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打造「自由中國」：

亞洲基金會與冷戰初期的臺灣（1952－1960）

Forging “Free China”:

The Endeavor of The Asia Found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徐祥弼

Hsiang-Pi Hsu

指導教授：陳翠蓮 博士

Advisor: Tsui-Lien Chen,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December,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打造「自由中國」：亞洲基金會與冷戰初期的台灣
(1952-1960)

Forging "Free China": The Endeavor of The Asia Found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本論文係 徐祥弼 君（學號 R08123006）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
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藍 翼 蓮

（指導教授）

藍 翼 蓮

王 梅 香

本論文寫作獲贈慈林教育基金會 2023 年「慈河獎學金」，特此致謝。



謝辭

涉足冷戰史領域，其實純屬意外。碩士班以來，先後構思幾個題目未果，最終才在指導教授的建議下，擇定以全然陌生的「亞洲基金會」作為方向。



由於臺灣的冷戰史尚在發展之中，說好聽點是藍海，實則履及荊棘之路。舉凡政策、運作乃至材料皆得自行摸索輪廓，遑論蒐羅散逸各檔案館的資料，或自眾多紙本出版品、刊物中淘選出有用的素材；而孤獨、茫然與惶恐，更是佔了書寫的絕大多數時間。不過意料之外的是，在追索亞洲基金會軌跡的過程中，我愈發意識到，這篇論文無意間串聯起過去幾年我所感興趣、關心的那些課題——流亡政權如何鞏固統治正當性與正統性，臺灣作為一個大寫的主體如何可能等等。距離我以華新街緬甸僑生來歷為題完成在大學期間的第一份報告數年過去，當時的懵懂、困惑與未竟卻在這篇論文獲得了解答。

老實說，在正式開始寫論文之前，總對正文前顯得叨叨絮絮的冗長致謝清單感到不耐，直至完稿的現在，才終於理解學術研究的不易，以及得之於人者太多。真要開始寫的此際，卻突然又不確定該如何下筆了。

這本論文得以付梓，首要感謝指導教授陳翠蓮教授的悉心垂詢與提點。老師百忙之中仍刻意撥冗回覆我的諸多疑惑，仔細審讀、斧正不甚成熟的論文初稿，而且屢屢囑咐注意文脈的簡潔，強化詮釋與論述主張。尤須感謝老師慷慨提供這篇論文的核心材料與思考，引介潛在受訪者，給了我後續撰寫論文時相當關鍵的指引與參照。而口試委員王梅香老師、藍適齊老師有關文化冷戰研究與理論的建議同樣十分寶貴，提醒了我書寫過程中若干的盲點，以使內文更為完善，得以進一步地與國內外冷戰史研究對話，免於孤懸一隅。

洪紹洋老師給予我在裕隆集團企業史計畫打雜的機會，以及提攜，亦令我銘感五內。不只為這份論文提供甚是重要的經費來源，期間整理、閱讀到的各式有趣檔案、期刊，老師分享的各式建議與資訊，每每皆拓展了我的視野與學術養分。還要謝謝秦曼儀老師、洪廣冀老師對於新文化史、科學史成果的引介與導讀，給了我另一種思考問題、想像世界的方式；感謝韓承樺老師提供有關國民黨史與王雲五先生經歷的資料與意見，作為這份論文部分段落正確性的核實。

另外，特別感謝亞洲基金會後期秘書王世榕先生、曾受資助的姚嘉文先生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承蒙兩位前輩為我釐清該會運作情形，提供執行層面與受援者觀點



的珍貴口述紀錄，可惜最後因論文方向調整而未能用上。調閱檔案方面，要感謝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蔡女士與國史館新店分館的賴女士等人行政方面的鼎力協助，以及系辦呂助教不厭其煩地協助我申請學校檔案與各類行政庶務，並解答我的各項問題。

寫作過程中，謝謝信豪、聖峰的意見交流與研究分享，每每刺激我的撰寫靈感與思考，並為論文初稿提供相當精闢的修改方向。期間，不可或缺的還有勝安、品硯、喻安、尹嚴、思儀、潘美、乃瑩、芊均、南彤、誌緯、貽柔、可祐、思安、建豪、柏穎、孟頤、昱書、幸麒的陪伴、笑鬧，並不顧研究生禮貌運動地關心論文進度，終於使這份論文不致中輟。也謝謝綾襄、小筑、子萱、馨慧、昱心的相互砥礪，時時提醒我研究路上受苦的不是只有我一個。

同時，還要感謝一直以來共同為轉型正義努力的台灣共生青年協會夥伴們的扶持與激勵，總彷彿暗夜裡的燭光，讓我確信追尋更明亮前方的過程並不孤單；當然更重要的是，數度以案子供養這份研究所需資金。謝謝豐恩與故事夥伴的看重，讓我有機會在史多禮與《觀臺灣》一起做有趣的事情、撰寫各式各樣的臺灣故事；這段期間的心靈上與財務上的收穫，亦成為了這份論文相當可貴的基石。另外，當然還得感謝當前科技的發展，檔案的陸續數位化，讓我們這個世代的數位游牧者得以無遠弗屆地拓展研究版圖。

最後，我想，這份論文得以寫就，最需要感謝的是家人們的愛與包容。儘管這幾年沒有太多回臺南的機會，卻仍時不時感受到家的溫暖，幸虧有家人們的支持，才使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完成這本論文。謹以此文獻給在昭和年代生長，經歷烽火以及漫長戒嚴歲月的阿嬤郭家秀女士與外公歐陽本田先生。



摘要

冷戰初期，美國政府積極圍堵共產黨中國對鄰近國家的滲透，唯恐亞洲赤化。中央情報局遂於 1951 年發起代號「DTPILLAR」隱蔽行動，意圖透過自由亞洲協會及隨後的亞洲基金會爭取亞洲民眾支持。為了拉攏廣大海外華人，亞洲基金會於 1952 年設立臺灣辦事處；將臺灣打造為「自由中國」一事，遂成該會行動重心。因亞洲基金會活動不只關係美國的心理戰布局，亦牽動受援國各領域發展，本研究運用臺灣與美國兩地政府檔案、亞洲基金會檔案、私人文書與報刊等材料，細緻考叡 1950 年代亞洲基金會在臺灣的運作，及其與受援方的合謀、協商或交鋒，旨在以受援國視角重寫臺灣在冷戰中的角色，並進一步析論美國政府在冷戰中對民主與反共理念的權衡，以及該會對「戰後臺灣國家」形成之影響。

將臺灣與東南亞華人視為連帶的構想，清楚反映在亞洲基金會的「美援僑教計畫」、「購贈《自由中國》計畫」。該會構想以此將臺灣打造為「自由中國」的樣板，吸引華人青年學生、智識菁英並強化其反共、自由傾向。另一方面，又因「自由中國」此一宣傳性冷戰構詞的名實不符，而使亞洲基金會與美國政府陷入「自由中國兩難」。本研究顯示，亞洲基金會與美國的冷戰計畫高度仰賴受援國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協助，相應政策與行動更受其牽制，或需與之協商。僑教案例顯示，美方往往必須依中共、東南亞華人政策而調整方針，並在一定範圍內默許國民黨政府滿足政權需要；資助《自由中國》一事，則透露冷戰中美國對第三世界獨裁盟友的政策矛盾，經常需要因現實反共需要而做出妥協。最終，由於現實考量，只是閹割性地導致臺灣的中國化，有關自由、民主的投資必須留待日後。

關鍵字：自由亞洲協會、美援、文化冷戰、海外華人、僑生教育、《自由中國》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U.S. government prioritized containing Communist China in Asi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initiated a covert operation named “DTPILLAR,”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CFA) in 1951 and its successor, The Asia Foundation (TAF). In 1952, CFA established a Taiwan office to engage Overseas Chinese,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promoting “Free China.” This research utilizes government archives in Taiwan and the U.S., TAF records, personal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to scrutinize the Asia Foundation’s operations in 1950s Taiwan, aiming to redefine Taiwan’s Cold War role from the recipient country’s perspective. The study dissects the U.S. government’s dilemma between free ideals and anti-communism during the Cold War, while evaluating the Asia Foundation’s impact on shaping “Post-war Taiwan Nation (戰後臺灣國家).”

Considering affili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ith Taiwan, the Foundation aimed to attract non-communist Overseas Chinese youth,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through the “U.S. Aid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rogram” and “Free China Fortnightly Distribution Program.” Paradoxically, the Cold War rhetoric of “Free China” led to a Foundation “Free China dilemma.” This study shows TAF’s and U.S.’ initiatives heavily depended on recipient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reveals U.S. policy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ance and polic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often tacitly allowing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meet its political needs. The sponsorship of the Free China Fortnightly exposes U.S. policy contradictions toward dictatorial Cold War allies, requiring compromises for practical anti-communist reasons. Ultimately, the initiatives resulted in a somewhat restrained Sinicization of Taiwan, and delay investments in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the future.

Keywords: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U.S. Aid, Cultural Cold War,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Free China Fortnightly

機構中英對照表



縮寫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AID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ARCI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
CFA	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	自由亞洲協會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美國中央情報局
-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華美協進社
CU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國務院美國教育與文化關係局
CUSA	Council on U.S. Aid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DPP	Deputy Directorate of Plans	美國中央情報局計劃局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國務院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美國國防部
DPP	Deputy Directorate of Plans	美國中央情報局計劃局
ECA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
ESA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gency	美國經濟穩定局
FOA	The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美國國外業務總署
Government	States of Government	美國聯邦政府
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
JCRR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MAAG	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美軍顧問團
MSA	Mutual Security Agency	美國共同安全總署
MSM/C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共同安全分署中國分署
NCF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	自由歐洲全國協會



NSC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OCB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美國政府行動協調委員會
OPC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	中央情報局策略協調辦公室
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美國戰略情報局
OSO	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	中央情報局特別行動辦公室
PSB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美國政府心理戰略委員會
RFA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亞洲電臺
TAF	The Asia Foundation	亞洲基金會
USIA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國新聞總署
USICA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美國國際傳播總署
USI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美國新聞處
VOA	Voice of America	美國之聲
YMC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會

亞洲基金會人員名冊 I：臺灣辦事處人員



英文名	漢名	職銜	任期
Ward D. Smith	施豁德	首任代表	1952/5 – 1954/9
David N. Rowe	饒大衛	第二任代表	1954/9 – 1956/6
Earl Swisher	史麟書	第三任代表	1956/7 – 1958/6
Lawrence G. Thompson	譚維理	第四任代表	1958/7 – 1959/6
Richard J. Miller	梅瑞強	第五任代表	1959/6 – 1960/3
L. Z. Yuan	袁倫仁	代理代表	1960/4 – 1960/6
Edgar Pike	白安楷	代理代表	1960/6 – 1965/7
		第六任代表	
L. Z. Yuan/	袁倫仁/	代理代表	
W. Mallory-Browne	馬博仁		
Lyman Hoover	胡籟明	第七任代表	1965/8 – 1967/11
Clare E. Humphrey	韓克嵐	第八任代表	1967/11 – 1972/6
Allen C. Choate	邱越倫	第九任代表	1972/6 – 1977/5
Frank E. Dines	?	第十任代表	1977/5 – 1979/12
Sheldon R. Severinghaus	謝孝同	第十一任代表	1980/1 – 1988/1
Edith Coliver	高懿德	第十二任代表	1988/1 – 1992/9
Harold Tsai	蔡增瑞	臺灣辦事處職員	1952 – 1970
C. H. Tsai	?	臺灣辦事處職員	1970 – 1972
Rex Wang	王世榕	臺灣辦事處職員	1972 – 1992
Grace M. Mullen	穆倫	代表助理	1952 – 1954
Ann Rohrer	羅勒	代表助理	1954 – 1958
William Schultz	舒茲	代表助理	1955 – 1958

*上述臺灣代表之任期，是以官有垣先生整理之「TAF 派駐臺灣的歷任代表一覽，1952 – 1992」表格為底，並參照雷震日記、政府檔案、亞洲基金會臺灣代表處檔案等修正。黑框處為其任期待考部分，期間多次由顧問袁倫仁與香港代表馬博仁代理。官原表參：官有垣，《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臺灣社會發展》(臺北，智勝文化，2004)，頁 39。



亞洲基金會人員名冊 II：總部人員及其他海外代表*

英文名	漢名
George H. Greene, Jr.	谷禮恩
Alan C. Valentine	衛倫亭
Robert I. Blum	卜蘭姆
Ray T. Maddocks	麥達克 ⁱ
James L. Stewart	司徒華
Harold J. Noble	諾布爾 ⁱ
S. T. Tung	董時進
Daniel Lew/ D. H. Lew	劉毓棠
L. Z. Yuan	袁倫仁
F. Chang	張福運
Henry James	香雅各
L. K. Little	李度
James T. Ivy	艾維
Robert B. Sheeks	許伯樂
Noel F. Busch	布許 ⁱ

* 由於亞洲基金會總部人員多半具備複數職稱，有關上述職員之說明詳參正文。

ⁱ 此處人員並未在官方小冊子或檔案紀錄中尋獲相應漢名，故直接英譯其名。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概念界定	5
第三節 研究回顧	8
第四節 史料介紹	19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22
第二章 自由亞洲協會的成立及其對臺灣的評估	27
第一節 美國中情局之「DTPILLAR」計畫	27
第二節 臺灣辦事處的設立	39
小結	57
第三章 在臺灣推展「僑生教育」計劃	59
第一節 東亞冷戰的新面貌	61
第二節 僑生教育計畫的開展	68
第三節 在「國民」與「歸僑」之間的海外華人學生	93
小結	105
第四章 亞洲基金會的「自由中國」兩難	107
第一節 《自由中國》初期動向與資金籌措	108
第二節 亞洲文化冷戰中的《自由中國》	116
第三節 亞洲基金會與蔣介石政府的衝突	129
小結	142
第五章 餘論	145
引用書目	155
附錄	180
附錄一、亞洲基金會成立之初的遠東政策（1951）	180
附錄二、葛萊克「臺灣僑生教育報告」25 點建議（1953）	182
附錄三、亞洲基金會臺灣辦事處 1961 年工作一覽。	185

圖次



圖 1- 1、亞洲基金會海外辦事處的「萬花尺 (spirograph)」運作模式示意	25
圖 2-1、1950 年中情局組織架構圖	31
圖 2-2、自由亞協的大鐘標誌	34
圖 2-3、中文版《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書影	42
圖 3-1、僑教撥款下之臺大新建宿舍內部陳設	81
圖 3-2、來臺僑生錄取人數一覽 (1951–1959)	91
圖 3-3、美援期間各校招收僑生人數 (1951–1965)	92
圖 3-4、來臺僑生主要來源分布 (1952–1962)	92
圖 3-5、1959 年亞洲基金會代表梅瑞強於歡迎會上致詞	104
圖 4-1、友聯出版品刊載的《自由中國》廣告	123
圖 4-2、《美軍生活》書影	126

表次



表 2-1、自由亞洲協會初期的八個部門及其工作內容.....	36
表 2-2、1953 財政年度預定執行之計畫項目	50
表 3-1、各年度赴共產黨中國求學之華人學生數（1951–1954）	68
表 3-2、1951 及 1952 年臺灣海外華人學生來源分布.....	71
表 3-3、1954 財政年度共同基金撥付各校擴充教育設施分配情形.....	79
表 3-4、亞洲基金會 1955 年財政年度計畫預算.....	87
表 3-5、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每年濟助僑生人數（1954–1958）	89
表 4-1、《自由中國》創刊初期海內外銷量.....	109
表 4-2、臺灣辦事處評估 1950 年代初期「最值得關注」的 24 本期刊....	118
表 4-3、1957 年《自由中國》月收入統計.....	127
表 4-4、外交部列出之《自由中國》問題文章篇目	13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

The drama of Taiwan lies in episodes as well as in perspective. – Lyman Hoover¹

1965 年盛夏，胡籲明（Lyman Hoover，1900 – 1977）²由亞洲基金會總部調任來臺，擔任新一任臺灣代表。這位戰前曾因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而到中國活動的傳教士，對於國民黨敗逃來臺灣後的發展歷程給出了如斯評價——臺灣的戲劇性實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數度遭遇威脅隨後卻一次次迎刃而解，並且利用美援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奮鬥史。字句間無不流露著對國民黨遭遇的同情。至於一度成形的反對黨與日本臺獨勢力，在他眼中則成了危及穩定與民族團結的不安定因素。他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評論頗耐人尋味：

這就產生了一個既痛苦又具有學術意義的問題：一個欠發達國家的人民——他們對民主可能只是膚淺的了解，也沒有長期的支持傳統——是否真的準備好、且有權享受充分的民主特權，並接受公民在民主發展中必須承擔的責任？³

這段話無非暗示後進國家的民眾並不清楚民主真義，指控一知半解地挪用民主可能會為現況的安定帶來風險。作為亞洲基金會的代表，他的此番言論雖然並不一定代表該會所有成員的想法，但顯然透露了部份美國人士對於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看法，亦即穩定且威權的政府遠比民主而動盪的地區更為戰後世界需要。

對於美國而言，為了維繫並鞏固自由世界，圍堵共產黨的滲透是必要的，其中可以與之抗衡的觀念要件即是民主，誠如美國在戰後初期駐中華民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1898 – 1991）所言，美國在臺灣的所有建設「事實上即是對於真

¹ “Country Report: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NEA Regional Conference Tokyo, Nov. 1–4, 1965.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50。

² 胡籲明（Lyman Hoover），出生於美國密涅瓦。1928 年進入耶魯神學院，又於兩年後因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前往北京，隨後輾轉前往上海，成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副會長。1948 年返美，並成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會董事，1951 年加入自由亞洲協會，於隔年成為該會紐約代表。其任內數度訪問臺灣，並於 1965 年 8 月接任亞洲基金會臺灣代表。Lyman Hoover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https://archives.yale.edu/repositories/4/resources/309>, accessed Nov. 13, 2023.

³ “Country Report: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NEA Regional Conference Tokyo, Nov. 1–4, 1965.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50。

正民主的貢獻」。⁴民主一方面作為反共的最終目標，不過美國同時卻又戒慎恐懼地防範民主淪為共產思想的溫床。換言之，要贏得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最大化美國的利益，短程目標仍是以確保穩定、秩序、和平的圍堵政策發揮效用。出自此種「權宜之計」的思維，美國愈發偏好「穩定」的右翼獨裁政權，與其攜手共商反共前景；並且確信惟有此種堅實的統治與信念，才能避免第三世界遭共黨滲透，並循序漸進地邁向現代化、民主化。⁵由美國人的觀點來看，國民黨政府的反共努力或許確保了第一島鏈乃至東亞秩序的穩定；然而，對生活在臺灣島上大多民眾而言，外來政權的穩定顯然不意味著美好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45 年盛夏結束以來，美國愈發憂心於極富吸引力的共產主義與蘇聯勢力對自由世界的滲透，動搖甫擺脫殖民的非共產主義（non-communist，簡稱「非共」）新興國家，危害戰後的秩序與和平。美國杜魯門政府（Harry S. Truman，1884 – 1972）遂自 1947 年起陸續展開一系列的心理戰工作與相應反共措施，形成以「圍堵」（containment）共產主義蔓延為核心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⁶相較於緊鄰蘇聯的非共歐洲諸國，美國評估亞洲當時不具立即性威脅，因此將其行動主力放在西歐。

誠如 W. Scott Lucas 指出，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的推展實為「美國的心理戰奠定了長期基礎」，在經濟層面落實了杜魯門主義的意識形態號召。為了遏止蘇聯宣傳攻勢，國會通過《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允許美國政府在承平時期進行對外宣傳工作與教育交換活動；美國國務院與中情局進一步暗中組織了如自由歐洲全國協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NCFE，簡稱自由歐協）、自由十字軍（Crusade for Freedom）、歐洲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等組織，利用「私營網絡」（'private' network）的形式進行宣傳，並以此回擊蘇聯共產且集權的統治。⁷同時，杜魯門政府亦自 1949 年起大力擴充中情局並

⁴ 卡爾・L・藍欽，《藍欽使華回憶錄》（臺北：徵信新聞社，1964），頁 310–311。

⁵ David F. Schmi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65–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

⁶ 冷戰史家 Gaddis 指出，正是杜魯門政府過於簡化地將對希臘與土耳其的援助總結為「自由對抗極權」，而使此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長期陷入「意識形態桎梏」（ideological straitjacket）。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50–352. John Lewis Gaddis 著，時殷弘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26 – 91。

⁷ Scott Lucas, “Campaigns of Truth: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American Ideology, 1951–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2, 1996, pp. 279–302. 《史墨法案》又稱《美國新聞與教育交換法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相關討論參：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 – 1970）〉，《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01，臺北），頁 79 – 127。

擴展其隱蔽行動範疇，重拾戰後一度遭放棄的心理戰行動；⁸並且於 1951 年 4 月成立跨部會的心理戰略局（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作為公開宣傳與心理戰的最高規劃、決策機構。⁹不過在韓戰爆發以前，上述行動仍高度集中於西歐各國與美國海內外民眾，亞洲或第三世界國家並未獲得杜魯門政府的過多關注。

1950 年末中共人民解放軍對韓戰的干預，成了美國總體冷戰布局的轉捩點——美國預期「中共狄托化」、拉攏中共對抗蘇聯的計畫泡湯，亞洲的區域風險升高。中情局更於 1951 年初警告，中共現下軍力極有可能同時出兵朝鮮、越南、西藏、緬甸等地，且佔領香港，或在東南亞國家展開顛覆活動。不過因忌憚於蘇聯可能的後援，杜魯門政府遲遲無法展開或資助直接軍事行動。¹⁰為加強對中共勢力的圍堵，美國調整過往「重歐輕亞」的對外政策，評估在東亞展開隱蔽行動的必要性愈發急切，如中情局便將強化各式隱蔽行動，列為該局在韓戰後的首要改進方向之一。情報史家 Rhodri Jeffreys-Jones 亦強調，出自美國民眾對熱戰的普遍反感，美國政府此後在規劃且執行冷戰行動時，更大程度地傾向於「依賴核威懾（nuclear deterrence），以及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的形式進行。¹¹

其中，「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CFA，簡稱自由亞協）及其隨後改組而成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TAF），¹²便有著舉足輕重地位。該會以「非政府組織」之姿，相當程度地張羅並支應了美國在亞洲的冷戰行動。該會的成立與早期運作，實屬美國冷戰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一環，以別於傳統經美國政府機構如大使館、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

⁸ 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0–62.

⁹ 著眼於蘇聯強勁的文化宣傳攻勢，杜魯門政府隨後發起「思想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 of Ideas）、「真理運動」（Campaign of Truth）、「特洛伊計畫」（Project Troy）、「學說項目」（Doctrinal Program）等多項心理戰略行動，瞄準蘇聯。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4–80.

¹⁰ “INR-NIE Fil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Jan. 17,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7, Part 2*, pp. 1512–1514. (hereafter FRUS)

¹¹ 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hird Edition*. pp. 63–65.

¹² 在相關資料中，有關 The Asia Foundation 譯名常見亞洲協會、亞洲基金等語，以下除直接徵引自史料原文，將統一以「亞洲基金會」稱之。而該會前身「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偶亦見省略冠詞的「Committee for Free Asia」），其譯名有自由亞洲委員會、自由亞洲協會、亞洲自由協會、自由亞洲基金委會等，本研究採用 1951 年國民黨內部譯名「自由亞洲協會」。因該會於 1954 年改名「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主要癥結點，便是去除「自由」以淡化冷戰色彩，因此以下提到 1951 至 1954 年的前期組織時，姑以「自由亞協」簡稱，以凸顯其性質。此外，冷戰期間以「亞洲協會」為名之組織，尚有日本外務省為促進與東南亞發展而於 1954 年在東京成立之「社團法人アジア協会」、渡辺鍊藏於 1955 年在東京為強化與亞洲人民反共聯盟聯繫而成立的「自由アジア社」，以及洛克菲勒三世（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III）於 1956 年在紐約成立之 Asia Society 等；但由於不在本文範圍，暫不特作名稱上的區別。

簡稱美新處)¹³所展開的公開宣傳(overt action)。而該組織在亞洲各國的活動，不只關係美國的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布局，亦牽動受援國內情勢走向。

以此回看胡籟明的這段話，似乎意味著亞洲基金會在臺灣的目標與行動，坐實了過往大多論者所認為：美國基於冷戰的反共需求，在戰後有意地扶持並鞏固了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威權統治？矛盾的是，胡氏之語隱約間又透露美國對民主品質的不懈追求，顯然認為「民主」若要在一地真正落實，必然得經過長期地薰陶與培養。換言之，這形成一種頗為弔詭的發展途徑——穩定且反共的威權統治，將構成日後真正民主社會的基礎。換言之，民主理念並不只是深化反共的要件，反共更是促成真正民主的前提。而美國究竟為「欠發達國家」做了哪些實際努力，使如臺灣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準備好」並適應民主社會？

誠如胡氏所言：「臺灣的戲劇性在於情節，也在於視角。」美國在戰後臺灣國家的形成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將成為本研究的起點。以下我將聚焦亞洲基金會於1950年代對臺灣的構想、評估與各式行動，細緻考察美國隱蔽行動的運作經過，如何呼應美國的冷戰目標；同時梳理該會在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與臺灣民間三方之間的合作與周旋，以釐清該會在受援國的角色與行動方針，如何一步步推展業務並落實其藍圖。透過這兩條相互糾纏的軸線，我將進一步重新評估美國對戰後臺灣國家形成的影響。

¹³ 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成立於1953年，並在世界各地設立美新處據點。該署於1978年與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U)合併，更名為美國國際通訊局(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gency, USICA)，並於1999年裁廢。誠如林鴻亦的提醒，過往將USIS譯為「美國新聞處」實有待商榷，美國的「資訊活動」(information)並不僅止於新聞相關事項，而更常帶有情報活動與政治宣傳(propaganda)性質；Laura A. Belmote更進一步指出，information與propaganda在這個意義上實可互通，美國政府亦刻意宣稱：這類『資訊活動』暗示著公正地重述事實，而不是為了影響大眾意向而雕琢過的言論(precisely calibrated communication)。但因「美國新聞處」之譯名慣用已久，以下仍將因襲沿用。見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RG 306),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foreign-policy/related-records/rg-306>, accessed Nov. 16, 2021. Laura A. Belmo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 7. 林鴻亦，〈美國的霸權與亞洲〉，收錄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新北：稻香出版社，2012)，頁275；鄧峰、趙繼珂，〈美國學術界對美國新聞署的研究綜述〉，《冷戰國際史研究》第9卷第15期(2013，上海)，頁223–250。



第二節 概念界定

(一) 中華民國與戰後臺灣國家

「戰後臺灣國家」一語出自若林正丈。就字面解釋，係指二戰後「以臺灣為範圍」的國家，即 1949 年後敗退到臺灣、實際統治範圍僅存福爾摩沙島的中華民國。不過就其內涵看來，蔣介石政權儘管以臺灣為範圍，卻無法忘懷於大陸「中國」，而試圖在島上移植「正統中國」——其政權乃是由外省人壟斷的少數統治，製造出一個近似殖民型態的「遷佔者國家」；後臺則有美國因冷戰利益所需，給予各方面的資助與扶持，使國民黨中國成為其「協力者政權」。¹⁴

戰後臺灣國家的形成，實係區域性的中國內戰與全球性的美蘇冷戰交織的後果。二戰結束後，經陳翠蓮所謂「戰後美中體制」的合謀，¹⁵臺灣逐步被嵌合進中華民國的秩序之中，形成「意外的國度」(accidental state)；¹⁶亦使得經日本長年的殖民統治影響的臺灣，日漸中華民國化。本研究論及戰後臺灣的政治局勢時，採用國民黨政府一詞理由有二：首先，以「中華民國」指稱 1945 年後對臺灣的占領及 1949 年敗仗後寄居臺灣的政權處境，內涵過於泛散、易致混淆；同時亦難以有效說明這個偏安政權的特殊性，以及臺灣本地歷史經驗的延續。二來，在若林正丈對這個名詞的解釋中，已十分敏銳地同時納入內戰與冷戰的狀態，並揭露此二者對於形塑「戰後臺灣國家」的同等重要影響。¹⁷

¹⁴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67–81。

¹⁵ 陳翠蓮所提出的「戰後美中體制」，係指美國在二戰後為維持其優勢地位及遠東秩序，而與國民黨中國基於共同利益展開合作，並帶有強烈的主從性格。在韓戰爆發、臺灣海峽中立化後，此一體制才與以意識形態鬥爭為核心的冷戰體制合流。見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臺北：衛城，2017），頁 17–22。

¹⁶ 「意外的國度」語出林孝庭，詳見：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臺北：遠足文化，2017）。

¹⁷ 對此，Immanuel Wallerstein 則質疑「冷戰」在亞洲的適用性。相對於傳統認為戰後世界局勢由美、蘇兩強主導，在第三世界如中國、越南與古巴等地實應是美國與蘇聯被動地捲入，成為當地民族主義領袖所利用、援引的資源，與發生於歐洲大陸的情況顯然大相逕庭。Gregg A. Brazinsky 亦指出，第三世界的冷戰儼然成為美國與中共的對抗，且背後實則涉及對雙方國際地位（status）的競奪。然而，在戰後臺灣國家的形塑方面，由於蔣介石政權的存續高度依附於美國的冷戰架構，本研究暫且仍採內戰與冷戰相互交織的框架。Immanuel Wallerstein, “What Cold War in Asia?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oston: Brill, 2010), pp. 24.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由於中華民國以「殘存國家」(rump state)之姿在臺灣續命，中國內戰的延續帶來漫長的準戰爭狀態，擱置戰時與戰後的分野，生成臺灣雜揉了內戰處境的特殊冷戰經驗。同時，這亦使得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間產生扞格。戰略層面，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統治實係出自備戰反攻心態，因而與美國力圖藉鞏固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和平圍堵共產主義蔓延的東亞冷戰布局有所落差。¹⁸理念層面，國民黨政府為強調其與共產敵人的不同所設計出「革命民主」此一衝突性修辭，與美國意圖藉深化自由、民主理念來抵禦共產主義大為不同。誠如宋怡明指出，戰後世界絕不只一場冷戰；國共內戰的冷戰化，亦非僅為美蘇冷戰的地方迴響或代理戰爭。¹⁹正由於內戰與冷戰重心的分歧，美國與國民黨政府雙方的衝突、協商與妥協在所難免，亦拉扯戰後臺灣國家的構成與走向。

爰此，我認為，藉由這樣一個並不具「國家實體」身分的分析性術語，將更有效錨定中華民國在戰後臺灣的位置，並評估「臺灣」與中華民國、美國在冷戰與內戰中的關係及角色，以免在內戰與冷戰間顧此失彼。因此，除去史料原文，本文指稱 1949 年後臺灣之國家體制時，將作「戰後臺灣國家」；論及統治集團時，則使用國民黨政府或蔣介石政府等稱呼。

（二） 美援與冷戰金援

臺灣社會俗稱的「美援」，主要係指基於 1951 年《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 of 1951)，美國對臺灣在軍事、經濟、技術等三大面向的資助，並交由 1948 年成立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Council on U.S. Aid, CUSA，簡稱美援會)規劃運用的各年度款項與貸款；終止於美國削減外援款項、評估臺灣已屬「美援成功的典範」的 1965 年。但廣義而言，臺灣實際受惠於美援的時間可溯及 1948 年，美方基於馬歇爾計劃的《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48)，在上海與中華民國政府簽定《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Economic Aid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¹⁸ 「東亞」進入美國外交視野相當晚近，戰前乃至冷戰前期多半使用帶有東方主義意味的「遠東」(Far East)一詞。事實上，兩者地理界線亦頗有落差，遠東更大範圍地涵蓋了今日的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等地。由於本文涉及之地理範圍大抵可被認知為廣義的東亞，因此除論及部分美國外交戰略規劃時仍不合時宜地採用遠東一詞外，其餘皆改作東亞或亞洲。

¹⁹ Michael A. Szonyi (宋怡明) 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317–328。有關多重冷戰的討論，除前揭 Gregg A. Brazinsky 有關美國與中共間的競爭，尚有 Jeremy Friedman 聚焦中國與蘇聯暗中對於非共國家的拉扯，每每描繪出更為複雜的冷戰圖像。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America)，部分金錢與物資隨之溢流至臺灣，美援會臺灣辦事處亦於該年成立；²⁰結束時間則因合約兌現的時間不一，截至 1970 年代才完全告終。²¹有關美援挹注對臺灣社會造成的文化位移、典範移轉等現象，過去亦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²²

另一方面，文學研究者則注意到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部份得歸功於各地美新處的挹注，於是受援國視角將美國的「資訊活動」(information) 納入「美援」範疇，提出「美援文化」、「美援文藝體制」等解釋。王梅香指出，美國直接或間接資助了「文化生產、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構成臺灣具「反共性、中國性、現代想像」的文學與文化樣貌，並打造出「美援文化」(U.S. Aid Culture) 景觀。²³陳建忠進一步具體為「美援文藝體制」，認為美新處構築出「一種更進步、更現代的文學典律」，擾動既存以反共文學為核心的「國家文藝體制」。²⁴儘管看似與國民黨八股、教條式的反共分道揚鑣，但論者咸認這兩者實則相互為用，藉更具吸引力的美式價值與文化回頭強化了反共宣傳，進一步打造出「民主的、反共的想像共同體」。²⁵

縱然「美援文化」、「美援文藝體制」的生成，當屬美國授意的冷戰成果，但此種對民間組織的私下贈款，實與經政府管道分配的金流大相逕庭。既然其經費係由不同部門、專案撥款，便說明這兩項「美援」分屬美國政府內部不同的冷戰分工，

²⁰ 文馨瑩，〈美援與臺灣的依賴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989)，頁 58–70；翁之鏞，〈美援運用分析之研究報告初稿〉(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55)，頁 1–11；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²¹ 有關美國軍事、經濟援助梗概，參見：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1985)；周琇環，〈美國的經援與軍援（1945–1965）〉，收錄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頁 285–322。不過，並非所有經《共同安全法案》通過的款項皆交由美援會分配。如曾信豪指出，「遠東難民計畫」(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FERP) 一項便是由國外業務總署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FOA) 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直接合作，而國民黨政府亦稱呼此筆款項為「美援」。曾信豪，〈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遠東難民計畫的國際合作（1954–19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3)，頁 12。

²² 楊翠華、范燕秋等研究者指出，美援下的技術投資，使得醫療專業技術養成逐漸由戰前的日本式嫁接到了戰後以美國為主的型態，詳見：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癲政策變動與患者人權問題，1945 至 1960 年代〉，《臺灣史研究》(2009，臺北)，頁 115–160；楊翠華，〈美援技術協助：戰後台灣工業化開端的一個側面〉，收錄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6)，頁 261–292。同樣的觀點亦常見於關於其他專業技術如衛生計畫、護理教育、電力工程等面向，或者有關美援對於飲食方面的影響，恕不一一列舉。

²³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5)。

²⁴ 陳建忠，〈「美新處」(USIS) 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 52 期 (2012，臺北)，頁 211–242。

²⁵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5)，頁 44–45。關於美國冷戰思維對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或以「美援文化」視角出發的分析，業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恕不一一列舉。

其運作渠道、目標與意義亦當有所落差。相較傳統「美援」藉提供物質與技術援助，協助改造戰後臺灣國家的體質，美新處或其他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贈款則多帶有文化冷戰的資訊活動意味，之所以在海外推銷自由主義思想與現代文學，亦有其冷戰考量。若因語意之便，將未曾獲《共同安全法案》援款的英殖香港的「美援文化」之說逕自挪用至臺灣脈絡，將「美援」擴大解釋為所有美國在冷戰中對臺灣的資助與影響，恐將招致混淆或定義不清之嫌。

為免一概而論，本研究後續論及的美援，將僅限於出自《共同安全法案》項目或經美援會分配的款項。至於出自其他美國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基於文化冷戰或心理戰目的之贈款，本研究將統稱為冷戰金援。需要特別補充說明的是，儘管特意釐清這兩類款項的異同，但不代表美援與冷戰金援撥款項目、對象逕渭分明。當其撥款單位的利益一致時，偶可見相互補充、支應的情況，最顯著的例子當屬僑生教育（詳參第三章）。

第三節 研究回顧

隨著蘇聯在 1991 年冬日解體、冷戰告終，愈來愈多檔案解密出土，研究出現更多可能性。冷戰史大家 John Lewis Gaddis 於 1996 年提出「『新』冷戰史」構想，期許研究重心從早先的外交、軍事、經濟等面向，轉向關注冷戰中更多元的權力運作。²⁶儘管招致論者批評，但也預示更為細緻、寬廣的冷戰研究，亦隨之出現「文化轉向」與「國際史轉向」。²⁷研究者試圖捕捉權力在意識形態與文化活動中的運作，以及冷戰對小國、各區域地緣政治的影響。²⁸迭出的研究成果，屢屢重構傳統冷戰論述與架構。以下回顧將依序聚焦三個層面：檢討美國文化冷戰行動的影響，受援國的肆應，並重估作為冷戰中介者的亞洲基金會的角色。

²⁶ Peter Kindsvatter, “Report on the Temple University Conference – Exploring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 Vol.26, No.4, 1996, pp. 12–19.

²⁷ Gaddis 隔年進一步將此一論點以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為名出版，引發學界熱議。不少人批評 Gaddis 的冷戰解釋重回傳統老路，過分強調史達林在冷戰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云云；同時抨擊他呼應 Francis Fukuyama 「歷史終結」式的解釋，不外乎老調重彈地間接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背書。相關討論可見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2, 1999, pp. 501–524. 戴超武，〈“新冷戰史”與當代美國外交史學思潮〉，《美國研究》(1999, 北京)，頁 38 – 51。

²⁸ 牛可，〈超越外交史：從外交史批判運動到新冷戰史的興起〉，《冷戰國際史研究》(2014, 上海)，頁 31 – 34。



(一) 受援國觀點的文化冷戰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首先於 1999 年出版 *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一書後，²⁹「文化冷戰」被推上了爭論的焦點，並被視為宣傳戰與心理戰的同義詞；有關美國對日常領域的收買、滲透與暗中宣傳的討論方興未艾。³⁰在 Saunders 「誰付了錢」的質問基礎，外交學者 W. Scott Lucas 進一步探尋經費與宣傳活動在受援國的運作渠道。他延用美國外交官肯南（George F. Kennan, 1904 – 2005）的觀點，將文化冷戰視為「政治戰」，提出「國家－私營網絡」（State-Private Network）架構。美國政府透過這組美國官方與民間組織共同搭建出的冷戰分工網絡，將資金與工作交付看似中立的特定學術團體、工會與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層層下滲、分派，以最大程度地深化美式意識形態。但 Lucas 亦補充，此網絡並非單向的發送與接收，受援方不只如操線木偶般行動；反之，這套網絡極具張力，雙方常處在「有時合作，經常緊張，但始終協商」的動態交涉。³¹

Hugh Wilford 進一步透過英國左翼的案例指出，受援方其實與美國的冷戰目標不謀而合，才產生看似「自我殖民」（self-colonization）或「受邀的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傾向，而非甘心作美方應聲蟲：「中央情報局試圖召喚一種特定的曲調；但吹笛者並不總是如願地演奏，觀眾也不總是隨之起舞。」³²換言之，所謂美國陣營的冷戰體制，應視為美國與受援方間心照不宣的共謀——受援方借美國的支持為己賦權、實踐理念，美國亦高度仰仗受援方協助擴散其意識形態。Lucas 給

²⁹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中文版見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2）。

³⁰ 部分研究者認為這類隱蔽行動實係二戰期間負責情報、宣傳工作的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與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工作的延伸。但亦有學者提醒美國這類對外干涉的政策，可能是「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心態的遺緒，或繼承自 19 世紀末英、法、德等國民間組織的對外交流風潮等。相關討論請見：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土屋由香著，林鴻亦譯，〈美國新聞總署公關宣傳活動的「民營化」〉，收錄貴志俊彥等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頁 25 – 44；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pp.1–21. Tony Smith, *Why Wilson Matter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Crisis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1.

³¹ Scott Lucas, “‘Total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A Commentary.” in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and Frank Schumacher ed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pp. 206–214. Scott Lucas, “Introduction: Negotiating freedom.” in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3–12.

³² Hugh Wilford,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Calling the Tune?* (London: Frank Cass, 2003).

出一個頗為精準的結論：美國替這些「非政府」的組織與個人提供了戰略眼光，促使其追尋更大的願景——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的社會。³³

換言之，美國在冷戰中的心理戰與宣傳工作不只直指蘇聯與中共等共產國家，亦瞄準同為「自由陣營」的冷戰盟友。Susan Buck-Morss 將冷戰視為「大眾烏托邦」(mass utopia) 的解釋，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切入點。她借用班雅明的「夢土」(dreamworld)一說，指出美、蘇雙方皆具重塑世界的熱望。基於對於自身意識形態的確信，以及對現代化理念的嚮往，意識形態迥異的政治決策者卻無不致力煽動大眾投身這場現實幻夢。³⁴觀念與現實相互滲透，於是夢成為了文化，而文化成了最根本的政治，如輻射塵般在無形之中對沾染到的個體造成全方面的影響，同時導致受援國日漸美國化。

Matthew Connelly 則提醒了殖民問題、第三世界在冷戰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美國憂懼亞、非國家串聯形成勢不可擋的反殖民浪潮，威脅其冷戰布局與利益。³⁵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 進一步指出，由於美國自以為有責任承擔後進國家戰後非殖民化過程中衍生各式問題，遂積極主導第三世界的國家建構、發展與認同。文安立尤其精準地定位：冷戰不只是消極性的「非戰狀態的侵略性圍堵」，更是「西方菁英的宏圖」之實踐。³⁶雷迅馬 (Michael E. Latham) 亦說明美國透過冷戰期間盛行的現代化理論，假科學與慈善之名，正當化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介入；現代化理念的最終目標是保護民主，進而「創造一個革命不再有吸引力的世界」。³⁷

³³ Scott Lucas, “Beyond Freedom, Beyond Control: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in the Cold War.” in Hans Krabbendam and Giles Scott-Smith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40–56.

³⁴ Susan Buck-Morss,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夢土」概念在冷戰中的作用，後來被 Giles Scott-Smith 等學者借來考察文化在東西歐集團發揮的作用；他們提出，傳統認為勢不兩立的自由、共產意識形態，在現實運作中的差異遠小於預期。Giles Scott-Smith and Joes Segal, “Introduction: Divided Dreamworlds?” in Peter Romijn, Giles Scott-Smith and Joes Segal eds, *Divided Dreamworl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East and W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³⁵ 近來，研究者皆同意冷戰與第三世界並非兩個獨立事件，冷戰中除了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僵持不下，還捲入南、北的殖民問題，參：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3, 2000, pp. 739–769. Jürgen Osterhammel and Jan C. Jansen 著，傅熙理譯，《帝國主義的末日：去殖民的風潮吹過亞洲與非洲，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版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頁 160 – 168、179 – 181。

³⁶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版見：文安立著，牛可等譯，《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圖書，2014)。

³⁷ Michael E. Latham 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Jennifer M. Miller 有關美國對戰後日本展開政治改造的討論，提供頗為鮮明的案例。他指出，由於美國將民主視為「精神狀態」，積極介入日本人心理的「重建」，以使其「渴望和平」並嚮往民主。大體而言，美國的行動可分三部分：首先是出手遏止各種潛在的「反民主」威脅；舉行各層級的選舉、資助教育與各式交流活動，以培養公民的政治、社會參與，打造出「心理強大的公民團體」；最後，聚焦經濟發展，致力將日本打造為繁榮且市場導向的高效經濟體，利用現代化與經濟增長鞏固民主政治所需的社會穩定。美國嘗試將日本作為在東亞的基地，一步步將民主、現代化理念傳播至鄰近國家。³⁸裴斗虎（Gregg A. Brazinsky）考察戰後南韓國家建設，同樣認為美國鞏固了反共獨裁政權並援助其戰後復興之餘，亦透過官方與民間機構扶持韓國的教育、媒體系統與新式官僚發展，潛移默化地強化公民對政治的參與以及自由、民主理念。這將成為南韓日後民主化過程中相當關鍵的異議勢力。³⁹

誠如 Miller 與裴斗虎的提醒指出，許多看似毫無關聯的美援撥款、技術輔導與文化交流活動，抑或私營機構的各類贈款，在協助後進國家現代化的同時，卻也指向更宏大的願景——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社會。是故吾人有必要進一步細緻檢視，美國透過官方機構及與其關係密切的「非政府組織」所資助的各式項目，如何藉由個別目標分進合擊，潛移默化地影響受援國政治發展。

（二）「文化冷戰」中的臺灣

欲使「大眾烏托邦」冷戰構想成功，美國須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干預內政的爭議，或引來第三世界國家有關遭帝國主義殖民經驗的非必要聯想。⁴⁰除以官方名義予以援助，美國更高度仰賴公開宣傳與隱蔽行動等文化冷戰措施的支援——這三項手段正是美國在冷戰中達成其冷戰目標的關鍵。

過去有關戰後美臺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美援項目的各類合作項目。首先將討論拉抬至國際冷戰格局的是前外交官唐耐心（Nancy B. Tucker）。她首開先河地指

Press, 2011).

³⁸ Jennifer M. Miller, *Cold War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³⁹ Gregg A.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⁴⁰ 1952年，美國國務院人員曾就美軍及其眷屬問題做過全盤評估，並指出：「在臺灣發展一個從屬殖民地（dependents' colony）會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刺激中國人的反美主義，並更難達成原定目標。」美國大使藍欽也警告：建造出這樣一個「小美國」並將生活與當地人全然分開來，「都體現了殖民主義的不愉快傳統」，或多或少提醒了受援國過去那段「亞洲的殖民年代」。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pp. 35–36.

出，美國多管齊下地利用官方機構、情報單位與民間組織積極參與戰後臺灣國家的塑造。她認為，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政策的實際影響雖頗有限，至少仍成功推動了臺灣社會的西化。⁴¹不同於唐耐心過於概括性地以「西化」通稱美國的資助成果，趙綺娜則進一步具體定調為「美式理想」的表現——親美且支持民主。趙綺娜梳理了美國政府單位對臺灣的各項交流計畫經緯。她指出美國政府試圖透過「教育交換」，在臺灣培植一批親美菁英、鼓勵具「進步思想」的黨國高層，並期待這群人返國後「成為美國理想或美國生活方式的傳播與宣揚者」，在未來影響國民黨當局的政策，鞏固臺灣民主發展並使臺灣成為「東亞民主政治的櫥窗」。不少受資助者確實在赴美參訪過程中具體感受到美國的優點，諸如民主、自由風氣，開始對美國抱有好感。如高玉樹、吳魯芹等人即視美式民主政治為臺灣當效法的楷模。⁴²

國務院及相關組織發起的交流活動之外，美國公開宣傳的另一研究熱點則為美新處所扮演的角色。不少研究者因前揭「美援文化」、「美援文藝體制」之說，而開始關注該處的各式文化宣傳工作及其後續對在地的影響。王梅香首先分析了美新處經廣播、圖書館、影音、刊物、翻譯出版等柔性資訊活動，並聚焦在美新處對港、臺文學產業的資助，如挪用《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及張愛玲作品等為美方在東南亞做反共宣傳。她強調美國藉由合作生產的方式淡化美國色彩、隱蔽權力，進而強化傳播「真實」、宣傳美國文化之效度。⁴³三澤真美惠分析美新處扶助港、臺二地電影產業發展，以期促成亞洲自由電影陣營的合作、支援網絡，以及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⁴⁴蔡明諺則檢視該處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簡稱農復會）合辦的《豐年》雜誌，指出美新處嘗試以最貼近臺灣農家的形式使其獲悉「真實」並「教會他們如何幻想」。⁴⁵柯裕棻發現，美新處基於冷戰宣傳需求製作的大量英語教育影片，恰好補

⁴¹ 由於該書出版甚早，該時相關檔案解密、開放有限，內容常見與史實出入；但該書宏觀地檢視了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方面的互動，並全盤性地納入了美國國家、私營組織的在臺行動，尚不失參考價值。唐耐心著、新新聞編譯小組譯，《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 至 1992》（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1995）。

⁴²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頁 79－127；趙綺娜，〈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臺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1，臺北），頁 97－163。

⁴³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5）；王梅香，〈麥加錫與美新處在臺灣的文化冷戰（1958－1962）〉，收錄游勝冠主編，《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臺北：里仁，2016），頁 101－148。

⁴⁴ 三澤真美惠著，蓋曉星譯，〈美國新聞總署和臺灣「自由」電影陣營的形成〉，貴志俊彥等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頁 85－107。

⁴⁵ 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臺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收錄游勝冠主編，《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頁 1－38。



足 1960 年代電視臺成立之初的節目闕如，並經此加深了臺灣的「親美文化景觀」。

⁴⁶陳曼華亦提及該處對臺灣藝壇帶來的刺激與視野的拓展。⁴⁷

另一方面，研究者亦普遍留意到「美援」對國民黨政府反共工作及臺灣教育體制的深遠影響，如黃金麟直指臺灣戰後高教發展實由「冷戰體系」主導。該文通論性地評估了美援款項與非政府組織對臺灣高教的援助，點出這些外來資金提供啟動臺灣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的關鍵基礎。美國藉由資助臺灣的教育及研究工作，以拉攏本地菁英對美式理念的支持。⁴⁸美援教育計畫雖涵蓋範圍甚廣，但因其援款於 1954 年後大多收束到了華僑教育計畫一項，美援對僑教的挹注因而成為研究重點。李盈慧、夏誠華、李道緝等人首先從國民黨政府的僑務角度，初步勾勒美國政府在尼克森訪臺後對華僑教育的擴充與發展梗概；⁴⁹范雅梅轉而將其置於國際冷戰脈絡，認為美國促進國民黨流亡政權的僑務工作的政策係應反共需要，方將自身形塑為廣大華僑的「代理祖國」。⁵⁰周正偉、陳月萍、鐘瀚樞等人後續進一步聚焦計畫執行經過及其成效，不過囿於史料開放有限，有關美國在這之中的角色多半側面提及；惟鐘瀚樞嘗試析論美國對遠東的整體戰略考量，直指此項援助係冷戰中美國「現代化的想像性投射」，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僑教計畫遠不如美國構想的全面。⁵¹

由於有關僑教的前行研究主要仰賴刊物及相關政府出版品，到頭來僅是描繪出一幅過於滑順而無孔縫的美援教育計畫。不但不見各方爭持、評估與協商，美國亦彷彿僅是被動地捲入了國民黨政府運行中的教育與僑務工作，各類援助款項亦成了協助反共工作的善意贈款。黃庭康隨後修正了此一看法。他著眼於臺灣官僚體系與高教院校在僑教計畫中的角力，認為美方的注資融合了利益不一的各行政部門，終於觸發臺灣的僑教發展；有關美援的動機，他則視為美帝國主義的展現，以

⁴⁶ 柯裕棻，〈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文化研究》33 期（2021，臺北），頁 285 – 323。

⁴⁷ 陳曼華，〈新潮之湧：美國新聞處美國藝術展覽與臺灣現代藝術（1950 – 1960 年代）〉，《臺灣美術》109 期（2017，臺中），頁 27 – 48。

⁴⁸ 黃金麟，〈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育，1945 – 1990〉，《台灣社會學》第 34 期（2017，臺北），頁 123 – 167。

⁴⁹ 李盈慧，〈1949 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暨大學報》第 1 卷第 1 期（1997，南投），頁 165 – 193；夏誠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1912 – 2004）〉（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2005）；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民國 39 – 47 年）的僑務工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31 期（2007，南投），頁 181 – 208。

⁵⁰ 范雅梅，〈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⁵¹ 周正偉，〈淺論美援與中華民國僑教之關係（1954 – 1965）〉，《東南亞華人教育論文集》（屏東：屏東師範學院，1995），頁 139 – 149；陳月萍，〈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 – 1965）〉（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鐘瀚樞，〈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美援教育計畫〉（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鞏固其霸權與全球影響力。⁵²可惜的是，由於黃氏僅運用國民黨政府及校務檔案，未能釐清參與計畫的各美方機構之構想、評估與投入情況，頗有理論先行之嫌，反而重蹈其所批評的一概而論覆轍。藍適齊有關政大新聞學系的案例研究，適時補充了黃庭康論調的不足。他闡釋國民黨政府與美方在僑生策略上的合謀，博取東南亞華僑學生支持之餘，更圖其畢業後協助反共工作與國民黨中國的正面宣傳。雖就其目的而言，成效不如預期，不過卻意外促成一個「跨國的華文媒體網絡」。⁵³

至於美國對青年群體的構想及相關教育計劃經過，則有張楊翔實地做了全盤性考察。他發現，美國格外積極攏絡青年群體的理由大致有二，係因其評估此年齡層人士有著性格上不成熟與理想主義等特性，「極易受共產主義操縱」；再者，美方期待這群日後將成為當地社會菁英的青年學子，左右群眾的反共／非共意向，甚至躋身政府高層影響政策。為吸引亞洲為數眾多的海外華人學生故，美方投注大量資金擴充臺灣、新加坡與香港三地的教育設施，從而帶動當地高教發展。⁵⁴張楊另外也注意到，亞洲基金會嘗藉補助亞洲各大專院校，打造一所所由美國資助的「隱形大學」；並透過協助建制化社會學、法學、國際關係、大眾傳播等勢將裨益於第三世界建設的「新專業課程」，以「美國模式」引導亞洲國家的現代化人才養成。⁵⁵

綜上所數，現有研究大多止步於國民黨政府內部的協商、執行經過以及最終成果，鮮少觸及美國方面的計劃與決策，美國與冷戰往往成了故事中順帶一提的背景。倘若未能廓清冷戰中美國對亞洲的目標、盤算與整體佈局，且僅著眼於單項目別的考察，恐有見樹不見林的風險，終究流於受援方的自說自話。如此可能只是再度深陷自主或依賴爭辯，並對評估該行動對受援國或區域的長期影響時有所闕漏。由於

⁵² Ting-Hong Wong, College 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6, pp. 331–357. 中文版見：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收錄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頁 83–116。

⁵³ 藍適齊著，川島真監訳，〈米援、台灣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教育、そして中国系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トランクショナル・ネットワーク援〉，收錄森口（土屋）由香、川島真、小林聰明編，《文化冷戰と知の展開：アメリカの戦略・東アジアの論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2），頁 325–359。

⁵⁴ 張楊同時強調，「國際教育與交流計畫」實係美國政府、私營組織、學術機構共同交織的冷戰網絡，三方經此形成「特殊關係下的利益共同體」。不過，因美國政府高層始終糾結於美國國務院的「交流」或國安機構的「隱蔽宣傳」等兩項迥異的定位，亦影響該項目的運作與成果。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⁵⁵ 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15，北京），頁 91–102；張楊，〈雙重文化冷戰：亞洲基金會援助亞洲大學項目探析〉，《二十世紀雙月刊》第 193 期（2022，香港），頁 105–119。



美國的援助或資訊活動並非只是援助者的一意孤行，同時高度仰賴受援國政府與團體的默許、協助，或者附和，美方亦經常依現況調整其冷戰行動。

相對於研究者已陸續探悉美國政府部門對臺灣展開的各類交流活動、出版品、影音、教育設施等各類資訊活動項目，有關非政府組織或主導美國隱蔽行動的中情局在這之中的角色，及其實際活動與影響尚有待進一步考察。本文首先將探明的問題是：美國如何因地制宜地設計其冷戰行動，妥適地交錯利用官、私機構開展行動，以使其在臺灣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脈絡中發揮最大效用？再者，誠如 Miller 指出，美國出自此種「對民主品質的迷戀，反倒助長了幾乎反民主的民主」。⁵⁶美國對外輸出的民主、反共理念常因其堅持與「權宜之計」考量，而產生拉鋸或衝突；並且很多時候妥協於冷戰的反共需求，而使民主理念及其實踐型態為反共構想所制約。美國在冷戰中對於民主、反共的抉擇與妥協，及其與獨裁政府的協商與交鋒，如何牽動戰後臺灣國家的內涵與現實，則是本文另一關注的重點。

（三）定位亞洲基金會

文化冷戰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美國在冷戰中的各式暗中投資與資訊活動，除了明顯由國務院、美新處等官方機構支持的活動外，尚有不少行動由與美國政府利益相近的「慈善基金會」發起。如 Saunders 在那份開創性的研究中，便強調這類非政府組織恰是美國政府在冷戰中「最好的也是最不讓人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⁵⁷外交史家 Giles Scott-Smith 更形容：『『美國文化傳教』最初是宣道會的工作，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則由慈善基金會接手。』⁵⁸

冷戰中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心照不宣，使得傳統習慣將基金會視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的解釋，必須作出調整，⁵⁹雙方之間勢必處於更為複雜的互

⁵⁶ Jennifer M. Miller, *Cold War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⁵⁷ 桑德斯指出，暗中協助中情局進行文化冷戰、撥款金援的「慈善基金會」有 170 餘個，除了較為人熟知的洛克斐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亞洲基金會之外，還有 Hoblitzelle Foundation、Littauer Foundation、Price Foundation、Whitney Trust 等機構。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頁 142 – 161。

⁵⁸ Giles Scott-Smith, “Building a Community around the Pax Americana: The US Government and Exchange Programmes in the 1950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Studies*. p.87.

⁵⁹ 此種「第三部門」的解釋，將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大致分為補充性 (supplementary)、互補性 (complementary) 與衝突性 (adversarial) 三類，認為基金會係對於政府施政的支援或監督，並經常與公民社會劃上等號。官有垣，〈第三部門與公民社會的建構：部門互動的理論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4 期 (2001，臺北)，頁 165 – 201；Meghan Elizabeth Kallman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eds, *The Third Sect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NGOs, and Nonprofi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動與競合關係。若徑自將這類機構認定為「國際援助」、「以贈款為主 (grant-making Foundation)」⁶⁰或以人類福祉為依歸的跨國慈善基金會，⁶¹實則削弱了贈款背後的意圖與權力關係，而貿然做出過度去脈絡化、去政治化的論斷。誠如吳翎君指出，洛克菲勒基金會對臺灣學術、農漁業、傳染病防治等面向的各項資助，實與冷戰意識形態息息相關。⁶²

Scott Lucas 為冷戰中政府與私人機構的共謀關係，賦予一種葛蘭西視角的解釋：「國家－私營網絡」。⁶³美國政府藉此更有效地推展資訊活動、鞏固其自身利益，此類非政府組織則從旁鞏固了美國霸權。有關冷戰中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國家－私營網絡」的建置與影響已累積不少討論，亦為近來研究熱點。⁶⁴

不過此種框架並不適用於對亞洲基金會的分析。該會與上述慈善基金會最大的不同，係其自成立以來始終獲得中情局的支持，當屬具高度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組織。⁶⁵官有垣、吳芝嫻依此將該組織視為「政府創設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GONGOs)，認為其活動主要係協助推動美國政策，實屬公權力的延伸。⁶⁶王梅香與李尚俊 (Sangjoon Lee) 等人則轉而將亞洲基金會界定為「類非政府組織」(quasi-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Quango)，亦稱準非

⁶⁰ 如王世榕、官有垣等人將亞洲基金會視為是以促進「發展」為目標，進而使受援方自發解決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王世榕，《第三部門：美國亞洲協會與台灣》(高雄：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1997)；官有垣，《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台灣社會發展》(臺北：臺灣亞洲基金會，2004)。楊翠華亦曾聚焦亞洲基金會對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的援助。然而，由於當時檔案開放有限，其論調僅延續王世榕的解釋，並未論及這筆款項背後的冷戰因素。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 (1999，臺北)，頁 41–103。

⁶¹ 薛月順，〈臺灣「草蝦王國」的形成 (1968–1988)——政府與民間扮演的角色〉，《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 (臺北，2010)，頁 139–176；薛月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臺灣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國史館館刊》第 36 期 (臺北，2013)，頁 99–139。

⁶² 吳翎君，〈冷戰初期洛克菲勒基金會對臺灣的援助〉，收錄貴志俊彥等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頁 109–131。

⁶³ Helen Laville 與 Hugh Wilford 兩人合編的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Studies* 一書中，收錄了不少關於冷戰中美國運用「國家－私營網絡」的案例。

⁶⁴ 相關討論可參：Inderjeet Parmar, “Conceptualising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Studies.* pp. 13–27.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Luc Dongen, Stéphanie Roulin, Giles Scott-Smith eds, *Transnational Anti-Communism and the Cold War: Agent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⁶⁵ 如周愛靈高度強調資助新亞書院的美國民間機構的「非政府性」，無視私營機構與美國政府緊密纏繞的聯繫，僅淪為重述傳統慈善基金會敘事的冷戰版本。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臺北：商務，2010)。

⁶⁶ 官有垣、吳芝嫻，〈臺灣的政府捐資基金會〉，收錄蕭新煌、江明修、官有垣編，《基金會在臺灣：結構與類型》(臺北：巨流，2006)，頁 212。



政府組織）。⁶⁷以慈善基金會的姿態在受援國活動，實為亞洲基金會的運作策略，嘗試藉此抹消其美國色彩，並增強美國資訊活動之效度。近來研究皆注意到了該會的此一特色，主要聚焦該會與亞洲受援者間的互動關係及雙方角色定位。

王梅香與 Christina Klein 的觀點相近，認為亞洲基金會提供的資金發揮了中介作用，後者更強調亞洲基金會發揮了近似於美軍基地「入境口岸」(ports of entry)的角色——提供創作者與文化產業所需之資金與協助，並引導當地公共文化發展，進而確保報刊、書籍傳播有利於美國的民主與反共思想。⁶⁸許卓則透過該會菲律賓的「民主種子」(Seeds for Democracy)項目，揭示了該會行動的高度彈性，發揮協調者(co-ordinator)作用，以協助受援者「受助自助」(aided self-help)。⁶⁹相對於王梅香、金進等人認為受亞洲基金會支持的友聯出版社同仁，收受美國援助仍具高度自主性；⁷⁰許維賢則翔實地檢視亞洲基金會檔案，批評友聯出版社僅表面自主，實則作為亞洲基金會在香港與東南亞的代理人，服膺於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宣傳工作。⁷¹李尚俊檢視亞洲基金會對亞太電影產業與東南亞電影節的注資，亦認為該會對電影業的介入實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展現，在支持文化生產者與智識菁英的同時，同時大力出手干預其發展。⁷²陳學然亦認為亞洲基金會在內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積極介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⁷³

礪山麻衣有關「學生問題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tudent Affairs, ISA)的案例則顯示全然不同的互動關係。亞洲基金會為反制 50 年代中後期日本國內愈發熱烈的反美情緒及帶有左翼色彩的學生運動，特別成立該機構並請來矢內原忠雄

⁶⁷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20，臺北），頁 123－158；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1.

⁶⁸ 王梅香，〈香港友聯與馬華文化生產：以《蕉風》與《學生周報》為例（1955－1969）〉，收錄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編，《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2），頁 9－34；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Cosmopolitanism: Period Style in 1950s Korean Cine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⁶⁹ 許卓，〈冷戰初期美國在菲律賓心理宣傳活動探究——從亞洲基金會的“民主種子”項目為例〉，《國際政治研究》202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16－133。

⁷⁰ 金進，〈冷戰 1950、1960 年代新馬文學：以《大學論壇》（新）和《蕉風》（馬）兩大期刊為討論對象〉，《台灣東南亞學刊》10 卷 2 期（2015，臺北），頁 41－79。

⁷¹ 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52 卷 2 期（2023，臺北），頁 65－113。

⁷² 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⁷³ 然而，此文有關文化冷戰之討論仍言必稱 Saunders，且有關美國官、私機構檔案皆採轉引，使其有關美國介入的論述顯得較為片面。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第 70 期（2022，臺北），頁 167－244。

(1893 – 1961) 出任所長。然而，由於該會嚴守作為「贈款」方的局外人角色，儘管不滿於機構的運作方針亦不介入，以致成果不敷亞洲基金會期待而關門。⁷⁴

至於其行動成效，傅葆石、羅永生、沈雙等人立場相近，認為亞洲基金會對友聯的資助成功提供不同身分人士發揮的平臺。傅葆石指出，亞洲基金會藉此成功串聯起流落海外的難民、移民，「為流亡者建立了跨越代際的溝通橋樑」。⁷⁵ 羅永生則表示，該社對外傳播的中華文化與新儒家思潮，為華人社群打造出「冷戰文化性基礎建設」(Cold War cultural infrastructure)，布置「香港華人的主體性」。⁷⁶ 沈雙同樣認為，亞洲基金會所進行的資訊活動，及其協助構建出的友聯網絡，打造出「資訊力量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forces)，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平臺上展開有關「中國性」內涵的跨太平洋且跨文化的翻譯工作。⁷⁷ Eugene B. Ford 對於東南亞（主要是泰國）佛教的討論中，則指出亞洲基金會試圖透過資助、宣傳與協助社區發展工作，以使佛教現代化、國際化並吸引僧人成為帶動反共輿論的在地倡議者，然而行動最後卻與預期頗有落差；該書提供相當新穎且精彩的視角，提醒宗教在冷戰中發揮的影響，豐富了文化冷戰討論。⁷⁸

另一方面，亞洲基金會背後的美國色彩，亦引發部分受援者擔憂，如蒲地典子與市原麻衣子有關「東洋文庫」的討論中，揭示在亞洲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 對該機構的補助曝光後，日本中國研究社群內部亦出現是否接受美國非政府組織贈款的熱議，並使受援者重新反思其自我定位問題。⁷⁹

⁷⁴ 亞基會儘管並未主動裁撤學生問題研究所，但由於該機構運作之資金皆來自於亞基會，其撤資決定即宣告研究所的廢止。Mai Isoyama (磯山麻衣), “The Asia Foundation’s Cold War Influence on Tadao Yanaihara’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Japa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31, 2020, pp. 201–221. 有關該機構之簡介，可參：「學生問題研究所資料」，東京大學學術資產等アーカイブズポータル，<https://da.dl.itc.u-tokyo.ac.jp/portal/assets/94efba10-e24a-47a0-a3ae-11f91dbcc67b>，檢索日期：2023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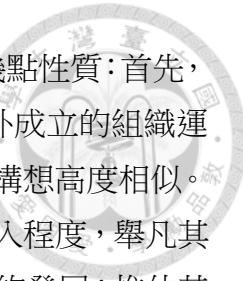
⁷⁵ 傅葆石著，秦雅萌、劉玲燕譯，〈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 – 1970（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73期（2019，香港），頁47 – 62；傅葆石著，秦雅萌、劉玲燕譯，〈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 – 1970（下）〉，頁67 – 82。

⁷⁶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1–151. 中譯本可參：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2015）。

⁷⁷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7, pp. 589–610.

⁷⁸ Eugene B. Ford, *Cold War Monks: Buddhism and America’s Secr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⁷⁹ Noriko Kamachi,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Debate of Japanese China Specialists over American Research Fun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 1975, pp. 981–994. 市原麻衣子，〈アジア財団を通じた日米特殊関係の形成？－日本の現代中国研究に対する CIA のソフトパワー行使－〉，《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260号（2015，名古屋），頁299 – 318。對於日本中國研究界的此一事件，紹軒磊亦曾聚焦1960年代爆發的「福特基金會事件（アジア・フォード財団事



上述案例雖然地點、性質各異，但仍反映了亞洲基金會運作的幾點性質：首先，該會並不以直接行動方式介入亞洲各國活動，更常利用現有或另外成立的組織運作，進而強化隱蔽效果及其真實目標，與前揭「國家—私營網絡」的構想高度相似。再者，該會對不同計畫的目標與構想亦有相當落差，進而牽動其介入程度，舉凡其介入程度較高的友聯與電影項目，就其初始目標看來當屬獲得較好的發展；推估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這兩類計畫實為跨國性的文化活動，亦較不具涉入政治的嫌疑，同時切合該會的宣傳行動。

綜上所述，亞洲基金會與受援國政府、受援團體間實處在相當複雜而動態的互動關係。亞洲基金會進入受援國，實作為外來且「非政府」的組織，為了有效地推展理念，自然需要在受援國政府的利益與美國政府的冷戰調度間拿捏得當；這也使基金會不只需要考慮反共與民主在其工作目標中的優先次序，更要忖度分寸以免觸犯當地政府的底線。這些權衡、周旋隨之左右了亞洲基金會的實踐，以及與在地行動者對反共、民主的協作過程，將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第四節 史料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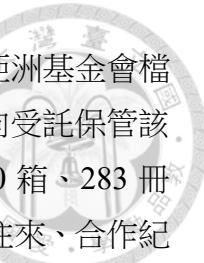
為釐清亞洲基金會與國民黨政府、臺灣社會交往經緯，並解答美國的冷戰活動如何影響本地社會、形塑戰後臺灣國家，須經對臺灣、美國官方與民間所留存的多層史料之翔實檢視及往復核實。大量檔案的解密與數位化，豐富了冷戰研究者的資料與視野，亦免於跨洋奔走、實地蒐羅之苦。本研究擬使用的材料，依性質大致可分成民間檔案、美國政府檔案、國民黨政府檔案、私人文書與報章等四類。

(一) 民間檔案

亞洲基金會總部資料 (Asia Foundation records，以下簡記作 AFR) 現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館藏，收錄 1951 年至 1991 年間各式業務相關資料，共計 697 箱檔案，內容舉凡與各國辦事處之工作信函、備忘錄、項目報告、會議記錄和財務資料等。⁸⁰本文有關該會臺灣辦事處 1950 年代各式工作的討論，主要利用編號 P-53、P-54 號箱。特別感謝陳翠蓮教授 2016 年赴美蒐集臺灣檔案時攜回此份檔案影像，

件」，細論不知情的受援者對美國帶有冷戰意圖的學術資助之反撲。紹軒磊，〈「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09，臺北），頁 71–90。

⁸⁰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1951–1996,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090158>, accessed Mar. 14, 2023.



並惠贈予我進行後續解讀、研究。⁸¹至於該會臺灣辦事處檔案（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目前特藏於臺大圖書館。此批檔案係蕭新煌、陳翠蓮於 2019 年向受託保管該會資料的中正大學官有垣教授協調下移交臺大圖書館典藏，共計有 30 箱、283 冊檔案資料。⁸²其內容較總部檔案留有更多該會與臺灣本地社群的通信往來、合作紀錄。本研究將藉由該會臺灣辦事處與總部間的各式通信、備忘錄以釐清其對當時臺灣社會與各項計畫的評估、構想與實際運作；同時利用該會與臺灣本地社群的通信往來、專案紀錄、預算與各式報告，與國民黨政府、美國方面的官方檔案相互對照，檢視各方考量與利益落差。

（二）美國政府檔案

國內現下有關冷戰與臺美關係的討論，多半利用經美國國務院揀選、輯錄的「美國對外關係」彙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FRUS），其內容多屬方針性的上層外交決策。⁸³至於美方駐外單位在現場的各式評估與政策細節，本研究則將輔以「美國國務院中央檔案機密文件」微卷（*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與其後陸續解密的美國官方資料，以及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簡稱中情局）檔案，以釐清美國駐臺北大使館的考量與實際活動。除了 1950 年代間有關臺灣的 FRUS 檔，本文亦將大量利用國務院微卷中有關 1950 年至 1963 年間對國民黨政府政治、教育現況及華僑問題等相關文件，以釐清美方態度、考量與後續政策制定。⁸⁴同時亦利用「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兩個資料庫中未藏於上述任一資料集中的行動協調委員會與國務院檔案。

對本研究尤為關鍵的材料尚有美國中情局檔案。不同於 FRUS 檔已為大多政治史、外交史學者重視，作為供給華盛頓大量情報且主導大多隱蔽行動進行的中央

⁸¹ 目前不少亞洲基金會總部高層、臺灣代表業已將其個人書信、日記、藏書、備忘錄等私人材料捐贈美國學術機構典藏，如耶魯大學藏有該會會長卜蘭姆的「Robert Blum papers」、胡佛研究所藏有二任臺灣代表饒大衛的「David Nelson Rowe papers」、科羅拉多大學藏有第三任臺灣代表史麟書（Earl Swisher）相關資料等。然而，由於這些個人資料皆尚未數位化，因疫情之故與本研究的實務限制，論及上述相關人物及其檔案時，暫且轉引自現有研究。

⁸² 〈臺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資料移交過程與清冊〉（2019 年 3 月 26 日），陳翠蓮教授提供。

⁸³ 美國政府基於資訊自由的法律，陸續將外交相關的歷史文件數位化公開於「Office of the Historian」網站，網址：<https://history.state.gov/>。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0 日。

⁸⁴ 國內目前收有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微卷處，有國立臺灣大學、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等地。本研究主要利用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0–1954、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5–1959 Pt.2、CHINA 1960–January 1963 Internal Affairs 等三件檔案中的十數份微卷。

情報局檔案使用者仍頗有限。中情局成立以來的各類文件，已隨著《資訊自由法案》（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記作 FOIA）而陸續數位化於「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網站。⁸⁵本文將利用中情局保留的「DTPILLAR」計畫三卷檔案，解析亞洲基金會及其前身自由亞洲協會在 50 年代的運作。另外，中情局檔案亦見於民間發起、非營利的「Internet Archive」網站。⁸⁶該網站較系統性地分類了檔案內容，且包含了其他檔案館或研究機構來源的中情局資料，部分未能在前述中情局網站檢得的檔案則參照此資料庫。

（三） 國民黨政府檔案

中央各部會與亞洲基金會往來之紀錄，主要見於國史館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簡稱近史所）庫藏的《外交部》檔案；除部分已數位化外，本研究所需之大多關鍵檔案仍須親赴國史館新店館區查閱紙本資料。其中保留不少舊金山總領事館對亞洲基金會的動向匯報，以及該會與國民黨政府間往來的書信、會議記錄等內容。至於庋藏於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的臺灣省政府警務處檔案中，亦留有一卷保安機關對該會的偵監紀錄，透露有關單位對該會在臺有組織性活動的審慎提防，可供吾人一探臺灣辦事處成立初期之內部動向。

另外，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典藏的《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中的美援會、安全分署等相關文件，以及檔案管理局近年公開的《僑務委員會》、《行政院》檔，則提供本研究有關僑生教育方面的關鍵材料。其於如臺灣大學校務檔案與現藏於政治大學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亦補充有關該會運作的部分細節。

（四） 私人文書與報章

由於亞洲基金會補助、往來對象主要為非官方的私營組織，大多不見錄於政府檔案，是故本研究不可或缺的最後一類材料即為受援單位及臺灣社會留存的各式資料。如雷震日記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近年入藏的「雷震、傅正檔」等人物私檔，即提供相當完整且豐富的內容，信函與日記中亦常見雷震個人的情緒。另外，本研究同時輔以顧維鈞、王雲五、胡適、沈鎧、黃杰、鄭彥棻等人留下的零星紀錄，以及美援僑教政策受益者的僑生口述、為文回憶，與檔案相對照，呈現受援方的故事。

⁸⁵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 accessed Mar. 15, 2023.

⁸⁶ About the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about/>, accessed Mar. 15, 2023.

在報章方面，除《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公論報》等業已數位化之官、民營報刊，及其轉錄的中央社電訊中，所報導的亞洲基金會動向則可作為上述各類檔案之補充。至於受亞洲基金會補助之社團，如大陸雜誌社、自由中國社、聯合國中華民國同志會或相關僑生團體，我亦將利用機關誌或相應出版品中的有關討論、記述，以彌補未能一窺其內部檔案之憾。

綜上所述，本研究大抵仍以檔案為依。透過檢視立場不一的多方檔案，並比對報章雜誌及相關私人文書的說詞，以推敲、拼湊出冷戰初期亞洲基金會在臺灣的運作。本研究亦將藉此進一步辨析該會與美方、所在地政府、受援機構間的立場差異，及釐清其與官、私機構各方的互動、評估、協商與折衝，重新定位這類冷戰「非政府」組織對受援國的作用及其角色，並且進一步析論該會及美國勢力對於「戰後臺灣國家」形成之影響。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誠如陳翠蓮指出，過去的戰後臺灣政治史敘事多半止步於「壓迫－反抗」敘事，而忽略國際情勢的影響；而中華民國史研究往往延續傳統外交史途徑，導致社會與民眾在其討論中隱形。⁸⁷另一方面，近來新冷戰史的文化轉向、南北轉向，愈發著眼於兩強對峙以外的東歐、第三世界國家的角色，嘗試廓清小國在冷戰中的策略與行動，以及冷戰對於後進國家帶來的形成性影響。本研究旨在延續上述理念，從受援國角度出發，並參酌現有外交史、政治史雙重取徑，深入考察亞洲基金會及其冷戰金援對於 1950 年代戰後臺灣國家形塑過程的涉入及後果。

羅永生過去曾經提出「文化基礎建設」的解釋，用以說明美國冷戰資金所串連起的難民知識分子網絡與文化事業，最終形塑出香港身分認同與港人的主體性。⁸⁸本研究嘗試在羅永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心靈基礎建設」的理解框架。以受援國的視角，重新評估美國在冷戰中利用各類心理戰、隱蔽行動、資訊活動等行動對於目標國家發展與政治意向的影響。美國在冷戰中的一切政策與行動，不啻反共需要，更往往帶有對第三世界的建設性考量。一如基於《共同安全法案》所撥交的各項援款，鞏固了受援國的軍事、技術或經濟發展基礎；美國亦積極透過各類宣傳、

⁸⁷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臺北：春山，2023），頁 33–34。

⁸⁸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pp. 131–148.



資訊活動與隱蔽行動，亟欲藉反共、親美、現代化、民主等理念強化受援國的心理素質，以建設出理想的「大眾烏托邦」。

Brian Larkin 指出，基礎建設不僅關乎物(things)，亦指涉物之間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things)；一方面作為支撐諸多「他者」運作的平臺，另一方面亦可視之為體系的運作本身。⁸⁹本文所提出的「心靈基礎建設」解釋，亦非物質性的實體，或僅止於馬克思式的比喻，而是關乎受援國民眾的政治認同及其對國家的想像——美國透過冷戰中的一系列資助、合作與隱蔽行動等布局，多管齊下地使民主、自由且反共傾向的價值觀扎根於受援國社會，在人民心中築起防備共產思想的堡壘，成為落實自由世界「大眾烏托邦」之基石。另一方面，誠如益田肇(Masuda Hajimu)在那份頗具啟發性的研究揭示，「冷戰」之所以成為普羅大眾的現實，實則來自於人們因對戰爭的恐懼而建構、傳播出去的想像情境；每個社會不約而同地以「冷戰」之名，清除可能危及戰後穩定與秩序的危險因子，進而回過頭強化了美蘇對抗的全球版本「冷戰」敘事。⁹⁰構建出一地大眾烏托邦的「心靈基礎建設」，必然有著本地行動者的高度參與，或者提供了行動萌芽的可能性，方使美國的行動有了著力的基礎，前引 Miller 與裴斗虎有關日、韓的討論已清楚展現此點。由於美國的冷戰布局關乎對戰後世界「大眾烏托邦」的藍圖，往往有賴受援方的協力，本文將「心靈基礎建設」定位為美國與受援方共謀、合作下的產物。

本研究認為，美國的「心靈基礎建設」工作所蘊含的重塑想像，提供了受援國日後發展的參照路徑，以及其構思、界定自身現實與夢想的基礎。換言之，「冷戰」被鑲嵌進了所身處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之中——這呼應了 Gordon Johnston 提出的「冷戰文化」解釋，亦即冷戰對個人行為模式、生活態度與思想結構等的全方面影響。⁹¹吾人有必要從 Johnston 針對冷戰如何影響文化、日常生活領域的叩問，進一步延伸質問：冷戰多大程度地參與並形塑了第三世界國家？而美國在冷戰中打造的「心靈基礎建設」又如何影響受援國發展？

這意味著，冷戰之於現實不應止步於背景性因素的理解，而須進一步考察其所帶來的形成性影響。由於這類隱蔽真實意圖的「心靈基礎建設」大多無關政治，經常被標示為反共與美國化，經常在過往政治史與外交史的討論中遭忽略。然而，由

⁸⁹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42, 2013, pp. 327–343.

⁹⁰ Masuda Hajimu, *Cold War Crucible: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Postwar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⁹¹ Gordon Johnst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Vol. 35, No. 3, 2010, pp. 290–307.



於戰後臺灣國家自 1949 年以來便深受冷戰與內戰的夢想與現實所塑造，其發展往往受制於美國的各式行動，是故吾人有必要將國內史的議題進一步置於跨國的冷戰情境中重新理解。

再者，本研究嘗試藉此修正過往將美國的冷戰行動視為「政治宣傳」或「意識形態戰爭」的解釋。若單純將冷戰中意識形態之傳播與落實過程看作「戰爭」，有再次重繪美國中心的冷戰系譜之風險，而將受援國再度陷於被動且受制處境。誠如文化史家 Roger Chartier 提醒，閱讀不必然意味著相信。Chartier 認為盧梭等思想家對於觸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可能相當有限；革命之所以成真，或許得歸功於政治諷刺、淫穢小冊子的風行，使大眾產生一種「更自由、更漫不經心且批判式的閱讀方式」，進一步解構了既有權威與價值觀。⁹²美國在冷戰中的宣傳與資訊活動亦然。由於資訊輸出端與接受端的落差在所難免，若只著重宣傳層面，易於陷入藉官方的眼光來窺探、設想「大眾」的陷阱，而對實情有所偏誤。美方的意識形態之所以得以在自由陣營與非共國家發揮作用，並非單純倚仗這類交流、出版、翻譯、發行等項目，部分看似與宣傳工作無涉的援助工作同樣發揮關鍵效用。此外，若僅以「宣傳」視之，亦可能忽略「國家－私營網絡」中基層行動者的協力動機，難以確實評估這類行動對受援國帶來的積極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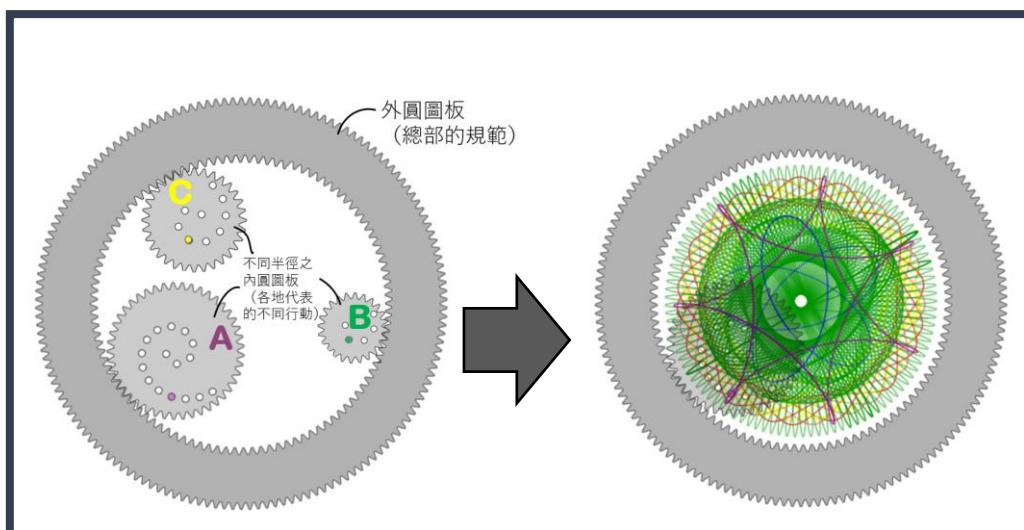
至於有關亞洲基金會的角色，本研究總結該會行動有三項特色：首先，誠如亞洲基金會前身自由亞洲協會總部於 1952 年所制定的《行動準則》(Operations Manual) 中提到，各地的代表除了執行總部的計畫之外，還需努力發掘當地有潛力的議題，並與當地人共同合作執行。⁹³本文認為可將亞洲基金會總部與海外辦事處間的互動關係，視為一種萬花尺 (spirograph) 式的運作模式：各地代表必須在不超出美國國策的範圍內，制定最符合當地社會民情所需的計畫。萬花尺由邊沿有著類似齒輪的內圓圖板，及有內齒輪大型圓孔的外圓圖板兩層構成：當不同半徑的內圓圖板齒輪貼合著圓周轉動，其筆跡將沿著擇定的圖板，描出一道貼著圓心轉動、如花朵般的規則螺旋圖案。(見圖 1-1) 而自由亞協派駐亞洲各地的代表，便是在內圓板半徑殊異的筆洞間，配合所在國的需求、制定出適合所在國的方針；不過其一切行動始終貼合相同的「反共」軸心。儘管依循迥異軌跡且最後繪出姿態各異的繁花，但終究還在總部與中情局所規範的邊界內，打造符合自由世界期待的反共圖像。

⁹²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⁹³ Ray T. Maddocks, “Operations Memo No. 2: CFA Functions in Asia,” Mar. 12, 1952, DTPILLAR, Vol. 1, 0008.

再者，在亞洲基金會的對外宣傳與實際行動上，別有用心地淡化該會的美國色彩，強化行動表面的「非政府」偽裝，使其贈款成為看似慈善基金會般的促進社會發展之基金會，進而為中情局「隱蔽行動」招致最大的成效。最後，由於此項隱蔽行動係以「非政府組織」形態運作，中情局與總部方面亦強調各地辦事處不得與當地政府發生衝突，且須嚴格意識到自己的「客人」身分，必須節制其對內政的涉入尺度，以免引來所在國當地民間團體與政府的懷疑或者不滿，進而影響該會活動推展。本文將此種行動定位稱為「共謀的局外人」，亦即亞洲基金會縱然與受援國當地共同發展計畫，推進其冷戰目標；不過仍須時時注意自身角色，以免過於突出而破壞隱蔽行動本質，或者使其自身政治色彩過於強烈而引發反感。

圖 1-1、亞洲基金會海外辦事處的「萬花尺（spirograph）」運作模式示意



來源：筆者自製。

本研究深入審視亞洲基金會 1950 年代在臺灣的活動交往。該會自 1952 年起以「非政府組織」的姿態來到臺灣展開各類隱蔽行動，勢必得與反共卻威權的蔣介石政權合作，計畫執行過程中的各式評估、交往、中介、斡旋與衝突。包括緒論及結語，本文共計五章。

亞洲基金會的前身——自由亞洲協會在冷戰初期的籌備、佈局，以及背後中情局設立的「DTPILLAR」計畫的詳細規劃，是第二章談論的重點。我將在這章理清亞洲基金會與中情局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及該會臺灣辦事處在 1952 年開設經過、各項評估與行動。

第三章將聚焦美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共同發起的一項合作案——「僑生教育計畫」。事實上，美援僑教工作之所以得以推動，實為艾森豪政府政策轉折後的結



果，本章將梳理此項計畫運作經緯。一方面，析探美國 1950 年代中國政策變遷，以及對亞洲華人的評估與構想，將僑教工作重新放回冷戰脈絡中檢視；另一方面，微觀檢視受援方的僑生來臺後的就學與適應情形，嘗試側面回應此一政策的影響與成績，如何牽動臺灣社會與高教發展。

第四章則將焦點轉向亞洲基金會購贈《自由中國》半月刊經過。不同於美方與國民黨政府在僑教的共同合作，《自由中國》的案例呈現全然相反的情況。該會起初有意藉支持這份刊物影響海外華人社群意向，但隨著雷震等人言論愈發尖銳，歲導致亞洲基金會陷入政治爭端。我將利用此一衝突案例檢視並評估該會涉入受援國政治的尺度，如何斡旋於各方之間並維持其底線。

總而言之，本研究透過亞洲基金會的視角，重新考察 1950 年代臺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並利用僑教與《自由中國》兩個案例重新評估美國在臺灣的戰後發展中的角色。不同於過去普遍強調戰後的第一個十年的政治高壓威權、社會百廢待舉，本研究呈現了海外華人與「自由中國」的密切來往，而穿梭兩者之間的是亞洲基金會與美國，臺灣恰成為他們號召廣大海外華人的集結點。「自由中國」成為了各方行動者的最大公約數（當然不包括臺灣人），亞洲基金會、美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抱持著不完全相同的自由中國願景與構想，共謀性地投入了臺灣島的重塑工程——打造出一個「自由中國」，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華人來歸，而非隔海的共產中國。

當然，這個「自由中國」在不同行動者間有著全然不同的含意與偏重。各懷鬼胎的結果是，「自由中國」最終成了遙不可及的冷戰夢想，一個之於海外華人的政治宣傳樣板，有志者的努力終究未竟，無法落實呈現實，甚至回頭導致了「自由中國兩難」——自由民主理念，以及冷戰反共考量的具體權衡。是故本研究以「打造『自由中國』」為題，檢視非政府組織、政策制定者、獲援助的民間團體與個人在這過程中的涉入、行動、遭遇與相互關係，以及權力如何在這之中運作，從而影響「自由中國」的構築或者導致歪斜。而這份研究的時間段落在 1952 年至 1960 年，展開在亞洲基金會正式於臺灣展開活動的 1952 年，結束在《自由中國》購贈案遭強制中止、僑生教育政策不再資助新來僑生的 1960 年。



第二章 自由亞洲協會的成立及其對臺灣的評估

第一節 美國中情局之「DTPILLAR」計畫

(一) 籌組自由亞洲協會

為了圍堵中共對亞洲鄰近國家帶來的威脅與滲透，中情局負責隱蔽行動的政策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簡稱策協辦）於 1951 年 1 月提出代號「DTPILLAR」之心理戰專案，並於 2 月 7 日通過。¹政策協調辦公室係在 1948 年據國家安全委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簡稱國安會）NSC 10/2 文件指示設置，促使中情局成為日後美國「隱蔽行動」的主導者。該號文件賦予美國政府「拒絕承擔任何責任」的權力，中情局得以展開宣傳戰、經濟戰，以及支持地下抵抗運動、自由世界中岌岌可危政權下的反共人士。該部門擴展迅速，經費在 1949 年至 1952 年間成長了 17 倍，並建立如自由歐洲全國協會及其下的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RFE）等組織。²

策協辦計劃仿效「自由歐洲全國協會」的組織模式，在加州招集三位熱衷公共事務、與亞洲有商業或其他緊密聯繫的民間有力人士，籌組一個與中情局密切合作，目標為煽動並動員亞洲民眾加入反共行列的全新組織。最初的構想是希望這個組織能作為自由歐協在亞洲的翻版，因而將其取名為「自由亞洲協會」。³不過自由亞協與自由歐協最大的不同是，後者的目標是「鐵幕」內的東歐國家，前者則主要針對亞洲非共的自由國家。⁴同年 3 月 12 日，自由亞協以「慈善機構」的名義向加州政府登記成立，並於 5 月 18 日正式對外公開。⁵

¹ “Project DTPILLAR.” Jan. 26, 1951, DTPILLAR, Vol. 2, 0052. 引自「Internet Archive」網站，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DTPILLAR/>，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10 日。（美國中情局所藏的「DTPILLAR」計畫檔案，皆引自該網站，以下省略網址。）

² 策協辦隨後因為與主導間諜工作的特別行動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 OSO）因行動與權責上的衝突，兩者在 1952 年 8 月被合併為計畫局（Deputy Directorate of Plans, DDP）。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hird Edition*, pp. 56–70. “NSC 10/2,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rective on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June 18, 1948.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pp. 713–716.

³ 中情局內部直接將自由亞協相關工作標示為「策協辦專有計畫」(OPC Proprietary Project)。“Project DTPILLAR.” Jan. 26, 1951, DTPILLAR, Vol. 2, 0052. “Recommended Financial Plan for OPC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Mar. 1, 1951, DTPILLAR, Vol. 1, 0097.

⁴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s to the President,” Jun. 30, 1953. CIA Records, i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5076de59993247d4d82b59ab. (URL will be omitted below, and hereafter FOIA.)

⁵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TPILLAR, Vol.1, 0001.

策協辦作為自由亞協的成立者，同時也負責組織營運、管理之責。該會董事會核心，交由事先所選定的三位民間企業負責人主持，並邀請其他舊金山當地理念相近的企業家、社會領袖加入，與策協辦密切合作推展其冷戰工作。董事會成員在加入前，須通過中情局的安全審查，以免洩密或危害美國政府整體布局。⁶比起董事會成員的資格只需是反共、愛國的傑出人士，更為困難的是得找到合適的人選主掌自由亞協運作，並出任會長一職——由於自由亞協實係執行策協辦心理戰構想的檯面上組織，在彼時美國心理戰資源大力投入歐洲的背景下，要找到熟悉亞洲事務的心理戰人員實屬不易。幾經尋覓，最終請來谷禮恩（George H. Greene, Jr., ? - ?）先擔任代理會長。谷禮恩畢業於密西根大學，於戰前被派駐上海擔任花旗銀行總經理直至 1949 年，戰時曾加入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中情局前身），戰後出任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中國分署工業重建處處長。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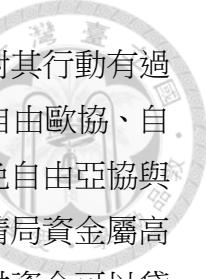
自由亞協會長的另一個身分，則是由策協辦聘任的執行秘書。儘管策協辦已與董事會核心成員建立極為緊密的聯繫，但要確保各項行動吻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且使該會目標及行動嚴實地服膺於中情局政策，執行業務的會長自然亦須出自中情局人馬；另一方面，亦能協調將來策協辦在路線、任務的意見上與董事會可能產生的任何摩擦。⁸為使自由亞協的工作發揮最大作用，需要極力限縮知道該會與中情局關係的人士，執行端僅有零星核心職員與策協辦的僱員知情，且其雇用前需受安全審查，受雇後亦需簽署保密協定。⁹

⁶ “Project DTPILLAR.” Jan. 26, 1951, DTPILLAR, Vol. 2, 0052. 相關人員譯名取自《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San Francisco: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1951)，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⁷ 谷禮恩（George H. Greene, Jr.）擔任自由亞協代理會長的任期，只維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後來很快地被衛倫亭（Alan Valentine）取代。谷禮恩卸任後則轉赴東南亞進行經濟相關研究。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5–28. “Alan Valentine Named Head of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San Francisco Examiner*, Dec. 12, 1951, 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⁸ “Substantive Operational Control of DTPILLAR.” Aug. 13, 1951, DTPILLAR, Vol. 1, 0045. 例如，自由亞協與中情局縱使大抵有著隸屬關係，但會長如谷禮恩已有中情局的背景，仍需向自由亞協的董事會爭取支持，以利行動推展。谷禮恩為此還寄了封自薦信給 Brayton Wilbur，他強調：1950 年代，對東方的心理戰工作有經驗與認識的只有軍人，但若是任命他們將會帶給亞洲民眾錯誤印象；行動若要在亞洲獲得成功「必須有足夠的公眾關係基礎」，且負責人最好是能「不費力地在公眾面前有良好表現的公關人員。」“A Personal Statement on Your Memorandum of July 12th, concerning appointment of a President for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Sept. 20, 1951, DTPILLAR, Vol. 1 0044.

⁹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TPILLAR, Vol.1, 0001.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因此，儘管自由亞協的公開身分是非營利組織，但為排除贊助者對其行動有過多的置喙空間，仍亟力避免公開募捐。¹⁰組織初期的活動經費部分由自由歐協、自由十字軍等單位提供，部分則仰賴中情局及美國政府的資金支持。為免自由亞協與中情局間的關聯遭披露，而危害其心戰工作，用來支持自由亞協的中情局資金屬高度機密，需以隱蔽管道轉移至「DTPILLAR」專案，如內部便評估預付資金可以貸款形式提供。隨後，中情局更於 1955 年設立了另一個名為「亞洲基金」(Fund for Asia) 的慈善基金會，該組織表面係由美國東岸各州的知名人士倡議成立，實則做為將中情局的資金轉給自由亞協的中繼站；同時亦公開對外籌募基金，暗中補貼自由亞協的活動資金。「亞洲基金」的工作方向、募款與核算，大抵依照自由亞協各年度的計畫修正調整，其金流亦皆依中情局指示運作。¹¹截至 1959 年，支持自由亞協運作的資金幾乎全數來自於美國政府，僅有極少部分來自於私人基金會。¹²正由於自由亞協初期的經費主要來自於中情局，自由亞協日後的行動規劃及預算亦須交由策協辦審核。換言之，該會的工作皆可視為受到中情局的直接支持。

在自由亞協成立前夕，策協辦大方向性、扼要列出了五項宗旨，列入自由亞協即將制定的章程。然而，與其說這些宗旨將提供自由亞協日後行動的參照，不如說這是不違背中情局政策、不會造成問題，並能凸顯美國冷戰目標的官方樣板說詞——策協辦補充，會如此撰寫的目的正是「這些條款夠籠統、無害，以遮掩我們的實際意圖，且又能滿足法律要求」。¹³這五項宗旨如下：

¹⁰ “Project DTPILLAR.” Jan. 26, 1951, DTPILLAR, Vol. 2, 0052.

¹¹ “Recommended Financial Plan OPC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Mar. 1, 1951, DTPILLAR, Vol. 1, 0097. “DTPILLAR-Cover-Funding-Raising.” Sept. 25, 1953, DTPILLAR, Vol. 2, 0040. Frank G. Wisner, “CFA Budget for FY-1955.” Jun. 25, 1954, DTPILLAR, Vol. 2, 0034. 自由亞協縱然刻意隱避其資金來源，及其與美國政府間的連結，但成果與預期頗有若差。如中華民國舊金山總領事多次向外交部指出，自由亞協收受國務院、中情局補助，政策經常受其指示或與之磋商。「張紫常呈葉公超函」(1951 年 11 月 13 日)、「外交部收電」(1952 年 2 月 26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¹² Memo of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 Jan. 23, 1959 [DDE's Papers as President, NSC Series, Box 11, Special Meeting of NSC 1/22/59],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research/online-documents/declassified-documents-fiscal-year-2010>, accessed Mar. 21, 2023.

¹³ “Statement of Purposes to be Included in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TPILLAR, Vol. 1, 0065.



- (一) 促進及協助亞洲個人及國家自由之運動，以反對共產主義及其他極權主義。
- (二) 關於此種運動，本協會得以直接或間接發起，協助，或辦理及研究等工作；並研討對此種運動之關係，以各種聯繫之方式，採取，搜集，分析，刊印，廣播，散步和分送有關之資訊。
- (三) 協助亞洲各國之非共產及非極權分子，以實現及維護個人與國家自由之理想。
- (四) 協助亞洲各國非共產及非極權之旅外僑民，難民，及被放逐者與其本國人民保持聯繫，以期保存及促進個人和國家自由之理想，並予以種種便利其所需設備，使此等僑民，難民，及被放逐者能在法律上對維護自由之運動有所貢獻。
- (五) 為實現上述之宗旨及目標，本協會得以募集及接受款項；並得管理及運用之，或將款項之一部分授予，分派及支付為促進此等目標及宗旨之其他任何組織。¹⁴

為了強化自由亞協的民間性質，並完成美國的冷戰需求，該會雇用的基層人員與顧問，刻意選用不少具華裔前官員或社會賢達身分之人士；美籍幹部階層方面，亦多聘請具中國經驗者出任，強化與東亞諸國的連結，以利其會務推展。¹⁵另一方面，策協辦亦計劃讓該會透過援助亞洲國家的民間團體（如宗教團體、華人社團、商會等），強化其反共能量之餘，同時擴大自身在亞洲各國社會的影響力，進而成為當地「資金、理念、素材的中央結算所」（central clearing house of funds, ideas, and materials）。之所以選擇民間團體，係因策協辦擔心，若自由亞協過度涉入當

¹⁴ 這段宗旨亦為該會立案章程之內容，並於 1951 年 3 月 12 日呈加州政府秘書處存案。“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TPILLAR, Vol. 1, 0001. 譯文引自《自由亞洲協會計畫書》，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¹⁵ 職員方面，除前揭曾任行政院參事之董時進、劉毓棠等人，尚有曾任上海《虎報》總編輯袁倫仁（L. Z. Yuan）協助該會編輯部、前中國關務署署長張福運（F. Chang）參與亞洲行動部門之工作。美籍幹部方面，除代理會長谷禮恩曾參與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工作、華僑聯繫部主任香雅各曾任嶺南大學校長外，首任會長衛倫亭副手麥達克（Ray T. Maddocks）則是二戰期間魏德邁將軍參謀長、亞洲行動部主任司徒華（James L. Stewart）曾於重慶執行心戰任務、紐約代表李度（L. K. Little）是前中國海關外籍總稅務司、學生聯絡部及香港代表艾偉（James T. Ivy）曾協助美國援華救濟委員會（The China Relief Mission）及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業務、人事及辦公室經理 Autumn Mead Ryan 曾參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會長助理 Florence Cross 則曾任上海電信公司與上海美國商會行政工作。舊金山總領館亦注意到該會內部的人員組成，並評估麥達克、司徒華、艾偉等人立場較親國民黨，華裔職員大多積極「糾正美人錯誤觀點」，對該會是否支持國民黨政府此一問題頗具信心。「駐金山總領事館快郵代電」（1951 年 9 月 10 日）、「Information from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1952 年 5 月 1 日）、「駐金山總領事館快郵代電」（1951 年 5 月 15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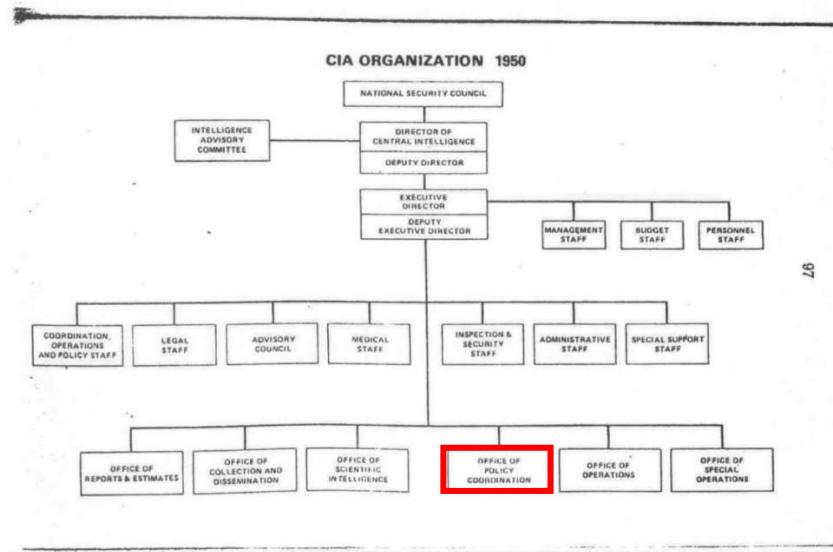
地政治，恐招致不當聯想，於是放棄了自由歐協在歐洲的經營模式——要求自由亞協不該也不能在亞洲各國建立全國性的委員會，同時亦禁止該會將自身定位為所在國政府的壓力團體，或向當地異議性組織提供支援。¹⁶



(二) 自由亞洲協會的初期方針與任務

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於 1951 年 5 月通過題為「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政策與行動方針」的 48／5 號文件，為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刻畫出更清晰的輪廓，並指出亞洲成為當前對美國利益的最大威脅。隨著自由亞協逐漸步上軌道，陸續開始展開在亞洲的任務，中情局遂進一步指示，自由亞協日後的行動方針與各式計畫，必須遵循該文件的規範，以及策協辦內部制定的冷戰策略。¹⁷事實上，在中情局設立的法源依據《國家安全法》中，即明白指出該局實係國安會的下轄組織，行動方針基本受其決策指導；中情局依法須將有關國家安全情報活動呈報予國安會，國安會再視重要性將軍事、政治相關情勢向總統提出建議。¹⁸隸屬於中情局行動部門的策協辦，以及受策協辦扶持成立的自由亞協，亦當需依循國安會的決議。（關係圖請見圖 2-1，策協辦為紅框標示者）

圖 2-1、1950 年中情局組織架構圖



來源：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Organization Charts, 1947–75, 2016，引自「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CIA-Organization-Charts/CIA-Chart-1950.jpg>，檢索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

¹⁶ “Project DTPILLAR.” Jan. 26, 1951, DTPILLAR, Vol. 2, 0052.

¹⁷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¹⁸ 〈1947 年國家安全法中涉及的中情局部分〉(1947 年 7 月)，收入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捌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頁 491－492。

目前，學界有關 NSC 48／5 號文件的討論，多半聚焦這份文件透露的美國對臺灣、東亞政策的關鍵轉折，¹⁹尚未有人檢視 NSC 48／5 號之於亞洲文化冷戰的影響。由於該份文件提供了自由亞協行動的關鍵指引，有必要花點篇幅解釋，美國在這份文件中所定調的亞洲政策與方針，以及其之於美國冷戰策略的意義。

NSC 48／5 號文件強調，亞洲最大的威脅乃是由克林姆林宮與中國共產黨所對外輸出的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一方面，蘇聯積極將共產主義思想滲透進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奪得大陸地區的統治權，此種「亞洲性的、革命式的、反西方的政權」在亞洲的迴響熱烈，同時極可能使移居亞洲各地的華僑響應其號召。²⁰而彼時美國在亞洲的首要關切是：透過美國的援助，讓亞洲各國發展出穩定、自立的非共政府，有意願與能力圍堵共產主義滲透、維繫國家安全，並在政策上向美國靠攏。²¹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要推翻中共政權，或使其與蘇聯產生嫌隙的難度過高。再者，亞洲多為戰後方獨立的新興國家，美國亦難以直接照搬在歐洲的工作模式；而且其國內問題繁多，舉凡缺乏基礎建設及基礎教育、殖民與戰爭導致的經濟失序問題，影響民眾對戰後民族主義政府的信任，給了共產主義趁虛而入的空間。再者，相對民主的西方色彩往往使當地人連結到白人殖民剝削的記憶，共產主義在亞洲則經常摻入民族主義色彩——縱使當地政府自發打壓共產勢力，看似與美國同一陣線；究其實情，仍與美國期待的「親美」頗有落差。²²

相較於該文件中正面闡明的政策及目標，吾人或許更需要注意到美國在亞洲行動所掣肘之處；那些美國難以透過外交的官方手段解決的問題，便需利用如自由亞協這類不具官方色彩的組織。國安會當時評估，美國的行動可能在東亞遭遇的障礙主要有九項。其中，依其內容可大致分成四大類：共產理念的高度吸引力、亞洲非共國家內部／之間的不穩、第三世界對西方的不信任態度、美國尚未在亞洲培養出可仰仗的勢力。²³這四類障礙構成美國對亞洲文化冷戰佈局的目標、政策和行動方針雛形，且大多被落實到自由亞協日後的工作項目之中。

¹⁹ 該份文件有關華府官員正式鬆口支持蔣介石政府、承諾保衛臺灣的討論經過，張淑雅已有相當精彩的解析，詳參：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 158–178。

²⁰ NSC 48/5, NSC Staff Stud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 1951. *FRUS, 1951, Vol. 6*, pp. 33–64.

²¹ NSC 48/5, Statement of Policy on Asia, May 17, 1951.

²² NSC 48/5, NSC Staff Stud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 1951.

²³ NSC 48/5, Statement of Policy on Asia, May 17, 1951.



另一方面，由於亞洲非共國家間並不團結，其文化、語言等更是紛雜多元，美國政府認為須針對亞洲國家分別制定不同對策，並且時時調整計畫，才有機會能「在相互信任且基於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立起與亞洲國家的聯繫」。然而，若要依國別制定政策、執行美國政府的冷戰布局，便需要足夠且具相關經驗的人員派駐當地。這些人員除了要在能力及理念上獲得美國方面的認可，亦需避免帶給受援助的亞洲國家「殖民化」、「美國化」印象，以免背道而馳。²⁴

NSC 48／5 號文件中透露的隱憂，不少正是策協辦成立自由亞協的理由。就自由亞協而言，美國在亞洲的解方必須透過彰顯其「非政府」、「私人組織」的性質，從表面上的組織定位、內部人員到合作的對象皆然。國安會的指示進一步確立了本文在前一章提及的「萬花尺」互動模式與「共謀的局外人」自我定位。透過因地制宜地制定最適合當地的計畫，並且在介入當地的同時又謹慎保持距離，自由亞協格外小心翼翼地在亞洲國家推展其冷戰行動。

「共謀的局外人」構想在該會於 1951 年發行、題為《致美國所有亞裔學生的一封信》的一本小冊子中，更是表露無疑。自由亞協一方面努力展現其作為亞洲國家「局外人」的身份，撇清其作為西方國家潛在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幫兇嫌疑，並強調不願插手他國事務、與政治無涉的清高姿態；另一方面，卻又積極暗示其可作為非共亞洲國家的「共謀者」，拉攏不願列隊於自由或共產陣營的第三世界國家領袖，表明尊重其政權的獨立與革命性格之餘，隨即轉身將侵略的標籤貼回共產勢力。這樣的構想，不啻是自由亞協的自我定位，亦成為其日後行動中嚴守的界線：

作為非政治性組織，自由亞洲協會不打算與任一政黨或領袖的共事。
本會的原則、目的與意向明確。……僅尋求亞洲不具官方色彩的公民合作。……本會清楚瞭解，任一個國家在國內事務上都存在政治團體的差異。在這些問題上，本會將不偏袒任一方。本會支持的是每一個主張國家的獨立性、反對暴政及帝國主義的亞洲政治團體。今日的帝國主義，即是共產帝國主義。²⁵

²⁴ NSC 48/5, NSC Staff Stud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 1951.

²⁵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TPILLAR, Vol. 1, 0001. 由於這本小冊子設定的讀者是學生，因此特別強調，若要維護亞洲的自由，避免「流經中國的紅色浪潮繼續淹沒鄰近國家」，需要自由世界的學生一同努力，展開行動（student campaign）喚起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學生挺身捍衛其自由與誠信。為此，自由亞協在這本小冊子中列出 14 道問答，釐清讀者可能的疑惑；引文出自這本小冊子的第 12 個問題：協會將對亞洲國家的政黨採取何等態度？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A message to all Asia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page number. 引自「Internet Archive」，

相對於自由歐協目的是為了遏止蘇聯對歐洲帶來的威脅，自由亞協的大敵則是中共。在當時該會的出版品、信紙上，伴隨該會名稱出現的標誌是一具來自北京孔廟的大鐘。（參圖 2-2）自由亞協之所以選擇大鐘作為該會形象，不外乎使讀者產生「自由鐘」的聯想；並強調這具鐘的低沉音調，過去「象徵著寬容世界中的社會道德標準的平靜與和諧」，而未來將在「自由之中響起。它的鐘聲，乃是對那些獻身於捍衛自由、人類的解放與瓦解奴隸制度的人們的頌歌」。²⁶

圖 2-2、自由亞協的大鐘標誌



來源：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Prospectus*. (San Francisco: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1951), no page number. 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其實，早在 3 月初，策協辦便已將「DTPILLAR」計畫的目標設定為「特別針對中國進行的心理戰行動」。²⁷這項目標，在自由亞協成立後亦未見調整，中共、滿洲地區與北朝鮮等共產化的地區理所當然成為其頭號目標。為了削弱中共對外輸出的共產主義理念的可信度，並爭取東南亞為數眾多、與母土關係緊密的海外華僑支持，甫成立的自由亞協的首要之務是：打破共產政府對於「自由談話、自由求知、去學習自由傳播真理」的封鎖。²⁸簡言之，便是強化資訊的流通、人員在自由世界中的各式交流，藉此打造自由的風氣，以及別於共產主義觀點的另一種聲音，來鬆動共產世界嚴密的壁壘。其次則鎖定甫脫離殖民、國內秩序尚不穩定，且政府的非

<https://archive.org/details/messagetoallasia00comm>，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²⁶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A new approach to the vital need for freedom in Asia*. (San Francisco: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1951), no page number. 引自「Internet Archive」，<https://archive.org/details/newapproachtovit00comm>，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²⁷ “Recommended Financial Plan for OPC Proprietary Project DTPILLAR.” Mar. 1, 1951, DTPILLAR, Vol. 1, 0097.

²⁸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共立場仍搖擺不定的東南亞諸國。²⁹最後才是自由亞協評估「已具民主風氣、獨立且政治上更為成熟」的日本、菲律賓、印度等國家，以確保民眾的反共信念不被動搖，並在合理的範圍內協助人們實踐成就。³⁰

不過隨著美國政府愈發意識到海外華人對其冷戰布局的潛在風險，自由亞協很快在同年底更新了其行動順位，轉而將海外華人獨立出來並列為其目標之首。該會對海外華人的行動主調大抵有四：培育親美的華人領袖以影響海外社群、否定共產黨認定的關鍵領袖與菁英、扶助中國難民中的重要人士、訓練人員投身情報工作或戰時任務。³¹出自對海外華人與中共聯手的忌憚，自由亞協甚至為此成立了「海外華人聯繫部」，瞄準「出生於美國與中國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的第二或三代中國人」，密切關注與各地華人留學生團體及非政治性社團間的來往。³²該會隨後在亞洲展開的工作亦高度集中華人相關項目，其花費一度高達總經費三分之一。³³

雖然自由亞協已有了初步的目標，不過在「DTPILLAR」專案開始的 1951 年，有關計畫的施行方式、行動的執行等各實務面問題事實上仍處於摸索、嘗試階段。由於組織的路線、目標及整體規劃仍未底定，相關設備與人員安排的問題仍待解決，且尚須與亞洲各國政府接洽於當地成立分會相關事宜。因此在最初的階段，中情局指示首要之務是提升自由亞協的知名度，使其工作為亞洲人所接受、習慣，該年度的幾項主要工作宣傳意義多半遠超出實質內涵：如開辦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RFA），捐贈 1,000 噸新聞紙給南韓政府印小學教科書，以及接待西藏達賴喇嘛兄長當彩活佛（Tak-tser Rinpoche，1922 – 2008）赴美治療等。³⁴

²⁹ 在 NSC 48/5 號文件中，更具體指出了美國政府應當在東南亞應施行的具體方針，摘要如下：1. 強化東南亞近海的防禦計畫。2. 繼續東南亞的新聞與教育交換計畫（programs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3. 鼓勵東南亞與自由世界的商貿往來。4. 提供印度支那軍事援助、鼓勵其進行內部的改革。5. 致力使印度尼西亞政府遵循非共政策，使其更大程度地參與自由世界。NSC 48/5, Statement of Policy on Asia, May 17, 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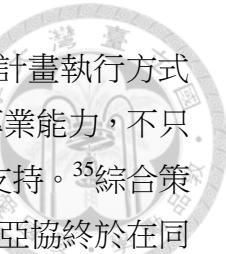
³⁰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在 NSC 48/5 號文件中，除了強調美國要努力讓日本從佔領階段過渡到恢復主權狀態的過程中，有幾項目標：1. 發展適當的防衛武力。2. 強化日本的經濟穩定，以支援亞洲其他非共地區的發展。3. 建立起適切的心理計畫（psychological programs），引導日本人走向自由世界、遠離共產主義。NSC 48/5, Statement of Policy on Asia, May 17, 1951.

³¹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 17, 1951, DTPILLAR, Vol. 1, 0022.

³²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 George H. Greene, Jr. to Mr. Alan Valentine. Dec. 12, 1951, DTPILLAR, Vol. 1, 0023.

³³ Frank G. Wisner, “CFA Budget for FY–1955.” Jun. 25, 1954, DTPILLAR, Vol. 2, 0034.

³⁴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此外，該年度的工作尚有如補助舊金山的《少年中國晨報》發行、印發《紅色中國的洗腦》(Brain Washing in Red China)小冊子、翻譯《童軍守則》(Boy Scout Manual)、調查香港書店出版情形等。“Comparison Programs of January 2, 1952 and August 1, 1952.” DTPILLAR, Vol. 1, 0003.



幾個月的試驗下來，中情局對於自由亞協運用美國公民協助的計畫執行方式頗為滿意：認為此種與民間合作的特定計畫，仰賴合作者的聲望與專業能力，不只減輕了策協辦的工作負擔，更能額外獲得社會領導層與社群方面的支持。³⁵綜合策協辦內部的評估，以及國防部、國務院等政府機關人員的建議，自由亞協終於在同年年底確立其組織的目標、政策與行動方針。中情局責成該會必須完全擺脫美國標籤，更大程度地「亞洲化」。具體像是將大部分工作（包括自由亞洲電臺）從舊金山轉移到亞洲各國，並加強與亞洲當地組織的合作；補充而不重複美國官方主導的各類行動，作為美國政府冷戰中的後勤奧援。³⁶

（三）自由亞洲協會的工作定位

自由亞協首任會長衛倫亭（Alan C. Valentine，1901 – 1980）於 1952 年就任。他曾於 1935 年起擔任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長，並於 1942 年擔任中國聯合服務社（United Service to China）董事。1946 年起擔任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董事，於 1948 年起主持馬歇爾計畫在荷蘭的工作，並被杜魯門政府延攬為經濟穩定局（Economic Stabilization Agency，ESA）首任局長。³⁷衛倫亭大抵沿續前任的行動方向，幾乎未調動既有的組織架構，只使其目標與工作內容更加明確化。其所設定的八個部門分別為：編輯部（Editorial Branch）、海外華人聯繫部（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學生聯繫部（Student Contacts Branch）、亞洲行動部（Asian Operations Branch）、公共關係部（Public Relations Branch）、歷史研究部（Historical Research Branch）、學術組（Lecture Bureau）、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詳參表 2-1）

表 2-1、自由亞洲協會初期的八個部門及其工作內容

部門	主要工作項目	1952 年的預期工作方向
編輯部	負責撰寫、發行、翻譯、產出及流通給亞洲民眾的出版品。	除出版工作，尤重提供亞洲學生英語或已翻譯成當地語言的書報、雜誌，及定期提供似於《每週閱讀》週報（My Weekly）

³⁵ “Substantive Operational Control of DTPILLAR.” Aug. 13, 1951, DTPILLAR, Vol. 1, 0045.

³⁶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 21, 1951, DTPILLAR, Vol. 1, 0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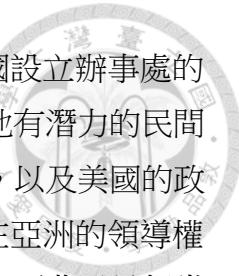
³⁷ Valentine 亦見譯作瓦倫丁，擔任自由亞協會長的任期自 1952 年 1 月迄 1952 年 9 月。Alan Valentin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Libraries, <https://rbSCP.lib.rochester.edu/1784>, accessed Mar. 14, 2023; 「Information from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1952 年 5 月 1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自由亞洲委員會新主持人 魏倫亭〉，《公論報》，1952 年 1 月 21 日，02 版。舊金山總領館方面亦樂見衛倫亭就任，讚其「從事文化活動多年……富有魄力，該會之反共工作必加強。」「外交部收電」（1951 年 12 月 15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Reader) 予香港及東南亞華人學校。並與福特基金會合作設立翻譯、發行教科書的出版中心計劃。更特別強調，需避免與美新處的工作重複。
海外 華人 聯繫部	與亞洲、美國的華人合作，使其接觸在共產黨中國境內的親屬，以削弱、分化中共。	主要配合自由亞洲電臺與編輯部所需，協調美國與亞洲各地反共團體，連結非共華人共同投入民主重建中國的工作。
學生 聯繫部	協助在美亞裔學生間的聯繫，並強化與亞洲各國學生的關係。	與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共同支援難民師生，資助港澳與臺灣等地學者赴新加坡大學任教。同時，製作、發行書刊與電影等媒介，加強對香港、東南亞等地學生之反共宣傳，特別是華人學生與在美華裔學生。
亞洲 行動部	與學生聯繫部合作，使亞洲人更深入認識民主體制。	要求各國代表需與至少一個當地民間、反共組織建立緊密聯繫。在各地培養反共華人領袖與智識菁英，使其親美；並協助當地亞洲青年組織發展，使其協力於該會出版品發送。
公共 關係部	將自由亞協推銷給亞洲各國，並在美國從事公關行銷。	主要項目同左，該部門的工作與生產力將視協會的活動進展而增加。
學術組	挑選、培訓、派遣合適的講師到亞洲，或進行相關交流活動	直接邀請或透過營利性的演講組織(lecture bureaus)，資助亞裔講者在亞洲授課；並長期發展音樂、藝術性娛樂活動或電影製作，作為授課之延伸資源。
歷史 研究組	進行有關亞洲的基礎研究，為其他部門提供反共素材。	強化有關抵禦共產思想之研究，並將相關素材供給自由亞洲電臺與編輯部。同時，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立一支小型團隊，該會則提供類似於史丹佛大學規劃的研究設施、職員與研究督導。
自由亞 洲電臺	為亞洲思想與新聞的自由交流提供平臺。	製播電臺節目在亞洲放送，其內容多不見於美國之聲(Voice of America, VOA)及美國政府等官方機構。

整理自：“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Operating Program of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Fiscal Year 1952,” Nov. 21, 1952, DTPILLAR, Vol. 1, 0030.



在完成了對亞洲國家的調查之後，衛倫亭著手評估在亞洲各國設立辦事處的可能性，以協助自由亞協海外工作的推動，並且同步尋找、培養當地有潛力的民間組織開展心理戰工作。由於經費相當有限，必須依其重要性、潛力，以及美國的政策來抉擇辦事處設置的優先順序，癥結點有如美國是否可能將其在亞洲的領導權交給另一個國家？或優先於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發展反抗力量，而非已具相當發展的日本？此外，為了加強與自由歐協、自由十字軍等隱蔽行動間的聯繫，協會亦在紐約設立辦事處，與東南亞海外華人聯繫的工作則交由該地代表負責。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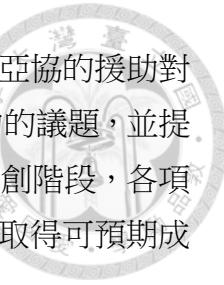
由於自由亞協此種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從事文化冷戰、情報任務的組織，與美國政府不少進行中的海外工作雷同——除了與中情局策協辦在亞洲的任務相仿，不少項目亦與美國新聞總署、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的海外工作重疊。為免疊床架屋，或相互競爭影響成效，必須釐清並協調彼此權責；再者，為了降低美國色彩，亦應當避免執行與美新處等美國官方機構雷同的計畫項目。中情局與國務院雖皆承認，亞洲有些「真正的工作」（real job）僅能交付有「非政府」外觀的自由亞協達成；但亦強調該會行動不得違背國策，或與美新處等國務院主導的公開宣傳活動牴觸。³⁹中情局解釋，相對於情報工作的隱蔽性，自由亞協的活動通常是公開且可被承認的，獲許蒐集公開的情資。此外，各處代表在出發前皆會被告知在隱蔽任務方面的責任，須與中情局各海外站站長協調、合作，以免自由亞協的公開活動損害中情局在當地的隱蔽任務。自由亞協亦不被允許自行發起任何隱蔽行動，而海外站則需保護自由亞協的工作推動。⁴⁰

隨著自由亞協的海外工作陸續展開，自由亞協副會長麥達克（Ray T. Maddocks, 1895 – 1973）制定了一份內含數份備忘錄的《行動準則》（Operations Manual），在1952年3月寄予該會在亞洲各地的辦事處人員。其中多次強調，自由亞協為了與亞洲各國建立起更為密切的聯繫與合作關係，必須透過各海外辦事處發展與當地人的夥伴關係，深化當地人的社會及政治參與，一同抵禦共產主義的侵略。同時，責成自由亞協派駐各地的代表須時時記得其作為「客人的義務」，不得公開批評所在國的各式機構、法律或公眾人物，且行動須以所在國的人民、團體為主體。在制定及執行各國的計畫上，則要求不能脫離支持個人的自由、國家的獨立、圍堵共產

³⁸ “Operating Program of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Fiscal Year 1952.” Nov. 21, 1952, DTPILLAR, Vol. 1, 0030. “Possible Policy Problems.” Apr. 1, 1952, DTPILLAR, Vol. 1, 0006.

³⁹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 21, 1951, DTPILLAR, Vol. 1, 0020.

⁴⁰ “Coordination of DTPILLAR activities with FE covert missions.” Dec. 5, 1951, DTPILLAR, Vol. 1, 0097.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 13, 1951, DTPILLAR, Vol. 1, 0085.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 17, 1951, DTPILLAR, Vol. 1, 0022.



主義等核心理念，至於較無密切關聯的慈善、救濟工作則不該是自由亞協的援助對象。各地的代表除了執行總部的計畫之外，還需努力發掘當地有潛力的議題，並提交予總部審核。⁴¹另一方面，會長衛倫亭補充，由於自由亞協尚處草創階段，各項計畫皆應時時滾動式修正與檢視，並將「最大量的資源投注那些日後取得可預期成效的項目」，其餘項目則在不干涉主要項目的前提下方得以執行。⁴²

1952 年上半，自由亞協在東亞設置第一批辦事處，包括英屬香港、日本東京、菲律賓馬尼拉、臺灣臺北、緬甸仰光、馬來西亞吉隆坡六處。⁴³隔年初擴點斯里蘭卡可倫坡、巴基斯坦卡拉噠，1954 年於孟加拉達卡，並計劃 1955 年設點首爾、曼谷、喀布爾。除了設立辦事處的目標一度在印度與印尼碰壁之外，自由亞協的海外計畫大抵令人滿意，並很快在東道國初步鞏固地位，其當地計畫亦有所斬獲。中情局強調，該會的工作是「長期性的努力」，首要之務是在所在國鞏固組織聲望，以利後續活動。至於印度與印尼政府拒絕的理由，則迫使自由亞協重新檢視其尷尬身分——這兩個國家仍將其視為「冷戰組織」。⁴⁴

第二節 臺灣辦事處的設立

就目前能接觸到的檔案來看，自由亞協早在籌組中的 1951 年 6 月以前，便開始試探中華民國官員意向。自由亞協主動接觸了時任臺灣省省主席的吳國楨與外交部長葉公超等幾位國民黨官員，⁴⁵以及潛在的民間合作對象如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即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等。⁴⁶

⁴¹ Ray T. Maddocks, "Operations Memo No. 2: CFA Functions in Asia." Mar. 12, 1952, DTPILLAR, Vol. 1, 0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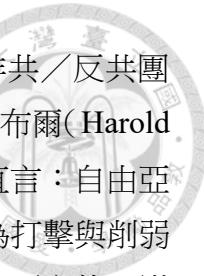
⁴² 「Policy Paper」(1952 年 3 月 24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⁴³ 1952 年派駐各國的首任自由亞協代表分別是：Ward D. Smith (臺灣)、James Ivy (香港)、Richard Bertrandias (日本)、Robert Sheeks (馬來西亞)、Marvin McAlister (緬甸)、Fred Schuckman (菲律賓)。「Committee for Free Asia 存卷」，〈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⁴⁴ Frank G. Wisner, "CFA Budget for FY-1955." Jun. 25, 1954, DTPILLAR, Vol. 2, 0034. 據此，王梅香提到自由亞協 1951 年在亞洲設有 12 個分部、曼谷辦事處亦在當時成立的說法亦需做出修正。王梅香，〈冷戰時期跨國非共策略與美國文化宣傳：論泰國的亞洲基金會 1954–1963〉，頁 567–611。

⁴⁵ Letter from George H. Greene, Jr. to Dr. K. C. Wu, Sept. 10, 1951.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hereafter AFR) Letter from Harold J. Noble to George Yeh, Sept. 10, 1951.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⁴⁶ 代理會長谷禮恩曾於 1951 年 7 月去函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會長朱家驥，希望能獲支持及協助合作。同志會前身為成立於 1919 年的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並在聯合國成立後改組為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其工作方針為：加強與自由世界之聯繫、宣揚中華民國反共抗俄的堅定國策、促進國際與國內的學術研究與文化合作等。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編印，《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工作報告》(臺北：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1963），頁 1–2、21。



為了盤點所在國的意願及可利用的宣傳資源，建立起與亞洲各非共／反共團體間的聯繫，以及評估在當地設立辦事處的急迫性，是年編輯部部長諾布爾（Harold J. Noble，1903 – 1953）兩度訪臺考察，並與本地官員交換意見。他直言：自由亞協「最為關注」（greatest concern）中國問題，強調該會「希望最終可為打擊與削弱亞洲各國的共產主義思想方面提供相當支援」。⁴⁷為了展開對中共的負面宣傳，諾布爾強調其「迫切需要有關中共活動的連續且詳細的資訊」，而請求國民黨政府協助蒐羅，⁴⁸並支援監聽中共的對外廣播；另一方面，則探詢國民黨政府協助其會務運作的可能性，舉凡推廣自由亞洲電臺，及推薦臺灣當地同樣反共且可支援的合作夥伴（fraternal organizations）等。⁴⁹

值得留意的是，諾布爾在通信中積極釋出善意，並經常強調自由亞協的要員多在 1949 年前與國民黨當局往來密切，爭取國民黨政府支持的用意明顯。爾後代理會長谷禮恩亦主動去信葉公超致意，進一步在信中暗示該會對臺灣的定位及標的與國民黨當局不謀而合：

我們認為，這個組織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我們亞洲合作夥伴的素質。
當然，我們迫切希望將資訊傳遞給身處大陸中國的那些人，但不管這多重
要，我們的計畫不會僅限於某個特定地區。我們對於在東南亞建立工作計
畫尤感興趣。⁵⁰

（一）「國民黨中國」難題？

對於國際盟友的支援，國民黨官員當然熱烈歡迎。如中華民國舊金山總領事張紫常早在獲悉該會成立後即隨即電呈外交部此事，指出該領館在 7 月底已與自由

⁴⁷ 「Harold J. Noble 致葉公超函」（1951 年 6 月 14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Harold J. Noble 並未取漢名，以下戰音譯作諾布爾，與報載之諾勒爾同人。另，據目前能掌握到的檔案可知，諾布爾除了在自由亞協成立前夕來臺之外，又於 9 月再度造訪，並先後會晤錢思亮、葉公超與董顯光等人。〈自由亞洲委員會 遠東代表抵臺 諾勒爾訪葉公超錢思亮〉，《公論報》，1951 年 9 月 11 日，01 版。

⁴⁸ 諾布爾強調，該會的宣傳工作格外需要有關中共對異議人士（non-conformist Chinese）的清洗、對家庭價值的破壞與強制勞動等，可能觸發人們反感的宣傳材料。「Harold J. Noble 致葉公超函」（1951 年 6 月 14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⁴⁹ Letter from Harold J. Noble to George Yeh, Sept. 10, 1951.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⁵⁰ Letter from George H. Greene, Jr. to George Yeh. Sept. 25, 1951.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亞協建立起「極密切之聯繫」，並引介董時進等人進入該會任職。⁵¹國民黨中央後續亦指示駐美總支部暨當地僑領，要其加強與該會的聯繫。⁵²

然而，在諾布爾返美至 1952 年間，仍遲遲未見自由亞協展開任何有關臺灣的行動——查諸各方資料，該會 1951 年間於臺灣境內之工作，僅有聘用曾任職美國大使館新聞處、時任《英文中國日報》社長之鄭南渭（Stanway Cheng，1914 – ?）協助監聽中共廣播，並隨時彙報以供該會後續宣傳之用一項。⁵³對比當時自由亞協在日本、香港、韓國、菲律賓、緬甸等地皆已陸續展開實際活動，⁵⁴此般猶疑的態度顯得十分不尋常。該會甚至未將臺灣納入首批辦事處名單之中。⁵⁵

總以行動重要性與急迫性作為衡量依歸的自由亞協，既已將中共視為頭號敵人，且在 1951 年 9 月刊印、翻譯的《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中，亦特別指明其目標之一乃是「維護臺灣島上之自由以及擊敗大陸中國上之共產主義」。⁵⁶然而，何

⁵¹ 董時進（S. T. Tung，1900 – 1984），自清華學校畢業後，赴康乃爾大學攻讀農學經濟學博士；歸國後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地，並受聘於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單位。戰後協助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農民黨，於 1950 年赴香港參與第三勢力運動。1951 年遷居美國，加入自由亞洲協會，又於 1952 年 7 月退出。「董時進」，近代春秋 TIS 人物索引，<https://reurl.cc/p6NNy8>，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8 日；〈董時進致雷震〉（1952 年 8 月 5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8-072。

⁵² 舊金山領館說明該會之宣傳目標：「首在防止中國四周各國之赤化並喚醒中國人民，次在灌輸亞洲人民以美國式之民主思想。」國民黨負責海外工作的第三組，於同年 10 月呈報總統蔣介石，進一步敘明該會宗旨係：「以文字及廣播宣傳，從事於鼓勵歐亞兩洲民眾之反共情緒，並揭露以維護臺灣島上之自由及擊敗中國大陸共產主義為目標。」舊金山領館高度重視自由亞協，強調該會海外華人聯繫部部長香雅各（Dr. Henry James，1880 – 1956）曾任廣州嶺南大學校長、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總幹事，在廣州聲望極佳；同時指出，該會的華裔職員尚有：董時進（S. T. Tung）、盧鴻湛、劉毓棠（Daniel Lew/D. H. Lew）、賴良及、吳思琦夫人等。「駐金山總領事館快郵代電」（1951 年 8 月 6 日）、「外交部收電」（1951 年 7 月 25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40 年總裁批簽〉（1951 年 10 月 30 日），「中國國民黨檔案」，國立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室藏，檔號：總裁批簽 40-0402。（以下簡記作孫圖藏）

⁵³ 鄭南渭擔任該會臺北通訊員任期僅一年，其後亦未見其他繼任人員。至於該會當時其他「中國」相關工作，則與臺灣當局無涉：舉凡資助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立「中國中心」（China House）之研究機構，並聘請華美協進社社長孟治作顧問；提供學人研究獎學金等計畫。「Harold J. Noble 致葉公超函」（1951 年 10 月 7 日）、「張紫常呈葉公超函」（1951 年 11 月 13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鄭南渭（鄭保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2637。

⁵⁴ “Comparison Programs of January 2, 1952 and August 1, 1952.” DTPILLAR, Vol. 1, 0003.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Programs & Planning.” Sept. 28, 1951, DTPILLAR, Vol. 1, 0040.

⁵⁵ 自由亞協 3 月底制定的行政備忘錄中，可見列出每日旅行津貼標準的國家，僅有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日本、泰國、緬甸六地，臺灣並不在名單之列。在該會一份時間未詳、但推測應與前述備忘錄同期或更早寫就的簡介中，則可見該會決定長期派駐（permanently assigned）代表在香港、仰光、吉隆坡、東京四地，亦不見有關臺灣之規劃。Alan Valentine, “Admin. Memo No. 14: Travel Regulations USA and Overseas.” Mar. 28, 1952, DTPILLAR, Vol. 1, 0008.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Committee for Free Asia」，〈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⁵⁶ 《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有關該計畫書中所載「對遠東方面之計畫」，全文請見附錄。

以始終未能在當時有著大量華人⁵⁷且島上有積極反共的國民黨政府得以合作的臺灣展開任務？

圖 2-3、中文版《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書影



來源：「自由亞洲協會計劃書」，收於〈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究其原因，或許得歸究於非共中國團體內部的派系錯雜，且經常爭鋒相對。國民黨於 1949 年敗逃臺灣之後，美國杜魯門政府積極尋求、試探亞洲反共且反蔣的領導人，如當時一位奉命接洽暫居香港的顧孟餘、張發奎的國務院代表指出：彼時「臺灣軍事力量不夠，政治欠民主，而大陸游擊尤不可靠，將來回大陸後恐我仍走『一黨專政』之舊路，故美國認為有組織第三勢力之必要。」⁵⁸然而，美方最後多方接觸未果，⁵⁹最終仍只好將位處「竹幕」(Bamboo curtain) 前緣、⁶⁰一度遭放棄

⁵⁷ 英文檔案中皆記為華人（Chinese），惟考量行文脈絡，若檔案係特指來到臺灣的中國人，以下譯作「外省人」（Mainlander）。

⁵⁸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臺灣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

⁵⁹ 1950 年前後，由於不滿蔣介石在中國的失敗統治，美國情報局及外交官員開始積極接觸並扶植有機會在亞洲取代蔣介石的反共第三勢力，建立「區域性反共政權」伺機牽制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行動。如曾加入國民黨的軍人如蔡文治、張發奎、溫應星、李彌等人，乃至主張臺灣獨立的廖文毅、黃紀男，或者越南的 Trinh Minh Thé 將軍等可能勢力皆成為美國試圖網羅的對象，遍布中國華南、雲南等地及東京、香港、沖繩、塞班島、東南亞等地。相關討論參：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 - 1988》（臺北：聯經，2015），頁 88 - 108；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臺北：遠足文化，2017），頁 267 - 278；陳翠蓮，〈冷戰與去殖民：美國政府對戰後初期臺灣獨立運動的試探與評估（1947 - 1950）〉，《臺灣史研究》（2019，臺北），頁 91 - 138；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ondon : Lexington Books, 2018).

⁶⁰ 「竹幕」一語出自記者張國興，用以形容淪落共黨統治的大陸中國，以此別於歐洲的「鐵幕」



的中華民國重新納入其東亞冷戰計畫之中。此一決定使得身負隱蔽行動任務，且尚在摸索、確立行動方針的自由亞協，陷入可能需要「押寶」的困境。

首先，既然強調協會不涉入中國內部政治，但若與某個團體展開密切合作，便可能得罪另一方。再者，由於協會無力調解國民黨政府、第三勢力等各非共勢力的嫌隙，此般緊繃關係更使統一反共戰線的最初構想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且更可能影響其他反共工作推展。該會不得不承認：「非共中國社群內部的派閥問題（factionalism）」使其工作變得愈發挑戰。⁶¹1951年9月，時任聯合國會費委員會中國代表兼駐美技術代表團秘書長李榦，留意到該會當時尚持「狄托主義」式（Titoism）的期待：儘管不排斥與中國或臺灣的任何非共產主義勢力合作，首要目標還是「鼓勵第三勢力在中國大陸出現」。⁶²

由於一時間無法確立明確的路線或發展方向，代理會長谷禮恩在該年年底決定，不同於美國政府需要在外交上選邊站，作為私營組織的自由亞協應以更彈性的方式行動。他指出，協會的任務是積極尋求各類非共且非政治性的華人組織合作，舉凡作家、報紙編輯、華僑社團、職業公會、學生組織、學術組織等團體；並且著重投資報紙、期刊類型的項目，並鼓勵各式建設性的批評，期待能使其發展成公開談論、倡議的平臺，例如支持舊金山的親國民黨報刊《少年中國週報》。這樣的構想隨後獲得了胡適、梅貽琦等人表態支持。⁶³谷禮恩的定調，並非意味著自由亞協隨即改變對臺政策，且亦未能削減國民黨政府的疑慮。1952年3月，該會對於第三勢力相對友好的態度，導致隸屬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簡稱中改會）的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提出警告，要求有關單位對自由亞協「應具警覺」。⁶⁴

（Iron Curtain）。有關張國興生平可參：吳國坤，〈冷戰中的文化傳承——張國興與亞洲影業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93期（2022，香港），頁145。

⁶¹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 Dec. 12, 1951, DTPILLAR, Vol. 1, 0023.

⁶²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9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470–471、487。舊金山領事張紫常的看法與李榦不同，指出該會內部僅有一小部分人對第三勢力抱有同情，且「他們的聲音微弱，未能左右該會政策方向」。然而，就自由亞協嗣後對友聯出版社大加資助看來，張紫常顯然過於樂觀。「張紫常呈葉公超函」（1951年11月13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⁶³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 Dec. 12, 1951, DTPILLAR, Vol. 1, 0023.

⁶⁴ 張其昀原著，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質樸堅毅：張其昀日記（1949–1950, 195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頁231。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於1951年8月，在1952年10月隨中改會解散而裁撤前，先後共召開61次會議。其工作目標為：對國際問題之研討、國際宣傳政策之策劃、國際宣傳工作指導之研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六次會議紀錄〉（1952年12月2日），「中國國民黨檔案」，孫圖藏。



大體而言，臺灣在自由亞協東亞佈局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在 1952 年上半愈發明朗。如負責該會有關中國工作的職員劉毓棠，⁶⁵於 5 月 12 日拜訪駐美大使顧維鈞時，特別告知：自由亞協「現在已更加瞭解在工作中謀求臺灣合作的重要性」。⁶⁶而在亞洲行動部職員張福運 (F. Chang, 1890 – 1983) ⁶⁷於 6 月寄給該部部長的司徒華 (James L. Stewart, 1913 – 2006) ⁶⁸的信件中，則更加清楚闡釋了自由亞協當時的評估與顧慮：

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受到法律承認，且堅定執行反共政策，是能對民主事業做出貢獻的反共力量。……本會業已派遣一名代表到臺灣的狀況，似乎默認了此一事實。但自由亞洲協會作為民間組織，沒有義務或藉規章認可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政府，或支持它成為中國日後的唯一政府。為了實現本會的目標，我們需要且應當與臺灣與其他地區的華人合作。……本會的目標應是，促進自由與民主，並且幫助亞洲人民支持他們所認可的民主政府，而非認同特定政府……日後，自由亞洲協會或將發揮統合性作用，打造並堅定東南亞華人對於自由、民主的支持。這些支持將在日後時機成熟之際，為中國終於出現一個真正自由且民主的政府時發揮關鍵作用。⁶⁹

⁶⁵ 劉毓棠 (1913 – 2005)，出生於中國廣東，幼年即隨家人移居美國西雅圖，先後就讀於嶺南大學、燕京大學，並取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45 年出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勸英文秘書，1956 年起奉派國民黨政府駐加拿大、紐西蘭、巴西等地的領事與大使職務，期間積極參與世界道德重盛大會。1974 年應邀返臺出任中國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所長，掌教鞭直至 1988 年退休。黃日燦，〈劉毓棠先生行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 29 冊》(臺北縣：國史館，2006)，頁 622 – 625。推測劉毓棠應於 1951 年至 52 年間進入亞洲基金會，卸職時間不明。

⁶⁶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9 分冊，頁 543。

⁶⁷ 張福運 (F. Chang)，中國山東人。自北京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取得哈佛大學法律學位後返回中國，1918 年起任職於外交部，並兼任國立北京大學講師。1921 年起先後奉派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祕書、交通部司長、北京交通大學校長等職，自 1928 年起出任財政部關務署署長至戰後，後又身兼敵產管理委員會、輸出入管理局等局處職務，於 1949 年後定居美國。中國經濟資料社編，《上海工商人物誌》(上海：氏著，1948)，頁 159；「張福運」，近代春秋 TIS 人物索引，<https://reurl.cc/x7WKjL>，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⁶⁸ 司徒華 (James L. Stewart)，出生於日本神戶、成長於廣島，父母皆為衛理公會傳教士。1939 年至 1944 年在擔任美聯社駐中國的記者，1942 年起擔任戰時情報局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中國分部副主任，主導心戰工作，並兼職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於重慶之無線電播音工作。1947 年任駐韓美軍公共宣傳顧問，1949 年出任美國駐首爾大使館第一秘書、公共事務官員兼新聞處主管。1951 年遷居舊金山，進入自由亞洲協會主持亞洲行動部；隨該會新任會長卜蘭姆於 1953 年 8 月就任，轉為該會執行長。1967 年至 69 年間轉任紐約日本協會 (Japan Society of New York) 執行董事，隨後又出任亞洲基金會日本代表直至 1985 年退休。Charles Burress, "James L. Stewart – longtime liaison to Asia." SFGATE, Jan. 29, 2006, <https://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James-L-Stewart-longtime-liaison-to-Asia-2523343.php>, accessed Apr. 13, 2023. 沈劍虹，〈國際宣傳處——一個很特殊的機構〉，《傳記文學》42 卷 2 期 (1983，臺北)，頁 77。

⁶⁹ “Committee for Free Asia's work in Taiwan and in Relation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 Chang to J. L. Stewart, Jun. 4,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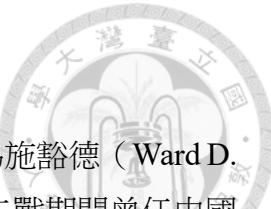
換言之，自由亞協決定在臺灣設立辦事處，並非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背書，而是基於現實反共需求、促進自由與民主而做出的權宜性妥協。自由亞協由於不抱特定政治傾向，因而能在其他承認中共的亞洲國家不受制肘地活動，靈活遊走在不同團體之間。雖然信中強調自由亞協的合作對象主要是民間組織，但張福運亦強調，在不捲入「誰代表中國」爭議的前提下，若因目標與計畫所需，並不排除與國民黨政府合作。⁷⁰另一方面，這封信亦指出，該會對臺灣的看重仍是出自對於中國的總體評估，試圖藉此對東南亞華人發揮最大影響，並促使這些「僑民」回頭影響「中國」。

除了以上理由，就目前能接觸到的資料來看，背後推了自由亞協一把，裁定在臺灣設點的原因，可能與當時臺灣情勢高度危急有關。隨國民黨政府移居臺灣的自由亞協顧問李度（Lester Knox Little，1892 – 1981）⁷¹於 1952 年春天寄予會長衛倫亭一封機密信函，認為當前臺灣的現況極度令人擔憂，亟需自由亞協介入。他隨信附上一份未署名美籍人士撰寫的觀察報告。其中指出，當時美國對臺灣的支援只限於物質層面，幾乎未曾接觸國民黨政府以外的民間聲音，大使館、美新處、美援相關機構與美軍顧問團的工作可謂極度失敗（complete failures）；臺灣社會對政府的漠然態度，已與喪失大陸中國前夕相仿，絕大多人對美國亦無好感。對此，該報告認為有效的解方是：「需要對臺灣民眾稍微展開宣傳工作。我尤其認為，美國政府機構過於隱蔽，且難以自繁文縟節中即時調整行動方向。……一個能夠發揮影響，或代表美國公眾意見的私營組織尤為可貴。」⁷²

⁷⁰ “Committee for Free Asia's work in Taiwan and in Relation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 Chang to J. L. Stewart, Jun. 4,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⁷¹ 李度（L. K. Little），出生於美國羅德島，1914 年自柏德基高等學校（Pawtucket High School）畢業後前往中國海關工作，期間曾返美取得了布朗大學文學碩士，並在 1943 年接任總稅務司，成為國府內最高階的外籍官員；同時亦支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工作。1949 年後，李度一度返美，隨後出任自由亞協紐約辦事處代表與海外華人聯繫部副部長，並於 1951 年底獲中華民國聘為財政部顧問直至 1954 年；因接受國民黨政府之官方聘請，為免與自由亞協政策衝突，於是轉任該會無給職顧問，提供美方有關臺灣現況的意見。1955 年至 1960 年間出任美國新聞總署人事部的助理主任職務。李仕寧，〈李度與中國海關（1943 – 195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頁 19 – 132；“Lester Knox Little, 89 Dies; Headed the Chinese Customs.” *New York Times*, Oct. 31, 1981, <https://www.nytimes.com/1981/10/31/obituaries/lester-knox-little89-dies-headed-the-chinese-customs.html>, accessed Mar. 15, 2023；「George H. Greene 致葉公超函」（1951 年 11 月 12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⁷² “Notes on Formosa.” letter from L. K. Little to Alan Valentine.” Mar. 2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Copies made March 27, 1952.” Mar. 2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此信同時發給了海外華人聯繫部的香雅各，以及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艾利森（John M. Allison，1905 – 1978）等人。Letter from L. K. Little to John M. Allison, Mar. 2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Letter from L. K. Little to J. M. Henry, Mar. 2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二) 首任代表施豁德與臺灣工作的展開

自由亞協遂於 1952 年 5 月在臺灣成立辦事處，⁷³首任代表為施豁德（Ward D. Smith，1921 – ?，任期：1952 年 5 月 – 1954 年 9 月）。施豁德於二戰期間曾任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Albert Wedemeyer，1897 – 1989）新聞官，被譽為「自由中國之友」；1954 年轉任該會泰國代表，於離臺前與聯合國中國同志會職員周明華結婚。1957 年離開亞洲基金會後，先後任職於「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ARCI，簡稱援知會）香港分會、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駐臺記者等職務。⁷⁴施豁德遇人僅稱其非美國政府人員，來臺目的僅為「幫忙反共……對此間政治如何亦不過問」。⁷⁵

自由亞協於 1953 年甫來臺活動之初，便遭臺灣省警務處盯上、展開偵監。⁷⁶警務處注意到該會臺灣辦事處最初雖以通訊社名義向新聞局登記，卻未見任何稿件發表，形跡可疑。細查該會工作，則發現雖其「似致力于資助非國民黨派之學術界人士，並招致海外僑生返國求學，其宣傳資料專事宣揚美國之民主及共匪之極權」等，不過卻暗中資助「民主智識份子」及「非國民黨人士」，顯有違國策。然而，由於自由亞協在臺接觸人士多屬當時「學界耆宿或權威」，導致警務處欲進一步深入調查卻屢屢碰壁；且考量後續隨後接任的臺灣代表反共立場鮮明，相關偵監紀錄於 1954 年末後便未見更新，推斷應不了了之。⁷⁷

⁷³ “The Asia Foundation Plan for Taiwan.” Jul. 25,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據報載，自由亞協來臺設點，背後尚得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從中斡旋、出力，雙方自 1951 年 7 月以來亦見諸多函電往來。然而，由於尚未得見相關檔案紀錄佐證，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之於自由亞協來臺及後續合作之關係尚待釐清。〈自由亞洲委員會 在台設辦事處〉，《聯合報》，1952 年 6 月 4 日，01 版；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編印，《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工作報告》，頁 20 – 21。

⁷⁴ Ward D. Smith 漢名亦見誤作史豁德、史密斯等。〈自由亞洲委員會 在臺籌設辦事處 史密斯任駐台代表〉，《公論報》，1952 年 6 月 4 日，01 版；〈政務—我國官員出訪及各國官員來華訪問情形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1-00022-001；「情報」（1954 年 11 月 22 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⁷⁵ 雷震著，傅正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臺北：桂冠，1989），頁 94。

⁷⁶ 警務處的偵監行動，起因於《中央日報》4 月報導指出，菲律賓新任總統公開指控自由亞協與共黨往來密切。儘管旋經自由亞協相關人士澄清，但北市警局仍因評估該會在臺已有具體組織而上報；保安司令部獲報後亦指示警務處嚴密追蹤。「本市自由亞洲協會組織可疑情形報請察核」（1953 年 6 月 12 日）、〈密〉（1953 年 6 月 22 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該則報導請參：〈季里諾指控 自由亞洲委員會親共〉，《中央日報》，1953 年 4 月 5 日，02 版。

⁷⁷ 「密（特報偵查自由亞洲協會台灣分會內幕一案請察核由）」（1954 年 4 月 16 日）、「情報」（1954 年 11 月 22 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警務處的偵監紀錄，同時提示了該會臺灣辦事處在施豁德任內的運作情形。據呈報，臺灣辦事處內部職員共計六名，除代表施豁德及助理穆倫（Grace M. Mullen，1908－？）兩位美籍人士外，尚有蔡增瑞、章雅谷、范同仲（1925－？）、古穎（Lily Ku，1933－？）等四位本地外省人職員。⁷⁸本地職員中，以前兩位華籍職員尤為核心：蔡增瑞（Harold Tsai，1920－？）出生於上海、畢業於之江大學，進入自由亞協前曾任職於行政院物資供應局，經常周旋於中、外新聞界。⁷⁹章雅谷（1921－？）則為浙江人，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先後任職於敵偽產業處理局、行政院物資供應局、資委會機械工程處重機械廠等；在自由亞協工作之餘，亦兼職《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記者。⁸⁰

警務處報告透露，施豁德與穆倫來臺之初「經常以記者姿態出現各官私場合」；⁸¹但若參酌前揭該會之《行動準則》則可悉，施豁德等人之行動應為藉此建立與臺灣社團間的連繫與良好關係，並尋覓潛在合作夥伴，以利其後續會務推展。就目前能掌握到的資料來看，自由亞協在臺灣初期的活動，密切往來的社團主要有二：除前揭的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外，同時積極投入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的籌備、⁸²社務運作，施豁德後續亦獲選該社副社長。⁸³另一方面，打入本地智識菁英社群的同時，

⁷⁸ 「續查復自由亞洲協會組織情況一案請察核」（1953年6月12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施豁德的助理穆倫於1952年11月到任，因施氏認為臺灣本地人員專業能力不足以協助會務運作，多次催促總部派遣助理；穆倫之工作內容，主要係監督撥款後的項目運作情形。范同仲自50年代起擔任中央社記者，並於1980年代獲薦為該社副社長。古穎（Lily Ku）則負責總機與電報打字工作。Telegraphy from Ward Smith to Headquarter, Oct. 18,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6. Administration."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美副總統尼克森〉，《聯合報》，1953年11月7日，02版；〈中央社昨股東常會 曹聖芬連任董事長〉，《聯合報》，1986年6月28日，02版。

⁷⁹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民出入境聯合審查簡復表」（1955年6月14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⁸⁰ 〈章雅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20000-4704；「情報」（1954年11月22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⁸¹ 「情報」（1954年4月14日），〈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⁸² 華美協進社於1926年由杜威（John Dewey，1859－1952）、門羅（Paul Monroe，1869－1947）與胡適等人發起，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簡稱中基會）的支助下於紐約成立，其目標是促進中、美文化交流，首任會長為郭秉文（1879－1967），1930年後由孟治接手。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p.141–244.

⁸³ 華美協進社第二任社長孟治於1954年3月籌組臺灣顧問委員會，召集臺北當時一流文化人士，假自由亞協臺北辦事處開會。隨後選出杭立武任首任會長、施豁德為副會長，並有沈昌煥、黃朝琴、羅家倫、錢思亮、李濟、曾虛白、李度等人分職不同會務。10月，臺灣顧問委員會轉為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值得留意的是，在該社內部文件中，其英文譯名亦由起初預定之China Branch改為Taiwan Branch）施豁德離任後，副會長職由繼任之饒大衛代表接任；饒氏卸任後，亦由繼任之史麟書續任副會長。然而，由於國內學界目前尚未有關於華美協進社的研究，該社與自由亞協

施豁德亦須著手為該會評估、規劃可行的行動。不過由於自由亞協當時的海外工作尚處摸索階段，總部並未為各國代表擬訂具體或可參考的行動方案，僅有頗為模糊的任務目標。施豁德作為首位臺灣代表，無前人制定過的行動可供參照，如何規劃出契合自由、反共等目標，且適合所在國、並以在地人為主體的計畫，成了一大難題。為此，施豁德在9月向總部派來視察的司徒華抱怨道：總部未能為其行動提供「正確解答」，且信件往往需等待三週才獲回覆。⁸⁴

為了安撫施豁德的動搖，司徒華遂在臨走前制定了一份可供指引的行動備忘錄，供施豁德推進後續工作。司徒華觀察到，當時遷臺甫一年餘的國民黨政府「絕望地龜縮一隅，尚存一絲希望」，且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安全堪慮。⁸⁵由於中華民國的內政各方面已獲美援資金與技術的扶持，司徒華指示自由亞協在臺灣的目標將瞄準海外，善用中華民國現有的人才資源及臺灣作為「自由中國」的身分，首重推動研究、宣傳、教育三大方向的發展，並強調其行動目標並非臺灣民眾。他認為可透過臺灣強化美國在東亞的心理戰工作，並特別強調：「此處極具潛力，不容忽視。」他建議，在臺灣的研究、宣傳工作可善加利用外省人遭共黨侵略、滲透的第一手受難經歷，協助戰術的研究及相關宣傳工作；並期待刺激相關文學創作，闡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強化國民黨中國作為中國的正統性。⁸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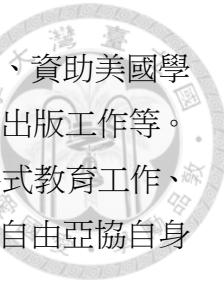
司徒華初步構想的工作目標，基本符合自由亞協總部1953年對亞洲整體布局框架。在自由亞協總部於4月提交中情局的1953年預算規劃中，行政支出以外的

之往來係由杭氏牽線，抑或出自美國總會方面的合作，尚待釐清。「杭立武致沈昌煥函」（1954年1月26日）、「情報司報告」（1954年3月12日）、「Minutes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Taiwan Advisory Committee of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54年3月12日）、「請轉呈外交部准予在台成立分社藉加強中美文化交流工作由」（1954年10月20日）、「Taiwan Committe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Annual Report 1955」，〈華美協進社等（一）〉，《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102；「承詢華美協進社概況函復查照由」（1958年9月20日），〈華美協進社等（二）〉，《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103。

⁸⁴ 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5,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司徒華該次訪臺，係訪查自由亞協在設有辦事處的六國之運作狀況的其中一站，其認為香港的成果尤為突出。他強調，各國的計畫方案，皆出自該地代表的構想及該國人民的意願所共同推動，如在日本強化與作家間的合作、在菲律賓支持發展中的公民行動、在緬甸將重點放於佛教徒身上、新馬等地則與英國的鄧普勒將軍（Gerald Templer, 1898 – 1979）密切合作。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1,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⁸⁵ 司徒華於1955年再訪臺灣時發現，1952年所見舉凡工農業產量低下、政府信譽不佳、難民與本地臺灣人間士氣低落（morale）、軍隊裝備不全、境內國安問題、政府與土地制度尚待改革等巨大難題，已在美國的支援下略有改善。James L. Stewart, "Taiwan Notes," Sept. 19,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⁸⁶ 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5,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20,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款項主要運用在：自由亞洲電臺的初期建設、設立 12 個海外辦事處、資助美國學者赴亞洲研究教學，以及主持反共相關出版品與報刊的補助、翻譯、出版工作等。而中情局對此僅指示，該會強化在亞洲內部各式活動，舉凡資助從各式教育工作、增進與當地社會團體的合作、發展非共國際組織在當地的分會，以及自由亞協自身有興趣的研究工作、電影計畫等項目。⁸⁷

司徒華的建議隨後落實在施豁德制定的 1953 年臺灣工作方案（見表 2-2）。施豁德於同年 11 月寫給總部的信件中，說明他任內工作重心預計將是「產出任何類型的中文材料」，開發新的反共素材並翻譯為英文。⁸⁸在一份推測是他於 1952 年下半草擬的「臺灣國別計畫」初稿中，更明確地指出了他對臺灣的定位：

自由亞協無須在此特別留心圍堵共產主義的滲透。國民黨政府已採取足夠預防措施……自由亞協在臺灣的任務，取決於此地能為亞洲自由世界作出的最大貢獻，即：（1）鞏固海外華人對國民黨政府支持。（2）重申持續高度關注該政府在中華文化的活力、完整性與連續性方面的努力。⁸⁹

由於國共內戰的漫長化，1950 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境內對共產勢力展開高壓肅清，進而導致臺灣情勢相對穩定，缺乏自由亞協開展「人心之爭」的空間。職是之故，該會將在臺灣的目標轉移至另一個身分——利用「自由中國」的反共素材強化對其他亞洲國家的非共宣傳，並從旁協助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的中國化改造，以使「自由中國」成為非共海外華人的集結點。施豁德強調，透過強化臺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將有效抵銷中共的「中國」法統，進而促成國際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

為了使臺灣辦事處的工作能真正有助於推進自由亞協的總體冷戰目標，施豁德強調：該會在臺灣的工作需置於整個東亞的尺度考量，審慎評估對海外華人的影響與效益；而與島內直接相關的項目則以小規模的常態性補助為主。⁹⁰換言之，儘管自由亞協已駐點臺灣，但臺灣國內問題並非該會首要考量，左右臺灣辦事處行動的關鍵始終在臺灣島之外。而自由亞協對臺灣的此般構想，亦大抵吻合美國政府於 1953 年底所確立對中國與臺灣的官方政策。

⁸⁷ 在這份命名為〈要求自由亞協在亞洲需額外支援的工作〉的文件中，前三項便是教育，其中尤其強調對於中國學校的支援；在社會團體方面，首重宗教相關活動，再者是在地青年組織、婦女組織、編輯或媒體或教師相關專業團體等。“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Apr. 14, 1952, DTPILLAR, Vol. 2, 0049.

⁸⁸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Asian Operations” Nov. 24,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⁸⁹ “First draft of the Taiwan Country Plan,”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⁹⁰ “Further Comment on Department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表 2-2、1953 財政年度預定執行之計畫項目

撥款 項目	項目內容	金額 (USD)
6A	為淡江英語學院提供 10 名獎學金，以培育反共的領導潛能。此計畫由臺灣代表與該校院長居浩然共同發起，共兩學期。	750
6A	為東吳大學提供 2 名獎學金（共計三人：分領全額、1/3、2/3），以培育反共的領導潛能，共計兩學期。	1,100
6B	贊助淡江英語學院 2 名中國難民知識份子授課費用，共兩學期。	500,000
10	將有關共產黨宣傳技術、戰略等素材譯成英文，並建立相關研究機構供亞洲各國所用。此計畫由王雲五主持，預計為期 10 個月。	16,500
109	翻譯現有反共／非共華文文學作品。由梁實秋編輯，臺灣辦事處人員負責謄寫、打字。	15,000
15	贊助華盛頓大學陶爾西教授（Dr. Gray L. Dorsey）擔任臺灣大學憲法學講座，並在東吳大學開設相關課程，為期一年。	13,050
107	自 1952 年 7 月 16 日至 1953 年 6 月 31 日間，每月購入 30 份《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 在各校流通。	1,035
12	贊助亞洲的講者交流，提供臺灣大學 3 名學生參加 1953 年 4 月於夏威夷大學舉辦的太平洋地區學生會議（Pacific Area Student Conference），以鞏固亞洲的反共信念、增強亞洲的交流。	3,327
13	購入杭立武的英文著作《中華民國台灣》(Taiwan Today)，以及斯旺公司（Swen Company）出版的 17 種小冊各一千套。前者交由援知會及教育單位分發；後者則委託僑委會送交海外華僑。	?
應急 款項	擴建、維修臺灣辦事處的辦公大樓。	1,875

以上為是總部於 1953 年 1 月前批准之第二至四季的工作經費，但該年度的工作項目並不僅限於這 13 項，亦視調查與評估情形而新增。整理自：“Projects,” letter from Robert Goffard to M. E. Pollard, Jan. 9,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再者，由於中情局內部將有關臺灣事務的急迫性評為「低優先級」，臺灣辦事處的規模及其可動用的款項隨之受限。⁹¹這也導致施鈞德呈報的年度計劃中，僅有少數總部核可具急切性與潛力的活動才得以付諸執行，如起初施氏嘗試推動的宗教與電影項目便遭駁回——資助本地宗教活動可能有違國民黨政府要求總動員節

⁹¹ Ward Smith, “Comment on Plans 1953–4 Taipei,”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約的原則，而電影項目則因當時主要由政府主導的商業電影、新聞片與紀錄片過於呆版、品質低劣，成效恐頗有限。⁹²

綜觀上表通過的 9 項計畫，雖看似以教育、青年領域活動佔多數，但其撥付較高金額的計畫實皆出自其他考量，如項目 15 經以深化受援國法治理念為標的，而項目 6B 則是為扶持難民知識分子生計。施豁德隨後補充，因臺灣當時「缺乏與非共組織競爭的共產主義學生社團」，舉凡獎學金等小型教育開支，主要目的僅是與東道國培養良好關係。⁹³不過若進一步追查，可悉該會對淡江補助的目的實為促成「畢業後有志從事國際文化合作工作者」，⁹⁴即出自美國教育文化交流構想。扣除前揭「自由中國」導向的計劃，其餘如獎學金、法學講座、學生交流計畫等項目，相當程度皆指向——形塑出民主、親美的本地菁英的構想。自由亞協及日後的亞洲基金會臺灣辦事處於 1950 年代的工作重心，遂朝向鞏固臺灣作為「自由中國」基地為主，深化臺灣社會的民主傾向與親美氛圍為輔的方向進行。

與此同時，施豁德呈請總部進一步擴大臺灣辦事處的工作規模，將目標重心進一步集中到海外華人相關事務，強化與其他海外辦事處及當地民間團體的聯繫。他強調，唯有調整行動路線，方能使臺灣辦事處真正裨益於自由亞協的總體目標。而其行動具體反映在有關海外華人學生來臺就學的協商，以及在宣傳方面建立起一個覆蓋海外華人社群的分銷管道。讓臺灣辦事處與香港等海外辦事處串聯合作，齊心推展以「中國」為目標的總體計畫。⁹⁵

（三）推展中國總體計畫

正如同先前構想，自由亞協在臺灣的目標係透過臺灣保有的中國遺產，「夥同其他地區的工作，一同推進本會的中國總體計畫」。根據施豁德於 1953 年 10 月整理的項目概要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活動類別區分，大抵係由四個方向分頭並進，並尤其聚焦於文化、研究兩項寫作領域（literary field）。⁹⁶

⁹² "Further Comment on Department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⁹³ "Student Program of CFA."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an. 21,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⁹⁴ 報載，自由亞協除設立該獎學金，還捐設國際關係講座兩名（見同表 6B 項），聘請曾任職於外交部的張乃維、王炳文二人客座講習；並且募捐千冊圖書贈與淡江。〈美自由亞洲協會 昨贈送淡江英專獎學金〉，《聯合報》，1952 年 10 月 7 日，03 版。

⁹⁵ Ward Smith, "Comment on Plans 1953–4 Taipei,"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Further Comment on Department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⁹⁶ Robert Blum, "Memorandum." Mar. 12,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1) 研究項目 (Research)



早在 1951 年年中，自由亞協編輯部與國民黨中央展開聯繫之際，便數度發函央求提供反共書刊及匪情相關資料，以供研究、宣傳所需，此工作隨後則轉由臺灣代表施豁德負責，並發展成此一項目。⁹⁷隨後，因獲悉省主席吳國禎有意成立統合性的機構從事反共材料的生產與研究，施豁德經諮詢總部人員司徒華與華盛頓大學遠東及蘇俄研究所教授戴德華 (George E. Taylor, 1905 – 2000) 等人意見後，便著手研擬新成立一所反共研究機構 (Communist Infiltration Research Institute)，⁹⁸以圖強化獲取、產出相關材料之效率與品質。

為避免與香港辦事處進行中的計畫重疊，施豁德將重心放在 1949 年以前國民黨遭中共滲透的經驗，以期生產有關共產主義如何在亞洲作用的實用性知識，並將其成果提供美國學者研究、向亞洲學生進行宣傳。⁹⁹執行方面，委託曾在香港出版反共書籍且與美新處有過往來的王雲五，居中整理共黨有關的紀錄，以及延攬與中共有直接交手經驗的黨政要員或中共「暴政」的親歷者，書寫其個人的「冷戰自傳」(Cold War autobiography)。¹⁰⁰待作者完稿後，再轉交自由亞協託人翻譯成英文，並介紹合適的美國出版社出版、發送至亞洲其他非共國家，或送至其他海外辦事處運用。截至十月底，自由亞協選譯了國民黨中改會第六組編製的《認識敵人》系列的若干文件，以及唐縱、朱開來等作者的共計 15 本著作。¹⁰¹

⁹⁷ 查找現已開放的國民黨檔案，最早可見有關單位在 1952 年初將自由亞協的請求送交國民黨黨中央大會討論。〈中改會第 66 次工作會議紀錄〉(1952 年 2 月 26 日)，《第六屆中央改造委員會工作會議》，「中國國民黨檔案」，孫圖藏，檔號：會 6.43/66。〈中改會 41 年度 7 月份工作報告〉(1952 年 7 月 31 日)，《第六屆中央改造委員會一般檔案》，「中國國民黨檔案」，孫圖藏，檔號：會 6.41/308.3。

⁹⁸ 司徒華於 1952 年 9 月訪問吳國楨，聞吳氏稱：「我總希望能看到能有一所機構，深究我們在大陸中國期間經歷到的那些中共手段與詭計。今日，我們看到中共亦在日本操作同樣的手段，而吾人卻無從警告他們即將遭遇些什麼。」此一構想隨即當場獲得了司徒華與施豁德的附議。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Taiwan Plan." letter from Harold L. Amoss to Mr. Blum, Mr. Conlon and Mr. Stewart, Sept. 11,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然而，經查諸各方材料，暫未見相關紀錄佐證，尚不確定該單位是否確切以機構形式運作，故暫籲統稱其為「反共研究機構」。

⁹⁹ "Taiwan Plan." letter from Harold L. Amoss to Mr. Blum, Mr. Conlon and Mr. Stewart, Sept. 11,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⁰ 「冷戰自傳」一語出自學者 Shawn J. Parry-Giles。她認為，美國政府當時資助出版的數本自蘇聯脫逃的當事人自傳，利用幾近專家證言的親歷者言說強化對讀者的說服力，並將反共意識形態擬人化，使其作品成為共產與民主間角力的具體寫照。Shawn J. Parry-Giles,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Westport: Praeger, 2002), pp.85–92.

¹⁰¹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國民黨中改會第六組主掌中共黨務、政治、動態與民情等匪情相關情報資料的蒐集、研究，在中改會 1952 年 11 月解散後轉隸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而《認識敵人》則是集結該組發表在《改造》半月刊、「匪情分析」、「專題研究」上的若干討論，以供研究、分析匪情相關人士參考。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組編印，《認識敵人》(1951，臺北)，收錄「吳稚暉檔案」，《中國國民黨檔案》，孫圖藏，檔



其成果卻差強人意，僅菲律賓辦事處承諾翻印此批素材，總部人員亦認：「最優秀的內容可作為研究的一手材料，最糟的卻是極易識破的政治宣傳。」¹⁰²施豁德隨後調整此計畫的運作，在王雲五於 1954 年初寄給前新疆省省主席盛世才的新版委託合約中，較前封信件增列了幾項條款，其中強調：「大著為供外國人士閱讀，寫作時請以較有興趣之方式描寫。」自由亞協亦承諾額外撥給每千字一百元新臺幣的稿費。¹⁰³然而這些努力終究未能使這項計畫略有起色，會長卜蘭姆指出：自由亞協「並未成功促成任何品質足以在海外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或相關學術研究」。對此，施豁德評估原因出在「中國學術界正一片低迷 (doldrums)」，短時間難以改善。¹⁰⁴

(2) 文化項目 (Cultural)

此項目包括前揭由梁實秋主持的非共、反共文學翻譯出版工作，以及協助展出故宮珍品與委託杭立武編印藏品目錄等兩大方向。¹⁰⁵前項預期鼓舞臺灣作家發揮潛力，使其作品傳播至海外華僑社群，以與中共競爭；後項則同時發行中、英文目錄，向東亞其他國家與美國人民說明國民黨中國的正統性及其作為正統中國文化的傳人地位，進而使大眾意識到中共正在摧毀中國文化。¹⁰⁶

號：稚 00499、稚 13002；「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1953 年 1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會議紀錄彙編〉，《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05-010。

¹⁰² Letter from Marjorie S. Ravenholt to Richard P. Conlon, James L. Stewart, Nov. 15,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Information on Taiwan Research Program for Mr. Taylor," Curtis Farrar to Harold L. Amoss, Jr., Sept. 15,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³ 王雲五首次向盛氏邀稿，是在 1953 年 4 月 1 日，並獲得盛氏的欣然允諾。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 第二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785 – 787、801 – 802。感謝韓承樺老師提點我注意此份材料，證實王雲五與自由亞協確有合作。而據盛世才回憶，過程係光復大陸研究委員會友人（即王雲五）引介密西根大學講師懷廷 (Allen S. Whiting, 1926 – 2018)，訪問其主政新疆經過（其子盛任傳居中翻譯）；期間懷廷獲悉盛氏尚未發表的「新疆十年回憶錄」書稿，並在取得後於 1954 年轉交自由亞協託人節譯、私下出版。推測這份回憶錄極有可能是王雲五的邀稿成果。「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 1953 年 9 月 29 日至 12 月 11 日間在《自立晚報》連載，盛氏憶往之餘亦力圖為己辯駁。見盛世才原著，〈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17 卷 2 期 (1970, 臺北)，頁 93 – 95；〈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1953 年 9 月 29 日，01 版；〈盛世才新疆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1953 年 12 月 11 日，03 版；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xiii–xviii.

¹⁰⁴ "Plans and Program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Apr. 5,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接任的饒大衛代表亦觀察到當時的臺灣知識界正為一股「陰鬱」(gloom) 壟罩，司徒華則稱之為「茫然的無望感」(a vague feeling of hopelessness)。對此，司徒華認為自由亞協在臺灣的「圖書館購書計畫」(library acquisition program) 恰是改善此等困境的契機，其指出：若要使臺灣民眾擺脫無望感，「非得靠智識菁英來指點迷津；而這些智識菁英唯有在更跟上時代的環境中工作，其產出才有意義」。正是自由亞協在各地補充的圖書館藏，提供了此一「智識刺激」(intellectual stimulus) 的機會。James L. Stewart, "Taiwan Notes." Sept. 19,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⁵ Operation Department,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⁶ "Taiwan Programs On-Going."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由於自由亞協是當時唯一在亞洲開展中翻英計畫的美國機構，為免逕自利用歐美作品做宣傳而引發亞洲民眾反感，總部起初對於文學翻譯項目寄予厚望，甚至一度編列高達 33,000 美元的預算。¹⁰⁷不過實際運作下來，卻發現臺灣「適合翻譯的素材稀缺……文學翻譯工作暫且處於停滯狀態，因為找不到適合翻譯的作品。」施豁德轉而將贊助撥予國民黨內部發起、張道藩主持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簡稱文獎會），¹⁰⁸並在張氏提議下擴大補助範圍，協助開設寫作班、補助報導、徵文比賽、廣播劇等項目。¹⁰⁹不過狀況卻未見改善，連主事者張道藩亦感來稿的政治宣傳意味往往高於「高深的藝術造詣」。¹¹⁰截至 1953 年 10 月僅勉強選出 10 部短篇小說翻譯，及出版張秀亞的幾部作品。¹¹¹文學翻譯計畫的挫敗亦使施豁德建議：「若總部評估應放棄此計畫，臺灣辦事處亦不會感到惋惜。」而此項目隔年預算砍半，低度運作至計畫喊停。¹¹²

儘管臺灣辦事處與總部皆高度重視的文化、研究項目成果不如預期，施豁德仍認為上述活動間接從旁推展了自由亞協的目標——使臺灣民眾與智識菁英咸認自由亞協是藝文組織，從而掩蓋該會的真正目標；並且聯繫起自由亞協與學術界、文化界的友好關係，有利於日後會務推展。¹¹³

(3) 分銷項目 (Distribution)

自由亞協自臺灣會務正式展開的同一年，便先後透過每月花費共 500 美元（後略漲至每月約 623,47 美元）承購《自由中國》、《大陸雜誌》、《世界新聞》三本刊物。以圖維繫這類主題獨立、內容非共且適當的刊物之營運，賦予其與親共黨報刊的競爭能力；同時亦作為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的一部分，使當地讀者能接觸到更多非

¹⁰⁷ “Office of Vice President for Operation.” Oct. 7,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⁰⁸ “Request for Comment on 1953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n. 2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關於文獎會的目標，誠如張道藩指出，政府縱使時局險惡亦不該過於介入、統制文藝發展，反之應以獎勵的方式循循善誘，使其「走上正當的道路」。張道藩，〈論當前文藝創作三個問題〉，《文藝創作》創刊週年紀念特刊（1952，臺北），頁 1–12。

¹⁰⁹ “Monthly Activity Report for February, 1953, Taiwan.” Taiwan File, Box No. P-54, AFR. 而施豁德亦評估張道藩發行的《文藝創作》，是當時臺灣最好的藝文雜誌（the best existing literary magazine）。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¹⁰ 張道藩，〈論當前自由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文藝創作》第 22 期（1953，臺北），頁 1–7。有關文獎會作品品質低落一事，而美新處亦有同感。王梅香指出，該時臺北美新處曾為《今日世界》雜誌的稿源而找上文獎會，但該會選用的文稿宣傳色彩過重，難以應用於其隱蔽宣傳工作，不敷美方的期望與需求，雙方合作僅乙次便戛然喊停。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頁 202–205。

¹¹¹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¹² “Program Budget Fiscal Year 1955 – 1956: Taiwan,”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¹³ Robert Blum, “Memorandum.” Mar. 12,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共產資訊。自由亞協強調，此項目並非對發行機構的補貼，而是藉包攬其海外發行郵費，使其獲得更高的償付能力，進而提升海外發行量。¹¹⁴

《世界新聞》(World News Magazine)創刊於1952年9月5日，由任職於政府發言人辦公室下轄機構 (subordinate capacity in the Government Spokesman's Office) 的李德齡與泛亞新聞社 (Pan Asia News Agency) 臺灣負責人丁維棟創立。該刊以分析報導時事新聞為主，內容涵蓋「從世界問題到臺灣的政經動態；從自由中國的發揚韜厲，到紅色大陸的殘民以逞」，試圖仿效《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嚴肅時事評論。由於兩位創辦人皆不具黨政色彩，且施豁德評估該刊頗具潛力，故獲得該會些許補助 (very limited extent) 測試海外需求。

¹¹⁵

《大陸雜誌》(The Continent Magazine)創立於1950年7月15日，由中研院首屆院士、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理事長朱家驥與董作賓等人發起，其自詡：「我們為了延續這不絕如縷的學術命脈；為了搶救這勢將中斷的文化系統；為了保存這橫遭摧毀的歷史真跡；纔決定了創辦這個刊物。」¹¹⁶施豁德認為，這份學術性刊物雖優質，但對閱讀大眾 (reading public) 吸引力有限，故僅願予小額補助 (a small amount) 購贈海外知識圈。¹¹⁷其補助中止於1967年，辦事處職員蔡增瑞解釋：「美國之補助向例以三年為限，今補助大陸雜誌已十年矣。三年時間足以普遍引起反應，三年而無效，是國人不需要此雜誌，美國人已盡其力矣。」¹¹⁸

至於由雷震與胡適發行的《自由中國》(Free China Fortnightly)，則被施豁德譽為「可能是臺灣最好的雜誌」，於是資助該刊部分 (some help)，加強其海外發行量。¹¹⁹施豁德評估，該刊每期6,000冊的發行量中，有40%受眾為海外華僑，而此

¹¹⁴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Taiwan Programs On-Going.”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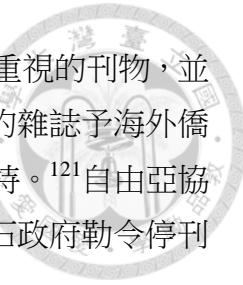
¹¹⁵ 該刊的發行目標為「在戰時安全原則之下，在反共抗俄的大前提下，以最客觀的態度，分析最複雜問題……我們相信這種態度是符合國家最高利益的。」施豁德評估該刊受眾為一般民眾，發行量應為2,000份。〈我們的話〉，《世界新聞》創刊號 (1952，臺北)，頁1；“Taiwan Programs On-Going.”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¹⁶ 馬徹，〈大陸雜誌〉，《現代學苑》第2卷第1期 (1965，臺北)，頁41–42。

¹¹⁷ 施豁德評估《大陸雜誌》受眾為學者，其發行量國內可能達1,000冊、國外800冊。“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¹⁸ 本社，〈大陸雜誌二十二年〉，《大陸雜誌》第44卷第6期 (1972，臺北)，頁28–31；王梓良，〈大陸雜誌三十年〉，《大陸雜誌》第61卷第1期 (1980，臺北)，頁39–42。

¹¹⁹ 《自由中國》受眾為智識菁英，施豁德評估其國內發行量為3,500冊、海外為2,500冊。“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讀者群正日漸擴大。¹²⁰這也使得《自由中國》成為該會在臺灣至為重視的刊物，並於 1955 年起獨獲自由亞協每年購贈 6,000 美元（500 美元／月）的雜誌予海外僑校、僑團或僑領；而其餘兩份刊物每年僅共同獲得 4,000 美元的支持。¹²¹自由亞協對《自由中國》的資助自 1953 年 2 月起，迄 1960 年該刊遭蔣介石政府勒令停刊止，雙方來往經過詳見第四章。

（4） 教育項目（Education）

有關亞洲教育處境的改善，因獲自由亞協與美國政府高度關注，逐漸成為該會工作重心之一。臺灣辦事處著手將此計畫目標由供給臺灣內部需求，如資助私立院校獎學金、供給當時臺灣八所院校期刊與英文書籍、贈送桃園農工各式花卉與灌木種子等工作，轉向與該會整體反共目標直接相關的海外華人學生教育——預期藉由提升臺灣高教設施，吸引更多僑生來臺就讀。¹²²有關該會在 50 年代資助臺灣高教與僑教發展的經緯則詳參第三章。

綜觀自由亞協該年度諸項工作，施豁德評估其在臺灣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當屬文化項目與分銷項目。他期待藉由翻譯工作與刊物分銷，有效地落實該會對海外華人的心理戰構想，無形中強化其反共意識，並日益傾心於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時強化該會與非共華人社群間的聯繫。¹²³然而，儘管施豁德在其任內做出各種嘗試與努力，直至 1954 年 9 月自臺灣代表卸任之際，他仍對自由亞協在臺灣的成績感到失望。不只原先賦予厚望的共黨研究及文化宣傳方面，成效頗為不彰；更遭新任會長卜蘭姆批評工作內容過於分散。另一項更為根本的問題是，無法找到符合總部期待的「非政治性」合作對象。他自言：

無論對國民黨政府有什麼不滿，它對反共一直堅決不移；而對於反對它的意見，亦皆採取堅決如斯的排斥態度。政府將其觸手伸進了幾乎每一個領域，無論其內容好壞。我們難以找到私人組織，甚至是民間人士

¹²⁰ “Taiwan Programs On-Going.”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²¹ “Program Budget Fiscal Year 1955–1956: Taiwan,”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²²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Education in Taiwan.”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12,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²³ 除了上述四大類計畫外，經臺灣辦事處擬議並獲總部通過的計畫，尚有金援中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資助籌建中的 Sino-American Cultural Institute（尚不確認該組織之中文名稱），並試驗性地在臺灣建立一個報紙與雜誌發行機構，促成出版品的海外流通等。“Request for Comment on 1953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n. 2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private individuals)。我猜，我所接觸的那些人，至少有九成皆任職於政府機關一類的單位。¹²⁴

由於前述計畫接連碰壁，施豁德一度萌生呈報總部「關閉臺灣辦事處」的念頭。不過，他注意到前述工作實對該會在當地的工作頗有助益，舉凡對於文化、研究項目及《自由中國》等刊物的資助，使得自由亞協開始與臺灣社會建立起相當緊密的聯繫，而施豁德亦評估此般人際網絡將成為日後拓展業務的基礎。再者，隨發送刊物而建立起的分銷管道，亦提供日後自由亞協圖書計畫與相關宣傳工作的流通途徑。最後，真正使施豁德暫緩「撤辦」建議的關鍵，則是他注意到了教育在對海外華人工作上可能發揮的無窮作用。¹²⁵

小結

自由亞洲協會自 1951 年春天由美國中情局暗中推動以來，工作重心始終在於圍堵中共對亞洲鄰近國家的滲透。「中國」及其延伸出的海外僑民，遂成為該會在亞洲頭號目標；並且促成該會決定將臺灣定位為「自由中國」的基地，不只積極展開對臺灣的自由中國化改造，對外則將臺灣宣傳為非共華人的集結點。在首任臺灣代表施豁德任內，其行動重心為加強對中共的圍堵與反制，因此至為重視能裨益於反共宣傳的各式材料生產。

在其實際行動方面，由於自由亞協與中情局的關係緊密，且又是該局在亞洲的隱蔽行動重心，其活動必須遵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 48／5 號文件及中情局內部方針；其核心目標為防止東亞諸國赤化，並且強化當地民眾心理素質以日漸嚮往自由理念與美國價值。由於其活動刻意以「非政府」形象包裝美國冷戰意圖，其行動的成功與否，高度關係是否能將其美國色彩降到最低，並以公開的非營利組織姿態介入，與當地人合作推動反共的心理戰工作。再者，中情局亦強調該會須時時意識到其「非政府」身分，尊重所在國政府的主權，避免涉入當地政治問題，且節制拿捏地與當地社群合作而不過度涉入的尺度，謹慎維持本文強調的「共謀的局外人」自我定位。

¹²⁴ “Plans and Program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Apr. 5,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¹²⁵ “Plans and Program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Apr. 5,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另一方面，為了使自由亞協於當地的行動成效最大化，中情局亦要求該會海外代表，視當地實際情況而制定出最合適的工作項目與合作模式，賦予其行動的高度彈性，本文將其稱為「萬花尺」式互動模式的構想。也正是出自此般構想，該會在臺灣的行動並不會如其他海外辦事處將重心置於公民或宗教項目；反之，鑑於當時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流亡政權之特殊性，以及東南亞華僑與中國母土的緊密連帶，遂構想將臺灣設計為「自由中國」。自此，臺灣辦事處成為自由亞協在東亞心理戰的重要節點，成為「中國總體計畫」的關鍵環節。施豁德在向總會報告 1953 年年度計劃時，尤其清晰地闡釋了這點目標：

由於自由中國的民眾難以符合自由亞協設定的目標對象，我們在臺灣的計畫發展有限。人們在健全的經濟環境過得不錯，他們要不是忠實的反共份子，就是非共人士。更準確地說，自由亞協期望善用在臺灣的機會，夥同其他地區共同推進中國總體計畫。¹²⁶

在臺灣島上隔海展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並蒐集與產出方便後續翻譯、出版、加工或流通的文字材料，成為自由亞協在臺灣的首要任務。然而，這些曾獲臺灣辦事處、總部高度重視的文化項目與研究項目，邀集並運用不少曾與中共有過交手經驗的外省官員與有志於反共書寫的藝文創作者，且投注許多經費，最終卻幾乎血本無歸，未能對宣傳或心理戰行動作出任何貢獻。檢視其執行經過，自由亞協顯然自制地維持其「共謀的局外人」角色，避免過度介入計畫，亦導致最終成效不彰。耐人尋味的是，原先不抱持過高期待的海外華人學生教育計畫與刊物分送計畫，隨後卻擴大進行，並成為自由亞協 1950 年代在臺灣主要推動的工作。

¹²⁶ “Outline of CFA’s Programs in Taiwan.” Oct. 27,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第三章 在臺灣推展「僑生教育」計劃¹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於 1953 年 11 月的訪臺行程，普遍被認為是影響戰後臺灣教育發展的轉捩點，各式教育設施隨即因美援對僑生教育的挹注而獲大幅擴充。然而，這樣的敘事暗示著援助國與受援國間恩賜、依賴的權力關係，繼承了國民黨政府威權主義式的冷戰秩序觀。更有甚者，被誤解為麥卡錫主義高漲下的反共產物。

僑教計畫的制定與規劃，有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僑務委員會、省教育廳、美援會，以及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安全分署（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MSM/C）²、亞洲基金會等合計 7 個部門共同商議，背後始終有美國官、私營組織的介入。換言之，僑教計畫的推動，並非美方一時興起，或僅出自改善國家體質、加強抵禦能力等傳統美援構想，實則牽涉總體東亞冷戰布局以及資訊活動構想。

1953 年 1 月，曾率領盟軍擊敗納粹德國的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其任內實施的「新面貌」（New Look）戰略，大抵延續既往「圍堵」構想，並高度仰賴核威懾、同盟、心理戰、隱蔽行動與和平談判等手段達成其冷戰目標。³為避免公開的軍事行動及共產主義勢無忌憚地蔓延，艾森豪政府特別將「心理因素」納為其冷戰政策中的核心要素，以爭取全球尺度的人心支持——大幅修正了前朝不甚成功的心理戰略（Psychological Strategy）工作，

¹ 英文檔案中，通常以「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稱呼海外中國裔移民，但同一稱呼在國民黨脈絡中則成了「華僑」（huaqiao/ Chinese sojourner）。有關東南亞華人／華僑的身分問題已累積相當成果，誠如王賡武的提醒，「華僑」一詞難以準確概括所有身分認同與國籍的海外中國人，並暗示「寓居」狀態。其名稱一味訴諸高度保守的血緣、文化觀，常與事實脫節，實為一種「感情用事的沙文主義者」的習慣說法，無視「許多不同類型的華人散聚者（Chinese diaspora）」。然而，因「華僑」是國民黨政權來臺後重建權威、國族敘事的關鍵憑依，且這群「華僑」亦因其身分享有國民黨政府賦予的各式利益，本文以下論及有關「戰後臺灣國家」形成脈絡時仍採「華僑」一詞，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作「僑生」；一般描述性敘述則作「海外華人」。王賡武，〈「華僑」一詞起源詮釋〉、〈中國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單一的華人散居者？〉，《天下華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頁 1－37、183－213。

² 安全分署的上級單位為美國負責外國經援業務的機構，1948 年至 51 年間為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1951 年至 53 年間為共同安全總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SA），1953 年至 55 年間改名為國外業務總署（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FOA），1955 年至 61 年間又為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1961 年迄今則稱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由於國民黨政府習慣稱呼「安全分署」，以下為免混淆，暫且將其於美國的對應機構譯名統一作「安全總署」。

³ John Lewis Gaddis 著，時殷弘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頁 130－165。



將過去限縮於尖銳反共宣傳的狹隘認定，進一步擴展至外交、經濟、各式傳媒、文化與體育交流等全方面交流工作。

新政府嚴格區分公開與隱蔽宣傳的範疇：公開宣傳工作交由新成立的美國新聞總署與美國之聲（Voice of America，VOA），並要求這些具政府色彩的宣傳機構以中立態度訴說「真實」，以此包裝「資訊活動」意圖；至於反共、揚美的隱蔽宣傳與政治戰，則交由不帶美國標籤的民營機構、非政府組織或個人進行，由政府部門暗中予以必要補貼。為妥適地落實心理戰略目標，隱蔽宣傳工作與隱蔽行動悉數交由中情局主導。與此同時，改組權責不明且成效不彰的心理戰略局為行動協調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協調美國冷戰政策運作，以更有效地調度各方資源、影響「輿論風向」（climate of opinion）。⁴

鑑於韓戰以來中共與蘇聯的態度轉變，艾森豪政府的冷戰政策比起杜魯門更大幅度地向亞洲傾斜。美國憂心東亞各國出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而接連倒向共產勢力，且忌憚第三世界國家高漲的民族主義、去殖民情緒與共產主義合流，因而連帶性地將「韓國、中國與印度支那視作同一問題，且作為整體來考量（considered as a whole）」、制定相應對策。⁵再者，由於憂懼中共效仿日本在二戰期間勢如破竹地進軍東南亞，並聯合有著血緣連帶的海外華人展開滲透，中共一躍成為美國在東亞的頭號敵人。做為中共在海外潛在「第五縱隊」（fifth columns）的東南亞華人社群，則成為美方積極拉攏的頭號目標——儘管東南亞諸國不一定與中國相交，但仍因境內的華人群體而與中國共享一道「共同（且滿是縫隙）的邊界」。⁶為避免刺激東南亞新興國家的民族情緒或殖民噩夢，美國愈發仰賴隱蔽行動與資訊活動，以暗中對抗中共的大量海外宣傳，遏阻共產主義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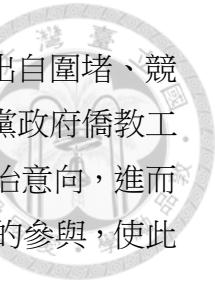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近來冷戰研究亦提醒，美國政府在東亞的行動目標並非全然出自「圍堵」構想。如裴斗虎認為背後尚關乎與中共競奪國際「地位」（status）的意圖，從而影響了美國的東亞與第三世界政策制定。⁷Frank Gerits 則藉非洲的案例強調，艾森豪的第三世界政策背後涉及對種族問題的家父長式（Paternalism）觀念，試圖

⁴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pp. 46–103.

⁵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William J. McWilliams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 Jan. 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6, Part 1*, pp.882–883. 蔡佳禾，《雙重的遏制——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東亞政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72 – 78、301 – 309。

⁶ Wen-Qing Ngoei, “The Domino Logic of the Darkest Moment: The Fall of Singapore, the Atlantic Echo Chamber, and ‘Chinese Penetration’ in U.S. Cold War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21, No. 3, 2014, pp. 215–245.

⁷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pp. 1–13.



運用教育援助與資訊活動促成新興國家的現代化與自治發展。⁸無論出自圍堵、競爭、現代化考量或兼有之，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於 1954 年起支持國民黨政府僑教工作，背後正是意圖利用「資訊活動」的教育手段，左右東南亞華人政治意向，進而鞏固冷戰中臺灣作為「自由中國」的地位——而亞洲基金會自始至終的參與，使此事更加不言而明。

第一節 東亞冷戰的新面貌

(一) 艾森豪政府「中國」政策的確立

隨著美國 1950 年前後嘗試尋求可靠且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計畫無疾而終，遂於 1951 年 5 月發布 48／5 號文件，正式表態對蔣介石政府的支持。鑑於臺灣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意義，美國政府指出，臺灣問題只能與中國問題一併看待，並強調臺海安全關乎美國國家安全。⁹不過，該份文件亦透露美方對國民黨政府的保留態度。美國政府予以支持的附加條件，是要求國民黨政府展開內部改革，以改善「自由中國」的聲望與代表性。與此同時，美國亦進一步擴展了對潛在非共華人領袖的培育工作，嘗試透過各種可能的手段強化對共產黨中國內部的影響。¹⁰換言之，杜魯門政府雖對外宣告支持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並促成了美援規模的擴大，仍不願說死與非共華人領袖、第三勢力的任何合作機會。

美國大使藍欽注意到美方在國民黨政府與海外第三勢力間兩面下注的構想，遂於同年 8 月發出警告：藉支持不同反共華人團體使其競合的手段，可能導致各方對美國的反感，甚至喪失信任。他對美國支持第三勢力一事頗有微詞：「所謂的香港第三勢力似乎既缺乏組織，遑論計畫或資金……至於把這些立場各殊甚至相互敵對的成員團結起來，更幾乎不可能。」¹¹隨著韓戰停火談判的停滯，美國政府內部再次重新評估「中國」政策，並在年底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同意「將福爾摩沙強化為一軍事、經濟、政治及心理上的反共基地」。¹²

⁸ Frank Gerits, “Hungry Minds: Eisenhower's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 1953-1961.” *Diplomatic History*, Vol. 41, No. 3, 2017, pp.594–619.

⁹ NSC 48/5, May 17, 1951. *FRUS, 1951*, Vol. 6, pp. 33–64.

¹⁰ NSC 48/5, May 17, 1951.

¹¹ The Chargé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nki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Aug. 13, 1951. *FRUS, 1952–1954*, Vol. 7, Part 2, pp.1779–1785.

¹² “United States Policies on Support for Anti-Communist Chinese Forces.”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Mar. 4, 1952.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15–16.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 174 – 178。



美國的中國政策真正底定，大抵應是在持強硬反共立場的艾森豪政府於 1953 年上臺之後。早在該年 1 月，負責美國政府心理戰工作的心理戰略局便指出，美國在東亞的目標之一便是將臺灣塑造為全體華人的集結點，以此提升蔣介石政府威信。同時強調，將僑匯與僑教集中至「自由中國」尤其重要。¹³這個構想隨後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獲得確認：蔣介石反攻成功的機率雖「有如歐洲為數眾多的王位覬覦者般渺茫」，但不得不承認這是「現存唯一可行的非共中國政治勢力」(the only effective non-communist Chinese political force in being)，且可作為「與共產世界作持續政治鬥爭不可或缺的武器」。隨著美國國安會確立全面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與其他非共華人團體的接觸只能轉往地下，並禁止美國官員對其做出任何具體承諾。¹⁴美國大使藍欽隨即於 1953 年 7 月向蔣介石政府聲明再次美方承諾，強調中情局等有關部門正考慮漸次縮減並放棄對第三勢力的資助。¹⁵同年 11 月 6 日，艾森豪政府終於正式拍板中國政策與行動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當天先後通過了兩份文件，成為美國在 1950 年代對中共、國民黨政府與華人工作的基礎。

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構想，表現在註記為「美國對共產黨中國政策」的 NSC 166／1 號文件之中。為了維護東亞的權力平衡並達成區域性的秩序穩定，美國需尋求戰爭以外的手段削弱中共在亞洲的「相對權力位置」(the relative power position)。如此則間接提升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總體冷戰佈局中的地位——臺灣被定位成「中國」的替代性符號 (symbolic alternative)，藉此挫敗中共的國際聲望。¹⁶至於標為「美國對福爾摩沙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目標及行動方針」的 NSC 146／2 號文件，則一改過去對國民黨政府的語焉不詳，以近三十頁的篇幅詳盡闡釋美國對臺的行動規劃，正式將臺灣納為「美國在遠東防衛的關鍵防禦據點」，並指示發展成「反擊大陸的有效心理戰基地」。至於心理戰的目標對象，除了共產黨中國民眾，矛頭更直指所有海外華人。美國政府在該份文件指出，其目標除扶持臺灣的政治、經濟、

¹³ PSB,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 5, 1953. CIA Records, i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accessed Mar. 14, 2023. (URL will be omitted below, and hereafter FOIA.)

¹⁴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6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 5, 1953. *FRUS, 1952–1954, Vol. 15, Part 1*, pp.266–277. "NSC Report on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Mar. 27, 195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s://www.proquest.com/dnsa/advanced?accountid=14229>. (hereafter DNSA).

¹⁵ 「蔣介石與藍欽談話紀錄」(1953 年 7 月 1 日)、「四十二年九月一日下午四時蘭欽大使致外交部」，〈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2701-0056。美方紀錄見：“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mbassad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nkin)," Jul. 1, 1953.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222–225.

¹⁶ NSC 166/1, U.S. Policy Towards Communist China, Nov. 6, 1953.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279–306.



軍事、貿易與外交發展，更須「強化所有大陸中國與福爾摩沙島外的非共華人團體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令其對國民黨政府的義務與忠誠能一如其對所在地政府表現的那般，尤其是東南亞的海外華人。」¹⁷

NSC 146／2 號文件強調，國民黨政府對東南亞華人的爭取關乎美國在亞洲冷戰行動的成敗。為了避免海外華人因為與東南亞新興的民族主義政府格格不入，而成為中共在當地的「第五縱隊」，影響區域安全。美國政府認為，寄居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對海外華人提供的政治制衡與心理慰藉至關重要，且臺灣當局亦可自海外華人身上獲取政治與財政支持，可謂一舉兩得。至此，國民黨政府取代第三勢力，成為左右美國東亞冷戰構想成敗的關鍵；而促進國民黨政府與海外華人連繫一事，亦被寫入美國官方政策，不再只是中情局檯面下運作的隱蔽行動。更具體地來說，NSC 146／2 號文件指示美國政府將臺灣打造成替代性的中國，並且由國民黨政府執掌此一「自由中國」的最高權威。國務院內部就「NSC 146／2」進行後續規劃與執行的工作小組，則交由日後曾擔任臺北美新處代理處長、美國駐華大使的中國事務部主任馬康衛（Walter Patrick McConaughy，1908 – 2000）負責。¹⁸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唯恐蔣介石政府的獨裁統治壞事，削弱「自由中國」對海外華人、其他亞洲國家的吸引力。如自由亞協顧問李度指出，臺灣的「反民主勢力正在抬頭」，警告美國政府須採取適當措施以扭轉國民黨政府「專制主義化的趨勢」。¹⁹為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 – 1959）一度指示：為了將臺灣打造成「自由與民主的展示窗」（show–window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應將國民黨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保障納為美援撥款的條件。²⁰

¹⁷ NSC 146/2,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Nov. 6, 1953.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308–330. 粗體字為筆者加註。

¹⁸ OCB,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 Study," Dec. 1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52401/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¹⁹ "Mr. L. K. Little's Remarks on his visits to Formos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 20, 1954. 794A.00/4-2054, in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50–1954, Reel 2.

²⁰ 國務卿杜勒斯對蔣經國曾發表「國家自由」先於「個人自由」的說法甚為感冒，認為其主張過於危險，並深怕援款恐將重蹈戰爭期間被扔進「老鼠洞」（the rat hole）的惡夢。Dulles, "A Practical Program for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790.00/2–553, in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0–1954, Reel 9. (hereafter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二) 瞄準海外華人

1949 年以來，美國儘管猶豫於「中國」的代表人選，不變的是從未放下對中共的警戒。時任美國駐港領事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於 1950 年指出，中共在出版及宣傳工作方面有長足進展，正致力發行各式「通俗」作品，以囊括更多受眾。²¹他強調，由於中國人對出版品的重視與經久保存，導致這類宣傳品的「壽命」不容小覷，這在中共對中小學生的宣傳攻勢上尤其嚴重。例如在純真童話中穿插尋釁且仇美內容的《小朋友》、《好孩子》、《新兒童》等兒童刊物，便常見於青年讀者間二度流通，²²大幅提升中共宣傳效度。與此同時，馬康衛提醒當局或可效法中共在《三毛流浪記》連環漫畫的成功，在東亞的資訊活動中創造另一個極富「人性吸引力」（human appeal）的英雄人物以競爭華人讀者。²³

然而，由於美國駐外機構當時已先後撤至港、臺二地，上述反制宣傳工作缺乏共產黨中國境內的在地支援，並未成功在中共境內展開。自由亞協與美新處嘗試利用漫畫的方式介入兒童、青少年市場已是 1953 年以後，前者透過資助友聯發行《兒童樂園》，後者則發展出「小說報」（Story Papers）的插畫宣傳模式——共通點是皆嘗試爭取更多華文程度不高的廣大海外華人讀者支持，尤其是未成年學子。²⁴海外華人與青年，成為艾森豪政府在東亞心理戰的行動核心。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早在 1952 年即通過強化美新處對海外華人的宣傳計畫，並打造出由香港美新處負責中共負面宣傳，臺北美新處強化對國民黨政府的正面行銷的分工宣傳體系。²⁵美國對東南亞華人進行宣傳的構想，恰與國民黨政府不謀而合。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隨即於 1953 年向美方傳達合作意願。他一方面盛讚美新處對東南亞華人進行的宣傳工作，相當有效地增進華僑對自由中國的支持；²⁶同

²¹ Walter P. McConaughy, “Chinese Communist Book Publish Activities,”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Dec. 14, 1950. 993.63/11-2950,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47.

²² Walter P. McConaughy, “Chinese Communist Magazine for Children,”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Feb. 14, 1951. 993.63/2-2351,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47.

²³ Walter P. McConaughy, “‘The Wanderings of San Mao’: Chinese Communist Comic Book Series,”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Jan. 29, 1951. 993.63/1-2951,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47.

²⁴ 相關討論請參：王梅香，〈打造冷戰兒童：香港友聯《兒童樂園》與自由亞洲協會的文化宣傳（1951–1954）〉，《中國現代文學》第 43 期（2023，臺北），頁 71–94；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2 期（2016，臺北），頁 1–40；Kenny K. K. NG, “Soft-boiled, anti-communist romance: The Story Paper and Liu Yichang’s A Singapore Story.” in Jeremy E. Taylor, Lanjun Xu eds, *Chineseness and the Cold War Contested Cultures and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and Hong Ko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94–109.

²⁵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頁 64–70。

²⁶ “Observations on Overseas Chinese by the Chairman of the Overseas Affairs Commission,” Taipei to



時自薦，國民黨政府同為「中國人」，更能分辨哪些手段更有效，並明示該會有意協助美新處更明智地規劃反共宣傳工作。²⁷正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僑務、黨務網絡支援下，美國政府得以更可靠地掌握東南亞各國華人社群人數、分布、組織、動向，以及當地政府與華人的關係，從而制定後續對策。²⁸

為善加利用國民黨政府業已累積的豐碩反共資源，統籌美國冷戰行動的行動協調委員會於 1953 年 10 月通過題為「加緊利用福爾摩沙設施開展心理戰」的「PSB D-44」號計畫，宣告將臺灣納入美國在東亞的心理戰略布局一環。此項計畫主要由美新處主導，並與中情局等機構協調權責與實務分工。然而，由於其宣傳設計大抵仍延續前朝風格，高度針對共產黨中國量身打造——力圖以國民黨政府作「掩護」，向大陸中國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帶展開反共宣傳攻勢；手段上，亦僅利用杜魯門時期常見的傳單、廣播等傳統宣傳管道。唯一有關海外華人的心理戰工作，只有利用既有電臺向收音範圍內地區投放廣播節目。²⁹臺北大使館方面對此頗有微詞，認為此方案透露政府中央對東亞工作現場的陌生，並建議此類資訊活動的援助不僅僅限於中共本身，而應擴及海內外。另一方面，則強調支援尚須觸及宣傳的「指揮層面」，協助國民黨當局設定宣傳主題、評估效果及其內部組織等面向，以強化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在宣傳工作上的合作成效。³⁰

年底，隨著有關中國政策的 NSC 166／1、NSC 146／2 號文件的發布，艾森豪政府的東亞冷戰布局大致拍板定案，海外華人被確立為美國東亞資訊活動的首要目標。「PSB D-44」計畫的各項業務，隨即分派美新處、中情局、國外業務總署 (The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FOA) 等對應機構負責。1954 年起，美國在東

²⁷ Department, Mar. 2, 1953, 793.00/3-23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²⁸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aipei to Department, Feb. 10, 1953. 793.00/2-10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²⁹ “Comment on General Olmstead’s Statement to the Press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Aid to Overseas Chinese,” Bangkok to Department, Jan. 26, 1953. 793.00/2-26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The Kuomintang in Malaya,” Taipei to Department, Mar. 16, 1953. 793.00/3-16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o Department, May 6, 1953. 793.00/5-6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Estimated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Taipei to Department, Nov. 5, 1953. 793.00/11-5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9.

³⁰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D-44 Formosa)” USAF to OCB, Nov. 6, 1953. FOIA, CIA-RDP80-01065A000300080007-0. PSB, “Draft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Report No. D-44: Intensified Use of Formosa Facilities fo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Nov. 19 1953.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671464/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2, accessed 16 May 2023. (hereafter USDDO.)

³¹ “Comments on PSB D-44, June 8, 1953. ‘Intensified Use of Formosa Facilities fo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Josiah W. Bennett to the Ambassador, Jun. 8, 1953.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672799/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16 May 2023



亞的資訊活動布局，由既往的傳單、廣播，轉向著重擴大東亞教育設施，以及強化出版品的流通、圖書館的擴充等工作。³¹

有了 NSC 146／2 號文件的背書，艾森豪政府自 1954 年起著手規劃針對海外華人的全方位資訊活動工作，並交由美國新聞總署及國外業務總署負責。美新處的工作主要聚焦三大部分：首先，運用旗下的《今日世界》、《四海》畫報等刊物，以及購自臺灣本地刊行的各式出版品，在東南亞、拉丁美洲華人社群間流通；輔以文學翻譯計劃、教科書出版計劃，向東南亞各國傳遞自由世界的理念；最後則自行刊印小冊子或經美國之聲廣播等宣傳媒介，大力渲染中共的殘暴、「自由中國」的成功，向海外中國人傳播「自由中國正日益強大」的消息。至於主責美援撥款的國外業務總署，則以經費支持擴建並改善臺灣各中學與大學教育設施，以容納至少額外兩千名海外華人學生。³²

國外業務總署於 1954 年起正式撥款支援臺灣教育發展，顯示美國政府對亞洲教育資源的高度重視，高度焦慮於「亞洲的下一代正走向馬克思主義」。著眼於中共投注了大量資源於青年與兒童的宣傳工作，美國愈發重視可能成為將來變革主力的青年群體，積極培育潛在領袖及新世代的人力資源，以圖在日後影響當地社會風向。因此，同文同種且易於對中共有所共鳴的海外華人學生，成為美國政府在東亞要爭取的首要目標——以免前往共產中國學成歸來傳播共產思想，徒增社會動盪。³³事實上，美國政府內部此前已陸續出現有關華人學生教育計劃之議，如行動協調委員會在 1953 年初專為東南亞制定的「PSB D-23」號心理戰計畫中，便論及有關鼓勵華人學生至臺灣接受高等教育、聘用更多反共教師的選項，並評估此案對於觸發海外華人「非共傾向」的高度潛力。³⁴隨著艾森豪政府確立中國政策，亞洲的華人教育正式成為了東亞冷戰的問題核心。

³¹ “Annex to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on PSB D-44,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Jan. 19, 1954. FOIA, CIA-RDP80-01065A000300080006-1. “PSB D-44,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Officer, OCB, Feb. 8, 1954. FOIA, CIA-RDP80-01065A000100070001-9.

³² 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46/2 (Formosa and Nationalist China),” Jul. 1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48666/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16 May 2023. 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46/2 (Formosa and Nationalist China),” Feb. 17, 1955. FOIA, CIA-RDP80R01731R0003000010001-1.

³³ 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1947－198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頁 193－208。

³⁴ “PSB D-23,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 5, 1953. FOIA,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中情局在一份內部報告中，將海外華人區分成年長世代與年輕世代兩群，並指示尤其須密切關注後者動向。該報告認為，緣於在居住國長期未能享有平等權利，華人青年更易於對中共產生「真切興趣」，從而選擇中共所提供的教育機會；並對一味索求僑匯而未見相應福利措施的國民黨政府愈發反感。對他們而言，現實問題遠比政治理念重要。³⁵為了釐清中共為何如此吸引華人學生，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曾於 1953 年訪談赴共產黨中國求學的華人學生，並歸納出四點理由：殖民地香港升學不易，且私人書院缺乏吸引力；畢業後的就業問題；親共院校及書刊密集灌輸「共產主義烏托邦」理念；中共積極提供經濟支持、簽證及生活資助，留學門檻遠低於臺灣等地。在港英政府提供的出入境資料中，有關赴共產黨中國求學的港澳及東南亞華人學生數量一直呈穩定成長，截至 1954 年 10 月已累積近一萬八千人。（見表 3-1）為了避免這些學生返鄉後鼓吹其他人前往中共，或影響年長世代對中共的觀感，香港領事館強烈建議，美國政府應在亞洲提供另一個優渥學習機會與情感慰藉的選擇，才可能贏得這場與中共的競爭。³⁶

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在 1953 年底參訪亞洲各國之後，同樣表示了對華人學生教育問題的憂心：「（中共）他們正透過十分有效的方式，從外部與內部接管年輕人。」他在國安會的報告中強調：美國有必要透過學生交換計畫等形式，強化與亞洲民眾的聯繫，以防範各地潛在的「內部顛覆」（internal subversion）；同時須「繼續維持福爾摩沙作為海外華人文化的載體與符號」，爭取更多海外華人支持。³⁷

³⁵ “The Overseas Chinese,” Mar. 15, 1954, FOIA, CIA-RDP80-00809A000500420095-8.

³⁶ “Chines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to the China Mainland for Advanced Studies,”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Dec. 4, 1953. 893.43/12-4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Mainl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May 28, 1954. 893.43/5-2854,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Travel to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Dec. 29, 1954. 893.43/12-2954,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

³⁷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77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 23, 1953. *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p.345–349. “Meeting with the Vice President,” Jan. 8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33240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16 May 2023



表 3-1、各年度赴共產黨中國求學之華人學生數（1951－1954）

年度	自港澳入境	海外華人
1951	300（估計）	4,564
1952	500（估計）	3,169
1953 (1至11月)	691	3,993
1954 (前一年12月至10月)	712	3,710
小計	2203	15,436
合計		17,639

來源：“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Travel to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to Department, Dec. 29, 1954.

893.43/12-2954,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

為了減損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並確保其「西太平洋前線」(Western Pacific Frontier) 的穩固，美國致力於將臺灣改造成讓海外華人集結的「自由中國」。予以臺灣經濟援助吸引僑資，以及透過印刷出版品展開心理攻勢之餘，美國政府更是充分意識到華人青年之於其東亞冷戰布局的重要性，嘗試透過教育對年輕一代東南亞華人造成潛移默化影響。例如美新處認為，受過教育、可能成為將來領袖的青年學生，將能發揮與智識菁英與媒體同樣關鍵的影響力，形塑海外華人社群的輿論風向。³⁸至此，美國政府將原先研擬利用夏威夷大學展開亞洲學生培訓計畫的念頭，³⁹轉向構思將臺灣及香港納為海外華人學生教育計劃實施基地的可行性，隨後正式於 1954 年起以美援補助國民黨政府的「僑生教育」。

第二節 僑生教育計畫的開展

自由亞協很早就注意到教育之於亞洲新興國家的可能性，諸如前一章提及的《致美國所有亞裔學生的一封信》即透露該會對美國境內亞裔學生的高度重視。自由亞協隨後將目光轉向亞洲的青年學子，1952 年於香港發起「隱形大學」(invisible university) 項目，藉由成立影子組織「孟氏教育基金會」(Mencius Educational

³⁸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頁 136－140。

³⁹ 戰後，美國政府一度試圖將夏威夷大學打造為與亞洲國家間的橋梁，在此培養亞裔學生對於民主與美式精神的認識，並促成第一島鏈學生間的相互理解與共識，進而將對殖民的不滿轉為區域合作。“Developing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Pacific Front—Long range Planning for Japan, Ryukyu, Formosa and the Philippines,” J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Foundation)，主導對香港中文書院的教育補助，藉此隱蔽自由亞協對香港教育的直接介入，強化香港各書院皆獨立經營的印象。⁴⁰1953年，隨著自由亞協將臺灣目標定位為「中國總體計畫」一環，臺灣代表施豁德著手與國民黨政府洽談、規劃「僑生」來臺就學事宜。「僑教」工作成為臺灣辦事處1950年代中後期的行動重心。

如前所述，自由亞協對海外華人學生教育的日益重視，背後牽涉總部的總體方針調整，更關係艾森豪政府的全球冷戰布局。1953年8月，卜蘭姆(Robert Blum, 1911 – 1965)接替衛倫亭成為新任自由亞協會長。卜蘭姆的任命是中情局欽點，他被認為是首位最富心理戰及亞洲經驗的自由亞協會長。他曾於二戰期間於歐洲進行情報工作，戰後初期亦曾代表美國國防部參與中央情報局的組建，1950年後加入美國經濟合作署負責柬埔寨、寮國、越南及印尼等地業務。⁴¹

幾年運作下來，中情局深感自由亞協在亞洲的斬獲有限，與其原先期待頗有落差。這導致整頓自由亞協成為卜蘭姆就任後的首要之務。首先是改組董事會，不同於現有董事多半為知名企業家或社會領袖，他轉而邀請對亞洲感興趣的人士及教育家、作家、傳媒及電影界人士加入，為該會在亞洲的工作提供意見；並且指示各辦事處應提供受援方更「確切的東西」(something positive)，以使其逐漸「適應」西方知識，而非止步於傳統的「心理戰」招數。⁴²接著，卜蘭姆則將目光轉往帶有濃厚冷戰色彩的「自由亞洲協會」名稱。為避免被印度與印尼政府拒之門外的經驗重演，他更強化該會無關政治的「非政府組織」形象——以免「自由」一詞刺激甫擺脫殖民、「正為獲得自由而自豪的亞洲人」。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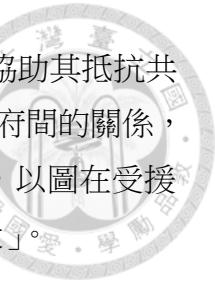
1954年10月，該會正式以「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的嶄新中性面貌展開活動，該會宗旨同樣調整為「藉由提供非共選項協助亞洲人實現其自身願

⁴⁰ 張楊，〈雙重文化冷戰：亞洲基金會援助亞洲大學項目探析〉，頁107。

⁴¹ “Implementation of NSC 10/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ug. 6, 1948.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pp.719–722.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May 20, 1950. *FRUS, 1950, Vol. 6*, pp.818–819. “Mr. Robert Blum,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for Programs,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Cleveland) to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llison),” Dec. 17, 1951. *FRUS, 1951, Vol. 6, Part I*, pp.759–762.

⁴² Frank G. Wisner, “CFA Budget for FY–1955.” Jun. 25, 1954, DTPILLAR, Vol. 2, 0034. 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pp.31–33.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p.594.

⁴³ Frank G. Wisner, “CFA Budget for FY–1955.” Jun. 25, 1954, DTPILLAR, Vol. 2, 0034. 不過，臺灣代表施豁德對此事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自由亞洲」與「自由中國」構詞相似而較易獲得民眾接受，且臺灣社會已普遍習慣舊名，認為貿然更動恐事倍功半。“Proposed New CFA Name,”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President, Aug. 31,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景」、「實際培養亞洲人的公民實踐及公民責任」、「活絡非政府組織並協助其抵抗共產勢力的滲透意圖」等相對溫和的目標。⁴⁴除了進一步隱蔽與美國政府間的關係，亞洲基金會亦轉向透過更為迂迴的資訊活動方式爭取東亞民眾支持，以圖在受援國達成更為淺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有效地落實美國的「心靈基礎建設」。

(一) 自由亞洲協會的海外華人教育構想

臺灣代表施豁德自 1952 年底著手研議在臺灣開展海外華人教育計劃的可行性。隔年 1 月，他正式向總部提案，主張臺灣辦事處應在進行中的教育計劃如提供私立院校獎學金、聘僱美籍教師前來亞洲、補充大學藏書與中英文報刊等基礎上，額外撥款資助臺灣大專院校修築宿舍與教學空間，強化臺灣作為留學地點的吸引力，進而擴大招收東南亞華人學生，鞏固海外華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⁴⁵

根據施豁德在 1953 年 1 月向總部提出的「擴展海外華人在臺灣之教育機會」這份計畫草案，他預計可為臺灣的大專院校額外招收 500 名華人學生。比對教育部或僑委會當時統計，1951、1952 年來臺的僑生人數皆僅有未滿 300 人，其中港澳學生又佔了逾八成（參表 3-2），⁴⁶一年增加 500 名學生已是翻倍成長。不過，相較於每年數千華人學生赴共產黨中國求學的景況（參表 3-1），仍有不小落差。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差異，施豁德認為大抵可歸納為四點原因。出入境方面，國民黨政府為防範中共而採取過於嚴苛的入境審查，若留學生缺乏本地擔保人則無法入境；又因部分東南亞國家承認中共，來臺簽證恐被為難。其次是東南亞各國華文學校（以下簡稱華校）有限，或遭當地共黨控制，整體海外華人學生的中文程度與學力較差，能達入學標準幾希。最後，亞洲國家的境外匯款或外匯多有管制，徒增留學

⁴⁴ 有關「亞洲基金會」名稱之中文譯名，總部曾給出亞洲協會、亞美協會、亞美協進會等三個選項，臺灣辦事處方面一開始傾心於「亞美協會」，並建議將為亞洲基金會籌措資金的「The Fund for Asia」譯為「亞洲基金」。但總部方面最後選用「亞洲協會」，而臺灣代表饒大衛則於 1955 年年初向內政部更新該會執照，由最初登記的通訊社改為社會團體。“Name Change,” letter from Milton Chase to David Rowe, Aug. 31,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Name Change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letter from David Rowe to President, Sept. 7,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關於亞洲協會駐臺北代表辦事處擬登記為我國社會團體事」（1955 年 1 月 31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⁴⁵ “Student Program of CFA.”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an. 21,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⁴⁶ 兩份統計雖略有出入，大抵相去不遠。“Proposed Project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Feb. 20,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僑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處編印，《僑生回國升學概況》（臺北：氏著，1972），頁 42 – 43、107 – 108。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之《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一書之統計資料，亦主要參照僑委會。



生的資金調度難度，而臺灣極有限的宿舍與零零總總的額外生活開支，間接導致經濟問題加劇。⁴⁷

表 3-2、1951 及 1952 年臺灣海外華人學生來源分布

年度	來源	臺灣大學	師範學院	省立農院	省立工院	其他	總計
1951	港澳	20	14	9	16	26	85
	東南亞	14	2	-	-	-	16
	其他	2	0	-	-	-	2
	總計	36	16	9	16	26	103
1952	港澳	32	27	13	19	121	212
	東南亞	13	13	7	6	3	42
	其他	1	0	0	0	0	1
	總計	46	40	20	25	124	255

來源：“Proposed Project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Feb. 20,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臺灣在 1950 年代初期的教育資源實殊匱乏。首先，國民黨政府彼時致力反攻，能用於教育的經費自然相當有限，而臺灣省教育廳的經費亦僅用於掃盲導向的小學教育。至於美國政府如共同安全總署、美國新聞處等機構所關心的教育項目，則集中在補充教師員額及圖書資源等方面，施豁德重視的院校空間問題從未獲得任一有關單位正視。再者，由於當時主要沿用日治時期留下的教育設施，戰爭的破壞與戰後臺灣高教迅速發展而導致的設施耗損，加上校舍的學生容納數將屆飽和，任一間高教機構皆無能於擴大招生。職是之故，施豁德評估，若要招收更多海外華人學生，相對於開辦新學校接收海外學生，依現有高教基礎加以補強的風險較小且效益更高。施氏建議自由亞協資助修繕臺灣高等教育設施，並為此編列高達 10 萬美元的經費預算。他強調，臺大若能獲 15 萬美元改善教學設施，將可為該校增加 10% 海外華人學生的入學率。⁴⁸

為了提高來臺留學一事對海外華人的吸引力，施豁德選擇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臺灣工學院（今成功大學）、臺灣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等四所當時臺灣最為頂尖的公立院校為實施地點；並計劃以臺大為重心，收容其中 300

⁴⁷ Ward D. Smith, “Proposed Project of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for Expanding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aiwan,” Jan. 29,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⁴⁸ “China News Editorial on Education,”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Feb. 5,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名學生，剩餘 200 名學生則平分至三校。由於這四所院校聚集臺灣一流師資，使這項教育計畫在增進海外華人與自由世界的連結之外，更有培養這些華人留學生成為所在社群所需的人才、引領當地發展及輿論走向之目的。⁴⁹

總部雖很是肯定施豁德的「僑教」構想，同時仍提出其顧慮：在最大化自由亞協贈款效益之際，還是需要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稍詳言之，總部的考量主要有三個面向：該會宗旨、經費與區域效應。首先，此計畫資助的對象皆為國立院校，似乎有違不與政府方面合作的方針；過高的建築費用亦有使該會暴露的風險，總部建議臺灣辦事處最好只負責後勤的規劃、協調工作。其次，加強與海外華人組織間的合作，以此籌措計劃資金、擴大區域連結，同時避免國民黨政府在費用上「長於承諾卻短於表現」的情況重演而出現呆帳。第三，總部要求臺灣辦事處評估資助臺灣高教與籌備中的新加坡華人大學間的效益，以及此事是否衝擊海外華人與所在國政府的關係。⁵⁰縱然自由亞協對推展海外華人學生教育甚感興趣，且海外華人正是該會的重點工作項目，但為了更有效地推進該會在亞洲諸國的行動效果，仍須嚴守介入尺度，以免牽扯進受援國內部的政治漩渦。

隨著尼克森於 1953 年 11 月訪臺，有關東南亞華人學生來臺就學一事正式獲得美國官方的公開宣示性承諾。原先只是自由亞協內部擬議的海外華人教育計劃，隨即抬升為美國東亞總體冷戰政策一環。尼克森隨行的考察團指出，相較於中共提供海外華人學生十分優渥的高教就學條件及 10%名額保障，臺灣的大學卻幾近飽和，無力招收海外學生。尼克森一度為此提議在臺灣專為華僑辦一所大學。⁵¹尼克

⁴⁹ Ward D. Smith, "Proposed Project of Committee for Free Asia for Expanding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aiwan," Jan. 29,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⁰ Letter from RPC to JLS, Feb. 4,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James L. Stewart, Robert G. Goffard, "Monthly Activity Report for December, 1952," Jan. 15,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James L. Stewart, "Monthly Activity Reports," Jan. 1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新加坡華人大學即稍後於 1956 年成立的「南洋大學」。相關人士曾於 1953 年初籌備之際尋求美國駐新加坡領事館的資助，但美方為避免涉入當地馬來人、華人與殖民政府間的民族與政治爭議，暗示應尋求福特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支援。“A Chinese University for Malaya?” Feb. 20, 1953. 893.43/2-453,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 有關該校成立經過可參：利亮時，〈1950 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6，臺中），頁 533 – 552。

⁵¹ White House, "Report of the Van Fleet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Apr. 2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4913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16 May 2023；「K. L. Rankin 致陳誠函」（1953 年 11 月 24 日），〈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對此，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則認為，是其所率領的國民黨第三組積極出面向尼克森說明僑教重要性，方才得到其同情與支持。鄭彥棻，《往事憶述》（臺北：傳記文學，1978），頁 130。



森之言促成美國各政府部門對亞洲華人教育問題的高度關注，適時為仍對於是否花費高達 10 萬美元在單一項目而僵持不下的自由亞協提供了解套。⁵²

隨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大使藍欽與外長葉公超的建議下，正式於隔年一月成立籌備工作小組，著手會商強化臺灣的華僑高等教育一事。「東南亞僑民教育計畫工作小組」（簡稱僑教小組）成員由臺灣與美國兩方分別指派，國民黨政府方面由教育部部長程天放、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省教育廳廳長鄧傳楷與美援會秘書長王蓬代表，美國大使館則委派安全分署教育部門主管白朗（H. Emmett Brown, 1897 - ?）及大使館文化專員惠波（Dorothy Whipple, ? - ?）與會，藍欽隨後又以自由亞協在此領域耕耘已久而要求加入施豁德與會。召集人由教育部長程天放出任。⁵³國民黨政府與美方雙方合作的臺灣僑生教育工作的核心小組就此確立，這七個單位共同主導並決策 1950 年代的僑生政策方針與走向。

（二）東南亞僑民教育計畫工作小組

教育部與僑委會隨即於 1953 年底依據尼克森的發言，擬定一份「東南亞華僑青年教育及訓練計畫綱要」草案，並設定由海外及國內兩個方向齊頭並進地推展華僑青年工作。海外工作主要依循國民黨第三組提交第七屆三中全會並獲通過的「加強海外工作方案」執行，同時透過供應僑校教材、師資與適量經濟支援，以即加強報刊、圖書、廣播或影音資源的文化宣傳，強化與中共競爭的能力。國內方面，則特別設立僑生大學及中學，供應僑生升學所需，並降低程度落差。新設大學的系所涵蓋文理商、師範、會計、新聞等學科，附設有研究部、大學先修班、短期訓練班、函授部等單位，預計第一年招生 1,300 名學生（港澳 1,000 名、其餘地區 300 名），至第四年起常態性維持每年 5,050 名學生；至於農、工、醫等學科因花費較高而交由臺大與省立農學院、工學院擴班容納。該計畫指出，國內僑生教育的施行原則有二：滿足僑生畢業後返回原居留地就業需要，並提高他們「與匪鬥爭之精神及技

⁵² “Mr. Blum: Here are a few paragraphs which might be included in your letter to Dr. Rowe,” Mar. 12,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³ 「K. L. Rankin 致陳誠函」（1954 年 1 月 21 日）、「陳誠致藍欽函」（日期未悉）、「K. L. Rankin 致陳誠函」（1954 年 2 月 10 日），〈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A/0042/7-7/1。



能」。⁵⁴ 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隨後明白指出，僑教工作的重點之一將是鼓勵僑生來臺攻讀師範院校或傳播科系，以訓練、補充親國民黨在海外的師資與媒體人才。⁵⁵

國民黨將僑教工作視為僑務工作的補充，定位爭取僑生來臺的目標為陶冶僑生的民族精神與生活技能：「堅定其反共抗俄之信念，俾能為自由民主而奮鬥」。⁵⁶ 換言之，僑教在國民黨集團內部的構想，實為藉此達成范雅梅所謂維繫「國民黨作為一流亡政權下所需要的象徵秩序」，⁵⁷ 利用東南亞的廣大「華僑」為其正統性背書，進而在臺灣重建起以中國為尺度的天下國家——這與美國試圖藉臺灣作為非共中國人的集結點的期待不謀而合。

不過誠如前文指出，美國出資的理由實與國民黨的盤算存在落差，美國更在意避免東南亞華人淪為「第五縱隊」。不同於國民黨政府將「僑生」同時計入有文化與血緣相親性的港澳生與東南亞華人學生，美國政府將「海外華人學生」嚴格定義為：居住在中共用力甚深的海外地區，且自美方批准的院校畢業後有意返鄉工作的華人學生。⁵⁸ 換言之，美方並非僅將臺灣定位為另一個中國，更是「自由世界」的具體表徵。美國政府最為在意的，並非強化海外華人的僑民身分與文化認同；其目標始終是以自由理念感染來臺留學生，加入非共／反共陣營。雙方對「僑教」的迥異期待，亦牽動日後在經費與行動規劃等各方面的摩擦。

僑教小組隨後以教育部與僑委會草擬的方案為底本，召開三次會議凝聚共識，會中決議國內執行工作交由教育部負責、海外則由僑委會主導。教育部對提升僑生升學數的評估與施豁德相仿，認同現實層面的首要工作是擴充教育設施。有關新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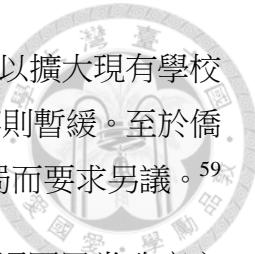
⁵⁴ 「東南亞華僑青年教育及訓練計畫綱要（草案）」、「爭取大量僑生來臺升學計畫」、「籌設容納僑生之國立大學計畫草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鄭彥棻致葉公超函」（1953年12月14日）、「加強海外工作方案」（1954年3月），〈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

⁵⁵ 「第一屆立法院第十三會期第二十四次會議速紀錄」（1954年6月15日），《立法院公報》第13會期第10期（臺北，1954），頁49。

⁵⁶ 「加強海外工作方案」（1954年3月）；「招收僑生回國升學計畫（大專部分）」，《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僑委會顧問張彼得在與美國大使館對談時表示，該時鄭彥棻出任僑委會委員長而葉公超被派往華盛頓，係出自雙方對僑務政策的意見分歧，蔣介石政府更重視華僑的效忠。“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Chang,” Aug.25, 1958. 893.43/9-358. in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Part II, 1955–1959, Reel 12. (hereafter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⁵⁷ 范雅梅，〈論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95。

⁵⁸ 「Project Proposal & Approval Summary: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C), Fiscal Year 1958」，〈1958年度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2。



學校一事，由於施鈞德與惠波皆質疑國民黨政府的籌款能力，最後以擴大現有學校規模方向進行；僑生中學、大學先修班待隔年設立，籌設大學一事則暫緩。至於僑委會統籌的海外僑務工作，因美方評估牽涉整體對東南亞外交布局而要求另議。⁵⁹

為確保僑教計畫不出意外，期間美國國務院指示大使藍欽確認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華僑政策方針。藍欽透露，美方認為臺灣當局現下政策「未必皆有增強華僑內向心之效力」，建議國民黨政府將海外行動重心由海外黨員擴展到所有海外華人，並鼓勵華人取得居留地的國籍——便利華僑在當地的發展，進而強化其反共信念。葉公超對此回覆：考量部分華僑以中國人身分為榮，僅指示「暗中默許各地華僑所得當地公民權」，而非較強制性的「明令」手段。⁶⁰兩國對「華人問題」的爭持最終以國民黨政府佔了上風。儘管美國政府清楚體認到「華僑」作為少數族裔在身分與國籍歸屬上的特殊性，且一直有意藉推動華人在當地的國民化，避免僑生來臺升學一事激化東南亞各國對華裔住民的拒斥，或進一步延燒成民族衝突而影響區域穩定。然而，著眼於越南問題愈演愈烈以及日內瓦會議的失利，美方愈發仰賴僑生升學政策與中共競爭海外華人支持，是故最終仍妥協於國民黨政府的華僑政策構想。

由於僑教計畫牽涉金額與單位甚廣，行政院隨後又邀集美國大使館、安全分署高層重複確認執行細節、金流相關問題。會中決議自同年暑假擴大招收海外大學生 1,000 名、中學生 300 名，擴建教育設施的新臺幣 867 萬元由美援共同基金支出，校務維持相關的新臺幣 267 萬 1,800 元經常費則由政府負擔。兩國高層會議基本採納了僑教小組的決議，同意隔年開辦僑生中學與大學先修班，並指示將原編制於華僑大學內的部分系所轉移至現有院校設置，如要求臺大增設商學院或工商管理學系、師院增設僑教師資訓練班等，以供海外華人社群的實務需求。⁶¹為了趕在 9 月開學季前擴充容納 1,300 名僑生，教育部及各院校皆急迫地以最優先件處理，美援會更特別簡化撥款流程，允許逐校分別辦理。⁶²

事實上，安全總署起初並不情願承擔此筆款項，因該署給款大抵須用於「永久性及建築方面之計畫」，且額外支出此筆僑教款項意味著將犧牲其他同等重要的計

⁵⁹ 「行政院簽呈」（1954 年 3 月 5 日），〈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⁶⁰ 「美國藍欽大使請見外交部葉部長談話紀錄」（1954 年 4 月 9 日），〈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

⁶¹ 「行政院秘書處致教育部程部長函」（1954 年 4 月 26 日），〈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⁶² 「為函請轉知各校處理招收僑生用美援計畫手續由」（1954 年 5 月 30 日），美援會致教育部函，〈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畫。更重要的是，教育工作或資訊活動並不在《共同安全法》載明之給付標的之列——維繫臺灣經濟穩定，以及確保軍事防禦能力。⁶³以海外華人為訴求的「僑教計畫」，顯然與目標改善國家體質的傳統「美援」範疇工作頗有落差，主責核撥美援的安全分署的顧慮誠然合理。不過，由於尼克森之言將海外華人教育問題推上了美國東亞冷戰布局焦點，美援會最終仍在 7 月獲許自相對基金項下撥支僑教款項，作擴充臺灣各校教育設備之用。安全分署同時補充，因撥給臺灣相對基金依法不能用於其他國家，建議有關東南亞華僑教育工作經費轉請美新處支出；同時指出，安全分署恐無法支付僑生往來旅費、生活費等雜費款項。⁶⁴

作為「非官方」組織、有著高度靈活性的自由亞協遂成為此案的解套。中央情報局一直對僑教工作抱持高度興趣，局長甚至在 4 月主動致函尼克森報告自由亞協在臺灣的教育計畫——強調該局願提供 15 萬美元，支應臺灣辦事處前一年提出之「為臺大新收 500 名海外學生」計畫；同時聲明，若教育設施所需款項已有單位負責，該會將接手學生旅費及獎學金等生活支出。⁶⁵施鈞德代表隨後於 6 月中向總部提交另份計畫：預計撥付 6,000 美元為已完成半學年課業，但需重新返國更新身分憑證的 65 名東南亞華僑學生提供往返旅費。⁶⁶

考量收付及管理經費需要，隨後在臺灣辦事處主導下，偕同教育部、僑委會、大專院校組織了「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Advisory Committee)，主要由亞洲基金會承擔旅費與生活費補貼、獎助學金等各類津貼所需資金，不足的分額由省教育廳、僑委會等單位補充，美援僑教計畫中後期則有安全分署投入撥款支持。此委員會首要補助對象為美方評估最需密切爭取的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亞、印尼、北婆羅洲與緬甸等九地僑生，至於情況相對較不危急的港澳、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等地僅予以少量補貼。⁶⁷自由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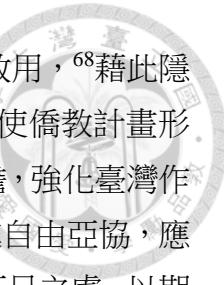
⁶³ 「？致 J. L. Brent 函」(1954 年 4 月 28 日)，〈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僑教工作小組第 12 次會議記錄」(1955 年 6 月 7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⁶⁴ 「J. L. Brent 致 Martin Wong 函」(1954 年 7 月 1 日)，〈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A/0042/7-7/1。

⁶⁵ Letter from Allen W. Dulles to Richard M. Nixon, Apr. 8, 1954. FOIA, DOC_0000481167.

⁶⁶ “TAIWAN: New Program Designations,”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⁶⁷ 由於此筆僑生補貼款項以亞洲基金會為主，黃庭康將其視作「美援」的解釋並不正確。「Project Proposal & Approval Summary: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C), Fiscal Year 1958」，〈1958 年度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2；「5 僑生輔導與獎助」，〈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收入蕭阿勤、汪宏倫編，《族



協總部期待「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發揮類似孟氏教育基金會般的效用，⁶⁸藉此隱蔽自由亞協在僑教中的著力以及與官方機構緊密合作一事——進而使僑教計畫形成看似係由國民黨政府內部自發推動的表象，減輕僑生來臺就學負擔，強化臺灣作為「留學」地點之於僑生的吸引力。推測美國大使館之所以刻意拉進自由亞協，應不啻該會對僑教工作已具初步規劃，更是期許該會補充官方行動的不足之處，以期更有效地拉攏亞洲青年學生。

至於招徠海外華僑學生前來臺灣的工作，主要交由在海外據點眾多的美新處與僑委會負責。美新處當時對海外華人的資訊活動目標是使其「將自由中國視為其精神家園」，一方面形塑國民黨政府的正統性與獲得美國支持等要素，強化僑生來臺意願；另一方面則醜化中共政權及其教育政策，恫嚇僑生恐有去無回。僑委會則編印各類升學資訊指南，配合海外宣傳工作說服更多僑生。⁶⁹另一方面，長期獲得亞洲基金會鉅額資助的香港友聯出版社，這段期間亦在其出版品《中國學生周報》頻繁刊登有關各臺灣大專院校簡介、港澳生來臺求學心得等文章，直白暗示「在這兒〔按：臺灣〕，你可以追求你所渴望獲得的學問，也可以追求到你嚮往的幸福」。⁷⁰該報積極倡導僑生來臺升學一事，推測應為亞洲基金會所授意，要求香港辦事處支援宣傳工作，以透過這份民營刊物的報導、介紹或看似自發性的投書潛移默化地影響華人青年讀者，強化前列官方機構的效果。

在相對基金的挹注與美國機構的配合下，僑教工作至此終可擺脫黃庭康所謂「欲振乏力」的難堪處境。⁷¹事實上，國民黨政府早在 1950 年即注意到大量華僑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一事，數度制訂相應對策。教育部於隔年首次訂定保送辦法，定義僑生為僑居港澳以外地區三年以上之學生，予以僑生、港澳生考試總分加 20 分的優待。⁷²在原居住地方面，則由教育部與僑委會共同督飭正中書局依各國需求，

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頁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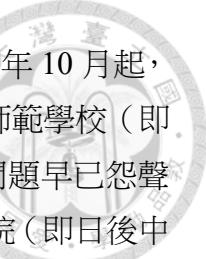
⁶⁸ “Program Allocation Form: Program B,” Jun. 16,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⁶⁹ USIA, “Overseas Chinese: U.S.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Oct. 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32993/ USDD?u=twn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OCB,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 Study," Dec. 16 1954. 「鄭彥棻箋葉公超」(1955 年 6 月 14 日)，〈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外交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5.2/0001。

⁷⁰ 趙承廉，〈臺大同學生活剪影〉，《中國學生周報》第 203 期，1956 年 6 月 8 日，06 版。「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s://hklit.lib.cuhk.edu.hk/browse-index/>，檢索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以下省略連結。

⁷¹ 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頁 96。

⁷² 「中華民國駐河內總領事館代電」(1950 年 12 月 20 日)、「四十年度暑期保送華僑學生升學注意事項」，〈僑生回國升學（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1；〈教部核示僑生定義〉，《公論報》，1952 年 11 月 30 日，03 版。



為當地僑校量身打造各科別教科書供應，並供應所需僑教師資。⁷³1952 年 10 月起，省政府亦為此撥款 30 萬臺幣予各校修築宿舍，並計劃在臺灣大學與師範學校（即日後臺灣師範大學）間建造一座僑生宿舍——此前宿舍嚴重不足的問題早已怨聲載道，例如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僅臨時安置僑生於學校禮堂，省立農學院（即日後中興大學）則是只能供應竹床的舊倉庫。⁷⁴然而，此筆經費要由各校瓜分則略顯拮据，終究只是先前毫無備套措施即倉促開放僑生的亡羊補牢，斬獲亦當有限。

直至美援款項的流入，短缺的僑教經費方才獲得緩解，進而帶動僑生教育的發展與高等教育設施的擴充。國民黨政府隨即於 1954 年 4 月公布「四十三年度暑期保送華僑學生升學專科以上學校注意事項」，進一步調降僑生保送門檻，僑校高中畢業年限由兩年改為三年內，並大幅下修錄取分數。⁷⁵美國大使館注意到，如此導致僑生的錄取率遠高過本地學生：相較僅有約 5% 的臺灣學生能進入大學，港澳生卻能高達 20%，東南亞等地僑生更享有近乎每兩人即錄取一人進臺大的優待。⁷⁶此般優渥條件政策隨即收效，根據教育部提供的入學登記資料顯示，1954 年來臺僑生高達 1,144 人，較前一年的 656 人呈翻倍成長。⁷⁷

這些來臺的新進僑生逾半數進入了臺灣大學就讀。考量到臺大作為臺灣 1950 年代前期唯一一所大學，政府亦將該財政年度 867 萬的僑教經費過半投入該校。⁷⁸

⁷³ 教育部編印，《教育概況（中華民國三十九年至五十年）》（臺北：氏著，1961），頁 153；「第一屆立法院第十三會期第二十四次會議速紀錄」（1954 年 6 月 15 日），《立法院公報》第 13 會期第 10 期，頁 49。

⁷⁴ 「關於僑生宿舍建築費之分配運用令仰遵照」（1952 年 9 月 30 日）、「建築僑生宿舍會議紀錄」（1952 年 10 月 17 日），〈一般經常性案件〉，《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2/002199/51/0003/017；「僑生宿舍會議記錄」（1952 年 9 月 24 日），〈一般經常性案件〉，《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2/002199/51/0003/017；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頁 98–99。

⁷⁵ 「四十學年度暑期保送華僑學生升學注意事項」、「四十三年度暑期保送華僑學生升學專科以上學校注意事項」，〈僑生回國升學（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1。

⁷⁶ Alexander L. Peaslee, "Education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Nov. 6, 1959. 983.43/11-6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部分成績未符標準而被分發到專科學校，或被要求返回華僑中學補習的僑生，又常透過關係請求重分發；政府方面對此亦採「從寬通融處理」。「商討四十九年度海外回國升學有關問題參攷資料（二）」，〈僑生回國升學（五）〉，《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5。

⁷⁷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⁷⁸ 「FY54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ject」，Martin Wong 致 J. E. Auburn 函（1954 年 12 月 15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由於臺大是當時臺灣唯一的「大學」，此亦導致成績較差、最後被分配到省立農院的僑生大為不滿，認為被國民黨政府欺騙而無法真正讀「大學」。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參表 3-3) 同樣著眼於此，自由亞協一度提出在臺大設立學生中心的構想，有意藉強化課後休閒、娛樂設施加強對海外華人的吸引力，並且改善本省籍學生與外省籍學生的關係。該會初步擬定 45,000 美元預算，計畫建造一座能提供適當學習及課外娛樂的設施，附設有禮堂、圖書閱覽室、社團室及飲食區等空間，並計畫由耶穌會傳教士主持。⁷⁹可惜的是，由於所費不貲，此計畫最後告吹，亞洲基金會隨後轉向支持另一項性質相近的「國際學舍」。⁸⁰

表 3-3、1954 財政年度共同基金撥付各校擴充教育設施分配情形

校名	經費數 (10,000NTD)	百分比
臺灣大學	485	55.9
師範學校	104	12.0
省立工院	106.8	12.3
省立農院	18	2.1
建國中學	103	11.9
北一女中	30	3.5
其餘 19 校	20.2	2.3
合計	867	100

來源：「FY54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ject」，Martin Wong 致 J. E. Auburn 函（1954 年 12 月 15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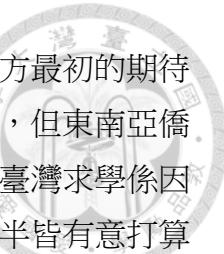
（三）葛萊克報告

僑教計畫開展約莫一週年之際，安全分署與美國新聞處請來葛萊克博士(Hugh C. Gregg, ? - ?)⁸¹進行成效稽核，以此作為來年僑教工作的改進參考。為了更精確地評估每筆款項花費情形，葛萊克針對每一項目作了相當詳實的實地觀察，並在訪談 113 名僑生後，提出了一份厚達 50 頁的報告書（簡稱「葛萊克報告」）。

⁷⁹ “Program Allocation Form: Program B,” Jun. 10,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Student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30,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⁸⁰ 「據國際學舍協會臺北分會誠請在美援相對基金項下撥款補助建築會所一案函請查照惠辦由」，教育部致美援會函（1955 年 5 月 20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⁸¹ Hugh C. Gregg 為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 副校長，於 1955 年初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臺，擔任僑教小組顧問，並獲邀出席第 10 次工作小組會議。國立教育資料館，《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1953 - 1957）》（臺北：氏著，1957），頁 54；「Minutes of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1955 年 2 月 25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葛萊克認為，就最初目的看來，這一年來的成績不盡理想，與美方最初的期待頗有落差。在僑生來源方面，1954 年的海外學生入學率雖增長 75%，但東南亞僑生數進展有限，仍以港澳生佔大宗；在這之中，更有不少人坦承，來臺灣求學係因在香港考不上或讀不起大學。至於職涯規劃方面，師院以外的僑生逾半皆有意打算畢業後續留臺灣，打算返國的僑生中又僅有少數人表現出「為自由中國及人類的自由拼搏」的意圖——與美方預期藉歸國僑生影響當地華人社群意向的構想大相逕庭，而這群留在臺灣的僑生可能又回頭排擠了本地大專畢業生的工作機會。葛萊克相當悲觀地表示：「可以想見，美國花費數十億美元在東南亞打擊共產主義的同時，很可能只是協助培植了一批日後的顛覆運動主導者。到頭來，美國的努力也許僅是協助訓練了一群訓練有素，卻因找不到合適工作、不滿意於現況，而且不快樂的潛在領袖。」⁸²

同時，葛萊克亦抨擊國民黨政府擴大招收僑生的政策過於魯莽，相應教育設施皆未到位，例如有些學校的臨時宿舍「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相較之下，他盛讚規劃有交誼廳與學生餐廳、淋浴間、抽水馬桶的新宿舍，是「臺灣最現代化、最令人滿意的宿舍」，強調其建築品質可媲美歐美宿舍，提供未來一百年的學生使用。在僑生的照料方面，葛萊克則認為當局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不僅缺乏社交與娛樂活動，收容大量僑生的大專院校對『推銷』(selling the idea)一個自由且統一的中國一事亦幾乎未見任何努力。⁸³

為了使僑生返鄉後成為「熱情的校友」，為「自由中國」做出真正的貢獻，葛萊克強調行動的關鍵在於使僑生們感受到休戚與共的「同胞」情懷，進而與臺灣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對此，他提出兩項建議：首先，校方與教職員工應更大程度地參與僑生生活，舉凡在院校間制定「學生服務計畫」(program of student personnel services) 以協助解決他們在臺灣求學期間可能遇到的各方面問題；同時指示各校教師應關懷、輔導離鄉背井的僑生，使其清楚意識到彼此有著共同利益與目標，尤其強調這關乎計畫成敗。再者，他認為僑生們的社交需求亦需獲得更多關注，藉由良好的社交與娛樂活動促成學生間的緊密聯繫，形成一體感，並相互勉勵達成共同

⁸²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此份報告隨後由教育部擇要翻譯往上呈報，參：「僑生教育中美小組顧問葛萊克撰在臺僑生教育報告書」，〈石叟叢書—各方建議(包括報告)(下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08-00019-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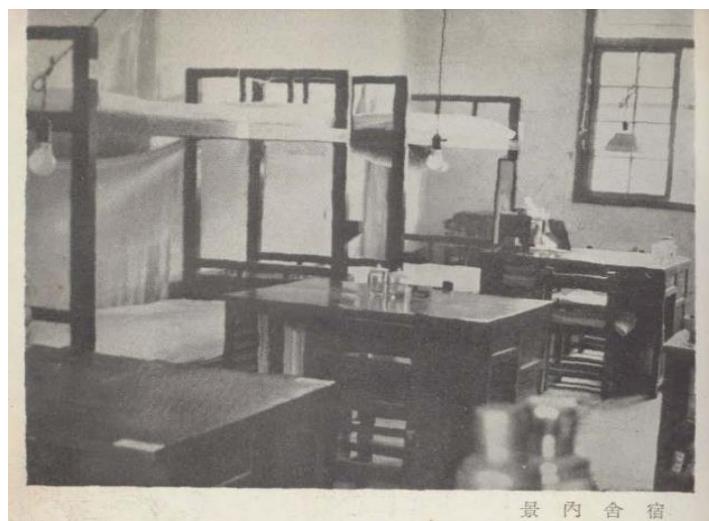
⁸³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目標。⁸⁴其所謂「共同目標」顯然係指待僑生回國後，對當地華人社群的輿論形塑工作，以此強化東南亞的反共／非共傾向。

之所以僑教工作一年下來仍成效不彰，葛萊克認為得歸咎於主事者對參與機構與執行院校的指導、協調不足；並指兩國高層的僑教會商應續辦，僑教小組應更頻繁召開會議以監督計畫執行細節。他語帶保留地總結：「直到此計畫成為某些有力組織或單位的『主要工作』，否則我們不應期待能有太好的結果。」⁸⁵

圖 3-1、僑教撥款下之臺大新建宿舍內部陳設



第一期撥款落成的除僑生宿舍外，還有餐廳、漁業生物館、商學系圖書館及教室若干。藍欽大使盛讚：美國政府「此種援助具有偉大崇高的意義」。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印行，《四十五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氏著，1956），頁 73；〈台大僑生宿舍餐廳 昨行落成禮〉，《中央日報》，1955 年 2 月 16 日，04 版。

美方對葛萊克報告的各項評估很是滿意，遂將其中多項建議運用到僑教工作之中。例如安全分署教育部門主管白朗隨即致函教育部長張其昀，要求改善葛萊克提出的三項建議：興建更多學生宿舍，提供華僑學生足夠的社交、娛樂資源與圖書館設施，並且滿足大專院校與海外華校的教科書、參考書等需求。⁸⁶除了第一點由安全分署與美援會著手改善之外，後兩項的工作則主要交付亞洲基金會協同僑委會等部門處理。

⁸⁴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⁸⁵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⁸⁶ 「H. Emmett Brown 致張其昀函」(1955 年 3 月 28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首先，除了教育部門聯繫各校設置相應輔導組織之外，社交、娛樂活動的補充主要實踐在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原址位於今大安森林公園一帶）。由於前述臺大活動中心計畫的未竟，亞洲基金會將心力轉移到了國際學舍的籌備上，承擔相當程度的建築基金及常駐活動督導的人事費用；隨後在臺北市政府提供土地、相對基金與洛克斐勒基金會等單位支出學舍剩餘所需建築款項後，國際學舍正式於 1957 年落成。有關單位預期藉此提供僑生課餘時間的去所，辦理各類康樂活動，加強僑生與本地學生的來往，強化對臺灣的向心力，同時避免產生孤立感。⁸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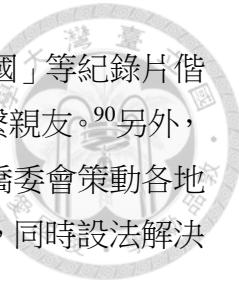
其次，亞洲基金會透過「亞洲學生贈書計畫」(Books for Asian Students Program) 大量贈送大專院校圖書館與各系所需參考書，提供安全分署的專業技術性圖書、美新處的美國文學書籍以外的一般性讀物，以及百科、人文或社科類等出版品，以此補充臺灣貧乏的研究資源，作為僑生與本地學生的娛樂及進修所需資源。⁸⁸同時，購贈港、臺非共華文出版品以供海外華校所需，並且與柬埔寨、泰國、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或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合作編印所需教材，更資助教育專家至當地輔導華僑教育。⁸⁹藉由提供非共出版品的方式，使僑生在求學的不同階段皆能沉浸在大量的非共資訊之中，以此確保華人青年與臺灣學生的資訊來源；在協助培養當地領袖的同時，亦形塑其人格養成。

至於增收港澳以外地區之僑生一事，僑委會委員長鄭彥棻解釋該會正密切關注，已派員分赴西貢、曼谷、新加坡與菲律賓統籌當地僑務工作。該會除積極透過《僑生回國升學之路》、《僑生回國升學須知》、《僑生回國升學問答》等數類小冊子，

⁸⁷ “Payment of Youth and Related Activities: Students,”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僑教工作小組第 13 次會議記錄」(1955 年 6 月 24 日)、「據國際學舍協會臺北分會誠請在美援相對基金項下撥款補助建築會所一案函請查照惠半由」(1955 年 5 月 20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⁸⁸ “Used Book Program, Taiwan,” letter from Robert B. Sheeks to William Schultz, Sept. 26,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Books for Asian Students, Local Program,”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亞洲基金會贈書範圍主要除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地區性的縣市公共圖書館亦在名單之列，規模相當龐大。例如，臺灣大學一校光是在 1961 年 9 月至 1962 年 8 月的一年時間，業已收到共計 1,130 冊贈書，可想見整體贈書規模頗為可觀。「為亞洲協會中華民國分會贈送貴校書籍請查照惠復由」(1962 年 4 月 18 日)，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檔號：0051/2500100/001/0008/045。

⁸⁹ “Comments on Taiwan Quarterly Report,” letter from L. Z. Yuan to Mr. Stewart and Mr. James,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The Ques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alaysia.” letter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laysia Lindley S. Sloan to Director of SEA Division, Mar. 27, 1969.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07；〈宗教部聘專家 輔導華僑教育〉，《聯合報》，1959 年 8 月 7 日，03 版。根據一份亞洲基金會於 1957 年對菲律賓華僑學校的贈書清單指出，該年度共捐贈 149 冊英文書、566 冊中文書。其中，購贈圖書大多出自該會合作過的香港的亞洲社、自由社、友聯出版社及臺灣的自由中國社等出版社；中文贈書中近九成中文書來自香港，而友聯又占近三成。「經菲大使館代電復關於亞洲基金會贈菲僑校事」(1957 年 10 月 19 日)，〈僑教活動、報告〉，《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6/002110/51/0001/013。



搭配廣播、雜誌等媒介加強對東南亞學生的宣傳，製播「僑生在祖國」等紀錄片偕同僑生活動照片分寄各地展覽、放映，並要求二千餘名僑生寫信聯繫親友。⁹⁰另外，外交部亦為此制定「海外各地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工作綱要」，協助僑委會策動各地海外黨部及僑團、僑校、僑報等組織與有力人士共同鼓吹回臺升學，同時設法解決僑生出國讀書之不便。⁹¹

為改善招生情形，安全分署亦曾派遣顧問赴東南亞作實地考察僑生情形，並數度與美新處共同在僑教小組會議中提議將港澳僑生排除於補助地區之列，以此招收更多東南亞僑生。不過，亞洲基金會對此事則表示反對，強調僑生工作應極力網羅有能力與潛力貢獻於冷戰目標的華人學生，而不該純然基於權宜之計的政治盤算。此案最終因國民黨官員的強烈反彈而作罷。⁹²

東南亞僑生來臺人數之所以相對遲滯，除了中共的銀彈攻勢與僑委會的宣傳不力等因素之外，華人家長們的考量亦常為國內外情勢左右。首先，東南亞各國普遍對華人學生前往「自由中國」抱持疑慮，例如前印尼僑選立委羅世宗回憶，若在印尼公開表明要來臺灣讀書恐回不了家，因此入學測驗常得私底下偷偷摸摸進行。⁹³其次，大多未曾履及臺灣的「華僑」亦對這座陌生的北方島嶼流露憂懼，尤其是岌岌可危的臺海局勢——在僑委會副委員長李樸生 1955 年於曼谷華僑教育座談會的發言可見一斑：

希望諸位轉勸僑生家長勿貪共匪之便宜。其次，臺灣學校疏散，此係另覓安全地點設校……決不致因軍事行動發生危險；臺灣鄉村與城市無殊，亦具水電設備等項，生活十分便利。此點亦請轉勸僑生家長勿加顧慮。⁹⁴

⁹⁰ 「僑教工作小組第 12 次會議記錄」(1955 年 6 月 7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海外出版社，《僑務一年》(臺北：海外出版社，1957)，頁 68–69。

⁹¹ 「為關於鼓勵海外僑生回國升學事電希遵辦具」，外交部代電駐外使館(1955 年 5 月 20 日)，〈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外交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5.2/0001。

⁹²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臺北：氏著，1959)，頁 57；「Minutes of the 62nd meeting of the Sino-American Working Committee」(1961 年 6 月 27 日)，〈僑校僑民報告表〉，《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50/002105/51/0008/005；James L. Stewart,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Rowe,” Sept. 19,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⁹³ 徐榮崇訪問，〈羅世宗〉(2013 年 10 月 17 日)，收錄徐榮崇、湯熙勇等人主持，《102 年僑務口述歷史專案報告》，2013，頁 399–400。

⁹⁴ 「華僑教育座談會紀錄」(1955 年 5 月 31 日)，〈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外交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5.2/0001。



由於葛萊克報告並未對這一年來的僑教成績給予太高評價，美國大使藍欽為使僑教工作更有校地裨益於美國的東亞冷戰布局，遂採納葛萊克的提醒，於 1955 年初特別暗示副總統陳誠美方對重起兩國僑教高層會談的期待：強調有必要定期集會討論、決議僑教工作細節，並敦促國民黨政府更嚴謹地研議並推動僑教工作。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的第三次雙邊會商隨後於 5 月 24 日舉行，藍欽在會中直指行動關鍵需使僑生在臺灣求學期間「感覺愉快」，並產生歸屬感；有關部門亦對此表達共識，稱已著手組織校外輔導工作作為照應。自此，行政院與美國大使館的高層會議方確立為常態性舉行，而非既往國民黨政府構想以其為核心的鬆散組織型態。⁹⁵此前常為不定期會議的僑教小組，隨之亦轉為每三週一次例會的密切運作模式。⁹⁶

這也意味著，國立教育資料館在出版品刻意標明，並為多數僑教研究者逕自徵引的僑教計畫最高指導單位「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實應屬事後溢美之詞。⁹⁷在僑教相關的政府檔案中，僅偶能在美方資料中見到「Sino-American Committee for Asia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註記，中文對應資料則全無，如政府檔案將 1954 年的兩國高層會議記為「東南亞華僑問題座談會」，往來公函則為「邀集中美雙方高級人員會商」等語。⁹⁸形成此一落差主因，推測應為兩國對於美國在僑教工作中的著墨程度各有考量。縱然美方認為僑教是兩國間共同目標，藉由合作開展對東南亞各國的人心之爭；不過國民黨政府卻僅視之為廣大美援贈款下的一環。國民黨政府雖不避諱美援對僑教的挹注，但對外多半僅承認美國作為一善心的贈款人——例如 1956 年 6 月刻意安排安全分署署長將八百多萬美援支票親交教育部長張其昀簽收的宣示性儀式，張其昀將此支票視為「自由的象徵」，表示美方的協助終能使華僑學生「接受自由教育」。⁹⁹雙方在僑教政策上的合謀研商，最終成了國民黨政府對

⁹⁵ 「行政院簽呈」(1955 年 4 月 29 日)、「行政院簽呈」(1955 年 5 月 22 日)、「譯抄中美討論華僑教育小組會議議程擬案」，〈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關於東南亞華僑教育小組會談藍欽大使所提供之議程草案參考資料」，〈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

⁹⁶ 「僑教工作小組第 12 次會議記錄」(1955 年 6 月 7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⁹⁷ 原文記為：「旋於四十三年初成立中美華僑教育委員會，從事制定教育援助方案之基本政策。中國政府行政院院長為該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成立次年經常召開會議，但稍後逐漸將僑教問題移交由中美小組委員會負責。」根據本文考證，顯然與實情頗有落差。國立教育資料館，《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 (1953 - 1957)》，頁 53。

⁹⁸ 「東南亞華僑問題座談會出席人員名單」(未標日期)，〈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⁹⁹ 〈美助我發展僑教 昨舉行贈款式〉，《中央日報》，1955 年 6 月 15 日，01 版。



外的成績單，而美國的角色則被掩蓋在國民黨政府的「自由中國」敘事及其對僑務、內政的苦心孤詣，以及美國強烈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大力宣揚之下。

國民黨政府雖在對外宣傳上刻意渲染自身功績，在檯面下仍不忘尋求美國的反共合作，於 1956 年中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兩份備忘錄：「備忘錄 A」建議美國共同安全法案的援助計畫攜手國民黨的區域經濟計畫，遏止中共在亞洲的經濟滲透；「備忘錄 B」則敦促美國強化與國民黨政府對東南亞華人的反共宣傳。美方很快應允這兩份提案，並動員國務院、美新處、國際合作總署等有關部門擴大海外華人工作。其中，國務院特別將亞洲基金會在內的「美國私人機構」與教會機構納入其整體亞洲布局，期待這些非官方組織發展並改良東南亞各國的非共教科書、教學設備、圖書館及教師等，興建各式提供娛樂、資訊及文化服務的青年中心，以促成華人學生與當地青年的聯繫，同時培訓海外華人的新聞、廣播人才與公民社團等。¹⁰⁰

在這樣的背景下，相對基金自 1955 年以來進一步擴大對僑教的支應，不再僅限於原先對既有院校教育設施與硬體設備的擴充：舉凡華校教師來臺受訓旅費、僑委會《僑生週刊》與各校僑生刊物或論文獎助、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之生活補助金，¹⁰¹乃至 1950 年代末期補助救國團舉辦的學生營隊活動、新生訓練等課外康樂活動與輔導工作層面，同時亦支應大專教科用書編纂、世界名著譯述所需費用。¹⁰²美援補助項目的擴大與差異，亦大抵符合教育部制訂的僑教「五年計畫」發展脈絡。張其昀指出，教育部規劃的僑教工作每年皆有工作重心的轉移，從最初的建築公事到隔年的圖書設備與教科書之編譯，1956 年起著重僑生輔導與課外活動，1957 年則進入畢業僑生聯繫與隨後的南洋研究工作。¹⁰³

¹⁰⁰ 為加爭取海外華人，美國建議國民黨政府的東南亞華人工作可朝四個方向強化行動：出口消費商品、擴大電影產業規模、派遣親善使團、籌辦體育競賽等。Depart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an Instrument of U.S. Policy,” Jul.13, 1956.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332334/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Depart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U.S. Policy,” Sept. 6, 1956. USDDO,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05672/USDD?u=%20t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不過目前尚未在國民黨政府檔案中找到相對應的計畫。

¹⁰¹ 「僑教工作小組第 12 次會議記錄」(1955 年 6 月 7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Project 66-228(C)」(1955 年 9 月 5 日)、「僑務委員會便箋」(1955 年 11 月 22 日)，〈經費補助〉，《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4/002107/52/0001。

¹⁰² 「美援補助教育輔導課程活動計畫實施情形簡報表（二）」(1960 年 7 月 27 日)，〈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9/005002/51/0001；「為本部僑教計畫項下譯印大學用書經費一案檢附譯述費總表壹件函請督照由」(1962 年 8 月 14 日)，〈1958 年度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2。

¹⁰³ 張其昀，〈最近四年之華僑教育－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六日在僑生課外活動研討會講〉，收錄《張



(四) 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

僑教計畫啟動以來展現的巨大潛力，各方人士皆對此寄予厚望。亞洲基金會臺灣代表施豁德即是其中之一，甚至為此打消關閉自由亞協臺灣辦公室的念頭，轉而向總部直陳：「此一行動將取得大成功，並為反共工作做出真切貢獻。」¹⁰⁴

1954年9月，普遍認為親國民黨且是「蔣介石頭號粉絲」的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1905–1985，任期：1954年9月–1956年6月），¹⁰⁵接替施豁德出任臺灣代表。饒大衛履任後隨即加入僑教小組、延續該會對東南亞華人的工作目標，他與前任代表同樣高度重視僑教發展。饒氏評估，由於當時臺灣未成年人口高達總數40%，且教育問題嚴重，遂將該會活動高度集中青年相關領域，而僑生工作即為其中一環。青年相關領域又分為學生計畫(Student Program)與教育者計畫(Educator Program)兩項，前者主要提供僑教相關補助項目，後者則聚焦英語教育、體育教育及圖書館發展等工作(參表 3–5)。據其統計，該會在 1954 年財政年度提供達 506 名學生部分或全部生活補貼，其中除匯兌限制而出現困難的東南亞僑生，尚有不少北越等地難民學生。饒大衛強調，少了亞洲基金會的適時援助，很多學生根本沒機會來臺灣求學。¹⁰⁶會長卜蘭姆隨後亦盛讚：「海外華人學生旅費及生活費補助，是本會最好的計畫之一。」¹⁰⁷

其昀先生文集》第十八冊（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國文化大學，1988），頁 9731 – 9732。

¹⁰⁴ “Plans and Program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Apr. 5,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⁵ 饒大衛 (David N. Rowe)，出生於中國南京，父母皆為衛理會傳教士。饒氏有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戰時在重慶擔任美國大使特別顧問、戰略情報局研究分析處特別助理。戰後返美擔任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並於 1954 年出任亞洲基金會臺灣代表，兼任臺大政治系教職，以全英文教授國際關係課程。鑑於其任內對於臺灣教育的努力，且對「中美文教合作事業」頗有貢獻，獲頒中華民國景星勳章。1956 年卸任後返回耶魯大學任教，期間多次訪問臺灣，在臺大、中研院、政大等單位短期任教、研究。“David Nelson Row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kt3p3034kd/entire_text/, accessed Apr. 13, 2023. 〈自由亞洲委會駐臺代表饒大維夫婦今晨來華〉，《中央日報》，1954 年 9 月 3 日，01 版；〈我政府以景星勳章一座 昨贈予饒大維博士〉，《中央日報》，1956 年 8 月 1 日，04 版；「David N. Rowe 致錢思亮函」(1968 年 3 月 14 日)，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檔號：0057/2601300/001/0006/003；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台北：天下文化，2005)，頁 36。有關饒氏與臺灣當局的互動經過，可參：賴韋廷，〈中華民國對外文化冷戰：以外交部對美宣傳為中心，1949 – 198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3），頁 72 – 85。至於饒大衛親國民黨立場，不少外交官皆曾論及，參：Charles Stuart Kennedy, “Interview with Albert L. Seligmann,” Jan. 27, 2000,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adst.org/OH%20TOCs/Seligmann-Albert-L.pdf>, accessed Sep. 23, 2023. Charles Stuart Kennedy, “Interview with Charles T. Cross,” Nov. 19, 1997,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adst.org/OH%20TOCs/Cross,%20Charles%20T.toc.pdf>, accessed Sep. 23, 2023.

¹⁰⁶ “The Asia Foundation Plan for Taiwan,” July 25,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¹⁰⁷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David Rowe, Apr. 25, 1955.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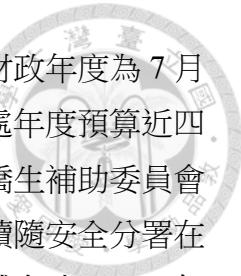
表 3-4、亞洲基金會 1955 年財政年度計畫預算



項目		金額 (USD)
學生		
1. 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旅費）		20,000
2. 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生活費）		30,000
3. 國際學舍主管活動費		8,500
4.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與東吳大學法學院		3,800
5. Chin Chung-wen		800
小計		63,100
教育者		
1. 東海大學、師範學院與淡江英語專科學校		22,500
2. 臺灣大學		7,000
小計		29,500
公民與社區服務團體		
1. 亞洲法律：教育及發展		10,000
小計		10,000
文化團體		
1. 文學翻譯計畫		1,000
2. Communist Infiltr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1,000
小計		2,000
3. 中央研究院		12,000
作家、出版商與發行商		
1. 《自由中國》		6,000
2. 英語報紙流通		2,900
3. 《大陸雜誌》與《世界新聞》		4,000
小計		12,900
廣播		
1. 美軍電臺		500
小計		500
計畫 發展	1. PD-2 General	5,000
	2. Unassigned	27,000
	小計	
合計		150,000

來源：“TAIWAN Program Budget Fiscal Year 1955 – 1956,”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有關僑教工作款項。



從上表 3-4 可見，該會於 1955 年中提出的財政預算中（該會財政年度為 7 月至隔年 6 月），有關僑生的費用規劃高達 58,500 美元，佔臺灣辦事處年度預算近四成。其中對於僑生旅費、生活費與醫藥費的審核、撥付，交由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統籌。亞洲基金會自 1955 年起每年撥款五萬美元予該委員會，後續隨安全分署在 1955 年與 56 年間先後開始撥款支持僑生旅費、生活費，而逐漸縮減資助。1955 年至 1965 年間，亞洲基金會對僑教補助總額計達 344,400 美元。根據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的統計，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截至 1957 年業已提供關鍵地區 $3/4$ 的大學生、 $4/5$ 的高中生旅費， $3/4$ 重點地區僑生生活費。¹⁰⁸如前所述，由於亞洲基金會構想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發揮如孟氏教育基金會的「隱形大學」作用，該會的僑教工作亦有意隱身於「美援」的大框架下暗中協助運作，此筆僑生補助款在政府出版品中多半被記為僑委會獎助金，留臺僑生亦多將其領到的獎助視為僑委會的善意。¹⁰⁹

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給予的學雜費補助、抵免的誘因，一定程度抵銷了中共釋出的優渥待遇。臺灣當局對於僑生經濟的奧援與成績優待，成為不少有志於升學的僑生來臺的動力——許多留臺僑生選擇來臺的理由，即是因為在學校接收到僑委會散發的獎助宣傳與招生資訊。¹¹⁰據 1957 年留學臺大的新加坡僑生李成忠回憶，當時國民黨在新加坡的僑生宣傳主要利用親國民黨的書報社與僑領，觸及成效有限，而當時會選擇來臺的僑生大抵可分為親國民黨、中立份子，以及思想雖左傾但聽從家長吩咐等三類，其中又以第一類最多。¹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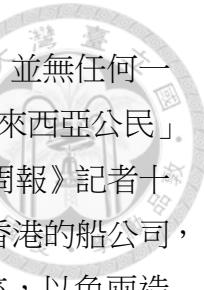
換言之，合理推斷應有為數不小的僑生之所以決心來臺深造，純然出自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中華文化的嚮往。這樣的看法流露在不少僑生的回憶之中——如有留臺港生曾投書《自由中國》，強調同樣來臺求學的香港友人多半係因父母曾在政

¹⁰⁸ 關鍵地區即為前述美國評估最需密切爭取的柬埔寨、寮國、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亞、印尼、北婆羅洲與緬甸等地區。“Payment of Youth and Related Activities: Students,”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Projection of 1964/65 Program Budget as of Feb. 28, 1965.”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178；「Project Proposal & Approval Summary: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C), Fiscal Year 1958」，〈1958 年度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2。

¹⁰⁹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臺北：海外出版社，1955），頁 68–69；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1985）》（八打靈再也，雪蘭莪：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20），頁 51。

¹¹⁰ 相關口述回憶可參：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1985）》，頁 15、37、51、66、71、76。

¹¹¹ 鐘逸明，“Interview With Lee Sing Tiong (李成忠),” Jun. 22 & 29, 202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ld War: On-the-ground Experiences In Asia, <https://rcw-asia.com/browsearchives/interview-with-lee-sing-tiong>, accessed Jan. 5, 2024.



府內工作或對國民黨抱有好感，否則就是商人、地主、資產家的子女，並無任何人是被政府宣傳說服。¹¹²有人更回憶道，不少僑生對於有些自認為「馬來西亞公民」而拒絕接受軍訓的僑生深感不滿，甚至為此大打出手。¹¹³《中國學生周報》記者十分鮮明地捕捉到了國、共意識型態在僑生身上的深根與對壘。暫泊於香港的船公司，當時必須特別將前往臺灣與中國的兩艘載滿印尼僑生的船隻隔絕開來，以免兩造出現爭端。¹¹⁴

在「美援」的挹注下，保送及考取來臺灣的僑生人數與日俱增，及獲得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濟助的學生數屢創新高。(參表 3-5)

表 3-5、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每年濟助僑生人數（1954 – 1958）

學年度	旅費	助學金	醫藥費
1954	348	613	49
1955	143	1,042	104
1956	596	2,162	212
1957	1,260	2,906	590
1958	1,727	4,109	446
合計	4,110	10,832	1,401

來源：「僑生回國升學概述」（1959 年 10 月 21 日），〈國內外僑教與僑生〉，《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50209-0078。

由於美援撥款的數額取決於各校收取的僑生人數，各院校遂愈發積極地招收僑生，校內教育設施亦因美援款項而獲擴充。這筆款項，成為臺灣中等、高等教育在戰後迅速重建與發展的重要支持。為了更有效地爭取並運用美援與清華基金，一度有立委建議政府將省立學院悉數改為國立；對此，教育部僅回覆需待行政院會議研商。至於隨即在 1954 年首先在臺復校政治大學的原因，教育部則回覆係因考量

¹¹² 蕭展，〈一個僑生的意見〉，《自由中國》第 18 卷 7 期（1958，臺北），頁 31。

¹¹³ 鐘逸明，“Interview With Francis Cham (湛承憲)，” Jul. 14 & 30, 202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ld War: On-the-ground Experiences In Asia, <https://rcw-asia.com/browsearchives/archives/interview-with-francis-cham>, accessed Jan. 5, 2024. 於 1964 年抵臺的馬來西亞僑生李振光回憶，他擔任大馬留臺同學會總幹事期間曾帶領同學向僑委會抗議僑生受軍訓一事，他強調「我們是馬來西亞的公民，更是花錢來深造的大學生，不應接受軍訓。」此說間接證實湛承憲所描繪的認同衝突。不過，亦有馬來西亞僑生認為，之所以會遭印尼或越南同學找麻煩，是因為大馬僑生經濟較為充裕。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 – 1985）》，頁 71 – 72；賴玉嬌整理，〈我們在成功的路上見面－訪周哲水〉，《大馬青年創刊號》（1983，台北），頁 25。

¹¹⁴ 周建，〈在短短四個小時內——登「芝利華」輪訪問過港赴台的印尼同學〉，《中國學生周報》114 期，1954 年 9 月 24 日，01 版。



到今後「國家需要政治事務人才」，方決議逐年恢復。¹¹⁵由於政大決定第一波設立的是公民教育、行政、國際關係與新聞等四研究所，而非更有利於獲取美援款項的大學部科系，推測其背後考量應實然並非為爭取美援。

政府為避免各院校因僑生程度問題拒收，隨後特別以僑生人數作為補助單位，促使各校收容。誠如黃庭康十分敏銳地指出，鉅額美援利益促使各校競相招收僑生。例如臺大該年即妥協收取了逾半新進僑生，與美援僑教展開前每年僅接收總僑生人數的一至三成形成高度落差。隨著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等新興院校先後復校、升格，並加入競爭僑教援款之列，衝擊臺大可能獲得的美援補助數額，亦迫使臺大從而釋出更多僑生名額。¹¹⁶然而，常為論者徵引，時任教育部次長高信憶及每名僑生補助一萬元新臺幣之說，其實過於概略。事實上，補助金額依年度別、學院別多有增減，如 1957 年文、法、商及教育學院補助每名僑生 16,000 元，理、農學院補助 19,000 元，工、醫學院則達每名 21,000 元。¹¹⁷

由於東南亞僑生享有較港澳學生更為優待的條件與較低的門檻，其來臺人數成長迅速，自 1956 年起超過港澳僑生數，影響大專學生組成結構甚鉅。中研院院士李王癸先生回憶，他在 1955 年進入師大英語系時，同屆僑生人數已超出本地學生數約 10 人。¹¹⁸作家陳若曦同樣憶及，她在 1957 年進入臺大外文系第一天，最感衝擊之事便是同屆逾半同學為僑生，且對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即能進入臺大一事感到「五味雜陳」。¹¹⁹教育部注意到了此一現象，並且憂心於當學年度臺大新舊僑生數破人數三分之一，恐使臺大以教育國內學生導向的目標出現改變，隨即於同年底的僑教工作小組中提出討論。¹²⁰事實上，招收僑生恐間接排擠本地學生之大專院校升學名額一事，此前已數度引發關切，如立委劉明朝早在 1954 年即就此事質詢。政府則回應僑生名額係另外增加，並強調高教所需費用皆由美方提供。¹²¹

¹¹⁵ 「第一屆立法院第十三會期第二十三次會議速紀錄」(1954 年 6 月 8 日)，《立法院公報》第 13 會期第 10 期(臺北，1954)，頁 31–32；「第一屆立法院第十四會期第四次會議速紀錄」(1954 年 9 月 24 日)、「第一屆立法院第十四會期第五次會議速紀錄」(1954 年 10 月 1 日)，《立法院公報》第 14 會期第 3 期(臺北，1954)，頁 106–107、138。

¹¹⁶ 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頁 105–108。

¹¹⁷ 高信，《中華民國之華僑與僑務》(臺北：正中書局，1989)，頁 66；「第一屆立法院二十會期第二次會議速紀錄」(1957 年 9 月 20 日)，《立法院公報》第 20 會期第 1 期(臺北，1957)，頁 35–36。

¹¹⁸ 李王癸，〈八十自述（上）〉，《傳記文學》第 109 卷第 4 期(2016，臺北)，頁 32。

¹¹⁹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臺北：九歌，2008)，頁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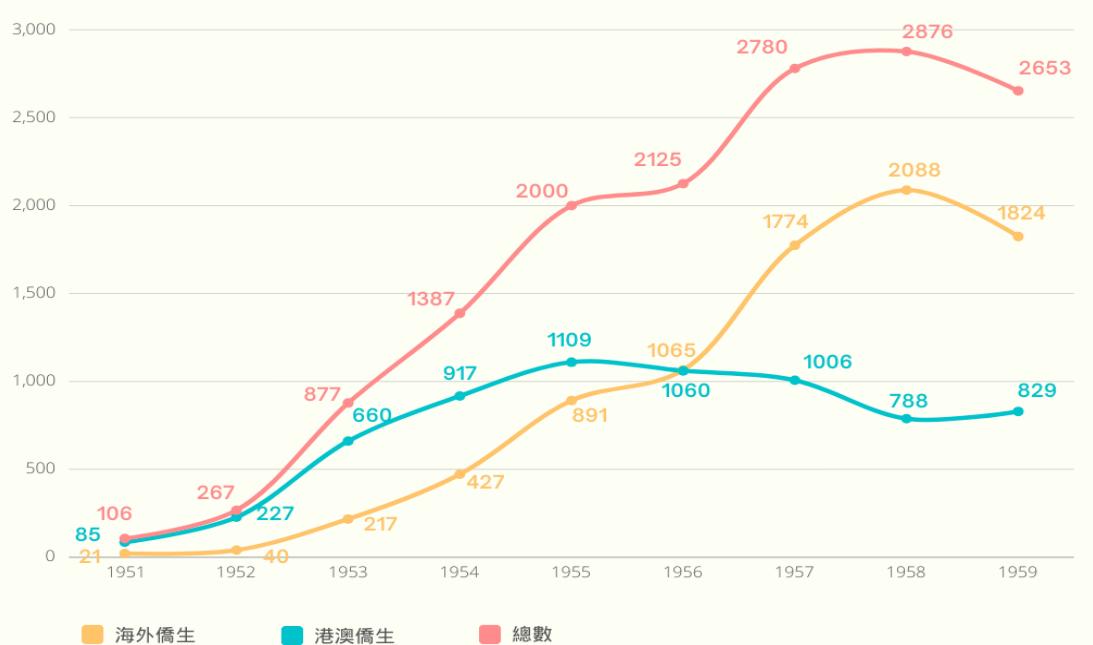
¹²⁰ 「僑教工作小組第 47 次會議記錄」(1957 年 11 月 14 日)，〈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7/005002/51/0001。

¹²¹ 「第一屆立法院第十四會期第五次會議速紀錄」(1954 年 10 月 1 日)，《立法院公報》第 14 會期第 3 期(臺北，1954)，頁 142。



儘管國民黨政府不願對僑生名額一事做出任何調整，來臺僑生人數仍在 1957 年來到巔峰後隨即於隔年驟降，推測係因金門、馬祖引發的臺海危機之影響。圖 3-2 雖呈現錄取人數達 2,876 人，但該年度實際報到數僅 1,621 人，較前一年少了千餘人。¹²²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亞洲基金會三方也約莫在這段時間，開始重新評估並調整僑生工作方針，以及整體東南亞華僑政策。

圖 3-2、來臺僑生錄取人數一覽（1951 -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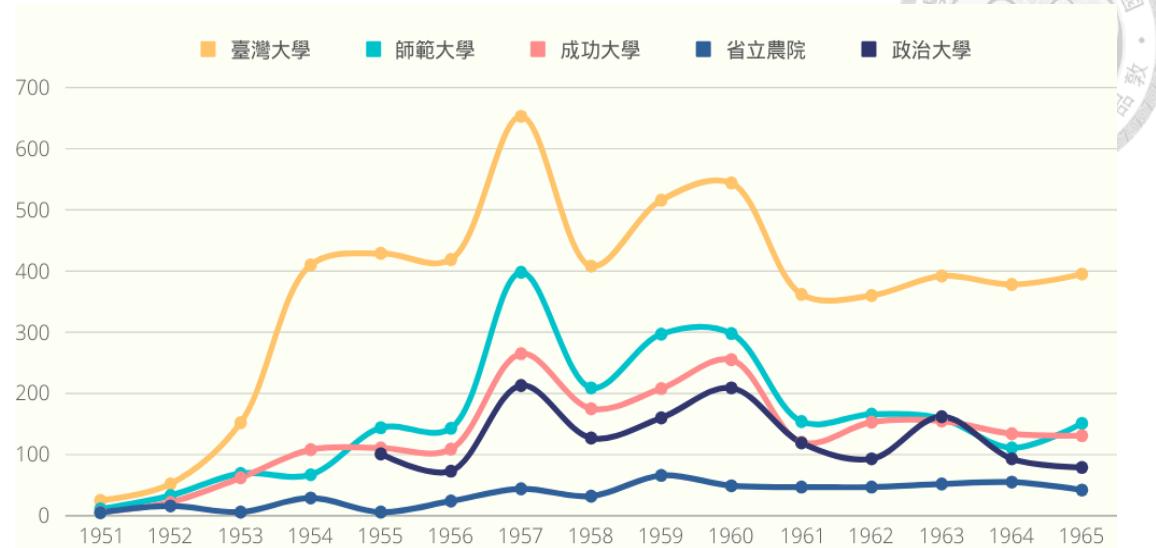
須注意的是，本表為已錄取人數，與實際報到數略有落差，平均報到率約為總數七至八成。來

源：「僑生回國升學概述」（1959 年 10 月 21 日）。

¹²²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氏著，1966），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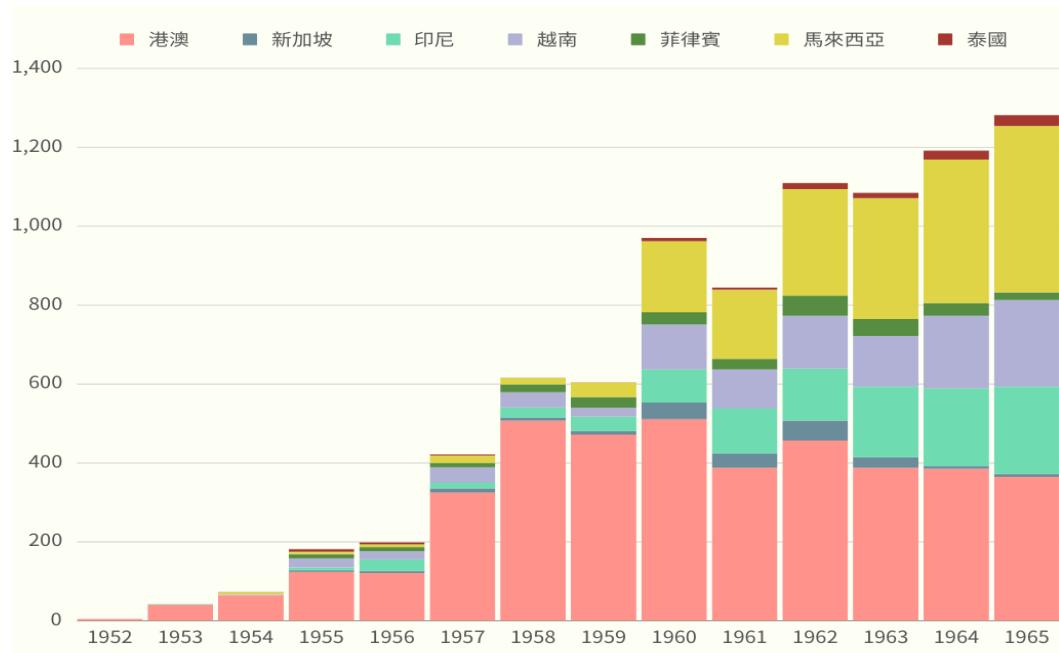


圖 3-3、美援期間各校招收僑生人數（1951 – 1965）



不同部門的統計常因依循標的、計算方式不同而有落差；國合會主要利用僑委會資料，是故本圖與利用教育部表 3-2 之數值稍有出入。儘管僑教顧問葛萊克與美國大使館咸認僑委會的資料出自宣傳動機而有誇大之嫌，惟因該會資料較通用且完整，暫且在此沿用。來源：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氏著，1966），頁 6。

圖 3-4、來臺僑生主要來源分布（1952 – 1962）



來源：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頁 9。



第三節 在「國民」與「歸僑」之間的海外華人學生

冷戰期間，美國除需密切防範亞洲新興國家走向共產之途，尚須巧妙且謹慎地維繫與亞洲國家間的關係，以免產生干預內政與帝國主義嫌疑。這亦導致處理散居各國、作為當地少數族裔的「海外華人」愈發棘手——作為東南亞各國戰後國家建構與整合問題中的關鍵民族因素，美國必須更謹慎地避免其反共努力延燒成當地民族衝突。美國雖看似自 1954 年起大力支援臺灣「僑教」工作，且對其愈發上軌道頗感滿意，事實上美方當時亦同步構思其他教育方案的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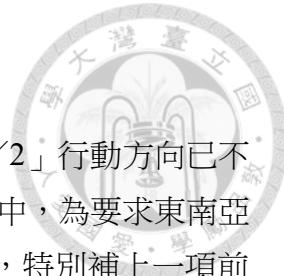
1954 年 5 月，「南洋大學事件」爆發以來，¹²³美國開始反省其東亞教育政策，猶豫於是否擴大對亞洲教育設施的投入，並思考臺灣僑教方案的替代性選擇。由於臺灣隨時有因中共而陷入緊急狀態的風險，且東南亞僑生來臺常因政治因素而成問題，美國政府評估有必要盡速提供更多教育設施給亞洲學生及海外華人，以抵禦共產意識形態的威脅。有關單位提出數項選擇，舉凡在菲律賓或泰國建立給亞洲人的大學，期間一併規劃華人學生的教育設施；抑或將亞洲的一或多所學院擴建成大學，促進區域性文化交流；又或者在臺灣專為海外華人設立一所「福爾摩沙大學」(Formosan University) 等。不過各方意見分歧，最終仍暫且以擴充臺灣高等教育設施的方向繼續進行。¹²⁴

1950 年代後期，隨著印尼、南越、菲律賓等國家華僑政策的緊縮、同化主義政策的推行，以及對於國民黨政府僑務工作的愈發排斥——南越總統吳廷琰 (1901 – 1963) 更直言，國民黨政府過度解讀臺灣當局對於海外華人的影響力：「如果西貢的華人反共或非共，那是因為華人遵守越南政府的政策，而非臺北所做的任何努力。」¹²⁵隨著 1955 年萬隆會議的召開、1956 年馬來西亞的獨立，終於使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政策與華人教育布局展開全盤重估。

¹²³ 「南洋大學事件」亦稱「林語堂事件」。南洋大學作為東南亞第一間華人大學，原屬意邀請在華人世界頗有名望的林語堂出任首任校長，但該校董事會隨後因校務運作與林氏產生嫌隙，林語堂一度指控該校遭中共滲入。此言一出，華人世界譁然，亦引來美國政府高度關注。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1947 – 1989）》，頁 211 – 212；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 – 196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頁 85 – 94。

¹²⁴ OCB,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an Asian University,” Aug. 18, 1955.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5240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1947 – 1989）》，頁 213 – 215。

¹²⁵ “Chinese Minority Problem,”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lair House, May 9, 1957. FRUS, 1955–1957, Vol. 1, pp.803–806. 「印尼地區僑生保送來臺升學有關問題會議紀錄」（1959 年 4 月 7 日），〈僑生回國升學（五）〉，《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5。



(一) NSC 5503 後的僑教工作轉折

隨著亞洲情勢的轉變，艾森豪政府過去依循的「NSC 146／2」行動方向已不敷當前外交所需。美國政府隨即於 1955 年的「NSC 5503」文件中，為要求東南亞華人對所在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兩方面效忠的此一海外華人方針，特別補上一項前提：「在不違反對當地政府的義務下。」¹²⁶

萬隆會議以來，由於中共積極強化與東南亞鄰近國家的往來與聯繫，更特別為此強調將放棄海外華僑國籍問題，並鼓勵當地華僑歸化；¹²⁷美國遂於 1957 年通過「NSC 5723」號文件，對海外華人政策做出實質性的大幅調整。該份文件直截了當地要求駐外單位，將行動目標轉向協助海外華人融入當地社群，而不再如過去般一味寄望「自由中國」：

鼓勵中華民國影響海外華人，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以使其盡可能地快速融入其所在國的國民生活，成為忠實的公民（loyal citizens）……同時努力確保那些仍以身為華人為傲而非所在國公民一員的海外華人，將中華民國視為華人社會與文化價值的捍衛者……在不危及我們與東道國關係的更大利益前提，協助中華民國努力影響那些中國認同（China-oriented）的海外華人，使其將目光投向臺灣而非共產中國。¹²⁸

「NSC 5723」號文件的公布，意味著美國政府拋棄過去積極援用、附和國民黨政府華僑敘事的政策，轉而將目光朝向爭取東南亞國家支持。「自由中國」對海外華人提供的政治與心理慰藉已不符時勢所趨，美國新政策要求強化華人對於所在國政治、文化與身分上的認同。由於確立促使海外華人由「僑民」轉為「國民」的政策方針，導致臺灣過去作為「政治中國」的地位消退，僅在文化與血緣上仍保有「文化中國」化身。美國開始不再將華僑視為「中國問題」的一環，轉而將其置於東南亞國家少數族裔問題思考——這也意味著，僑生作為「中國」延伸的優待政策勢將面臨調整。

¹²⁶ NSC 5503, U.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 15, 1955. *FRUS, 1955-57, Vol. 2*, pp.30–33.

¹²⁷ Meredith Oyen,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pp. 88–89.

¹²⁸ NSC 5723,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ct. 4, 1957. *FRUS, 1955-57, Vol. 3*, pp.620–622.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指示下，美國行動協調委員會隨即於同年底頒定一份「影響東南亞華人的美國計畫準則」，予以派駐亞洲的美國機構明確指引。在這份文件中，當局明確要求駐外單位應致力避免其華人計畫與東道國產生齟齬，並且強調美國的核心目標是促成其華人與所在國的穩定關係、和諧發展，以免共產勢力趁隙滋擾；與此同時，建議國民黨政府改善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由此前因過於僵化地爭取海外華人政治支持，而觸怒所在國政府採取更嚴厲華人政策，轉往有限度地鼓勵華僑改變國籍、學習當地本土語言等方式，進而以此重建自身區域聲望，善加經營與周遭國家間的友好關係。其中，美國政府尤其強調，須特別關注亞洲的教育現場，並指示應善加利用華校促成華人融入所在國社會，同時抑制中共的宣傳攻勢。為了更有效地推進其華人工作，美國政府要求港、臺兩地有關部門密切合作，妥適利用美國官、私機構在香港的行動，以輔助臺灣計畫的推展。¹²⁹

更重要的是，此份文件標誌美國對海外華人教育政策的轉折：重心由既往對國民黨政府僑教政策的支援，轉向資助東南亞各國的非共華校。之所以產生此般政策的急轉，主要基於現實情勢與華校成果考量——行動協調委員會經蒐集在東南亞各國的駐外單位意見，並發現：來臺僑生要不是對升學沒興趣，就是自始便能負擔相應教育支出，自然無須擔心這兩群人奔赴共產中國；且畢業僑生返鄉人數幾希，與美國政府的期待頗有落差。再者，中共當時又縮減了對海外華人學生的招募行動，轉而聚焦東南亞各地華校教學。¹³⁰

職是之故，美國政府逐漸將其重心自臺灣僑教工作，延伸並轉移至供給僑生來源的東南亞華校。著眼於 NSC 5723 構想，新的東亞華人教育政策除延續既有的反共／非共考量，並且更加關注華校與當地教育體制的融合問題：一方面以「不顯眼」的方式提供華校所需非共教科書與圖書資源，以及培訓非共傾向的教師，延續過去降低中共影響力的方針；另一方面，積極輔導華校畢業生融入主流教育體系，從旁協助當地政府將華校納入國家教育體制，以促成當地華人的本地化。¹³¹

¹²⁹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¹³⁰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¹³¹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亞洲基金會的工作方向跟隨著美國政府政策亦出現轉向。其實總部早在 1956 年便要求臺灣辦事處探索大學與智識菁英以外的領域，構思有關青年領袖、勞工、媒體等面向的工作；並數度提議轉由安全分署承擔僑生旅費、生活費補助，以發展其他項目的可能性。¹³²對此，繼任饒大衛工作的史麟書代表（Earl Swisher，1902 – 1975，任期：1956 年 7 月 – 1958 年 6 月）¹³³則指出，由於安全分署認為他們是被亞洲基金會「牽扯進」（dragged into）僑教計畫，亞洲基金會的持續支持將確保安全分署延續此項目發展。更重要的是，史氏深感僑教計畫成就可觀：

我想不到還有哪個項目能像這項工作一樣，為自由中國以及廣大海外華人群體代表的自由世界總體目標，發揮如此直接且深遠的影響。我在最近的東南亞參訪對海外華人做過直接觀察，無庸置疑的是，當地已經出現了真切而顯著的改變。¹³⁴

就史麟書看來，僑教工作開展以來最重要的影響是：前往中共升學的僑生數確實銳減了五分之四，中共無意繼續競爭僑生升學數。¹³⁵再加上香港、馬來西亞等地學生逐漸具備自費留學能力，亞洲基金會對僑教的注意力便逐漸轉移至其他教育工作。

「打擊中共在海外華人社群間的影響，並鼓勵華人成為所在國忠誠且合作的公民」一項，隨後被列入了該會呈報給中情局的 1958、1959 年年度目標。居該年目標之首的，則是培養亞洲青年學生、領袖及改善亞洲的各類教育設施，該會試圖藉此使東南亞華人社群中產生以民主手段達成正當亞洲目標（legitimate Asian goals），且支持人性尊嚴與自由理念的領導人。¹³⁶

¹³²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Ang. 3, 1956.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Feb. 15,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³³ 史麟書（Earl Swisher，1902 – 1975），出生於美國洛杉磯。1924 年自科羅拉多大學畢業後赴中國，任教於嶺南大學，屬美國早期的中國專家；期間訪問過孫中山、結識蔣介石。1938 年返美。戰時任職於太平洋戰區的海軍陸戰隊情報部門，收集日本情報、審俘及對日廣播，戰後成為首批接收臺灣的美軍。1956 年至 1958 年間擔任亞洲基金會臺灣代表；隨後返回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任教，並於 1964 至 1965 年間赴中研院近史所訪問。John K. Fairbank and Joyce C. Lebra, “Earl Swisher 1902-197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3, 1976, p.461. F. Earl Swisher paper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University of Libraries, <https://archives.colorado.edu/repositories/2/resources/336>, accessed Jun. 28, 2022. 沈懷玉訪問，簡佳慧紀錄，〈周道瞻先生訪問紀錄〉，收錄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頁 482 – 483；謝雄立，〈中國之友史麟書〉，《馬祖日報》，1957 年 10 月 27 日，網址：<https://data.matsu-news.gov.tw/>，檢索日期：2023 年 7 月 9 日。

¹³⁴ “Comments on Quarterly Report, October-December, 1956,” letter from Earl Swisher to Robert Blum, Mar. 12,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³⁵ “Comments on Quarterly Report, October-December, 1956,” letter from Earl Swisher to Robert Blum, Mar. 12,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³⁶ “Request for Renewal, FY 1958.” Nov. 19, 1957, DTPILLAR, Vol. 2, 0009. “Request for PP Project Renewal,” Sep. 29, 1959, DTPILLAR, Vol. 3, 0038.



(二) 僑生計畫的成績

美國大使館隨後於 1958 年 9 月制定了一份「臺灣僑生計畫」，指示有關單位朝五項目標調整：一、提高僑生揀選標準，使來臺留學成為一項榮譽，而非傳統的補助。二、促使各國僑生與本地學生打成一片。三、提高僑生紀律。四、避免國民黨政府藉僑生工作收容東南亞難民，而影響他國事務。五、為新加坡等地華校培訓反共師資。¹³⁷換言之，美國政府在 1950 年代後期至為關切的問題成為：僑生來到臺灣後與本地學生的相處情形，以及海外華人在東南亞國家可能衍伸的政治風波。前者關係美方利用僑生圍堵中共海外滲透政策的成敗，試圖以此強化來臺僑生對自由中國的向心力；後者則透露美方的重心轉移，愈發重視僑生對所在國的貢獻，如安全分署在 1958 年 9 月的僑教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我們應為華人社群所在的國家服務，而不僅止於華人社群，並以此目標來制定僑教計畫」。¹³⁸

事實上，較為寬鬆的入學門檻、成績標準，相對優渥的學費減免與各式津貼補助等，在在強化了僑生與本地學生的隔閡——前引作家陳若曦對僑生輕易進入臺大一事的心理不平衡，常見於當時剛從高壓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本地大學生。曾任臺大醫學院教務主任的葉曙同樣回憶道，由於每年分發至醫學院的僑生皆達三分之一，其中良莠不齊，學生間的羨妒、憤懣時有所聞，甚至有師長在教務會議中對此大發牢騷。¹³⁹更有教育現場人員注意到，僑生抵校之初「衣著多屬華麗」，且行為「過於奢侈放任」，與臺灣學生顯得格格不入。¹⁴⁰

入學成績的優待、課程規劃的差異，導致不少僑生深感「水準比不上人」而挑燈苦讀，也有部分僑生因為無法適應臺灣教育環境而衍伸社會問題。¹⁴¹隨著滋事案件屢屢登上報紙版面，「僑生很壞」一事不脛而走，甚至有家長要求子女避免與僑生往來。¹⁴²論者批評政府對於僑生的過度關愛反而導致「僑生的特殊化」：「政府視

¹³⁷ David L. Osbor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gram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Sept. 3, 1958. 893.43/9-358,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2.

¹³⁸ 「Minutes of 54th Meeting of the Sino-American working Committee」(1958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開會通知單 Notice of Meeting〉，《教育計劃方案》，李國鼎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李國鼎資料庫，館藏號：a00174018。

¹³⁹ 葉曙，〈我與學生：病理卅三年之三十二〉，《傳記文學》第 15 卷第 6 期（1969，臺北），頁 76。

¹⁴⁰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工作總報告（四十六學年度）」，〈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47/005002/51/0001；韓繼旺，〈僑生在政大〉，《政大僑生》（1957，臺北），頁 12–13。不過，有馬來西亞僑生解釋，因他們身著英國料子，才會臺灣同學誤會成富家子弟。陳慧嬌，〈偶然身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分認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無頁碼。

¹⁴¹ 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1985）〉，頁 52。

¹⁴² 單德興訪談，〈李有成訪談錄（二）〉，《中山人文學報》46 期（2019，高雄），頁 113–144。



回國僑生為天之驕子……在壞的方面言，則愛之過甚，不免陷於驕縱，姑息，遂於有意無意之中，造成僑生的特殊化。」¹⁴³

對此，民間再度提出籌設「華僑大學」之議，以集中管理、方便施教作為解方。不過教育當局解釋，由於美援單位並不主張興辦華僑大學，僅能就現有情形作改善。¹⁴⁴是故最終仍導向與美方相似的構想——屬意加強學業、生活、品德與課外活動等各方面的輔導，協助僑生適應在臺灣的生活、增進與本地學生的互動。¹⁴⁵教育部與僑委會遂聯合各校自四十六學年第一學期起，推行僑生輔導工作，並關注學生課業補習、生活及品德輔導等面向。除了提高錄取門檻，更是在交代保送單位的注意事項中明列：送僑生抵臺前應先予指示，避免對本地學生展露「優越感」。¹⁴⁶對於來臺後惹事生非的學生則予以轉學或改以職業訓練，培養一技之長；少數過於頑劣者則送至新成立的彰化少年感護院附設僑生養護班管教，或者遣送回國。¹⁴⁷黨部方面亦指示，來臺僑生縱然是海外黨務新生力量，但輔導仍遠優先於吸收入黨。¹⁴⁸

教育部對於僑生輔導的高度重視，隨即反映在教育現場。如師大擴增輔導員數量，由原先全校共七位轉為每系至少一名教員兼任，同時額外安排友一至二名輔導助教協助。在課業輔導方面，則針對程度最為懸殊的國語、國文、英語三科開辦學科補習班，並安排系主任及輔導員隨側關懷。品德輔導工作主要透過愛國教育，發動僑生參加歷史文化、民族精神與學術相關活動，並要求暑假參加軍中服務團或救國團的營隊活動。生活輔導則由軍訓教官糾正「過於奢侈放任」之行為，及舉辦各式聯歡晚會、球賽，編印《僑生之友》加強聯繫等。¹⁴⁹不同於師大安排有專人密切關懷，政大主要仰賴學生間的集體生活。政大透過混和編組僑生與本地生，以團體

¹⁴³ 喬迺南，〈固步自封的僑務〉，《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0 期（1958，臺北），頁 21。

¹⁴⁴ 「第一屆立法院二十會期第二次會議速紀錄」（1957 年 9 月 20 日），《立法院公報》第 20 會期第 1 期（臺北，1957），35、36；〈回國僑生教育問題的商榷〉，《聯合報》，1957 年 5 月 21 日，01 版。

¹⁴⁵ 「梅貽琦致革命實踐研究院函」（1958 年 10 月 7 日），〈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47/005002/51/0001。

¹⁴⁶ 「辦理僑生回國升學各保送單位應請注意事項（海外地區適用）」，〈僑生回國升學（三）〉，《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3

¹⁴⁷ 〈僑生輔導工作優良 今後決定擴大推行〉，《公論報》，1958 年 4 月 23 日，03 版；張其昀，〈我國的僑教——民國四十七年五月十日在立法院教育僑務兩委員會報告〉，收錄《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八冊，頁 9736–9737。

¹⁴⁸ 「第一一五次中常會指示：聽取鄭彥棻報告海外黨務工作之檢討」（1959 年 1 月 28 日），〈石叟叢書續編—副總裁中常會指示彙編〉，《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09-00003-034；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第 87 卷第 3 期（2005，臺北），頁 121。

¹⁴⁹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僑生輔導委員會工作總報告（四十六學年度）」，〈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47/005002/51/0001。

生活消除彼此隔閡；同時規劃導師制，以消極獨裁方式促其適應學校生活，並對其學業予以團體或個別輔導；課外活動方面則利用學生社團、播放電影，或者聯袂郊遊、球賽活動等活動以增進育樂。¹⁵⁰然而，幾年下來，使僑生融入臺灣社會的實績始終不如預期。就讀於臺大的新加坡僑生劉寶珍（筆名淡瑩）觀察到，直至 1960 年代上半「本省籍、外省籍、僑生界線分明」，彼此毫不互動彷彿有層隔膜。¹⁵¹

為了更明確地掌握僑教計畫在東南亞當地的實績與影響，以作為逐步終止僑教工作、調整方向，或者縮編僑教援款等各種可能性的評估，美國駐臺北大使館自 1958 年中以來數度詢求其他海外使館看法。美國派駐東南亞各地的領使館普遍認為，由於當地政府積極推動同化政策，海外華人業已逐漸融入所在國；除了少數強烈希望接受中國式教育或有此需求的華人外，僑教影響頗為有限，其中一項原因是返國僑生數量幾希。¹⁵²美國大使館的檔案共留存 8 個國家／地區的回覆，各地評估皆頗有出入。其中，新加坡、香港、柬埔寨四地抱持正面態度，認為臺灣提供的深造機會確實有效地發揮「心理價值」，並一定程度上鼓勵當地的反共力量。不過新加坡領館補充，當地華人更關心生計問題，對僑生是否能發揮任何政治影響力持保留態度；而柬埔寨使館評估當地新政府對中共的友善態度亦不對僑教前景過於樂觀。¹⁵³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緬甸四地使館則認為，臺灣教育計畫的展延與否，並不對當地造成任何影響。駐馬來西亞人員強調，返國僑生立場殊異：「部分人士成為華人教師組織中阻礙『馬來化』的極端分子，另一群人則為有著健康反共偏見的忠實公民。不過兩方皆未對自由世界理念做出顯著貢獻。」¹⁵⁴至於越南大使館則評估來臺僑生「並未做好適應越南環境的準備」，亦有當地華人認為臺灣並未提供僑生足夠職業訓練。¹⁵⁵

¹⁵⁰ 韓繼旺，〈僑生在政大〉，《政大僑生》（1957，臺北），頁 12–13。

¹⁵¹ 淡瑩，〈讓種子萌芽的土壤〉，黃錦樹、張錦忠、李宗舜主編，《我們留臺那些年》（八打靈再也，雪蘭莪：有人出版，2014），頁 38。

¹⁵² Telegram from Taipei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5, 1959. 893.43/5-23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David L. Osbor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gram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Sept. 3, 1958. 893.43/9-358,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2.

¹⁵³ Telegram from Phnom Penh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9,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Telegram from Singapore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9,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 26,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¹⁵⁴ David L. Osbor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gram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Sept. 3, 1958. 893.43/9-358,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2. Telegram from Kuala Lumpur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7,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Telegram from Rango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8,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Telegram from Bangkok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9,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¹⁵⁵ Telegram from Hanoi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 7, 19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之所以導致這樣的結果，背後的原因除了國民黨政府的輔導不力之外，更大的問題則是臺灣的課程規劃對僑生返鄉後的就業幫助有限，有報刊直言批評僑生來臺後卻從「生產份子」淪為「消費份子」。¹⁵⁶再者，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局勢深刻影響僑生職業選擇，如馬來西亞等國不承認臺灣學歷，印尼、南越等地更明白拒絕僑生返鄉。¹⁵⁷連覓職都成了困難，遑論將所學貢獻於自由世界。根據負責國民黨海外工作的第三組在 1965 年的調查，返鄉的大專畢業僑生「一般缺乏反共意識」，這也呼應了美方所做的調查。¹⁵⁸

僑生們之所以缺乏「反共意識」，主要是來臺留學的經驗未能使僑生更深入理解「自由」理念、助益於反共工作。根據僑生們留下來的時評與回憶紀錄可悉，儘管有部分僑生如《蕉風》主編、馬來西亞作家白垚回憶於 1954 年見證無黨籍高玉樹贏得臺北市長選舉時的悸動，而深刻意識到民主選舉竟也「可以在中國人的地方做到」。¹⁵⁹不過更多是對戒嚴體制的親身體會——有人滿意於當時的社會治安、犯罪率低，有人則對街上常見的「反共、反攻和歌頌蔣總統的口號」感到震撼，甚至畏懼於國民黨籍學生打小報告。¹⁶⁰後來出任馬留臺聯總創會會長的賴觀福回憶到，他在當年那個沒有言論自由的臺灣體會到的一縷清風來自於後來被查禁的《自由中國》；並強調他從這份刊物中「力求客觀，事事講理」的評論「學到很多東西」。¹⁶¹正因戒嚴的陰影以及「自由中國」的名實不符，臺大僑生一度在 1959 年底發刊的《華僑青年》中向政府呼籲：「我們要求自由思想與自由創造的權力……（僑生）他們在自由中國不能如願以償地吸到自由的空氣，他們將會多麼地失望！」同時也感嘆到：「我們僑生滿懷著希望不遠千里而來，結果是帶着空虛的心情悵惘而歸，這將是多麼令人痛惜的事！」¹⁶²

（三） 僑生畢業動向

1959 年 8 月，接替藍欽成為新任美國大使的莊萊德(Everett Francis Drumright, 1906 – 1993) 綜合各方意見指出，縱然多數僑生尚未畢業返鄉，但鑑於中共教育政

¹⁵⁶ 〈回國僑生教育問題的商榷〉，《聯合報》，1957 年 5 月 21 日，01 版。

¹⁵⁷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一五）〉，《傳記文學》第 108 卷第 1 期（2016，臺北），頁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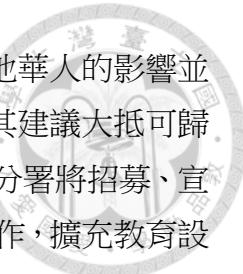
¹⁵⁸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二三）〉，《傳記文學》第 109 卷第 3 期（2016，臺北），頁 142。

¹⁵⁹ 白垚，《縷雲前書（上）》（八打靈再也，雪蘭莪：有人出版，2016），頁 230 – 231。

¹⁶⁰ 鐘逸明，“Interview With Francis Cham(湛承憲),” Jul. 14 & 30, 202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ld War: On-the-ground Experiences In Asia, <https://rcw-asia.com/browsearchives/archives/interview-with-francis-cham>, accessed Jan. 5, 2024. 劉放，〈傳園歲月〉，黃錦樹、張錦忠、李宗舜主編，《我們留臺那些年》，頁 47。

¹⁶¹ 賴觀福，《回首歷史往事》（吉隆坡：氏著，2016），頁 83 – 84。

¹⁶² 〈重視僑教與建設臺大—慶祝校慶一〉，《華僑青年》第 2 卷第 5 期（1959，臺北），頁 4 – 5。



策的調整，再加上僑生來臺一事與遏阻共產主義對東南亞各國、當地華人的影響並不真正相關，轉而建議美國政府逐步朝縮編僑教計畫的方向進行。其建議大抵可歸納成三項：減少招收大專僑生並停止資助高中僑生工作；要求安全分署將招募、宣傳相關開支轉向發展僑生輔導、領導與課外活動等學生直接相關工作，擴充教育設施的建築費用亦挪作供東南亞各國與臺灣的教育交流活動使用；將僑教工作納入對臺灣總體教育計畫之中，並以國家性的教育需求重新評估資助工作，同時滿足僑生與就業直接相關的教育需求。¹⁶³

如前所述，美國教育政策的轉向大抵依循其東南亞外交策略，目標由爭取海外華人投靠自由世界，轉移至經營與東南亞政府之間的關係。降低僑教工作強度的同時，鼓勵海外華人發展對「僑居國」的國族認同，藉此加強其與當地社會的連結，並間接削弱華人與「中國」之間所存在著的，近似若林正文所謂「遙遠的連帶」。¹⁶⁴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冷戰策略朝向不鼓勵維持「華僑」與「祖國」連帶的方向進行，此亦導致國民黨政府之於美國亞洲總體冷戰佈局的重要性愈發不如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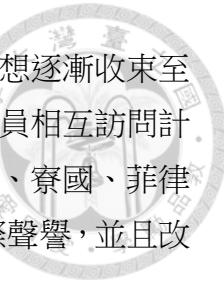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亦約莫在同一時間注意到東南亞各國氛圍的轉變，自1950年代中葉以來緩步調整其華僑政策：開放華僑登記所在國國籍、鼓勵學習當地語言，政府亦加強與東南亞國家間的經貿、親善團交流等。¹⁶⁵教育部在1958年春天制定的「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要點」中，首度頒定對畢業僑生的指示：師範學校畢業生「須即行返回原僑居地服務僑教」，大專院校畢業生除特殊狀況外同樣須「一律返回原僑居地服務」，惟允許畢業僑生返鄉前接受就業講習。¹⁶⁶迫於現實環境，華僑在國民黨政府「象徵秩序」中的角色出現轉變，從過去的中華民國政治共同體一員，轉為傳統中華文化共同體的一環。國民黨的自由中國敘事產生了斷裂，華僑成為了他國的華裔居民，國民黨政府的正統性在國際舞臺迅速萎縮；而流亡政權的象徵敘事則退守為島上的政治神話，持續在臺灣重複著「僑務委員會」與「僑生」的傳統大中國幻夢。

¹⁶³ Everett F. Drumright, "Suggested Revis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rogram," Taipei to Department, Aug. 5, 1959. 983.43/8-5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¹⁶⁴ 若林此語原為描述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於近代中國的關切與嚮往，而使不少「祖國派」智識菁英投身中國革命。本研究認為，(自我認同上的)「華人」對於中國的「連帶」同樣存在於戰後初期的東亞，隨著戰後臺灣被形塑為另一個「中國」，因而成為部分東南亞華人的心之所向。若林正文，著，何義麟等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新北：大家出版，2020），頁223–274。

¹⁶⁵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¹⁶⁶ 「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要點」（1958年5月24日），〈僑生回國升學（三）〉，《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3。



1958 年以來，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雙方對僑生的「同床異夢」構想逐漸收束至同一個焦點。例如國民黨政府即曾於 1959 年中制訂「東南亞教育人員相互訪問計畫」，建議國際合作總署撥款資助新加坡、馬來亞、北婆羅洲、越南、寮國、菲律賓等地僑校教師來臺進修；透過強調臺灣在教育方面的進步提升國際聲譽，並且改善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友好關係。¹⁶⁷

其中，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雙方最高度重視的問題，則為畢業僑生動向。不同於美國主要關心僑生歸國對當地社會的貢獻與影響，國民黨政府更期待藉此證明這批接受美援的畢業生回國後的「優良效果」，暗示國民黨的僑教努力並未刺激各國政府，以向美國爭取擴大援助範圍，¹⁶⁸並且以此重建其政權的「象徵秩序」——滿足內部需要之餘，亦透過畢業僑生所交織出的民間網絡，作為與中共競爭時的地下資本，影響海外人心並裨益於官方外交工作。¹⁶⁹

在前揭葛萊克於 1955 年提交的僑教報告中，尚有高達三分之一的僑生期望畢業後留在臺灣，並獲得政府安排的工作——美援僑教計畫展開之際的教育部長程天放指出，政府為了攏絡智識菁英，每年皆為大專畢業生提供一定就業機會。¹⁷⁰ 1958 年，根據僑委會對四十六學年度畢業生做的就業情況調查中，收到回覆的 215 名僑生中，只有 41 名打算續留臺灣、13 人計劃繼續深造，另外逾七成僑生則計劃返鄉服務；¹⁷¹ 至於四十七學年度蒐集的畢業生流向調查，亦有六成多的學生

¹⁶⁷ Telegram from Vientiane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8, 1959. 893.43/3-5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Telegram from Taipei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 19, 1959. 893.432/3-3057,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東南亞教育人員相互訪問計畫說明」，〈1961 年度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教育部新僑生入學輔導經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87。不過由國民黨官方發起的行動亦引發東南亞各國忌憚，如馬來西亞政府便認為此將導致「危險後果」(dangerous implications)——華校教師轉而效忠於臺灣當局。Stephen A. Comiskey, “The PAP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the Travel of Local Teacher to Taiwan,” Jun. 23, 1959. 893.43/6-305,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¹⁶⁸ 「美援僑教計畫備忘錄」，〈國內外僑教與僑生〉，《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50209-0078；“C. M. CH’EN Appeals for Contin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Program,” Taipei to Department, Jan. 19, 1960. 893.43/1/1960,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1960–January 1963, Internal Affairs, Reel 23. (hereafter Confidential Files: 1960–January 1963)

¹⁶⁹ 如僑委會在美援僑教計畫全面告終之際，隨即著手規劃「僑光堂」的籌建，強化畢業僑生與臺灣間的聯繫。「僅將僑生教育計畫實施情形報請查核由」（1966 年 9 月 13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0；「副總統嚴家淦於畢業僑生活動中心開幕典禮致詞呈核稿及僑生教育有關資料」，〈任副總統時：致詞稿（三）〉，《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6-010706-00003-006。

¹⁷⁰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程天放，〈民國四十二年度的教育〉，收錄教育部教育資料研究室輯，《程部長天放五年來言論選集》（臺北：氏著，1954），頁 256。

¹⁷¹ David L. Osbor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gram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Sept. 3, 1958. 893.43/9-358,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2.



(124人)打算離開臺灣找工作。而這六成學生中，又有高達97人(78.2%)打算從事教職，其次為擔任記者12人(9.7%)。¹⁷²

在另一份對1957年與1958年畢業僑生資料做的統計中，共回收373份有效樣本(占總畢業生的56%)，其中畢業後決定不續留臺灣或不繼續深造的僑生共有265名，亦約莫佔了總數七成。而在這些返鄉(或至鄰近國家)工作的僑生中，職業選擇同樣以選擇教職的人數最高，共有159人(60.0%)；其次則為投身傳播產業的24人(9.1%)及進入政府部門的21人(7.9%)。¹⁷³根據僑委會在美援中止後所做的統計，回國的僑生中以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數最多，佔總人數的一半，其餘則集中工程技術產業、工商產業、新聞事業、公職、醫務工作等工作。¹⁷⁴

之所以有大量畢業僑生選擇歸國就業，除了國民黨政府與美國的積極鼓吹發揮作用之外，或許更主要的因素是受限於臺灣當時的就業市場飽和，過多大專畢業生競爭激烈。再者，論者認為當時實施的預備軍官制度、缺乏輔導就業組織等理由，亦勸退不少僑生。¹⁷⁵至於以教育工作人數最多的原因，則係因學位不被所在國政府承認，多半僅能屈就於華校，並常僅領取次人一等的薪資。¹⁷⁶

自1952年至美援中止的1965年止，共有9,416名僑生畢業自臺灣大專院校畢業，而其中選擇返鄉者高達72%。¹⁷⁷這樣的成果雖符合美國的期待，達成以僑生支持東南亞各國政府發展與穩定的基本方向，但亦如前開指出，美國大使館與有關單位已開始思考僑教計畫的退場。亞洲基金會方面，同樣因臺灣辦事處撥付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每年皆高達五萬美元，所費不貲，1957年起數度引來總部質疑，並要求逐步刪減。¹⁷⁸

隨後，臺灣辦事處以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已獲安全分署補助為由，陸續縮減僑教援款。僑委會注意到亞洲基金會的動向，特別於1959年底藉口亞洲基金會隨後趁新任代表梅瑞強(Richard J. Miller, 1918–1976，任期：1959年6月–1960年

¹⁷² “C. M. CH’EN Appeals for Contin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Program,” Taipei to Department, Jan. 19, 1960. 893.43/1/1960, Confidential Files: 1960–January 1963, Reel 23.

¹⁷³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who Graduate from Universities in 1957 and 1958,” May 31, 1960. 893.43/5-3160, Confidential Files: 1960–January 1963, Reel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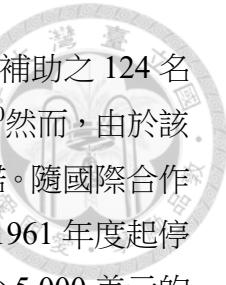
¹⁷⁴ 「僅將僑生教育計畫實施情形報請查核由」(1966年9月13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0。

¹⁷⁵ 〈僑生畢業無出路 當局應輔導就業〉，《聯合報》，1959年3月28日，02版。

¹⁷⁶ 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1985)〉，頁49、53。

¹⁷⁷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畫運用美援成果檢討》，頁9–13。

¹⁷⁸ Letter from John F. Sullivan to Earl Swisher, Sept. 11,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7月)¹⁷⁹抵臺履新，大動作邀集有關單位高層，並發函至各校要求受補助之124名優良僑生同至新北投僑園舉辦歡迎會，趁機向梅氏遊說補助事宜。¹⁸⁰然而，由於該會總部已確立縮減僑教贈款的政策，臺灣辦事處亦未能給予任何承諾。隨國際合作總署作出每年逐步減少對外美援的總體方向決議，亞洲基金會亦自1961年度起停止予以新進僑生補助，僅續資助此前已獲補助者。此後，以每年減少5,000美元的幅度逐步裁撤此一項目，直至1964年財政年度全面中止。¹⁸¹

圖 3-5、1959 年亞洲基金會代表梅瑞強於歡迎會上致詞



梅瑞強在歡迎會上的致詞則再次複述了美國對海外華人的新政策：「要僑生們學得高深學問，並將所得所學，返僑居地服務。」來源：〈各校僑生代表歡迎梅瑞強博士〉，《僑生》第2卷第2期（1960，臺北），頁6。

¹⁷⁹ 梅瑞強（Richard J. Miller），出生於美國加州，戰時以海軍身分服役於太平洋戰區。戰後成為首批獲教育部獎學金外籍人士，以此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士，並於該校任教。1954年加入亞洲基金會，先後擔任該會日本助理代表、巴基斯坦代表，並於1957年調任為計畫處負責人。1959年7月，轉任臺灣代表，並於1960年年初因病請辭，自1968年起任教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至退休。Delmer M. Brown, Kwang-Ching Liu and Don C. Price, "Richard James Miller, History: Davis and Berkeley." In Memori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s://reurl.cc/55mlNq>, accessed Jul. 6, 2022；「C. C. Yin 致 T. K. Chang（張紫常）」（1959年6月10日），〈福特基金委員會亞；亞洲基金協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451.1/40；「孟治致胡適函」（1959年6月10日），〈與孟性的來往書信〉，《南港檔》，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NK05-041-007。

¹⁸⁰ 「僑生輔導室科員兼股長盛啟簽呈」（1959年11月26日），〈一般經常性案件〉，《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48/005299/51/0005。

¹⁸¹ “Budget Presentation 1962/63: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undated. “Projection of Program Budget as of Jun. 10, 1963,” undated. “Projection of 1964/65 Program Budget as of Feb. 28, 1965,” undated.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178。



獲悉美援與亞洲基金會將大幅刪減僑教預算，主責海外黨務工作的國民黨第三組、僑委會與教育部等部門隨即表示反對。其中反彈最激烈的是教育部，該部一直將僑教計畫視為獲取擴充臺灣教育資源（*educational plant*）及相應設施資金來源的關鍵手段，並強調臺灣日益增長的學生人口對此需求愈發迫切。¹⁸²不過國民黨政府有關單位終究未能說服美國延續補助，而「美援」款項的刪減亦直接衝擊做為吸引僑生來臺關鍵的旅費、生活費等補貼。

為了延續僑教的政治效果，且避免補助斷然中止帶給僑胞的負面影響，有關部門決議將原定之助學金名目轉為獎學金，以自辦僑教的方式延續：僅予以 300 名品學兼優、家境清寒僑生，頒發每年 2000 元生活費與旅費若干。同時停招泰國以外中等學校僑生，並指示僑委會撙節支出，仍不敷的僑生助學金款項則由國庫及來年尚未支用的美援僑教經費撥用。¹⁸³至此，美國官、私機構全面自臺灣僑教計畫抽手，海外華人問題日漸從美國官方冷戰政策中心退潮；此事則重新回到國民黨政府的僑務工作範疇，持續經營畢業「僑生」網絡以供政權需要。

小結

誠如前一章指出，亞洲基金會出於「中國總體計畫」構想，積極將臺灣打造為「自由中國」。著眼於對青年學生的重視，以及中共吸收大量東南亞華人學生的急迫性，臺灣辦事處遂著手評估、規劃海外華人教育工作——藉此強化華人學生的反共傾向與自由、民主理念，並在將來返國引導當地華人社群輿論。換言之，「僑教計畫」即為亞洲基金會專為臺灣量身打造的冷戰計畫，亦只可能在臺灣發生。

事實上，爭取海外華人學生的構想，隨著東亞冷戰的展開而很快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在美國支援僑教前後，不少華人智識菁英皆有建造華人大學之議，如張君勸曾於 1952 年計劃在東京打造一所非共、非蔣的華人大學，而張其昀亦在教育部

¹⁸² 其中，美方認為國民黨第三組對僑教工作有著黨務居心，僅將其用作「償還政治債務（political debts）的手段之一」。Alexander L. Peaslee, “Suggestion for Revis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rogram,” Taipei to Department, Nov. 2, 1959. 983.43/11-257,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¹⁸³ 實際上。該會僅 1962 年頒發 300 名僑生獎學金，隨後名額逐年減少，1964 年後每年僅採 100 名。另外，教育部隨後洽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籌設了「清貧僑生補助金」，並且辦理越南、印尼、緬甸三地的專案公費爭取重點地區優秀人才；同時亦受理愛國華僑的捐款獎學金，迄美援結束已達數十案。「海外回國升學僑生補助問題審查會議記錄」（1962 年 5 月 2 日），〈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0；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頁 21–22。

長任內透露有意籌建「華僑大學」。¹⁸⁴儘管目的各殊且多半未竟，在在說明 1950 年代有志者的共同焦慮：避免思想不成熟的華人青年受共產思想蠱惑。

自由亞協的海外華人教育計畫，隨著艾森豪政府於 1953 年通過 NSC 146／2 號文件，以及副總統尼克森造訪亞洲的契機而獲得落實，成為美國冷戰總體計畫一環。經費規模由每年十萬擴增數倍，並捲入美國政府各駐外單位參與。1954 年起，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共同組織「東南亞僑民教育計畫工作小組」商議招致僑生來臺工作之整體規劃。亞洲基金會作為唯一「非政府」代表，主要負責僑生相關各類津貼，並制定若干獨立計畫從旁協助計畫推展；隨後更為隱蔽該會角色，另行成立「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統籌補助事宜，以作為該會在僑教工作上的影子組織，使該會對僑教的資助隱蔽於僑委會或美援之中。相較於美援鉅額款項的挹注，亞洲基金會每年五萬元的補助顯得杯水車薪，然而這已是該會 1950 年代在臺灣注資最高的項目。再者，由於該會行動方針限制該會任務為輔助美國政府海外工作推展，且行動不得與其他單位重複，亞洲基金會在僑教中的行動理應視為美方內部分工下的成果。

不過，美國與國民黨政府間對僑教計畫的構想實則大相逕庭。前者著眼於東南亞區域安全，構想藉教育將華人學生培養成「自由世界」領袖而非淪為第五縱隊；同時為避免引發第三世界國家反感，則退居幕後使僑教成為國民黨政府主導之功蹟。後者則企圖以「華僑」鞏固自身政治資本與正統性，將僑教工作設定為「自由中國」主導且在逆境中所達成的奮鬥成果，強化對本地民眾與國際社會的雙重宣傳。此亦導致雙方款項運用、做為行動目標的僑生範疇等問題上數度產生摩擦。

隨著東南亞各國陸續推行同化政策，以及中共海外華人政策的轉向，美國遂於 1957 年通過 NSC 5723 號文件，僑教工作的重心由吸引僑生前來「自由中國」，轉往關注東南亞各國內政問題，小心翼翼地促使「華僑」國民化。東亞情勢的改變及美國的政策轉折，迫使國民黨政府必須做出相應調整——愈發重視畢業僑生發散出的民間網絡。1960 年以來，隨著美援的逐步告終，美國政府與亞洲基金會同時逐漸裁撤了僑教相關支出，轉而將僑生教育工作放回以臺灣為單位的整體性教育計畫中思考。在後美援時代，主要培育作為後進國家的臺灣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並提供適應即將到來的民主社會所需——而僑教工作所提供的基礎教育設施擴充，則為隨後的教育計畫打下了部份基礎。

¹⁸⁴ “Plan for establish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Far East,” Jun. 6, 1952. 893.43/6-652, Confidential File, 1950–1954, Reel 39;〈教部正計劃 設華僑大學 張其昀鄭彥棻立院報告〉，《聯合報》，1958 年 5 月 11 日，03 版。



第四章 亞洲基金會的「自由中國」兩難

亞洲基金會在以自由亞洲協會身分來臺的隔年（1953），隨即以「分銷」的名義補助《自由中國》、《大陸雜誌》、《世界新聞》等三份刊物，強化對東南亞華人的「非共」宣傳。不過，十分不尋常的是，在該會支持的刊物中赫然出現《自由中國》，這本已在 1953 年與國民黨政府產生激烈摩擦的社論性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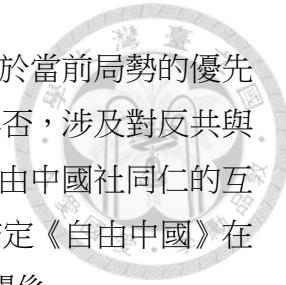
對亞洲基金會的海外活動而言，支持與東道國政府利益不一致的項目實屬險棋，易誤觸當地政治紅線，且與該會避免涉入內政的「共謀的局外人」立場扞格。亞洲基金會對《自由中國》長達八年的經援，涵蓋該刊最為活躍的幾年，亦成為維繫該刊營運的關鍵支持，幾乎可視為對其民主、自由言論的背書。此一服膺於美國冷戰利益的慈善基金會，何以決定支持此份異議性的政論刊物？又如何評估《自由中國》的營運、言論及其在該會冷戰布局中的具體成效？以及拿捏其自身與所在國政府、受援團體的交往間，那條曖昧且模糊的行動界線？

過去有關《自由中國》的研究，多半聚焦雷震在內的編輯群 1950 年代對自由理念、民主選舉的追求，對黨國體制的批判，以及「雷震案」之於戰後政治史的意義等面向。¹提供《自由中國》編輯團隊關鍵金援、使其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內容生產的贊助者，幾乎未曾進入研究者視野，通常被視為背景資訊一筆帶過。迄今僅有任育德嘗試將《自由中國》置於東亞的冷戰環境之中，爬梳香港、美國、臺灣三方的連結與互動。²可惜的是，由於史料方面仍止步於雷震日記與雜誌等既有材料，整體突破有限。

在《自由中國》的案例中，亞洲基金會、自由中國社與國民黨政府三者皆對彼此有所求，亦有所忌憚，隨之牽制了各自行動。本章首先梳理此三方互動經緯，並藉亞洲基金會對《自由中國》分銷計畫的運作、評估及其成果，進一步析論該會與國民黨政府充滿張力的互動。至於其衝突核心，實緣於統治集團聲稱其作為「自由

¹ 相關討論請參：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蘇瑞鏘，〈從雷震案看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收錄薛化元編，《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臺灣史論叢戰後政治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 177–212；蕭高彥，〈五〇年代臺灣自由觀念的系譜：張佛泉、《自由中國》與新儒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 卷 3 期（2014，臺北），頁 387–425。

² 任育德，〈1950 年代臺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跨域視角的分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83 期（2021，香港），頁 95–111。



中國」代表的名實不符，導致三方在構思「自由」與「中國」之於當前局勢的優先順位方面產生意見落差。亞洲基金會對於《自由中國》的補助與否，涉及對反共與民主這兩項冷戰理念的審度，此亦左右了該會與國民黨政府、自由中國社同仁的互動，我將其稱為「『自由中國』兩難」。另外，本章亦嘗試重新錨定《自由中國》在東亞冷戰與文化冷戰中的角色，以及受援國與美國在冷戰中的關係。

第一節 《自由中國》初期動向與資金籌措

(一) 《自由中國》初期主張

1949年初，胡適、雷震、杭立武、王世杰等人憂心於中共的勢如破竹，商議辦理一份「宣傳自由與民主」的刊物與極權政治抗衡。之所以取作「自由中國」，係因胡適提議效法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 – 1970) 的《自由法國》精神；此一構想隨即獲當時在野的蔣介石應允支持。³待夏秋之際雷震自重慶來到臺北，該刊終於在時任教育部長杭立武每月 300 美元（約折合新臺幣 1,500 元）的補助下辦成，隨後轉至國立編譯館名下撥付每月 4,000 元臺幣。⁴期間有人提出或可在香港籌辦，遭雷震強力反對，認為香港已有《民主評論》及《自由人》兩份民主刊物，且「臺灣作為反共基地，應有一民主刊物」。他批評：若是「怕受國民黨干涉而逃避現實，那是懦夫的行為」。《自由中國》首期於 1949 年 11 月 21 日發刊，胡適任發行人，雷震獲推舉為社長，正副總編輯由毛子水、王聿修出任，李中直擔任執行編輯、聶華苓則做為行政編輯（後任文藝編輯），經理為馬之驥。編輯群集結當時政壇、教育界與學術界的知名人士。⁵

在該刊發刊號中，胡適寫下〈「自由中國」的宗旨〉一則，自陳《自由中國》的發行實有宣傳目的，以祈「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⁶編輯部同仁將國、共內戰視為「民主自由與反民主自由的大鬪爭」，以「超黨派」姿態辦刊，進而投入「從事於建立自由中國的偉大運動」，使之在「國內外滙成一股偉大的洪

³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頁 59。

⁴ 馬之驥事後訪問杭立武，杭氏稱彼時教育部僅補助《自由中國》與《反攻》兩份雜誌；以美金補助，則係因該時臺幣幣值波動過大，方以教育部存有之相當數目美金撥付。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76 – 103；「電請按月補助本刊四千元或一次撥助八萬元作本刊永久基金由」（1950 年 4 月 29 日），〈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三）〉，《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09。

⁵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頁 60；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三〕》（臺北：桂冠，1989），頁 196。

⁶ 胡適，〈「自由中國」的宗旨詞〉，《自由中國》第 1 卷第 1 期（1949，臺北），頁 2。



流」。⁷具體來說，即藉刊物展開文化反共工作，掀起一場「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社在成立宗旨中明白寫到：「推動自由中國運動，反抗極權統治與威脅」。⁸

創刊之初，雷震即刻意將目標讀者瞄準海外，積極開拓海外華人讀者客群，獨力聯繫各國窗口代售。自第二期起，《自由中國》同步將紙板寄予香港時報社重印，並託該社負責在海口、星洲等地的海外發行。⁹1950 年起，該刊陸續拓展刊物於東南亞各地如菲律賓、泰國、印尼、南越、新加坡與美國等地發行據點，委由當地華人報社協助經銷。鑑於《自由中國》在海外華人間的風行，該刊海外銷量幾乎與國內銷量相當（參表 4-1），隨之加深編輯團隊自詡「成為自由中國所有同胞——海外的和國內的——情感交流的媒介，並藉此發動自由中國的潛在力量」之信念。¹⁰

表 4-1、《自由中國》創刊初期海內外銷量

地區	銷量(本)	佔比(%)
臺灣	4,000	44.2
舟山與金門	300	3.6
海南	400	4.4
香港	2,000	22.1
泰國	1,500	16.6
菲律賓	300	3.3
新加坡	200	2.2
美國	200	2.2
印尼	100	1.1
日本	50	0.6
合計	9,050	100.3

筆者彙整製表。由於此份資料係雷震提出，目的係為申請補助，數值恐有誇大之嫌。來源：「電請按月補助本刊四千元或一次撥助八萬元作本刊永久基金由」（1950 年 4 月 29 日），〈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三）〉，《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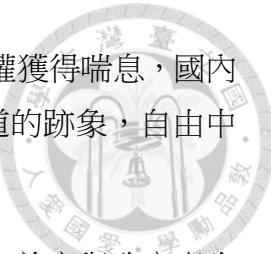
雷震在創刊之初評估，反共若要成功非得仰仗蔣介石的領導，遂逕自將「反共擁蔣」定為內部編輯、審稿原則，這也使得《自由中國》頭幾期刻意節制對國民黨

⁷ 〈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2 卷第 1 期（1950，臺北），頁 36。

⁸ 〈自由中國社籌備程序〉，《雷震、傅正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52-01-08-009。（以下簡記作《雷檔》）該運動梗概請參：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臺北：遠流，2020），頁 188–190。

⁹ 〈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1 卷第 2 期（1949，臺北），頁 24；〈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1 卷第 3 期（1949，臺北），頁 28。

¹⁰ 〈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2 卷第 7 期（1950，臺北），頁 36；〈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2 卷第 10 期（1950，臺北），頁 36。



政府的監督力道。¹¹隨著臺海局勢因第七艦隊協防而使國民黨政權獲得喘息，國內政治亦因國民黨內部改造與實施臺灣地方自治選舉而有步上軌道的跡象，自由中國社亦將言論重心轉向監督、勸諫政府方面。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首度與政府產生摩擦，雙方就自由與反共先後次序僵持不下。該文指控有不肖之徒試圖自金融案件的告密、承辦獎金營私，編輯說明撰文用意：「我們又覺得進忠言是輿論界的神聖使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共產黨的手法，我們萬萬不能東施效顰。」¹²果然發刊後隨即招致主責機關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與部分黨政要員反彈，一度要脅《自由中國》停刊並逮捕雷震。¹³彭孟緝等人的施壓，迫使雷震更大程度參與該刊編務工作，他於日記中自承：「我認為政府這樣作法，不僅不實行民主，反變本加厲，走獨裁政治路線，而當時之保安司令部，對我們壓迫之至，幾乎透不過氣來，我自不能不以全力照料刊物也。」¹⁴

不同於雷震等人強調，唯有自由、民主理念以及法治精神真正扎根民眾內心，方得使反共得以落實；並訴求集眾人輿論督促政府改革、「廣開言路」，以民意彰顯「自由中國」真義。¹⁵彭孟緝等人則呼應蔣介石的「革命民主」主張，認為當前首要之務是維繫國家、民族命脈，團結反共，不應過度批評而削弱執法效力，更出「要自由民主，應向毛澤東去要」等語；¹⁶換言之，正是藉內戰中國家分裂之名，擱置民主理念的落實，暗示惟革命成功方能獲真正的民主。出自對「民主」的不同構想，雙方歧見日深。蔣經國更於1952年初約見馬之驥，責該刊「不是反共而是反動……

¹¹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頁193–194。如曾任該刊編輯的許冠三批評：「若干批評政府的文稿，不是給改成溫吞水，就是整篇見不了天。……他〔按：指雷震〕總是夥同毛子水勸我們年輕人莫動火氣，須以大局為重。」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頁106–107。

¹²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4卷第11期（1951，臺北），頁4、31–32。

¹³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頁214–221。

¹⁴ 雷震提及《自由中國》創刊之初他原只被交付募款工作，編輯交由王聿修、李中直等人文責；直到1951年刊出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篇，引發政府強烈抨擊，才使他積極投入編務。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臺北：桂冠，1990），頁356。

¹⁵ 〈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5卷第4期（1951，臺北），頁32；雷震，〈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自由中國》第5卷第10期（1951，臺北），頁4。

¹⁶ 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頁164–171。有關革命民主內涵請參：任育德，〈當革命民主遇上選舉：1950年代國民黨與臺灣地方選舉〉，收錄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林映汝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頁147–170；呂芳上，〈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收錄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臺北：國史館，2015），頁253–285。



是騎牆，是投機，是危害國家，危害民族，這種雜誌要他何用？」並明白主張《自由中國》應該停刊。¹⁷

縱然《自由中國》又接連因言得罪救國團、國防部、教育部與國民黨黨部等單位，雷震等人仍不改其志，並在 1952 年末的〈給讀者的報告中〉直言：「本刊所揭露的『宗旨』，還是做得很不夠的，對於『督促政府』一層尤其如此。」自由中國社與國民黨政府間難以彌合的嫌隙，導致雷震隨後被免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職，更遭撤除中國國民黨黨籍。¹⁸雙方的齟齬亦使黨政機關陸續削減、中止對《自由中國》的補助。國民黨中央給付的每月 1,500 元郵寄費、省財政廳每年 20,000 元的撥款，則自 1951 年中的衝突以來陸續止付，軍方亦自 1953 年起將《自由中國》排除在勞軍刊物名單，不許軍人閱讀。¹⁹至於過去多為研究者所徵引，雷震與馬之驥抱怨因陳誠就任行政院長而取消的教育部款項，官方檔案中卻呈現全然不同的樣貌——由於 1950 年起補助政策的調整，教育部改為每年撥付 20,000 元新臺幣，隨後則由行政院動用第二預備金支應，且直至 1954 年仍得見補助紀錄。²⁰換言之，《自由中國》持續收受行政院資金至少迄 1954 年，該社同仁的紀錄顯然僅透露了部分事實。

黨政機關的援款雖不一定在 1954 年前後全面撤出，但自由中國社獲得的補助減少、經營愈發困難則是肯定的。在上述雷震與教育部的往返信函中，透露主要原因為紙價等印刷成本的「物價日漸高漲」，導致《自由中國》財政赤字愈發嚴峻，並且於 1952 年 10 月中調漲長期維持的單冊 3 元售價。²¹該刊的零售及訂閱數目顯然已難補足資金缺口。該刊之所以不致停刊，除個人及企業行號陸續投注的廣告費用之外，補足資金缺口的關鍵正是自由亞協隨後定期撥付的購書費用。

¹⁷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臺北：桂冠，1989），頁 13；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113。

¹⁸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頁 226–234；〈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7 卷第 10 期（1952，臺北），頁 44。

¹⁹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 81–82。雷震早在 1952 年 9 月便收到兩名軍人來信，指謫「軍中禁止閱讀《自由中國》，並將舊的撕去」，並認為這「將使他們愚蠢」。雷震慨歎軍方的此一決策：「政治部這種作法，將會自毀軍隊的。」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126。

²⁰ 「據呈請再予補助自由中國社新台幣一萬元一案指令知照由」（1950 年 9 月 1 日），〈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三）〉，《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09；「自由中國社代電」（1954 年 2 月 23 日）、「為四十三年補助自由中國社經費二萬元特令遵照由」（1954 年 3 月 22 日），〈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六）〉，《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12。特別感謝「中國現代史研究生工作坊」會中，陳昕邵先生提醒我留意此份資料。

²¹ 〈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3 卷第 1 期（1950，臺北），頁 44；〈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第 7 卷第 8 期（1952，臺北），頁 32。



(二) 自由亞洲協會的購贈評估

《自由中國》與自由亞協的接觸約始於 1951 年底，該時雷震業已為籌措發刊資金的缺額，先後接觸不少政府機關、民間企業與美國大使館新聞處等機構，並囑吳鐵城代其向菲律賓華僑募款等。²²然成果頗為有限，例如美新處雖稱《自由中國》是「臺灣第一位雜誌」，並贊其堅定立論與對民主的信仰勝過省主席吳國楨；但該處專員胡博德（John T. Houbolt, ? - ?）則指臺北大使館新聞處經費遠少於菲律賓與香港，暗示無力購贈，且婉拒資助廣告或購贈等請求。²³尋求資助接連碰壁，雷震哀歎「在臺灣已無可籌之款」，轉而探詢自由亞協補助的可能性。據目前找到的資料來看，雷震最早應在 11 月初致函赴美留學的王紀五，²⁴託其協助探明自由亞協組織狀況並嘗試聯繫。²⁵

經王紀五居中溝通，雷震終於成功聯繫上自由亞協華籍職員董時進、劉毓棠，董時進更直讚該刊「標準極高、程度極好，將來與該會合作一定可能」。董氏除提議可購贈該刊贈予留美學生，並要雷震商請發行人胡適出面提案。董時進之言論顯見自由亞協頗屬意藉胡適的聲譽，拉攏亞洲華人支持。王紀五亦觀察到自由亞協職員對胡適很是仰慕：「只須胡先生出名，一切皆易解決。」²⁶

然而，誠如第二章指出，該會 1952 年以前的行動方針尚未健全，對於要支持哪派人士代表「中國」亦舉棋不定，此亦導致《自由中國》接洽自由亞協之初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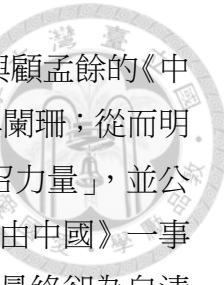
²²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三〕》，頁 170。

²³ 雷震對此頗不以為然：「（美國）政府之意，只想保守臺灣，以臺灣為軍事基地，對文化與宣傳則不注意，認為此間是反共的又沒有什麼共產黨，用不著大量宣傳之經費。其實這是錯的。」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三〕》，頁 88、173；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89 – 91；「外交官銜名錄」（1951 年 9 月），〈各國駐華外交領事人員銜名錄〉，《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00400-0087。

²⁴ 王紀五（1927 – 1991），原名德勤，中國湖北崇陽人，為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長子。1949 年於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旋即轉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畢業後返臺先後擔任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職、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等，期間參與規劃新竹科學園區、推動海洋研究、實施 B 型肝炎防治工作等。〈王紀五先生事略〉，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9380001A。

²⁵ 雷震最初向王紀五描述自由亞協的活動為：「聞說自由亞洲協會，設在舊金山，其經費是自國務院支出，表面上透過這個機會以幫助亞洲反共之團體及刊物。」頗為巧合的是，誤認自由亞協應收受國務院資金（實為中情局）的說法，與舊金山領事張紫常最初彙報外交部的情報相仿。職是之故，推測《自由中國》之所以能在自由亞協成立頭一年即展開聯繫，並於該會臺灣辦事處成立不久便獲其資助，應有賴於雷震國民黨要員身分帶來的人際網絡與各式情資。〈雷震致王紀五〉（1952 年 1 月 2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9-072；〈雷震致王紀五〉（1951 年 11 月 2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9-069；「張紫常呈葉公超函」（1951 年 11 月 13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²⁶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三〕》，頁 203；〈王紀五致雷震〉（1951 年 2 月 7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1-014；「吳思琦致胡適函」（1952 年 1 月 26 日），〈與其他吳姓的來往書信〉，《美國檔》，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US01-091-007。



不小困難。由於胡適隨後獲悉自由亞協曾接濟謝澄平的《自由陣線》與顧孟餘的《中國之聲》，忖度該會傾心第三勢力，「與自由中國無合作可能」而意興闌珊；從而明白反對雷震向自由亞協請款，批評「該會份子複雜，在文化界無號召力量」，並公開痛斥「第三勢力只是幻想」。此舉引來自由亞協不快，對補助《自由中國》一事態度愈趨冷淡。²⁷原以為將扮演自由中國社與自由亞協橋梁的胡適，最終卻為自清個人立場而使購贈案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據王紀五掌握到的資訊可知，該會的態度變化亦與因資助《少年中國晨報》而導致的人事變動有關。²⁸王紀五於 1952 年夏季應國民黨海外黨報《少年中國晨報》請託，赴舊金山與自由亞協交涉延長該報補助事宜。²⁹自由亞協對該報資助始於 1951 年 12 月 1 日，每月提供 3,600 元寄送費，為期半年。考量到孫中山對海內外華人的廣泛影響，自由亞協希望透過支持這份與孫中山關係匪淺的報刊，打入中國學生社群，強化對留美華人學生的反共號召；同時藉由在報刊談論被中共禁止的孫中山，促成美國非共華人社群的統一戰線。³⁰國民黨方面自然樂見此般合作，並指示該刊：應嚴守報社立場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宣傳貢獻，同時善加利用自由亞協的經濟支持，「加緊推動工作，充實宣傳效能」。³¹

王紀五在與該會人士往來間聞悉，正因自由亞協資助了此份親國民黨報刊，且因《少年中國晨報》屢次攻擊第三勢力，才導致自由亞協代理會長谷禮恩的去職。

²⁷ 〈王紀五致雷震〉(1951 年 2 月 7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1-014；〈杭立武致雷震〉(1952 年 3 月 27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3-02；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48。黃克武指出，國民黨留意到資助第三勢力刊物的組織主要應為美國駐港新聞處，其中以顧孟餘、張發奎等人合辦的《中國之聲》獲最多援助。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 249–250。

²⁸ 《少年中國晨報》(The Young China Morning Paper，美方多記為 Young China 或 Young China Daily News)前身為黃超五、李是男、黃伯耀等人於 1909 年在舊金山籌辦的《美洲少年週刊》，其後逢孫中山旅美建議該刊改為每日發行，以強化革命宣傳，遂於 1910 年 7 月 4 日發行《少年中國晨報》創刊號。該報與國民黨關係密切，除自詡為「黨員商辦」的報紙，報社股東幾乎悉數為黨員，編務工作亦長期收受黨部津貼，訂戶中不少海外黨部與通訊處。黨中央更於 1928 年將其登錄為「黨報」。本報同仁，〈少年中國晨報五十年簡史〉，收錄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編印委員會編，《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三藩市：氏著，1960)，頁文 5–文 18。

²⁹ 〈王紀五致雷震〉(1952 年 8 月 2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1-028。查《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王紀五並不在該報社正式職員名單，應只是短期的委任關係。

³⁰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 Dec. 12, 1951. DTPILLAR, Vol. 1, 0023.

³¹ 〈41 年總裁批簽〉，「中國國民黨檔案」，孫圖藏，檔號：總裁批簽 40-0163。《少年中國晨報》內部資料明載，自由亞協自 12 月 1 日起每期承購 3,100 份分送留美中國學生，為期一年，前六個月為試辦。當時任職於編輯部的湯翼海回憶，自由亞協的這筆款項使報社編輯突增，工作量亦大幅增加，並自言這段日子是他在該報中「極其苦悶的時期」。湯氏的回憶，坐實《少年中國晨報》編輯方針與工作確實回應了國民黨方面的期待。本報同仁，〈少年中國晨報五十年簡史〉；湯翼海，〈七年回憶〉，收錄《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頁文 14、文 115。

³² 王氏認為此項決策應有幕後主導該會的國務院授意，才使繼任會長衛倫亭數度嘗試中止對該報的補助，並將同情該報、多次呈請延長補助的學生聯繫部部長艾偉（James Taylor Ivy，1919 – 2006）³³「充軍到香港」；更嚴格限制該會香港辦事處經費，只許小額補助文化人士。期間王紀五數度接觸自由亞協副會長麥達克（Ray T. Maddocks），惟論及有關援助《自由中國》一事，麥達克連忙撇清：「關於臺灣的事他作不了主，想怕 Valentine〔按：即會長衛倫亭〕也作不了主。」³⁴ 王紀五的觀察雖不一定與實情相符，不過仍側面佐證前揭自由亞協成立初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保留態度，以及該會中國政策的擺盪——相當程度仍寄託於香港的第三勢力。

1951 年下半，自由亞協陸續收到不少華文刊物、團體聯繫申請補助，總部職員董時進一度評估《自由中國》「似乎得到補助之希望很少」。³⁵ 曾參與自由亞協對《自由中國》補助審查的劉毓棠亦稱：縱然極力主張補助，但審查會議以來聲息全無。³⁶ 購贈案耽擱數月後出現轉圜，據雷震留下的紀錄看來，契機應為自由亞協臺灣代表施豁德的就任。施氏對《自由中國》表示高度興趣，隨即於抵臺隔月 6 月 17 日拜訪雷震，洽商刊務經營及財務相關問題。施豁德注意到，該刊虧損嚴重，若要全額補助，勢必得監察經費運用，遂提議以購贈方式在香港分送。施氏明白承諾自

³² 谷禮恩本人對遭免職一事甚感詫異，同感係「『政治性』決定」，並為此寫了八頁長信質疑董事會決策，批評恐影響合作中的亞洲受援團體觀感。而在中情局策協辦在為繼任會長擬定的行動指引中，特別增列的一條指示則坐實了谷氏的指控：「請避免，至少在成立初期，造成自由亞協須就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作出公開聲明的狀況。」 Letter from George Greene to Dick. Nov. 29, 1951, DTPILLAR, Vol. 1, 0029. "Guidance to Alan Valentines." Dec. 6, 1951. DTPILLAR, Vol. 1, 0026.

³³ 艾偉（James T. Ivy），畢業於亞利桑那州立學院，戰時曾作為空軍軍官調派歐洲、菲律賓與中國戰區。戰後調任美國駐遠東國外清算委員會（Foreign Liquidation Commission），1948 年轉任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署長特別助理，及農復會區域主管等職。Ivy 於政府檔案中常記作艾維，但因香港方面的討論多稱其為艾偉，故擇以較常用的名稱。「Information from 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1952 年 5 月 1 日），〈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為本會執行長艾維之各國駐華外交官員證有效期滿特此函送請予延期使用由」（1950 年 2 月 6 日），〈各國駐華官員身分證（十）〉，《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00400-0112。

³⁴ 王紀五在通信中多稱自由亞協幕後係由美國國務院操縱，然而國務院正式資助該會實應始自 1960 年代亞洲基金會與中情局的聯繫曝光後方才接手。另外，有關交涉《少年中國晨報》補助糾紛，王紀五亦解釋之所以能獲得展延一期補助的成果，係因他揚言提供「自由亞洲是國務院走狗的證據」予舊金山當地英文報紙，「準備總攻擊」。自由亞協迫於輿論壓力的威脅，方應允在該報具結「永不再生是非」後勉予延長合同六個月。王氏總結，此後自由亞協內部流傳「國民黨比共產黨還厲害」一說。〈王紀五致雷震〉（1952 年 8 月 2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1-028。

³⁵ 〈董時進致雷震〉（1952 年 8 月 5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8-072。

³⁶ 民社黨的楊浚明曾向雷震表示，自由亞協負責審查該刊補助的人，是黨內高層張羣女婿劉毓棠，而雷震亦去信詢問。然而，劉毓棠則稱，該事並非其主管，他僅被找去商討該會有關中國方面的案件。〈劉毓棠致雷震〉（1952 年 8 月 26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9-089；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99。



由亞協「一定可以幫助也」。為免《自由中國》經濟一時陷入困難，施氏隨後更主動表示，可先行小額購贈自由中國社過去出版的小冊子，以作接濟。³⁷

雷震隨後又趁該會亞洲行動部部長司徒華於 11 月訪臺期間，與總部高層直接商談補助細項。司徒華稱，造訪東南亞期間觀察華人大多「忙於衣食，不注意臺灣問題」，認為《自由中國》「聲譽尚好」但「程度太高」，海外華人讀者應頗有限。有關司徒華的疑慮，雷震辯稱該刊內容多少對僑胞有所啟發並長知識；有關分送問題，亦允可一手包辦，自由亞協僅需提供津貼與郵費等款。³⁸

雷震很快在 1953 年 1 月中接獲自由亞協通過購贈《自由中國》的消息，並於次月起實施，每月承購 500 美元分送海外華人。首批刊物共計一千冊，先行寄往香港與日本等地。³⁹這筆來自亞洲基金會的資金，適時弭平 1952 年的資金缺口，亦成為雷震回頭向行政院索要提高補助的絕佳說詞——自由中國社儘管經濟拮据，仍「不顧困難」地將刊物寄往海外「擴大反共宣傳計畫」。⁴⁰雷震十分靈活且巧妙地穿梭於各方有力盟友之間，為《自由中國》謀求最大利益與成效，積蓄發展實力。隨著來自政府當局的補助陸續止付，他將募款重心更大幅度地轉向美國官、私營機構方面。從後見之明看來，美方的援助更成為該刊日後暢所欲言的保障憑依。

至於自由亞協之所以終於在 1953 年通過此筆購贈案，儘管因尚未得見該會內部相關商議紀錄，未悉詳細決策經過。不過據前開王紀五的觀察，綜合前一章關於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可推論自由亞協終於允許臺灣辦事處補助臺灣刊物分銷海外，⁴¹關鍵應為：艾森豪政府中國政策的全盤重估，以及隨後 NSC 146／2 號文件對臺灣地位的承諾，而美國官方的態度隨之牽動亞洲基金會政策轉折。

值得留意的是，論者過去常引用的該社經理馬之驥憶述，補助時段自 1953 年迄 1959 年 6 月合約期滿止並不全然正確。⁴²根據中研院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雷震、傅正檔》藏的雷震信函可悉，亞洲基金會與自由中國社的合作，在 1953 年 2

³⁷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85、94。

³⁸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四〕》，頁 125–126、153；〈雷震致王紀五〉（1952 年 11 月 8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9-096。

³⁹ 查諸雷震日記，其最早記下自由亞協決議的補助的消息是在該年 1 月 26 日：「連日為自由亞洲協會購贈本刊寄發事，連日忙甚。」故可推知雷震應在 1 月中下旬收到相關通知。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臺北：桂冠，1989），頁 19、22；〈雷震致王紀五〉（1953 年 3 月 1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09。

⁴⁰ 「自由中國社代電」（1954 年 2 月 23 日），〈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六）〉，《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12。

⁴¹ “Monthly Activity Report for February, 1953, Taiwan,”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⁴² 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15–124。



月至 1955 年 12 月間，撥付款項以口頭約定；1956 年至 1958 年間，則改以每年簽定書面合約；1958 年 6 月簽訂最後一份三年合約，約定補助終止於 1961 年 6 月，而臺灣代表處亦於 1960 年 6 月提前結清下一財政年度之補助款。⁴³是故亞洲基金會實際補助《自由中國》的時段，應為 1953 年 2 月至 1960 年 6 月。

第二節 亞洲文化冷戰中的《自由中國》

由於《自由中國》的目標並不止步於臺灣，同樣積極攏絡海內外支持、關心「自由中國」的華人讀者。若細查該刊每期的編排，即可發現除論及自由、民主真意，以及臺灣現況的相關分析文章外，亦有意穿插有關國際冷戰局勢，或亞洲各國的民主與共產對壘情形的報導性介紹，著實堪稱「自由中國」觀點的評論期刊。

這樣的自我定位使《自由中國》成立之初便吸引了不少海內外智識階級讀者，亦接獲不少回饋意見。如該刊曾在 1950 年 6 月刊出一名筆名來乙的印尼讀者來函，信中怨歎共黨宣傳之厲，稱所在地書局所進口的畫報、雜誌「皆是共產刊物」，並請求自由中國社設法協助、增加該刊海外銷售。⁴⁴相關請求眾多，使雷震更為高度重視《自由中國》的海外流通情形，力圖在有限的預算內觸及更多華人讀者，進而增進僑胞反共意識、強化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

雷震將《自由中國》視為一份自由世界文宣品的觀點，可謂與自由亞協不謀而合。這也正是臺灣代表施豁德於 1953 年決定資助《自由中國》、《大陸雜誌》、《世界新聞》三份刊物的初衷——加強對東南亞華人的心理攻勢，提升非共消息來源在華人社群間的散播，並且扶助這類非共／反共刊物的營運。

(一) 臺灣 1950 年代前期報刊生態

1953 年春季，曾任記者的施豁德代表彙整了一份臺灣報刊發行與流通狀況的評估報告，其中清楚表露他對於當時臺灣出版品的看法，以及之於該會運用的構想。這份調查計畫的緣起，係回應該會日本代表布許(Noel Fairchild Busch, 1906 – 1985)請求提供臺灣可用於海外流通的報刊名單；施豁德亦同步將這份題為《臺灣出版品調查》(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的報告呈交總部，以作後續評估。⁴⁵

⁴³ 〈雷震致 Robert Blum〉(1959 年 5 月 3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1。

⁴⁴ 來乙，〈一位僑胞理髮師對自由中國的嚮往〉，《自由中國》第 2 卷第 12 期(1950，臺北)，頁 27。

⁴⁵ “The Press in Taiwan,”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n. 2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前揭臺灣省警務處對施氏的跟監報告指出，他於 1953 年 4 至 6 月間常「以記者姿態

在這份報告中，施豁德大致清點了當時臺灣主要幾份報紙、雜誌、通訊社與海外駐臺媒體等四類。據施氏觀察，1950年代初期的臺北期刊，除去技術導向的專業型刊物與近乎八卦小報（semi-sensational）之大眾雜誌，以及其餘由國民黨政府及特定政治團體支持的刊物外，足堪稱作「獨立」發行的雜誌僅剩7本，為總數的十分之一。⁴⁶他認為，若要增加獨立期刊受眾，關鍵在於改善分銷管道（distribution techniques）。由於當時缺乏統一的分銷系統，雜誌的發行多仰賴城市書報攤，或小量郵寄，如此導致「分銷與收款佔了雜誌發行商賴以為生的收入大半」。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限制了刊物的銷售數量，亦使呆帳在所難免。⁴⁷

銷售量的低靡除關乎流通方面的限制，亦與刊物的編印有關。過於高昂卻品質低劣的新聞紙價，以及印刷耗材的固定損失，使刊物成本居高不下。再者，過於空洞、說教的內容與生硬文風，連熟悉漢文的外省人都頗具挑戰，遑論大多僅懂日語的臺灣讀者，進而限縮了讀者群；而有興趣的讀者，亦不一定經濟條件許可。另外，由於該時商業廣告的不風行，使報刊若缺乏政府部門或特定機構的支持，或如教科書一類有明確且固定需求的讀者，經營幾期後便停刊實屬常態。⁴⁸施豁德指出，當時臺灣為數不多的暢銷期刊，往往有賴金主支持以壓低售價，例如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ission to China, MSA）與美新處共同出資的《豐年》，以及馬尼拉美新處製作發行的《今日世界》（Today's World）、香港美新處支持的《四海》畫報（Four Seas）等出版品。⁴⁹施豁德以未獲補助的學術性刊

出現各官私場合」，推測其目的之一可能正是為了完成這份出版品調查工作。

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施氏統計的期刊多帶黨政色彩，或與黨政要員有所聯繫，舉凡《暢流》一類的文藝性刊物便未列出；相較臺北市政府於1953年已登記在案的208家雜誌社數目，施豁德報告書中僅選錄約70本雜誌，差距不小。施氏自承，由於美新處、農復會等此前並未做過相關調查，國民黨政府亦未展開相關統計工作，他與助手要就發行量、財務、設備與審查制度等諸項一一檢視，實不堪負荷，只得暫且打住。與此同時，亦如施豁德指出，彼時期刊若缺乏政府或機構補助，往往經營不長；上述官方登記在案，且實際維持營運之刊物數量尚有待釐清。綜上所述，儘管此份調查並不如其自稱的「全面」，但亦為現存有關戰後初期報刊情形最完整的評估報告，甚具參考價值。“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北市統計資料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本市新聞雜誌登記〉，《臺北市統計要覽》（臺北：氏著，1954），頁154。

⁴⁷ “The Press in Taiwan,”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n. 2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⁴⁸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對此，《自由人》發行人左舜生亦有相似觀察。他於1954年訪臺期間，留意到臺灣「出版界非常不景氣」，認為臺北出版品的貧乏實肇因於紙張過貴、銷路不廣、稿酬太低、訂價過高等四大問題，大抵與施豁德的觀察相去不遠。左舜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左舜生回憶錄》（臺北：秀威資訊，2023），頁192–193。

⁴⁹ 施豁德指出，臺灣當地製作、發行的雜誌特點是發行量小，最多不過5,000至8,000冊。農復會的《豐年》一本僅5角，發行量達38,000份；一本1元的《今日世界》達30,000冊，香港出版且要價4.5元的《四海》畫報亦有6,000冊左右的銷量。按：11,975元對照當時薪資所得，約為人均所得（名目值為2,726元）的4倍。「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k=dgmain>，檢索日期：2023年7月15日；“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物《大陸雜誌》為例，指出這本「嚴肅雜誌」每兩期的支出扣掉廣告收入及由雜誌社資本衍生的利息後，仍要虧損 11,975 元，被迫動用其登記資本支應。⁵⁰

綜觀臺灣報刊的發行狀況，施氏總結：「在臺灣印刷及出版的雜誌，總難達足夠銷量自負盈虧。那些有政府或機構支持的雜誌還勉能支撐，但依賴書報攤、訂戶或廣告維生的，難以為繼則是常態。」⁵¹這也意味著，為避免自由亞協屬意的刊物斷炊，有必要加速對優質刊物的購贈規劃。另一方面，因這項調查展開的時間恰落在總部決議購贈後不久，該報告亦透露施豁德決定呈請自由亞協購贈《大陸雜誌》、《世界新聞》與《自由中國》等三份期刊的線索。

在這份報告中，施氏特別列出共計 24 本其「最感興趣」的本地印製刊物（見表 4-1）首先，他將這些雜誌分成四大類，考量標準除使用語言，更重視刊物的獨立與否，舉凡黨政關係及資金來源等。誠如我在第二章指出，該會嚴守「共謀的局外人」界線，合作對象刻意限縮於非政治性的民間組織，以免無端糾紛。自由亞協確定撥款購贈的期刊，自然皆出自其認定需自籌財源的「獨立或半獨立」的六本中文期刊之列。其中，《大陸雜誌》、《世界新聞》與《自由中國》更被施豁德認為是該類別中，完全沒有來自黨政方面金援的刊物，並特別指明前兩本內容全無涉入當前政治；⁵²至於其餘三本刊物，施豁德則評估有與政府相通的嫌疑。⁵³

表 4-2、臺灣辦事處評估 1950 年代初期「最值得關注」的 24 本期刊

類別	期刊名	讀者群	銷量（聲稱／實際估計） ⁵⁴
中文、 政府掌控	今日大陸	大眾、政治圈、 上層階級	3,000／1,500
	反攻	大眾、智識階級	3,000／2,000
	真理世界	大眾	1,500／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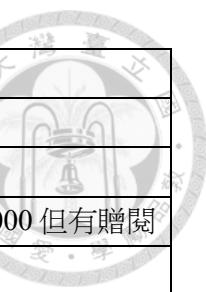
⁵⁰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¹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² 有意思的是，施豁德雖不確定《自由中國》資金來源，但卻認為「不直接來自於任何政府管道」。至於《大陸雜誌》與《世界新聞》兩本，該報告稱前者儘管與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中央研究院有往來密切，但他認為該刊在經濟層面獲得的支援有限；後者則多仰賴其自身與友人的資金周轉。“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³ 關於個別刊物的說明中，施豁德指出杜蘅之發行的《明天》一直與國防部關係匪淺，並曾獲美新處購贈數百份；臺灣省物資局專門委員吳愷玄創辦的《晨光》，則普遍被認為可能獲物資局的支持。而《新聞天地》雖有與蔣經國領導的國防部政治部聯繫緊密的傳聞，但施豁德對此抱持保留態度。“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⁴ 施豁德指出，由於當時臺灣尚未出現有關發行量的統計機構，而官方的數值又多高於實情，且雜誌社間往往因競爭而謊報數值。此處的實際估計值（estimated），係臺灣辦事處經官方數據以外的各項管道綜合評估後作出，亦難保全然準確。“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海外	僑界、大眾	6,000／2,500
	華僑青年	僑界	4,000／2,500
	拾穗	大眾	6,000／5,000
	文藝創作	創作者	4,000／少於 1,000 但有贈閱
	中國經濟	商界、金融圈	2,000／1,000
	財政經濟月刊	商界、金融圈、學生	1,800／1,000
	中國一周	部分大眾、 國民黨人、僑界	國內：1,500／1,000 海外：2,000／1,500
	戰鬥青年	軍隊、學生	3,000／1,000
	當代青年	軍隊、學生	2,000／1,000
	自由青年	學生、軍隊	2,000／700
中文、 非黨部掌控	民主潮	大眾、中國青年黨	1,500／800
	民主中國	大眾、中國民主社會黨	1,500／800
中文、 獨立 或半獨立	自由中國	智識階級	國內：4,000／3,500 海外：3,000／2,500
	大陸雜誌	學者群	國內：1,500／1,000 海外：1,500／800
	世界新聞	大眾	5,000／2,000
	新聞天地	大眾	8,500／5,000
	明天	大眾、軍方	2,000／600
	晨光	創作者	2,500／2,000
英文 或雙語	新生力	大眾、僑界	2,500／少於 1,000 但有贈閱
	英文自由中國 評論	大眾、半智識菁英	1,000／1,000（多為贈閱）
	英文學生週報	學生	9,000／多於 5,000

來源：“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至於一本刊物最終能否獲得自由亞協資助，則更取決於刊物受眾與發展潛力。施豁德高度肯定《自由中國》與《大陸雜誌》，認為其印刷及編輯品質皆屬上乘，因而吸引智識階層爭相閱讀。他認為，前者對於當前國際局勢及歷史發展的觀察頗為獨到，且海外發行量甚大；後者則對各領域的學術研究貢獻卓著，可吸引海外華人知識社群。至於資助銷量遠較《新聞天地》遜色且與其性質相仿的《世界新聞》，則出自鼓勵、嘗試性質 (interesting venture)。施氏強調，該刊是臺灣當時少數真正試圖以「雜誌」型態經營的期刊 (straight magazine publishing)。⁵⁵

⁵⁵ “Survey of Publications in Taiwan,”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換言之，施豁德特意選擇了三類讀者群略有差距且皆與政府保持距離的刊物，嘗試以此強化對華人讀者的反共／非共宣傳，並尤其關心僑界智識菁英對自由理念的接納。除去施豁德對《世界新聞》的支持相當程度應出自其作為記者的個人關懷，臺灣辦事處對《自由中國》與《大陸雜誌》的資助，則全然吻合亞洲基金會的冷戰目標：藉此強化非共資訊的區域流通，提供海外華人更多非共刊物的選擇。他構想透過定期、大量地寄贈這類刊物，取代東南亞氾濫的共產出版品，使「自由世界」讀者群能獲穩定增長，進而帶動海外華人智識階級與學者的反共風氣；再者，透過這群知識份子讀者回頭影響當地僑界意向，強化對「自由中國」的支持。

此項分銷計畫的正式開展，對自由亞協的意義有二：其一，藉小額資助確保「獨立且有價值的新聞工作得以延續」，並刺激獲援助的雜誌社回頭充實刊物內容。其二，藉這幾份刊物打開臺灣出版品大量輸往東南亞的管道。施豁德強調，此計畫應視為東南亞整體圖書分銷計畫的一環，而非目的本身——最終目標是，為自由亞協建立起非共出版品分銷網絡，促成更多臺灣出版品在東南亞流通。⁵⁶換言之，他意圖使此項分銷項目發揮類似美新處出版品之於臺灣社會的影響力——擇定合適的臺灣獨立出版雜誌補貼，進而形成表面上看似亞洲人民內部自發形成的反共傳播。

雖自由亞協總部核可了購贈《自由中國》一事，但並非毫無異議地通過，如任職總部的諾布爾便對這項雜誌分銷計畫頗有微詞。諾布爾認為，臺灣辦事處此舉實為「支持疑似反政府出版品」，並暗示施豁德「反對國民黨政府，正想方設法搞破壞」。對此，施氏一一反駁相關質疑，且懇切地闡釋他支持《自由中國》的理由：

臺灣並沒有「反政府」的出版品。是有一些無黨派人士(independents)與國民黨右翼人士所抱持的強硬守舊路線(strictly orthodox views)略有不同，但同樣的觀點亦常見於許許多支持政府的出版品。我不認為他們溫和傳遞的自由主義主張，可能傷害當前政府。若我曾這麼想，就絕不會考慮予以任何支持。我完全能理解中國政府目前搖搖欲墜的處境，使其有必要實施監控或其他相應的警務措施；但我同時認為，**自由媒體的存續**，可視作政府面對困境仍能成功維繫文化水準的最佳證明。⁵⁷

(二) 亞洲基金會的《自由中國》分銷計畫

⁵⁶ “Taiwan Programs On-Going,”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⁵⁷ “Further Comment on Department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粗體字為筆者註記。

1953年2月以來，自由亞協每月撥付500美元購贈《自由中國》，且以高於市價的每本新臺幣4元之原價購入。⁵⁸儘管如此，扣除製作成本後的利潤仍相當有限。為了填補刊物發行的編輯及行政費用，雷震除疏通各大企業購買廣告，亦積極遊說自由亞協續於來年展延購贈合約、提高補助金額，雷震曾抱怨：「我想請該會將過去購買本刊之款，改為補助，述謀發展，因購誌所獲不多也。」⁵⁹

為博得自由亞協好感，雷震積極彙整海外華人讀者寄來的大量回饋，並請臺灣辦事處職員蔡增瑞定期轉呈施豁德。其用意是向自由亞協揭露《自由中國》在傳播自由、反共理念上的努力及成效，並「純從公的立場」，告知該刊之於「自由中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⁶⁰另外，雷震亦提議將分送地點由原先的日、港等地，移轉到共產刊物充斥，且有眾多華人定居的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⁶¹為敷日後寄贈需求，該刊經理馬之驥更數度赴僑委會索取海外僑社、僑團、僑校等單位資料。⁶²

隨著該刊的海外發行量日增，接連有人建議雷震調整內容深度，使刊物更為淺顯可親，也便於推銷給海外讀者。不過雷震大加反對：「中國在政治上不滿者乃是知識分子……固本刊對象不能不以知識份子為對象。」⁶³後續在與香港代表艾偉論及有關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工作時，雷震重申此一觀點：「對知識份子的宣傳甚重要，一切農工運動，皆知識分子為之，要能把握住知識分子，一切才有辦法。」同時強調，需加強對一般民眾的精神教育，建立自由民主信念，以免輕易遭共產思想動搖。⁶⁴為達成此一目標，雷震愈發強調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強調刊物若「不能批評現實政治，則此刊物必無生命」。⁶⁵雷震不願為提升銷量而妥協刊物深度，堅定傳播自由理念之構想，以圖爭取更多智識菁英讀者的支持。雷震試圖運用智識菁英做冷戰宣傳的手段，恰符合自由亞協的行動構想，該會亦高度肯定《自由中國》在

⁵⁸ 《自由中國》的流通批發價，通常打七五折。雷震著，傅正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臺北：桂冠，1990），頁80–81。

⁵⁹ 〈雷震致胡適〉（1954年9月30日），收錄萬麗鵠編著，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69。

⁶⁰ 〈董時進致胡適〉（1954年2月9日），收錄雷震，傅正主編，《雷震密藏書信選》（臺北，桂冠，1990），頁278；〈雷震致#增瑞〉（1953年6月27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17。近史所檔案館的「雷震、傅正檔」中，雖藏有不少雷震保存的海外讀者索贈及致謝來函，惟較乏有關讀者意見之紀錄。日記方面，值得雷震特地記下一筆的回饋甚少，在自由亞協展開購贈同年僅見一則，是來自同情共黨的海外華僑的抨擊。雷震在1953年7月4日寫道：「印尼退回《自由中國》刊物，上面塗滿許多罵人的話，以為我這刊物是為蔣先生宣傳的，上面所圖者稱蔣總統為蔣光頭，認為我們是美帝的走狗。」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100。

⁶¹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22、51。

⁶² 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頁117。

⁶³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121–122、140。

⁶⁴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26–27。

⁶⁵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147。

言論方面的努力。施豁德與該處職員多次盛讚：「《自由中國》是肯講話的。」同時頻繁將品質不錯的文章翻譯成英文，送交總部做後續運用。⁶⁶

然而，面對雷震一再央浼調高該刊補助額度，自由亞協則始終不允。亞洲行動部部長司徒華曾向董時進表示，購贈的目標是「盡量維持本刊，不是以言發展」，明確回絕雷震希望將該刊自雙週刊轉為週刊，或發行叢書、擴充刊物版面等各項盤算。⁶⁷至於對施豁德代表而言，相較該刊的擴充，更優先的問題乃是建立海外通路等實務問題。縱然他以《自由中國》成效頗著，建議總部隔年續辦此一項目，不過亦承認該刊的分銷渠道始終「不盡如人意」。⁶⁸

為建立一個「涵蓋整個海外華人社群的分銷網絡」，加強非共出版品在各地間的流通，施豁德認為自由亞協與海外華人相關事務，有賴各地代表間的密切合作，並強調香港辦事處至關重要。為使該會分銷工作的效益最大化，他與總部人員咸認，不二選擇是讓包裝成「書店」的香港辦事處，主導該會在亞洲的「出版中心」(publishing center)，臺灣辦事處則適時補充。⁶⁹

推測此處的書店與出版中心，應係指亞洲基金會大力扶持的香港友聯集團(Union Press)。友聯出版社由史誠之、邱然、胡越等人於1950年成立，立場上屬第三勢力。自由亞協對友聯的資助最早始於1952年6月，其後亦於1955年6月將其版圖擴及東南亞。許維賢認為友聯藉此打造出一龐大而嚴密的「跨國出版帝國」，並扮演海外華人社群間的「組織中心」。⁷⁰1957年，中情局評估亞洲基金會資助的組織以友聯表現最為卓越，且是最接近「政治思想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的機構，美國政府亦認為友聯對海外華人的文化宣傳與反顛覆工作甚為有效。⁷¹施豁德之所以積極尋求香港方面的協助，推測應是見到友聯營銷的成功，以及《中國

⁶⁶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141、144–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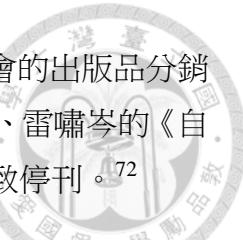
⁶⁷ 〈雷震致王紀五〉(1954年6月15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32；〈雷震致思琦〉(1953年4月7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13。

⁶⁸ “Request for Comment on 1953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n. 2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Ward Smith 致雷震」(1953年4月9日)，〈Josiah W. Bennett (USIS) 致雷震〉，《雷檔》，館藏號：052-01-08-009。

⁶⁹ “Further Comment on Department Plans,” letter from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6,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James L. Stewart,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 11, 1952.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⁷⁰ 傅葆石著，秦雅萌、劉玲燕譯，〈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173期（2019，香港），頁59；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52卷2期（2023，臺北），頁73–75。

⁷¹ “Request for Renewal, FY 1958.” Nov. 19, 1957, DTPILLAR, Vol. 2, 0009.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 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學生周報》在東南亞的銷售已有相當斬獲。不過這不意味亞洲基金會的出版品分銷工作全數委由友聯進行，期間亦斟酌購贈合適刊物，如予以左舜生、雷嘯岑的《自由人》、王道的《人生雜誌》等出版品短期且小額的補助，使其不致停刊。⁷²

隨著臺、港辦事處的聯繫日益頻繁，友聯出版社與自由中國社亦數度在此刊物上互登廣告，往來不可不謂密切。1954年7月，友聯方面進一步經中間人向雷震透露願助印1,000本《自由中國》在東南亞銷售，隨即獲雷震應允。⁷³不過由於目前尚未得見更進一步的資料，友聯社與自由中國社的合作、聯繫實際經過如何，則有待日後進一步爬梳。

圖 4-1、友聯出版品刊載的《自由中國》廣告



友聯核心出版品《中國學生周報》最早於1952年9月刊出《自由中國》廣告，且斷斷續續刊登至1955年初。來源：《中國學生周報》，1954年7月30日，07版，收錄「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s://hklit.lib.cuhk.edu.hk/browse-index/>，檢索日期：2023年12月27日。感謝王梅香老師提醒我留意自由中國社同仁與友聯方面的聯繫。

正因為亞洲基金會分銷工作以香港友聯系統出版品為主力，臺灣辦事處僅被定調為輔助性質。再加上，臺灣事務在中情局內部僅被評為「低優先級」，臺灣辦事處的規模及其可動用的款項隨之受限。⁷⁴補助一事終究不會如雷震預期般增加，1956年起甚至變相縮水——國民黨政府該時通知臺灣辦事處，日後各式贈款須經臺灣銀行換匯，並改以新臺幣直接給付。此前，亞洲基金會的500美元贈款由香港

⁷² 《自由人》就經費問題，前後請求亞洲基金會港、臺辦事處補助，不料僅獲1955年4月至6月共三個月的補助。《人生雜誌》則為錢穆出面向香港辦事處申請，成功後亦遭告知：「此後勿再往。」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347、358；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128；〈悼念蘇明璇兄〉，收錄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新亞遺蹟》（臺北：聯經，1998），頁623。

⁷³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五〕》，頁301。有關

⁷⁴ Ward Smith, "Comment on Plans 1953–4 Taipei,"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辦事處撥付，以折合約 3,900 元港幣交予雷震，令其自行至黑市換回 19,500 元臺幣。若以新制計，亞洲基金會持美元至銀行換匯，僅能得臺幣 12,500 元整，意味《自由中國》每月款項將短缺 7,000 元。雷震為此再次請求該會增加資助額度，以彌補被「政府購去了」的匯差，同時暗示該刊隨時可能因此關門。⁷⁵

相對於亞洲基金會每期皆大手筆支持友聯出版品，卻不願提高《自由中國》補助絲毫，雷震曾向王紀五怨懟道：「可是今日中文刊物，港台二地……內容差得很，只有本刊是以全力為之。……美國人不全用錢，香港用的很多，而他們刊物內容十分貧乏，我們是以全力辦刊物，他們給我們的幫助太少了。」⁷⁶言下之意，無非指摘亞洲基金會過於重視第三勢力，並認《自由中國》的深刻內容肯定更符合且能推進該會冷戰目標。雷震之說透露援助者與受援方的認知差距，以及雙方對於達成反共事業手段的意見分歧。力圖藉友聯打造亞洲出版品「分銷網絡」的亞洲基金會，僅將《自由中國》的購贈工作視為其整體布局的一小環節。至於刊物主事者雷震而言，亞洲基金會的補助金額則關乎自由中國社的生計。亞洲基金會購贈補助金額的落差，無意間觸發受援方之間的競爭意識，並導致受援方愈發積極地遊說並附和美方需要，以爭取更多資金挹注。

第二任臺灣代表饒大衛在知悉《自由中國》經濟情形後，隨即向上呈報，而舊金山總部亦於 1956 年 3 月底指示臺灣辦事處補足該刊匯差。自由中國社獲得的補助略漲至臺幣 18,000 元，較公定匯率多五千餘元。⁷⁷雷震的訴求可謂取得階段性成果。不過查諸該刊於 1956 年與亞洲基金會簽訂的續約，亞洲基金會給付的金額實未調整，仍舊明載每年撥款 6,000 美元或等值的本地貨幣予《自由中國》。⁷⁸由於未見更詳細的文件，該會予《自由中國》購贈數額的增加是自臺灣辦事處的其他名目挪用，或以其他管道換匯，有待進一步確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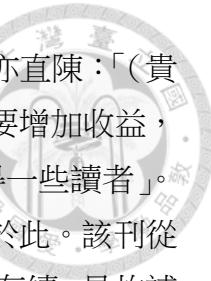
至於雷震多次提議將該刊改辦週刊一事，則未能獲得該會臺灣代表的支持。饒大衛強調：「改為週刊，必然注意新聞性東西，而失去現在之風格。」且恐使該刊

⁷⁵ 〈雷震致王紀五〉(1955 年 3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62；〈雷震致王紀五〉(1955 年 7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68。

⁷⁶ 〈雷震致王紀五〉(1955 年 3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62。相對於雷震的不滿，亞洲基金會方面頗肯定香港第三勢力的工作成果，如香港辦事處秘書蘇明璇於 1955 年 2 月來臺時，曾向雷震透露該會「對香港友聯及張國興之工作甚為滿意」。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26。

⁷⁷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134、212、241。

⁷⁸ 「Letter of Agreement」(1956 年 8 月 30 日)，〈Swisher 致雷震函〉，《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68。



虧損擴大，此案因而擱淺。⁷⁹第三任臺灣代表史麟書（Earl Swisher）亦直陳：「（貴刊）是 Opinion，非 News，改為週刊恐要降低水準。」史氏建議，若要增加收益，不應一味尋求亞洲基金會提高補助，應優先調整該刊程度，以此「多得一些讀者」。⁸⁰儘管亞洲基金會評估《自由中國》內容豐富、言詞懇切，但也僅只於此。該刊從未成為亞洲基金會分銷網絡中的關鍵項目，補助金額終究僅能供該刊存續。是故補齊匯率一事成功了，而改辦週刊卻告吹。

雷震之所以焦急於其刊物補助款的縮減，除關乎其對海外華人宣傳的個人願景，現實局勢的日益窘迫更使其愈感左支右绌。一再上漲的紙價，加上政府取銷配紙制度，印刷成本大幅提升。而保安司令部對刊物的查禁，又進一步增加該刊無謂支出，如光是該刊被沒收的 13 卷 6 期一期虧損便高達二萬餘元。⁸¹另一方面，由於《自由中國》與政府衝突的明朗化，部份企業為免無端捲入麻煩，亦避免購入廣告版面。⁸²各種因素的疊加，導致該刊收益銳減，經濟愈發惡化。

（三）美國新聞處購贈案

為免《自由中國》斷炊，雷震遂主動出版合於美國利益的小冊子，期望以此獲得有關單位購贈。該份題為《美軍生活》的出版品，由任職於駐日美軍營區的辛之魯於《自由中國》上的同名專欄文章集結而成，該專欄自 1954 年底連載至隔年 4 月，共計八篇。⁸³辛之魯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自言撰寫此專欄目的，便是藉描繪美軍在生活、舉止中體現的美國民主精神，以深化臺灣讀者對民主的理解。⁸⁴自由中國社在連載結束同時，隨即公告專刊印單行本的消息。⁸⁵

未待《美軍生活》付梓，雷震已著手聯繫亞洲基金會香港辦事處，以該書「不僅闡釋民主生活，對美國也是一種好的宣傳」為由，請其購入上萬冊轉贈。同時，

⁷⁹ 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6；〈王紀五致雷震〉（1956 年 3 月 20 日），收錄雷震，傅正主編，《雷震密藏書信選》，頁 318。

⁸⁰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8–9。

⁸¹ 該期之所以停刊，導因於王大均一則有關商人孫元錦被警總逼死的通訊。在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人的施壓下，雷震遂以抽出有「問題」的文章後重印，換取有關單位承諾將該文呈報中央、處置涉案人士及日後不再干涉《自由中國》言論等三點要求。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147–148、161。雷震著，傅正主編，《雷案回憶〔二〕》（臺北：桂冠，1989），頁 301–311。

⁸² 〈雷震致王紀五〉（1955 年 7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20-068。

⁸³ 〈美軍生活〉自第 11 卷 11 期，連載至第 12 卷 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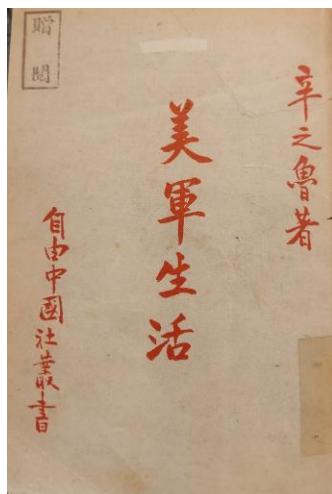
⁸⁴ 辛之魯，〈我是一個人！〉，《自由中國》第 11 卷 11 期（1954，臺北），頁 7。

⁸⁵ 〈給讀者的話〉，《自由中國》第 12 卷 7 期（1955，臺北），頁 32。

積極尋求美國大使館與臺、港美新處支持。⁸⁶然而，雷震的刻意附和卻未收預期效益，美新處以「他們需要反共與讚揚美國制度的書籍，別書不收」為由婉拒，並改以捐贈實物，代以扶持《自由中國》經濟——於 1956 年初送了重 58 磅的 81 令紙張，供該刊自行運用，間接彌補刊物因紙價上漲而導致的虧損。⁸⁷



圖 4-2、《美軍生活》書影



來源：辛之魯，《美軍生活》（臺北：自由中國社，1955）。

後續經雷震積極斡旋，美新處終允就刊物本身與其一談。代理處長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解釋，若要解決《自由中國》面臨的困境，該處可以補助稿費，或令各地美新處來函索閱的購贈形式撥款。雷震回應「以購贈為宜」，可利用《自由中國》制衡海外充斥的共黨刊物。⁸⁸頗值得玩味的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的雷震信函中，恰在雷震與美新處接洽的 1956 年 10 月至 12 月間，出現六封來自印尼、新加坡、南越、香港、印度等地讀者寄予所在地美新處索閱《自由中國》的來函。這些函件的格式與結構大同小異，無非強調共產勢力對東南亞華人的積極攻勢，已矇騙不少民眾與學生，並強調《自由中國》「對打擊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滲透與宣傳大有助益」，最後在信末懇求美新處致贈上百本至千本刊物在當地免費發送等語。⁸⁹查諸雷震檔案，僅見這幾封通信係由讀者直接與購贈機關連繫；過分巧合的時機、高度相似的文句鋪排，不免使人懷疑這幾封信函實為有心操作。

⁸⁶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101–104、161。

⁸⁷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216、232。

⁸⁸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289–290。

⁸⁹ 此六封信函如下：〈印尼華僑致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1956 年 10 月 16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56；〈新加坡華僑中學致 James A. Elliot (USIS)〉（1956 年 10 月 2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58；〈Chou Hsiang-Kuang 致 USIS〉（1956 年 10 月 24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59；〈Robert J. Clarke 致 Chang Sang Chiag〉（1956 年 10 月 30

美國大使館隨即於同年 11 月底購入 2,185 份《自由中國》分贈，而美新處亦於 12 月中與該刊簽定購贈合約，分送海外華人社群。由於該處當月經費用罄，預定於隔月（1957 年 1 月）起補助，後因雷震承諾贈送當期刊物分贈，雙方的合作遂自 1956 年年終展開。⁹⁰據一份未標示日期，但推測應於 1957 年初制定、向亞洲基金會提案的「自由中國週刊」計畫中，附上了該刊的每月收入統計。⁹¹（見表 4-2）其中，美新處每月 9,600 元臺幣的資助，隨即躍升該刊第二大訂閱戶，僅次於亞洲基金會的 17,000 元。⁹²美新處與亞洲基金會兩個美國機構的補助金額，便佔《自由中國》刊物總收入近半，成為支撐該刊營運的關鍵資金。

表 4-3、1957 年《自由中國》月收入統計

項目		金額（臺幣）	比例
訂閱	個人	20,000	34.7%
	亞洲基金會	17,000	29.5%
	美國新聞處	9,600	16.7%
刊物銷售		6,000	10.4%
廣告		4,000	6.9%
周邊出版品銷售		1,000	1.7%
合計		57,600	99.9%

來源：「Project for “Free China Weekly”」，〈Edgar N. Pike 致雷震〉（1960 年 6 月 29 日），《雷震、傅正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52-01-11-12-014。

可想而知的是，統治當局並不樂見雷震與美方人士交好，早在 1955 年初的宣傳會報中，總統蔣介石因聽聞《自由中國》批評讀總統訓詞及文告之必要性，而怒斥雷震漢奸，是美國海軍武官處間諜。⁹³由於與雷震往來的美方人士多為文職或屬政府以外單位，推測蔣指控的「美國海軍武官處」，應係「美國海軍輔助通訊中心」（U.S. Naval Auxiliary Communications Center，NACC）。該中心為中情局於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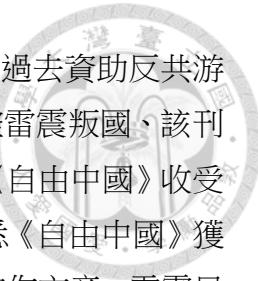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60；〈Dang Vinh Sanh 等致 The Service of Informations of the U. S. A.〉，《雷檔》，館藏號：052-01-11-11-047；〈楊少珍致 USIS〉（1956 年 12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0-062。

⁹⁰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342–344、349。

⁹¹ 雷震正式獲美新處資助係 1957 年 1 月，其後因「劉自然事件」的反美暴動而使補助於同年 6 月 1 日終止。因此，此份統計資料可能的時間，應坐落於 1957 年的前五個月間。

⁹² 「Project for “Free China Weekly”」，〈Edgar N. Pike 致雷震〉（1960 年 6 月 29 日），館藏號：052-01-11-12-014。

⁹³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4–6。雷震聞此說大怒，於 3 月 16 日的日記寫道：「為一國總統而這樣亂說話，我真不瞭解他所說之仁義道德作何解釋也。」前引書，頁 53。



年年初正式在臺北設立的據點，附屬於美國大使館，其工作接替了過去資助反共游擊隊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⁹⁴蔣介石之言，除指控雷震叛國、該刊對政府的批評及其民主的主張實為別有用心地為美宣傳，亦暗諷《自由中國》收受亞洲基金會資金，與美國情報工作關係曖昧。國民黨內高層在獲悉《自由中國》獲美新處資助一事後，再度議論紛紛。為避免獲美新處購贈一事又被作文章，雷震只得在第一時間出面澄清：「我雷某人以人格擔保，未暗中拿美國人的錢，只是購些刊物而已。」⁹⁵黨政人士對《自由中國》收受「美國」補助的憤恨不平，凸顯國民黨政府與美方利益間的矛盾與落差，亦為冷戰中反共與民主兩類理念的難解矛盾——惟國民黨的統治尚仰賴美國的援助與支持，只能暫且容忍該刊異議言論。

好景不常，美新處對《自由中國》的補助，旋即因同年 5 月 24 日爆發的「黑色星期五」反美暴動而告終。該場暴動緣於美軍顧問團士官長雷諾（Robert G. Reynolds，1915 – ?）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劉自然卻獲判無罪，民眾群情激憤下搗毀美國在臺政府單位。⁹⁶事發後，自由中國社員多同感義憤填膺，對從何下筆社論一事，與主導社務的雷震、毛子水等人爭持不下。⁹⁷由於雷震的解釋難以服眾，最終刊出的社論重心仍為「責備美人」，並強硬抨擊「這決不是我們平素想像中民主法治的美國軍事法庭所作出的事」，要求美國尊重「受援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個人自尊心」；對國民黨政府的處置則僅要其盡快「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⁹⁸

該期社論發表後，「國民黨政府工作人甚為滿意」，而雷震亦收到不少友人轉達外國人的悲觀態度：「認為我們〔按：指自由中國社與國民黨〕是一丘之貉」。美國大使館亦隨即對《自由中國》言論做出清楚表態，在該期刊物出刊當日寄予一紙「廢棄購書合同」。《自由中國》成為美新處撤銷的 15 份刊物補助之一。⁹⁹為平息美方

⁹⁴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遠足文化，2021），頁 86 – 87；翁台生，《西方公司的故事：CIA 在臺活動秘辛》（臺北：聯經，1991），頁 167 – 169。有關西方公司之創設目的，藍欽曾在其活動暴露、預計改組前夕與蔣介石總統會談，並指出：該組織的任務「為秘密援助在大陸上之反共游擊部隊及地下工作，後來之參與沿海突擊，實屬偶然。繼而突擊規模逐漸加大，寢至無法秘密進行，而與該公司之原來任務不符。」見「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團長蔡斯等關於支援外島游擊部隊之權責移轉問題等談話紀錄」（1954 年 2 月 12 日），〈軍事—蔣中正與美方將領談話紀錄（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89-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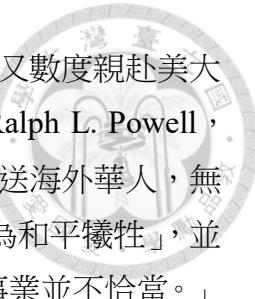
⁹⁵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59。

⁹⁶ 有關「劉自然事件」經過，詳參：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至於國民黨政府內部的反應則可見：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 1950 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收錄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臺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頁 207 – 262。

⁹⁷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101 – 103。

⁹⁸ 〈雷諾判決無罪與臺北騷動事件〉，《自由中國》第 16 卷 11 期（1957，臺北），頁 3 – 4。

⁹⁹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107 – 109。傅正在對雷震日記做的註解



不滿，並恢復該處的購贈補助，雷震除以較和緩的口吻撰文緩頰，又數度親赴美大使館遊說，甚至去信藍欽大使抱屈。然而，美新處處長鮑威爾（Ralph L. Powell, 1917 - ?）僅回覆：由於該處預算縮編，此後將自行編寫刊物、分送海外華人，無暇從事購贈。¹⁰⁰大使館人員則私下向雷震透露，《自由中國》是「為和平犧牲」，並稱：「對於美國政府機構而言，支持已獲其他私營組織資助的文化事業並不恰當。」¹⁰¹該刊與臺北美新處的合作前後僅維繫了五個月便告終。

出於現實經濟考量，亦是為反共宣傳故，《自由中國》對於爭取美國文化冷戰相關機構支持一直頗為用心；甚至為獲得更多冷戰金援，主動附和美國利益。除不定期刊載讚揚美式政治、理念及生活型態的文章，還刻意印製《美軍生活》單行本、轉載亞洲基金會會長卜蘭姆的〈亞洲協會的工作〉一文等。¹⁰²然而，美方對該刊的刻意逢迎不以為意，堅認其資助只為使其不致停刊，以免臺灣的自由言論象徵消失。另一方面，亞洲基金會對《自由中國》作為「自由媒體」的期許，不久卻成為美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齟齬的癥結點。

第三節 亞洲基金會與蔣介石政府的衝突

《自由中國》因第 13 卷第 6 期（1955 年 9 月）評論孫元錦遭謀殺一事而使刊物首度遭沒收以來，雜誌社與蔣介石政府的矛盾愈發尖銳。正如本章之初提及雷震與彭孟緝的對峙，這位自由主義者始終無法與黨政高層就民主與反共優先次序達成共識。爾後又因第 15 卷第 9 期的「祝壽專號」（1956 年 10 月）、第 17 卷第 3 期起的「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1957 年 8 月）、及第 20 卷第 2 期的「陳懷琪事件」（1959 年 1 月）數度與當權集團爭鋒相對。甚至抨擊政府「有些標榜反共的人將反共與民主視為不相容的兩件事」，諷刺彼等「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¹⁰³

指出，其於同期刊物中發表的〈劉自然案帶來的血的教訓〉一文，獲時任政府發言人沈昌煥大加讚賞：「親美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也刊出我這種反美的文章。」見前引書，頁 102。同獲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大陸雜誌》亦收到美新處的停購通知。「報告」（1957 年 7 月 8 日），〈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大陸雜誌社〉，《朱家驛》，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01-01-16-016。

¹⁰⁰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116、118、166。

¹⁰¹ 〈雷震致 Robert Blum〉（1959 年 5 月 3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1。

¹⁰² 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29, No. 1, 1956, pp. 46, 56. 該文由臺灣辦事處職員章雅谷節譯後，刊登於 1956 年 10 月中發刊的《自由中國》。羅勃·布侖姆作，章雅谷節譯，〈亞洲協會的工作〉，《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8 期（1956，臺北），頁 17 – 19。

¹⁰³ 〈我們應當怎樣來反共〉，《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4 期（1956，臺北），頁 3。



為了督促政府盡早建立民主政治，而非淪為個人專斷統治，自由中國社同仁自 1956 年中起決議「要多登批評政府之文章」。¹⁰⁴實際運作上，則由「盡輿論責任」的「諫諍」式監督施政，轉往成立反對黨建立兩黨政治的方向。隨著政府言論管制的緊縮，該刊愈發強化其自由主義色彩，直面回擊政府對個人自由的箝制。據薛化元統計，該刊第 13 卷後（1955 年 7 月至 12 月）論及有關地方自治、地方選舉的文章每卷皆破十篇，並自 15 卷起（1956 年 7 月至 12 月）愈發重視臺灣出現反對黨。¹⁰⁵《自由中國》認為，唯有反對黨的出現，方得改善當前政府的委靡及專橫。期間雷震多次與美國大使館政務參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1921 – 1994）等人交換意見，闡明其行動意圖：「總之我們希望今日政治改革，走上民主政治道路，在軍事反攻目前無望之際先從政治反攻，以民主政府來影響大陸之獨裁政府。」¹⁰⁶

面對《自由中國》要求實質民主的訴求，黨政高層頗不以為然，認該刊言論「對民心士氣影響太大」，恐危害政府的「革命民主」方針。臺灣警備總司令黃杰在雷震案後的一次訓話中直指：「當前匪諜在臺進行的統戰陰謀，適用『和平反共』、『民主改進』、『愛國一家』等口號，以『民主』、『自由』、『愛國』人士的姿態，展開『反政府』活動……《自由中國》半月刊以公開合法的方式，大肆攻擊政府，為匪作統戰宣傳……所謂『以民主毀滅民主』、『以法治毀滅法治』。」¹⁰⁷雙方難以彌合的理念，亦使衝突的白熱化愈發無可迴避。

（一）「祝壽專號」的兩種解讀

隨著《自由中國》的言論欲發批判性，亞洲基金會內部亦出現不同意見。第二任代表饒大衛認為，該刊過於尖銳的發言存在風險，一度警告總部需密切關注，並暗示其內容恐有「賣國」之嫌。¹⁰⁸會長卜蘭姆雖憂心於該會因補助刊物而導致的部必要聯想，但更怕「有價值的出版品因本會協助而關門，無法貢獻於更加健全的智識氛圍（intellectual climate）」，¹⁰⁹暫且擱置對《自由中國》的處置。另一方面，繼

¹⁰⁴ 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六〕》，頁 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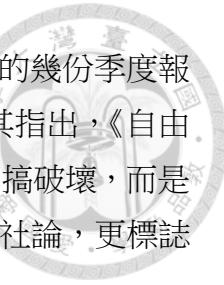
¹⁰⁵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 179 – 184、194 – 216。

¹⁰⁶ 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242。

¹⁰⁷ 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新北：國史館，2003），頁 306。粗體字為筆者註記。同樣的言論亦見於總統蔣介石，如其於同年 11 月 4 日的日記記下：「〔共匪〕今在臺灣乃以民主改革名義，利用《自由中國》半月刊為其心戰盾牌（武器），而隱蔽其（地下）滲透活動，顛倒是非，擾亂人心，希圖實施其動搖反共基地之陰謀，以達到其所謂解放臺灣之目的。」「蔣中正日記 1960 年 11 月 4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臺北市：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頁 34。

¹⁰⁸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二）》（臺北：聯經，2000），頁 90 – 91。

¹⁰⁹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David. Rowe, Feb. 20, 1956.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任的史麟書代表則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他在 1956 年 7 月到任之初的幾份季度報告中，強調《自由中國》是臺灣新聞界健全的言論自由指標。他尤其指出，《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提出的諸項改革建議精闢有力，「既不敵對、亦不搞破壞，而是誠然建設性的」；該期兩萬餘份的銷量，以及廣獲海內外媒體轉載的社論，更標誌華文世界對該刊的普遍支持。¹¹⁰

會長卜蘭姆於 1957 年初收到此份報告後頗感欣慰，認為《自由中國》的驚人銷量、日增的僑生數量意味著「臺灣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重要性」終於獲得認可。同時，他盛讚臺灣辦事處的進展，是該會所有海外行動最令人振奮的一項：

我想指出，亞洲對自由中國努力的認可，更能夠抵制北京的政治宣傳所導致的錯誤印象——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國家重建的捷徑。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縱然臺灣情況至關嚴峻，但其仍能按照傳統的中國方式有所斬獲，這將為亞洲其他地區的穩定提供相當激勵。¹¹¹

「祝壽專號」的廣受歡迎尤其「意義重大」，卜蘭姆認為這意味著臺灣「民眾（尤其是智識菁英）對『依法治國』的要求與日俱增」。著眼於《自由中國》對於亞洲基金會整體工作的潛力與益處，卜氏進一步指示臺灣辦事處重新評估與該刊的合作形式，進而強化該刊的宣傳成效，例如與美新處共同將該刊的購贈轉為營運支持，以增加刊物零售銷量，朝自給自足方向邁進。至於海外分銷工作，則全數委由香港友聯出版社處理。¹¹²

縱然史麟書代表與美新處處長鮑威爾同認，絕佳選項是予以直接補助，但仍憂慮美方的政策轉折淪為有心人士的話柄，或削弱亞洲基金會其他計畫的效度，遂決定暫襲向例購贈。¹¹³兩人的決定係考量到《自由中國》該期的「成功」，業已引來不少「非官方」攻訐，舉凡具黨政軍色彩的《中華日報》、《幼獅月刊》等報刊圍剿，軍方發動「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全面批判，承印的印刷廠亦遭施壓脅迫等。¹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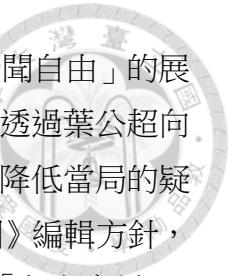
¹¹⁰ Earl Swisher, "The Asia Foundation Quarterly Activities Report, Taipei, Taiwan: October 1–December 31, 1956." Taipei to Department, Feb. 4, 1957. 793.00/2-457, in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5–1959, Part I, Reel 5. (以下簡稱 Confidential Files, 1955–1959, pt. I.)

¹¹¹ "Comment on Quarterly Report,"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Feb. 15,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¹² "Comment on Quarterly Report,"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Feb. 15, 1957.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May 17,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¹³ Earl Swisher, "Report of Asia Foundation, First Quarter, 1957." Taipei to Department, May 21, 1957. 793.00/52157, Confidential Files, 1955–1959, pt. I, Reel 5.

¹¹⁴ 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頁 232 – 255；楊秀菁，〈權衡下的 10 年罪責：雷震案與 1950 年代



史麟書雖將上述圍繞《自由中國》的「爭端」大致視為臺灣「新聞自由」的展現、公共領域中有益的意見交流，¹¹⁵但仍要求雷震節制批評力道，並透過葉公超向蔣介石暗示「西方對任何反言論自由舉措的可能反應」。¹¹⁶另外，為降低當局的疑慮，史氏亦特別向某位黨政要員澄清：亞洲基金會不涉入《自由中國》編輯方針，且「絕不希望該刊『攻擊』政府」。他直言，購贈目的乃是看中該刊的「獨立意見」，且評估將有助於向海外人士宣示：「自由中國」支持新聞自由，能容忍異議批評。該刊的存續關乎國民黨中國之於香港、東南亞等地的威望。¹¹⁷

在擴大購贈《自由中國》計畫之功效，以及恪守亞洲基金會的海外行動方針之間，史麟書步步為營地在國民黨政府與自由中國社之間來回溝通。他希望最有效地調度本地眾多有志於反共的在地協力者之餘，¹¹⁸亦避免節外生枝，深陷東道國內政糾紛。他在寄予總部的信函中，坦言臺灣辦事處面臨的「自由中國兩難」很是棘手：

我們確實陷入了兩難境地：倘若雷震對政府人員攻擊與批評得太過，以至遭官方或非官方手段壓制，將導致我們背負支持顛覆性運動（subversive movement）污名，而自由中國相當重要的言論自由與多元意見亦將就此消失。若我們要求雜誌社緩和言論，或調整日益激化的編輯政策，恐使本會淪為媒體控制者，及反動派、鎮壓措施的擁護者。¹¹⁹

《自由中國》因「祝壽專號」掀起的風波，在國民黨中央委員許孝炎於 1957 年 2 月出面疏導下落幕；雷震承諾放緩《自由中國》言論，避免將矛頭指向總統蔣介石。由於雷震等人允調整編輯作風，史麟書後續僅口頭暗示雷震須節制該刊言論，避免過激，以維持該刊過往一貫的「獨立言論」：「既不鼓勵我們攻擊政府，也不鼓

的言論自由問題》，《國史館館刊》第 40 期（2014，臺北），頁 107–112。有關《自由中國》與印刷廠之間的糾紛，警備總司令黃杰則稱該刊遭拒印，實係雷震等人經常延遲送稿，耽誤廠方時程。而黨部與軍方更多次暗中出面疏導，以免該刊發刊成問題。黃杰著，廖文碩等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1》（臺北：國史館，2022），頁 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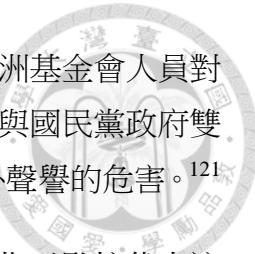
¹¹⁵ Earl Swisher, "Report of Asia Foundation, First Quarter, 1957." Taipei to Department, May 21, 1957.

¹¹⁶ Letter from James Stewart to James Ivy, undated.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¹⁷ "Comments on Quarterly Report, October–December, 1956," letter from Earl Swisher to Robert Blum, Mar. 12,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雷震猜測這位官員應為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委崔書琴。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63。

¹¹⁸ 史麟書曾向總部回報，在臺灣的工作推動十分順遂，獲得不少志願者爭相協助；然而，這也導致在當地的問題成了：該如何盡其所長地制定計畫？他補充：「他們每個人都覺得，必須對於自由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事業有所作為，並深信其自身的專長能做出真切貢獻。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在訂定行得通的工作之餘，避免扼殺他們最純粹的理想與熱忱。」Earl Swisher, "The Asia Foundation Quarterly Activities Report, Taipei, Taiwan: October 1–December 31, 1956." Taipei to Department, 793.00/2-457.

¹¹⁹ "Comments on Quarterly Report, October–December, 1956," letter from Earl Swisher to Robert Blum, Mar. 12, 1957.



勵我們歌頌政府，完全因為《自由中國》是有獨立的言論。」¹²⁰亞洲基金會人員對於該刊的前景大抵樂觀，如該會顧問袁倫仁評估，此後自由中國社與國民黨政府雙方將更明瞭言論自由內涵，權力集團亦將意識到查禁該刊對其海外聲譽的危害。¹²¹

然而，真實處境誠不容樂觀。早在 1955 年 10 月，警務機關便指示監控代表該會來臺與自由中國社洽商的顧問袁倫仁；¹²²總統蔣介石隨後亦以該會長期資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及友聯出版社等反對我政府的刊物」名義，指示推辭會長卜蘭姆訪臺期間的會晤請求。¹²³

（二）「干涉內政」的陰影

不久，《自由中國》又因「今日的問題」專欄挑動當局敏感神經。國民黨政府愈感該刊正「打擊反共復國的民心士氣」、「間接為匪宣傳」，遂著手醞釀相關反制措施。¹²⁴蔣介石在 1958 年初的宣傳會議中，要求宣傳機構加強安撫本省籍民眾情緒，並且修正「出版法」、清理黃色書刊、取締反動刊物及其言論等。其中幾項明顯針對《自由中國》而來，並在不久後獲具體落實，如允許行政機關逕行處分、撤銷出版品的「出版法」於 3 月底起在立院提案，並於 6 月無視民意強行通過；而黨政高層亦於 1958 年 4 月起邀集有關單位組織《自由中國》審查小組，每月兩次地檢視、紀錄該刊問題言論。¹²⁵

1958 年 3 月底，該專欄刊出〈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一文，要求美國須支持民主自由政府，而非「容忍或鼓勵各種各樣的軍人獨裁政權」，並強調美方有必要自經濟援助轉向政治援助，促進受援國的「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司法獨立」。¹²⁶不料隨即引來親政府報刊全方面圍剿，抨擊《自由中國》為「賣國主義者」、「犯了民族自虐狂和亡國欲」、「符合共匪顛覆陰謀」云云。¹²⁷國民黨高層亦抨擊該刊有

¹²⁰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32、77。

¹²¹ “Comments on Taiwan Quarterly Report,” letter from L. Z. Yuan to Mr. Stewart and Mr. James.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²² 「呈復臺灣保安司令部袁倫仁言行案」，〈偵查袁倫仁言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10000A/0044/05711/179/ 0001/002。

¹²³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二）〉，頁 82。

¹²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簽呈」（1958 年 10 月 31 日），收錄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頁 13–19。

¹²⁵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臺北），頁 252–253；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頁 290–294。

¹²⁶ 〈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對美遠東使節的台北會議題幾點坦率建議〉，《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6 期（1958，臺北），頁 3–5。

¹²⁷ 金燕君，〈一次莫名其妙的圍剿戰〉，《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8 期（1958，臺北），頁 31。



意「顛覆政府」，建議中央勒令停刊。該建議雖未獲總統蔣介石允諾，但蔣仍於 1958 年 4 月 3 日的日記中甚為不滿地記下：「反動刊物《自由中國》，美國自由亞洲協會予以扶用金錢津貼，應加禁止。」¹²⁸

至此，提供該刊關鍵財源的亞洲基金會成為黨政高層的眼中釘，該會再無法迴避《自由中國》與統治集團的嫌隙。1958 年初，臺灣代表史麟書多次接獲來自外交部長葉公超、國民党中央委員崔書琴等黨政要員的質疑；外長與《臺灣新生報》社長王民亦接連向美國大使莊萊德 (Everett Drumright, 1906 – 1993)、政務參事歐斯本等人施壓。對此，歐斯本辯稱該刊使海外華人見到「臺灣有言論（自由）的一面，史氏亦解釋該刊使臺灣當局得以宣稱「有 some degree 的自由」。不過史麟書同時補充：「如果政府正式要求停購，他當然可以接受。」¹²⁹

國民黨政府數度試探性地抗議亞洲基金會對「批評政府之刊物」的支持以來，該會處境愈發為難。面對雷震得知「購書費亦可能發生問題」而前來商量時，甫於 1958 年中到任的第四任代表譚維理 (Lawrence G. Thompson, ? – ?, 任期：1958 年 7 月 – 1959 年 5 月)¹³⁰只能無奈地解釋：亞洲基金會並非政治團體，在臺灣終究屬「政府的客人」，隨時有遭趕走的風險，而該會已在印尼有前車之鑑。譚氏強調，縱然同情《自由中國》遭遇，現況已非他能掌控。¹³¹有關續約未果一事，雷震始終

¹²⁸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254 – 255；「蔣中正日記 1958 年 4 月 3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 34。

¹²⁹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235 – 236、249、256；「呈報洽阻美國亞洲協會資助『自由中國半月刊』辦理經過」(1959 年 8 月 6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史麟書的這段發言，隨後亦成為雷震為該刊辯護的談資，直指《自由中國》方便國民黨中國有了得以自稱具言論自由的憑依。雷震，〈重申我們說話的態度〉，《自由中國》第 21 卷第 10 期 (1959, 臺北)，頁 39。

¹³⁰ 譚維理 (Lawrence G. Thompson)，出生於中國山東，父母皆為傳教士。中學畢業後返美求學，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音樂學院。1951 年下旬抵臺，出任美國大使館雇員，並兼任臺大外文系講師，1955 年轉入臺北美新處任職。1956 年間加入亞洲基金會，首先出任該會韓國代表，於 1958 年轉任臺灣代表；同時兼任師範大學音樂系合唱指揮，積極參與臺灣本地音樂活動。1959 年請辭代表職，隨後應邀赴師大任教。其漢名於檔案中亦常作直譯的湯普森或湯氏。〈亞洲基金會駐華代表 譚維理抵台〉，《聯合報》，1958 年 7 月 8 日，03 版；Cho Tong-jae, Park Tae-jin, Edward Reed, *A Partner for Change Six Decades of The Asia Foundation in Korea*. (Seoul: The Asia Foundation, 2017), p.45；〈譚維理昨晚 小提琴獨奏〉，《聯合報》，1959 年 1 月 11 日，05 版；〈亞洲協會駐台代表米勒昨抵達〉，《聯合報》，1959 年 6 月 24 日，03 版；「國立臺灣大學聘函」(1951 年 10 月 11 日)，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檔號：0040/1600400/002/0001/013；「外交官銜名錄」(1953 年 2 月)，〈洽購美國書刊資料及外交官銜名錄等〉，《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50213-0002。

¹³¹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390 – 391。有關印尼政府驅逐亞洲基金會代表處一事，起因係印尼政府於 1956 年聽信親共媒體指控亞洲基金會資助該國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PSI) 相關活動，有顛覆政府之嫌疑；該會先被禁止有關退伍軍人、媒體業、青年福利與勞工教育等四個領域的業務，隨後又於 1958 年 6 月遭要求全面撤出印尼。“The Asia Foundation in Indonesia.” Feb. 21, 1958, DTPILLAR, Vol. 2, 0008.



認為是新任代表從中作梗，於是指示社內「緊縮開支」撐過其任期。¹³²然而，隨此事日益發酵，「『自由中國』兩難」成為亞洲基金會被迫直面的議程，落入只能在推進受援國的民主自由，或者保全非共中國、海外華人工作間擇一的窘境。

正如同雷震焦急地商請與美方關係密切的胡適、吳魯芹等各方人士，出面遊說務使該刊補助得以持續，¹³³亞洲基金會更是小心翼翼地嘗試由這場成形中的政治風暴中脫身。會長卜蘭姆在獲悉該會臺灣業務可能因《自由中國》出問題後，便刻意致函新任駐美大使葉公超，解釋該會的補助全是「在國民黨政府知情且非正式諒解下展開」。¹³⁴此番說詞當然不為國民黨政府接受。新聞局長沈錡表示，該局此前從未獲悉有關資訊，指控《自由中國》「反攻無望論」與「主張美國干涉中華民國內政」二文引發民間極大不滿，有破壞政府信譽、挑撥離間之嫌。¹³⁵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亦偕同第六組共同函覆：亞洲基金會做為半官方文化組織，卻支持主張「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自由中國》，委實「干涉我之新聞自由，破壞我報刊之獨立言論，亦即妨害中美之友誼」。¹³⁶隨後，時任外交部次長沈昌煥要求葉公超向會長卜蘭姆與美國國務院表達不滿，直言亞洲基金會此項津貼恐將對該會活動或中美邦交造成不利影響；¹³⁷外長黃少谷更十分直白地在葉氏的回函上批示：「請大使切實向美方交涉，停止亞洲協會對該刊之補助」。¹³⁸

總統蔣介石旋即於 1959 年年 1 月的宣傳會報上，公開指示駐美大使葉公超儘速與亞洲基金會交涉解約事宜；強調該刊「思想毒素尤不能任其蔓延」，要求有關單位伺機取締。¹³⁹該時政府對《自由中國》的全方面壓制大抵成形，警備總部成立「田雨專案」蒐集自由中國社涉嫌叛亂事由，外交部亦正式干預亞洲基金會補助，雙管齊下地斷絕該刊在社會上與經濟上的支持。然而，由於此案背後牽連美國政府、

¹³² 傅正著，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 119。

¹³³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七〕》，頁 391。

¹³⁴ 「Robert Blum 致葉公超函」（1958 年 10 月 2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³⁵ 「行政院新聞局致沈昌煥代部長函」（1958 年 11 月 11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³⁶ 「馬星野致沈昌煥箋」（1958 年 12 月 3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³⁷ 「沈昌煥電葉公超」（1958 年 12 月 10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³⁸ 「葉公超致黃少谷函」（1959 年 1 月 21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³⁹ 黃杰著，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1》，頁 153–154。



香港第三勢力，為免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國民黨中常委陶希聖要求有關單位須謹慎以法律論之，避免轉為政治問題，而使有心人士「藉口對政府作政治鬥爭」。¹⁴⁰

前揭有關單位對《自由中國》不妥言論的逐條彙整於此時派上用場，提供國民黨政府向美方說明該刊持論失當、內容乖張的具體佐證。外交部總結該刊言論，指出《自由中國》有誹謗元首、挑撥人民反抗政府、匪共利用該刊文字進行分化中美友誼之陰謀等四大問題，強調此與亞洲基金會原先補助《自由中國》以加強反共力量的初衷背道而馳。¹⁴¹同時進一步指出，該刊批評政府言論，恐將導致海外華僑對政府產生疑慮甚至反感，並為中共宣傳素材所用，或使外國人士以為國民黨政府獨裁且是警察國家等後果。¹⁴²外交部更彙整其中最有疑慮的十則社論、短評摘譯成英文，寄予亞洲基金會總部。¹⁴³（見表 4-3）

表 四-1、外交部列出之《自由中國》問題文章篇目

篇名	期數	問題
反攻大陸問題	17 卷 3 期	
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	17 卷 5 期	
中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	18 卷 6 期	
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	18 卷 3 期	挑撥人民反抗政府：散佈失敗悲觀之言論期激起人民對政府之不滿
政治的神經衰弱症	18 卷 12 期	挑撥人民反抗政府：公開詆毀政府做偽敷衍
你要不要做人？	19 卷 11 期	挑撥人民反抗政府：誣衊政府摧殘人權、鼓動人民反抗政府

¹⁴⁰ 「陶希聖籲外交部」（1959 年 8 月 24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蔣介石同樣忌憚此事捲動更大政治問題，遂於雷震被捕當日記下：「重審文告稿，以幹部認為雷案為法律，而不涉政治問題，無須由余發表文告，故暫作罷。」

「蔣中正日記 1960 年 9 月 3 日、4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 366。

¹⁴¹ 「關於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事說帖」，〈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⁴² 「Memorandum for the Minister in His Talk with Dr. Laurence Thompson of Asia Foundation」（1959 年 5 月 28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⁴³ 「簽呈」（1958 年 5 月 25 日）、「Patrick Pichi Sun 致 Robert Blum 函」（1959 年 3 月 30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伍藻池闖下「言禍」	19 卷 12 期	誹謗元首：以毛匪澤東影射 蔣總統。
取消一黨專政！——從黨有、黨治、黨 享走向民有、民治、民享的大道	20 卷 2 期	
「奉命不上訴」案為何「不予起訴」？	20 卷 2 期	
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	20 卷 2 期	誹謗元首：咒罵蔣總統

來源：「Patrick Pichi Sun 致 Robert Blum 函」（1959 年 3 月 30 日）、「關於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事說帖」，〈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期間，亞洲基金會總部人員數度就此事與外交部高層磋商。會長卜蘭姆雖認上述反對意見對民主國家「亦屬有益」，但仍懇切地澄清：該會「絕無違逆我政府意願」，並且正努力設法擺脫《自由中國》，以使此事「不致再損及我政府」。¹⁴⁴接替譚維理職務的新任代表梅瑞強（Richard J. Miller），亦於 1959 年 6 月 25 日拜會外交部次長周書楷，商討《自由中國》問題。梅氏說詞大抵延續總部方面解釋，強調「絕非故意支持一反對中國政府之刊物」，惟該會與自由中國社的合約早在第三任代表史麟書任內簽訂，難以斷然中止。不過梅氏亦當場允諾「亞洲協會今後之活動將着重於文化教育工作，而避免涉及政治部分」；¹⁴⁵反覆向國民黨中央保證，對《自由中國》與雷震將「絕不予以政治支持」。¹⁴⁶

自由中國社與前任代表史麟書於 1958 年 6 月簽訂的合約，與過往最大的不同，係此前合約皆為一年期，屆財政年度期滿需再行續約；新版合約卻是三年期，自 1958 年 6 月迄 1961 年 5 月。同時又在正文第二款的最後補上一句：「協議雙方同意，從 1959 年 7 月開始，上述補助款將減少三分之一，隨後再減少三分之一，直至撥款逐步終止。（until a total phase-out is effective）」這也意味著，1959 年 6 月後，補助款將自過往的每年 6,000 美元縮減至 4,000 美元，每月將減少至少 160 元

¹⁴⁴ 「Note on Ambassador Yeh’s Conversation with Dr. Robert Blum of Asia Foundation Concerning “Free China”」（1959 年 4 月 3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⁴⁵ 「周次長接見美國亞洲協會駐臺代表米勒（Richard J. Miller）之談話記錄」（1959 年 6 月 25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為了展現亞洲基金會對於文化教育的重視，梅瑞強特別向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表示，該刊已開始對《科學教育》的補助。「Richard J. Miller 致朱新民」（1959 年 8 月 20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⁴⁶ 「陶希聖籲外交部」（1959 年 8 月 24 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美金。之所以特別訂定此一合約，推測可能出自同情該會的史氏刻意安排，利用合約保護該刊的補助款項免於因當地政府的施壓而驟然停止。

但就作為受援方的雷震看來，這無非是亞洲基金會對《自由中國》的背棄。雷震自言，他在未獲得任何人員提示，且其自身亦未察覺便逕自簽下；待其準備簽定下一年度的補助合約時才被告知其中蹊蹺。不過由於雷震業已於合約上簽名，誠然等同對亞洲基金會中止補助的附議。¹⁴⁷為了力挽狂瀾，雷震一再致函該會卜蘭姆會長與梅瑞強代表，期盼使該會的決議能有轉圜，以免使雜誌面臨斷炊。雷震指出，該刊印刷、紙質與內文皆屬一流，幾乎可謂美國資助的出版品中最優質的成果；並且一再強調，由於當前臺灣的消費力低下，民間刊物要自營生計更為困難，亞洲基金會資助與否「關乎雜誌存亡」：¹⁴⁸

我們堅信，美國正以民主與自由的高尚理想統領反共事業。我們也相信，惟有透過民主與自由，我們的反共努力才有可能獲得切實的成果。我們不禁猜測，如果沒有《自由中國》在此地談論民主與自由無可取代的價值，並說服政府別做出任何違背民主與法治原則的舉動，現今臺灣將淪為何種境地。我們認為，我們的美國朋友可能同我們一樣對此地的整體處境感到憂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希望《自由中國》能繼續得到山姆大叔的大力襄助，因為他珍視民主與自由的崇高理想，並以此作為打擊共產黨的得力武器。¹⁴⁹

面對雷震對於展延合約的一再懇求，梅瑞強代表委婉解釋該會在臺灣的處境為難，而且由於刊物對政府的批評遠多過讚許，亞洲基金會很難支持這麼一份政治色彩濃厚的刊物。不過梅氏亦給出解方，強調若雷震調整編輯政策、收斂言論，提出可行的營運改善方案，該會可能續予財政支持；¹⁵⁰並補充亞洲基金會「支持刊物，

¹⁴⁷ 〈雷震致 Robert Blum〉(1959 年 5 月 3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1；「Letter of Agreement」，〈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⁴⁸ 〈雷震致 Robert Blum〉(1959 年 5 月 31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1；〈雷震致 Richard J. Miller〉(1959 年 8 月 24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2。

¹⁴⁹ 〈雷震致 Richard J. Miller〉(1959 年 8 月 24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102。此信係由夏道平草擬，陳石孚譯成英文，並由聶華苓繕打。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八〕》(臺北：桂冠，1990)，頁 148–149。

¹⁵⁰ 〈Richard J. Miller 致雷震〉(1959 年 8 月 20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012；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八〕》，頁 133–134。



總是失敗的，他們不能長期援助一件事情」。雷震甚感不滿美國利用「做買賣」的心態支持刊物、從事反共工作，諷該會「經不起極權政府之壓迫」。¹⁵¹

迫於當地政府的壓力，亞洲基金會被迫自前開第三任代表史麟書提及的「兩難境地」中做出選擇。為免該會在臺灣的工作受阻，終究因現實考量，決定割捨過於理想主義的《自由中國》，成為「反動鎮壓措施的擁護者」，以此換取獨裁政府的默許與支持。

(三) 香港友聯出版社問題

繼《自由中國》補助爭議之後，亞洲基金會隨即在幾個月後又因香港代表處的工作，惹得國民黨政府不快。起因是左舜生、張君勸、胡越與燕歸來等七十餘位在港第三勢力與友聯集團人士，不滿總統蔣介石三連任及修憲問題，遂於 1960 年 2 月連名投書報刊〈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在該篇聲明中，左舜生等人嚴詞告誡國民黨內「有力集團」不可悖於憲法，警告恐導致「嚴守憲政民主的反共人士即無他途可循，只有與在臺的國民黨完全分裂。……將是反共力量的分而為二」。¹⁵²《自由中國》隨後於 3 月初全文轉載「反連任宣言」，並撰文聲援，要求國民黨當局「不要再玩政治魔術」。¹⁵³

國民黨主責海外黨務與情報工作的海外對匪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自 1956 年底成立以來一直關注友聯集團與左舜生等人動態。如曾於 1957 年要求有關單位注意友聯往東南亞發展事宜，摸清該社與黨部的「敵友界線」。隨後因認該社趨向第三勢力，而要求有關單位密切注意是否有共黨滲入；並指示嚴加防範香港友聯、左舜生等人與臺灣的《自由中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等勢力「因一時利害相投而結合」。¹⁵⁴該宣言發表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隨即函示外交部防範：《自由中

¹⁵¹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日記：第一個十年〔八〕》，頁 171。

¹⁵² 「中央通訊社參考消息：合眾國際社發表所謂七十人宣言」（1960 年 2 月 18 日）、「中央通訊社參考消息：所謂『聯名反連任宣言』實係由『友聯社』份子策動」（1960 年 2 月 16 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

¹⁵³ 〈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自由中國》第 22 卷第 5 期（1960，臺北），頁 6；〈不要再玩政治魔術！——告國民黨當局〉，《自由中國》第 22 卷第 5 期（1960，臺北），頁 3。

¹⁵⁴ 「海外對匪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57 年 3 月 30 日），〈周海通記錄對匪鬥爭〉，《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4/818.11/0005；「海外對匪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紀錄」（1957 年 10 月 4 日）、「海外對匪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紀錄」（1957 年 11 月 22 日），〈周海通宣傳資料〉，《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6/818.12/0027；「海外重要匪情僑情簡報」（1958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2 日），〈周海通記錄對匪鬥爭〉，《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6/818.11/0010；「港台分歧份子反黨反政府活動現況」（1958 年 9 月 26 日），〈海外對匪鬥爭指導委員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7/816.9/7。「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為保密故，與各海外支部、黨政機關連繫多以化名，先後採用周海通、李海興、



國》與友聯社關聯刊物經常「相互勾結以反抗政府」，且雙方皆獲亞洲基金會支持。國家安全局亦警告，當前地方自治研究會、友聯與雷震三者已然結合，組織活動日漸加強，積極破壞蔣連任，成為當前政治暗流。¹⁵⁵

期間，國民黨資助的《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一度嘗試攏絡該時香港第三勢力代表左舜生；不意左氏回覆，友聯與臺灣當局同獲美國支持，惟政治主張有所出入，強調友聯的活動是在美國同意下展開。¹⁵⁶誠如《自由中國》經常為文暗示該刊得「美國朋友予以支持」，¹⁵⁷友聯方面亦藉「美援」資助作為言論保護傘。外交部為此數度約見美國大使館副館長葉格爾（Joseph A. Yager, 1916 – 2007），商討友聯的「反國民黨」攻勢。除質疑雜誌有關連任、毀憲言論，外交部更指控友聯出版社嘗試推動「海外中華運動」，有「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之企圖」，要求美方糾正友聯的胡作妄為。對此，葉格爾辯稱香港情形複雜，「經常有人假借名義行騙」，斷言友聯聲稱得到美國授意「純屬捏造」，並強調美方對友聯的反連任宣言一無所悉。¹⁵⁸葉氏同時轉達，亞洲基金會對友聯的資助純供匪情研究，不涉政治活動，力陳該會「決不願從事反對中華民國政府之活動」。有關外長黃少谷暗諷該會對《自由中國》與友聯的資助「即與本身所標榜者迥異」、「仍謂其非政府組織乎！」等質疑，葉氏則稱臺灣代表梅瑞強已深切反省，並承認錯誤，正設法補救中。¹⁵⁹

蔣介石總統聞悉此事，在日記中怒斥友聯實為「共匪與美共所操縱之組織」。¹⁶⁰隨後批示外交部，美方既予以支持便須為其言論負責，認為「美政府透過亞洲基金會扶植友聯社，事實證明該社在破壞中美關係，根本上在破壞我政府」，要求設

唐海澄等名稱。「周海通致黃少谷」（1959年1月15日），〈海外對匪鬥爭指導委員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7/816.9/0008。

¹⁵⁵ 「陳建中致黃少谷函」（1960年2月15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黃杰著，廖文碩等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2》，頁603–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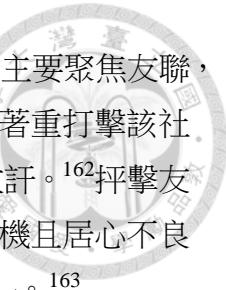
¹⁵⁶ 「抄許孝炎同志致陳主任建中函」（1960年2月15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

¹⁵⁷ 「陶希聖箋外交部」（1959年8月24日），〈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¹⁵⁸ 「葉格爾參事訪問周次長談話紀錄」（1960年2月12日）、「外交部周次長為友聯事再度約見美國大使館副館長葉格爾參事訪問談話紀錄」（1960年2月18日），〈美亞洲基金會利用美援支助香港友聯社反我活動〉，《總統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9/3110604/0262。

¹⁵⁹ 「外交部黃部長接見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葉格爾參事之談話紀錄之第三部分」（1960年3月19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香港祖國周刊審查情形報告表」（1960年4月8日），〈香港友聯社動態及相關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87。

¹⁶⁰ 「蔣中正日記 1960 年 2 月 20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 293。



法嚴正駁斥。¹⁶¹為免波及美方而成政治問題，國民黨政府後續的對策主要聚焦友聯，除釐清美國在港、臺二地如何運用友聯這類與國民黨不合的組織，更著重打擊該社核心人士的劣跡行徑，運用香港親國民黨報刊製造輿論對其指摘、攻訐。¹⁶²抨擊友聯與《自由中國》的主張之外，更直指亞洲基金會的善意「不幸被投機且居心不良的中國人士利用」，暗示「美國有支持境外勢力干預國民黨政府之嫌」。¹⁶³

顧慮國民黨政府的不滿，亞洲基金會方面首由臺灣代表梅瑞強於 3 月初致函亞洲基金會駐港代表，告知友聯事之於國民黨政府的嚴重性，建議香港辦事處做出回應。¹⁶⁴會長卜蘭姆亦於同月 16 日去信梅氏，闡明該會對友聯的支持實係出於該社對海外華人反共宣傳的效力，且亞洲基金會的補助僅限於教育及文化活動方面。同時，再次聲明該會立場中立，「且對任何國家之內政問題亦極力避免受到牽連」。¹⁶⁵美國大使館評估，此封信件一定程度紓解了國民黨政府對美方的猜疑——美國政府正在耍兩面手法 (double game)，藉亞洲基金會與香港友聯建立起聯繫。不過大使館亦承認，若該會持續資助友聯，此狀況只會一再重演。¹⁶⁶國民黨方面觀察到，亞洲基金會隨後小心翼翼地削減了對友聯的補助，此舉導致友聯的內部改組，並於 1961 年起由該會直接派員駐社指揮監督。¹⁶⁷不過，許維賢指出，亞洲基金會補助金的縮減，實應關乎對友聯在馬來亞活動的違規，與國民黨政府並無直接關聯。¹⁶⁸

至於同樣刊出宣言的《自由中國》，警備總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雖認構成內亂罪，但因此前決議待選舉後「掀起反雷高潮，予以打擊」，是故只能暫緩行動。¹⁶⁹

¹⁶¹ 「外交部呈蔣介石簽呈」(1960 年 4 月 7 日)，〈美亞洲基金會利用美援支助香港友聯社反我活動〉，《總統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9/3110604/0262。

¹⁶² 「李海興要案進行通知單」(1960 年 4 月 6 日)，〈香港友聯社動態及相關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87；「唐縱陶希聖陳建中等簽陳誠國民大會前夕海內外政治情況分析與建議」(1960 年 2 月 17 日)，〈石叟叢書資料彙編（四）〉，《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10-00005-008。

¹⁶³ “Transmittal of Articles Criticizing Asia Foundation Support of the Union Press (Hong Kong) and Free China (Taipei).” Taipei to Department, Apr. 6, 1960. 795.00/4-866, in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1960–January 1963, Internal affairs, Reel 1. (簡稱 Confidential Files, 1960–1963)

¹⁶⁴ 「黃少谷致張羣、陳雪屏、唐縱函」(1960 年 3 月 1 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

¹⁶⁵ 「Robert Blum 致 Richard J. Miller 函」(1960 年 3 月 16 日)、「亞洲基金會會長致該會在臺代表函譯文」(1960 年 3 月 16 日)，〈香港友聯社動態及相關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87。

¹⁶⁶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 Foundation and Union Press.” Taipei to Department, Mar. 25, 1960. 793.00/3-2560, Confidential Files, 1960–1963, Reel 1.

¹⁶⁷ 「陳建中致黃少谷函」(1960 年 5 月 13 日)、「唐海澄會議」(1963 年 10 月 25 日)，〈香港友聯社動態及相關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87。

¹⁶⁸ 國民黨檔案中提到的亞洲基金會駐員，應為該會華籍顧問袁倫仁。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52 卷 2 期，頁 83–86、100。

¹⁶⁹ 黃杰著，廖文碩等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2》，頁 657；黃杰著，廖文碩、陳祖安、



後續隨著蔣介石續任總統、地方自治選舉落幕，國民黨中常會終於在 7 月 14 日正式決議處置「《自由中國》半月刊問題」，蔣介石反省若不盡速處理，「臺民與政府惡劣關係……將噬臍莫及，不能不作最後決心矣」。¹⁷⁰啟人疑竇的是，亞洲基金會臺灣代理代表白安楷（Edgar N. Pike，1922 – 1980，任期：1960 年 6 月 – 1965 年 2 月）¹⁷¹恰也在兩週前的 6 月 29 日致信雷震，一反撥款向例地告知：該會近日將一次結清第三年度（即 1960 年 7 月 1 日至 1961 年 6 月 30 日間）的補助款項；待收到亞洲基金會「新臺幣 8 萬元，相當於 2000 美元的未付款項」後，也宣告雙方長達九年合作關係正式中止：¹⁷²

根據我們雙方的協議，一切責任由我們承擔。然而，本會與貴刊的關聯業已引發不少猜想，揣測我們支持其間諸多主張。由於本會為非政治性組織，繼續與貴社合作將違反我們不參與任何政治事務的政策。¹⁷³

小結

美國中情局在年度評估報告中指出，亞洲基金會在 1960 年財政年度最大的麻煩正是來自臺灣當局：蔣介石政府基於對政權延續的緊張情緒與些許間接證據，胡亂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¹⁷⁴1960 年 9 月 4 日，雷震與自由中國社經理馬之驥、編輯傅正、劉子英等四人隨即被以「涉嫌叛亂」的名義，遭警備總部逮捕，而《自由中國》亦遭查禁。

雷震案爆發以來，美國的作為讓雷震等自由主義者大感失望。陳翠蓮指出，美國雖要求國民黨政府妥善處理省籍問題以免該案延燒而出亂子，終究仍基於現實政治與區域安定的需要，拒絕過度插手雷震案與反對黨的民主訴求。¹⁷⁵美國政府對獨裁政府內政需要的權宜性妥協，同樣展現在亞洲基金會的工作盤算。為了延續臺

¹⁷⁰ 李仕寧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3》（臺北：國史館，2022），頁 52 – 53。

¹⁷¹ 黃杰著，廖文碩等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3》，頁 323；「蔣中正日記 1960 年 7 月 23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頁 293。

¹⁷² 白安楷（Edgar N. Pike），戰前任職於《紐約先驅論壇報》，後來赴巴黎協助馬歇爾計畫。1956 年起加入亞洲基金會，並於舊金山總部轉派越南、臺灣與香港等地。於 1960 年 9 月擔任該會臺灣代理人，離臺時間未悉。1970 年起投入密克羅尼西亞和平隊，隨後加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 1976 年起服務於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中東部門。“Edgar Pike, AID Official in Mideast,” Aug. 31, 1980.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reurl.cc/x9R0j1>, accessed Jul. 6, 2022.

¹⁷³ 〈Edgar N. Pike 致雷震〉（1960 年 6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014。

¹⁷⁴ 〈Edgar N. Pike 致雷震〉（1960 年 6 月 29 日），《雷檔》，館藏號：052-01-11-12-014。

¹⁷⁵ “Request for Project Renewal.” Oct. 25, 1960, DTPILLAR, Vol. 3, 0033.

¹⁷⁶ 陳翠蓮，〈地方選舉省籍關係與反對黨：美國政府對 1950、1960 年代台灣選舉的看法〉，收錄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林映汝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71 – 102。



灣工作，並支應美國政府在東亞的整體海外華人計畫，最終只能犧牲與其理念高度重疊的雷震等人。此一抉擇正說明了冷戰中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矛盾與弔詭——反共優先，自由與民主只是餘裕下的附加產物。

事實上，亞洲基金會自 1953 年 2 月起資助《自由中國》，始終並非以臺灣為思考主體，而是有著與僑教相仿的盤算：將目標瞄準廣大海外華人社群。亞洲基金會試圖以此提供海外華人更多非共書刊的選擇，進而構建出綿密的書刊分銷網絡，傳播反共／非共思想，強化海外華人對「自由中國」的認同，並在其心中打造出非共且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靈基礎建設」。之所以選擇購贈此份親國民黨的刊物，除是對刊物品質的肯定，更相中《自由中國》及其享譽海內外發行人胡適之於海外華人智識分子的吸引力。誠如礪山麻衣有關日本辦事處的案例，揭示亞洲基金會為遏阻左翼學生勢力的擴張，主動於 1960 年代於委請矢內原忠雄出面規勸、抗衡，背後考量便是出自對其威望的重視，企圖利用備受尊崇的社會賢達影響輿論。¹⁷⁶

縱然《自由中國》是亞洲基金會 1950 年代在臺灣最重要的分銷項目，但若放諸整個亞洲、華文世界出版品流通計畫，則顯得微不足道。鑑於臺灣的出版環境與政治現實過於惡劣，該會分銷計畫主要仰賴友聯出版社在香港、星馬與泰國等地的出版、營銷網絡，聯繫起廣大的非共海外華人讀者社群，一步步打造出沈雙所謂「資訊帝國」(Empire of Information)。¹⁷⁷再者，由於《自由中國》的銷量始終未見明顯突破，使其缺乏如友聯般的議價能力。職是之故，該會雖肯定《自由中國》的成果且不干涉經營與言論，對促進雜誌發展一事總意興闌珊。該會定期定額補助的目標僅是勉力維持不致停刊——唯一的例外是「祝壽專號」的暢銷，《自由中國》看似有望自力更生而非全盤仰賴補助，亦導致該會首度重新評估調整補助的可能性。

也正是該期專號在 1956 年下旬的出版，進一步加深雷震等人與政府當局的嫌隙。隨蔣介石政府在 1950 年代下半日益專權以來，雷震等人與國民黨政府的衝突愈發頻繁。《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嚴詞批判，雖獲不少海外非共中國人士支持，亦使部分外國人士如曾於 1958 年至 1962 年間擔任臺北美新處處長的麥卡錫 (Richard M. McCarthy, 1919 – 2008)，誤將該刊歸類為「臺灣的第三勢力自由派刊物」(Third Force liberal publication in Taiwan)。¹⁷⁸

¹⁷⁶ Mai Isoyama, “The Asia Foundation’s Cold War Influence on Tadao Yanaihara’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Japa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31, 2020, pp.201–221.

¹⁷⁷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7, pp. 589–610.

¹⁷⁸ Jack O’Brie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M. McCarthy.” Dec. 28, 1988.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1958 年春天，《自由中國》終於因主張美國干預臺灣政治而踰越蔣介石政府的紅線。有關單位將矛頭指向提供關鍵金援的亞洲基金會，屢屢施壓撤資，並暗示否則恐將影響「中美關係」，以及該會日後在臺灣的活動。美國政府為避免《自由中國》耽擱其冷戰議程，態度亦由 1950 年代上半要求以美援脅迫國民黨政府保障個人自由，而轉趨妥協。亞洲基金會被迫向獨裁政府輸誠，澄清其絕無支持違逆意圖，此番態度延續至日後有關香港友聯問題上。此亦導致該會於 1960 年代的工作大幅轉向支持非政治性的教育、學術、文化活動，同時強調避免參與出版工作，以免再次無端捲入因編輯團隊的政治主張所引發的風波。¹⁷⁹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memory.loc.gov/service/mss/mfdip/2004/2004mcc04/2004mcc04.pdf>, accessed Aug. 25, 2023.

¹⁷⁹ L. Z. Yuan, "Semi Annual Report (February 1, 1962–July 31, 1962)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51。



第五章 餘論

1961年底，亞洲基金會逐步退出僑教計畫之際，臺灣代表白安楷決議另外撥付兩年期20,000美元款項（折合臺幣800,000元）供臺大擴充教育資源，共同展開該會籌畫已久的——「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計畫」（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Project，即今日臺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白氏在回覆錢思亮校長的信函中透露了對此計畫的高度興趣：「我認為利用此中心來引導學生參與健康且有益的課外活動，將使大學的整體計劃更為有效，並為其使用者提供指導及娛樂。」¹該計畫由臺大、農復會與亞洲基金會三方共同出資興建，亞洲基金會的經費主要用於建築的樓地板、家具與各式設備，以及提供活動中心負責人赴美參訪的費用。²臺灣辦事處認為臺大學生活動中心的需求反映了臺灣對於引導青年菁英的迫切需求，並將其視為該會在臺灣青年領域的第一個重要項目。³

事實上，誠如第三章提及，出自對於亞洲青年領袖的高度興趣，該會首任代表施豁德早在1953年即提議在臺大或周遭興建學生活動中心，提供學生課外休閒活動與社交生活。⁴然而，此前遭總部駁回的提案卻在8年後出現轉圜，背後關係美國整體外交政策的轉向。因應美國對海外華人政策工作重心的轉移，美國大使莊萊德於1959年向國務院建議，將僑生教育計畫放回臺灣總體教育計畫中考量，同時指示大使館人員針對臺灣教育現況撰寫一份評估報告作將來行動參考。⁵

在大使館首席秘書皮斯利（Alexander L. Peaslee，1923–1996）這份長達19頁的報告中，懇切地指出了臺灣教學現場與研究場域所面臨的困境。首先，他認為臺灣的教育政策缺乏面向未來的規劃，導致教育與文化領域長期缺乏活力：由於臺灣家長對於好學校的迷思，學校資源與教材的缺乏、教學方法僅沿襲中國傳統那套，以及對於學生紀律的高度要求，使本地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及主動性——終究只是向社會送來一批又一批沮喪且訓練不足的青年，且「更習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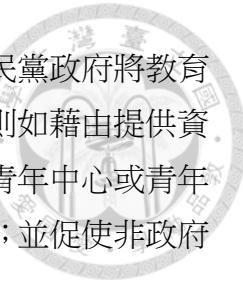
¹ 〈Edgar N. Pike 致錢思亮〉（1961年12月27日），《錢思亮》，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03-01-18-02-254。

²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tudent Center Project.”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188。

³ “Budget Presentation 1962/63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undated. “Republic of China 1963/64 Budget Presentation,” undated.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178

⁴ “Student Associations in Taiwan,” Ward D. Smith to the President, Jul. 30, 1953. Taiwan Files, Box No. P-54, AFR.

⁵ Everett F. Drumright, “Suggested Revisions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Program,” Taipei to Department, Aug. 5, 1959. 983.43/8-5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活在極權社會，而非民主社會」。對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促使國民黨政府將教育目標調整為提供學生「為現代民主社會作準備」的能力。實際行動則如藉由提供資金編譯教材、培訓教師及提高其薪資、強化職業教育等工作，以及青年中心或青年商會等機構指導學生的課外活動，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及領導能力；並促使非政府組織加大教育投資。⁶

在高等教育與研究方面，皮斯利則認為臺灣當局刻意迴避了為現實生活作準備的社會科學知識，加上研究資源與環境的問題、當前政治現況及對三民主義的高度推崇，在在壓抑了智識活動的可能性。他建議美國政府應夥同私人基金會在臺灣開展更多教育工作，舉凡增加教育資源的投注，使教授有時間作研究，進而回頭提供穩固的民主社會所需的智識刺激與創新精神；提供留學獎學金及促進海外教師的訪問等交流活動，消除智識菁英的孤立與鬱悶感；同時增加對於社會科學領域的關注與投入。⁷

上述美國政府對臺灣教育與青年問題的高度重視，同樣反映在亞洲基金會臺灣辦事處的工作上。該會 1960 年代在臺灣的工作與美國大使館的建議高度重合，此項重心變化誠然說明了美國對於第三世界政策的大幅轉向，儘管兩者間不一定有直接聯繫。另一項導致臺灣辦事處的工作大幅向教育及青年類別傾斜的原因，則是因補助了《自由中國》，而導致該會一度高度重視的出版領域卻在臺灣遭遇挫敗。

根據一份制定於 1961 年的〈亞洲協會簡介〉宣傳小冊子，該會彼時在臺灣的工作目標首重「協助學者達到他們的目標——建設性的思想，表現，研究及教學」，該年度六點工作目標中即有五項關注對科學、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發展與學術環境、教育問題等面向。⁸在臺灣辦公室撰寫的 1962 年上半年成果報告中，則更清楚地表明該會對培養人力資源、鼓勵年輕學者、教師與外界的交流合作、鼓勵社會科學及應用研究等學術與教育問題的興趣。⁹其重心明顯由 50 年代圍堵中共勢力、攏絡海外華人支持的「中國總體計畫」，轉向 60 年代對研究與教育領域的重視。1965 年

⁶ Alexander L. Peaslee, "Education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Nov. 6, 1959. 983.43/11-6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⁷ Alexander L. Peaslee, "Education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Nov. 6, 1959. 983.43/11-659,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3.

⁸ 中華民國分會編印，《亞洲協會簡介》(臺北：氏著，1961)，收於〈福特基金委員會亞；亞洲基金協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451.1/40。

⁹ L. Z. Yuan, "Semi Annual Report (February 1, 1962–July 31, 1962)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undated.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51。具體成果如協助臺大成立了社會學系與農業經濟研究所。「為亞洲基金會協助本校設立社會學系及農經研究所一案函請查照辦理由」，錢思亮致法、農學院函(1960年10月19日)，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檔號：0049/2400502/014/0001/006。



方才履任的臺灣代表胡籲明在該會海外辦事處間的一場交流研討會中，對於臺灣的國際定位的解釋，恰說明了辦事處 1960 年代目標定位轉變的緣由：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鬥爭不僅是中國問題，更是亞洲問題、全球問題。
如果中華民國能更全面地展現出——鼓勵個人主動性與責任感的中國社會是可行的；此處的自由的中國人與其他國家民眾相同，有著願意一起實現和平且合作的世界社會的共同願景——將對自由事業大有益處。¹⁰

由於東亞冷戰情勢的轉變，以臺灣作為「自由中國」的需求不再，臺灣辦事處此後確實大幅減少了「中國」導向的工作，更大程度地聚焦到「臺灣」身上，並且更加聚焦後進國家的人才培育、政府效能改善與國家體質重整等面向明日的工作。亞洲基金會總部一直以來強調，該會尤為重視各項任務對當地社會帶來的潛移默化且長遠之影響。若從後見之明來看，吾人或許可將該會於 1960 年代的政策轉折理解為對戰後臺灣國家「正常化」的準備，為了遙遠將來的現代化、民主化的社會的努力——儘管並非以「臺灣」作為思考的主體。

回顧亞洲基金會 1950 年代在臺灣的活動，大抵可理解為使臺灣「自由中國」化的努力。該會打造「自由中國」的構想，從來不是針對「臺灣」量身打造，而是將目標瞄準了亞洲廣大的海外華人。事實上，該會前身自由亞洲協會的成立，即是為因應共產黨中國的崛起與對亞洲鄰近國家的滲透而做出的反制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試圖利用此一非政府組織展開隱蔽行動，圍堵共產主義蔓延，且避免亞洲國家出現「骨牌效應」。1949 年後成為國民黨流亡政府最後據點的臺灣，遂成為美國政府在東亞屬意的「反共基地」，以及號召海外華人來歸的「自由中國」。此一構想後續隨著艾森豪政府通過 NSC 146／2 文件而獲得正式肯認及擴充。

自由亞協早在 1952 年設立臺灣辦事處不久，即注意到臺灣在東亞冷戰中的特殊定位，並將該會在臺灣的工作設定為推進「中國總體計畫」——一來著眼於不少外省人皆有與中共交手的經驗，有助於反中共宣傳；再者，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已使共產勢力在臺灣匿跡，轉而將該會目標擴大至廣大海外華人。臺灣代表施豁德與自由亞協的此番構想，即為本研究所稱該會海外工作之「萬花尺」運作模式的一實例。由於臺灣有著曾具備統治正當性的中國流亡政府，以及暴增的外省移民，在強化臺灣發展成另一個「中國」的潛力，相對於現下共產中國的另一個「自由中

¹⁰ “Country Report: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NEA Regional Conference Tokyo, Nov. 1-4, 1965.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 250。

國」。該會臺灣辦事處沿著萬花尺所繪製出的繁花，即是應冷戰需要而誕生的「自由中國」，亦是最符合當時臺灣社會與東亞冷戰所需的工作方案。

透過建立起國民黨政府與自由中國的關聯，自由與極權對立的冷戰敘事被挪用到了「中國」的政治與認同問題上，並展開對於臺灣的自由化與中國化的雙重改造。具體來說，亞洲基金會與美國政府並不只是期待臺灣出現另一個中國政權，而必須是反共／非共且自由的中國。自由亞協臺灣辦事處試圖利用「中國總體計畫」，培植亞洲在地的華人勢力與中共抗衡，並使臺灣日漸自由中國化，以此拉攏東南亞各地的海外華人，以免這群人成為潛伏東南亞各國的第五縱隊。最終，達成圍堵共產主義、鞏固自由世界之目的。

由於亞洲基金會認為，智識菁英與地方領袖往往能左右地方的輿論發展、政治傾向，經常成為影響行動成敗的關鍵，是故其各式行動目標往往不脫於對這些對向的拉攏或培育。該會在臺灣推展的僑生教育計畫與刊物分銷計畫亦當屬之，前者聚焦海外華人學生，意圖透過教育深化自由理念與非共意識；後者則藉購贈本地出版品，提供東南亞華人讀者更多非共資訊選擇，以達成潛移默化影響。兩項計畫的最終目標皆是透過接觸到這些資訊的智識菁英、青年學生，回頭影響當地華人政治意向，並強化對自由中國的支持。換言之，亞洲基金會試圖藉由教育與刊物兩項傳播媒介，建構起海外華人的「心靈基礎建設」，使其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雖然該會的「中國總體計畫」目標對象設定為海外的眾多華人，不過後續展開的工作及其周邊效應，亦對臺灣社會帶來深遠影響，並且牽動戰後臺灣國家的樣貌。在僑生教育計劃的案例中，由於艾森豪政府東亞冷戰政策的調整，亞洲基金會原先擬定的計畫草案獲得了數十倍擴充，成為日後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共同推動的僑教計畫依循的底本。此亦導致亞洲基金會轉向提供僑生來臺的各類津貼，同時成立一影子組織「海外僑生補助委員會」，隱蔽該會在僑教工作中的著力、與兩國政府間的密切來往，以從旁支援美國大使館、安全分署等機構的行動；該會也藉由直接參與臺灣教育政策制定，以為臺灣提供更多的符合美式理想的教育機會，並且滾動式修正並策畫對華人學生甚至整個亞洲青年學子的行動方針。

在亞洲基金會與美國各政府部門的挹注下，成功吸引大量海外華人學生前來臺灣就學，同時提供了國民黨政府重建其「象徵秩序」的憑依——透過實際行動與對外宣傳將「中國」移植進臺灣，並積極操作華僑代表的政治符號，進而強化臺灣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對於臺灣社會而言，大量海外中國學生進入大專院校，

一度改變高教學生結構，並影響就業市場。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設施與各類設備亦隨之獲得巨量擴充，提前為日後湧入大學的嬰兒潮世代作好初步準備。至於做為美方冷戰目標的這些畢業僑生，不少皆回到原鄉就業，成為發展中的東南亞國家可靠的人力資源，對於教育界、媒體界、工商業發展皆有裨益；不過亦誠如藍適齊考察政大新聞系畢業僑生所得出的結論，來臺灣求學的華人學生最終並未如同亞洲基金會期待般全數投靠自由世界，成效顯然不如預期。¹¹

不同於在臺灣推行僑教的目的，實為利用「自由中國」對海外華人的吸引力，方採取臺灣作為目標地點，而香港為輔的形式；至於刊物分銷計畫，則著眼於香港作為自由港的低廉印刷成本，而以當地友聯出版社為中心，臺灣刊物支援的方式展開。出自此種臺、港分工構想，亞洲基金會不願支付臺灣刊物過高的發展經費，這也導致雷震獲得的購贈經費往往僅能勉強支應營運，始終難以擴大補助規模。而該會對《自由中國》等臺灣出版品的期待，大抵與眾多華文非共刊物相仿，僅是為提供更多非共資訊在東南亞華人社群間流通；之所以特別予以《自由中國》補貼，更多時候是出自維繫臺灣優質出版品的經營，以及扶持本地智識菁英文化活動的構想，而非提升該刊作為商業媒體競爭力或協助其宣傳工作的構想。不過對雷震等人而言，亞洲基金會對該刊的補貼，實為促成「自由中國運動」的關鍵支持，強化海外華人對共產思想的抵抗力，並且擁護在臺灣的中國政權。

再者，《自由中國》的案例一改傳統認為文化冷戰是由美國發起並主導的認識。亞洲基金會對《自由中國》的支持，實係受援方主動請纓；雷震等人為籌措雜誌社資金，求助於今日普遍視為從事文化冷戰工作的美國機構，並成為最早一批獲美國冷戰金援的本地刊物。由於雙方理念的不謀而合，自由中國社同仁樂於成為美方的「冷戰協力者」，利用亞洲基金會資源為己賦權，並強化刊物的海內外銷路開展「自由中國」宣傳。美國提供的大量冷戰資金，使該刊愈發積極地援用、附和其冷戰構想，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理念以及美國文化，並期待藉此獲得更多金援。然而，此事由於前述雙方構想的落差而終究未竟。

在亞洲基金會的購贈補助與《自由中國》的自發回應，到頭來強化了臺灣的自由主義者社群的聯繫與「親美文化景觀」。¹²1956 年起，雷震等人對加強對當局的

¹¹ 藍適齊著，川島真監訳，〈米援、台灣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教育、そして中国系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トランクショナル・ネットワーク援〉，頁 343–355。

¹² 「親美文化景觀」一語出自柯裕棻，其認美國透過電視節目與軍事、政治、教育等制度，將美式元素揉進了受援國的社會生產與文化結構。柯裕棻，〈合宜的笑聲：美国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文化研究》33 期（2021，臺北），頁 290。



批判力道且民主理念愈發執著。過去雖然普遍認為是對蔣介石政府愈發專斷的回應，事實上，具美國政府色彩的亞洲基金會的背後支持亦相當程度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認為該刊對政府的批評可視為自由中國之所以為「自由中國」的關鍵因素。隨著《自由中國》因主張美國介入臺灣政治，而觸及威權政府紅線，不斷遭國民黨政府施壓的亞洲基金會最終只能與統治集團妥協並捨棄該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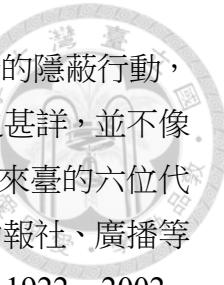
總結來說，本文透過梳理亞洲基金會在僑生教育計畫與《自由中國》分銷工作兩個案例中的行動，細緻考察了該會在戰後臺灣國家形成中扮演的角色與影響，並且釐清 1950 年代美國隱蔽行動在臺灣的運作模式，進一步揭示冷戰中美國權力在第三世界受援國幽微而強勢的介入。

首先，亞洲基金會的「自由中國」構想，終究因為與當地政府的期待落差，而未能如預期般發展。相對於打造出真正的「自由中國」，國民黨政府僅為謀求其政權的正統性、正當性與穩定，「自由中國」終究只是宣傳性的冷戰構詞，以凸顯其與中共的極權、暴虐不同。由於僑生來到臺灣後，並未實際接收到自由民主的「薰陶」，往往僅親身體會了威權的樣貌，自然未能在回國後貢獻於「自由中國」，或者進一步影響當地反共輿論。雷震與自由中國社的遭遇，則更加明顯地說明了此種「自由中國兩難」。再者，由於亞洲基金會的中央情報局色彩，其行動皆須符合美國政府的整體政策，並翼助其海外活動推展。該會 1950 年代在臺灣的運作因而以推進中國總體計畫為主、臺灣地區服務為輔，以美國整體反共圍堵構想為主，推進自由民主理念為輔的模式進行。職是之故，亞洲基金會的「自由中國」努力，更多時候導致了臺灣愈發中國化的結果，並強化了國民黨政府作為另一個中國的自我定位與對外宣傳憑依——儘管此一政策最初係為影響海外華人而設計。

再者，本文嘗試指出另一種理解冷戰中臺灣的方式，即透過受援國的稜鏡回看大國的介入與國際冷戰局勢的發展。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亞洲基金會在臺灣布置的「心靈基礎建設」在 1950 年代成效有限，僅閹割性地達成了臺灣「中國化」的成果，有關自由、民主的投資回報則須留待日後。

（一）亞洲基金會在臺灣的行動特點

本文指出，亞洲基金會的行動特點有三：萬花尺運作模式、隱蔽權力、共謀的局外人。由於「萬花尺」運作模式前文已有提及，此處討論將主要聚焦後兩項。



由於亞洲基金會力圖以「非政府」偽裝，執行中情局及美國政府的隱蔽行動，以利會務推展。該會選派的各國代表多半具備當地經驗，對當地知之甚詳，並不像外交官般頻繁調任各地，海外代表通常僅派任一至二國。1950 年代來臺的六位代表，戰時皆被派往中國戰區，且多半曾擔任情報部門工作，或者協助報社、廣播等工作。少數的例外如 1988 年由總部派任來臺的高懿德(Edith Coliver, 1922 – 2002, 任期：1988 年 1 月 – 1992 年 9 月)，則係因負責總部工作期間多次接待訪美臺籍人士如姚嘉文、江春男等人，與本地菁英關係密切。¹³這些「中國經驗」顯然有利於各任臺灣代表與國民黨政府高層的交往，並經其既往業已熟識的本地菁英進一步引介進其他圈子，如胡適與顧維鈞即在饒大衛來臺前夕先行通知有關人士。

再者，亞洲基金會代表在受援國的活動，常見以第二身分活動。如首任代表施豁德常以記者身分穿梭各種場合，次任代表饒大衛則同時擔任臺大政治系教職，史麟書曾出任中國之友社董事職，譚維理則積極參與本地音樂活動並於師大音樂系任教。此舉之目的是為潛伏當地以掩蓋主要目標，抑或藉此與本地社會菁英來往、深入社會裡層，仍有待進一步確認。沒有太大疑義的是，自由亞協來臺之初以通訊社名義向政府登記，顯然係出自隱蔽該會冷戰意圖的考量；不過由於國民黨當局早在自由亞協成立之初即接獲該會有美國政府資助的情報，此事亦在臺灣政治、文化菁英間流傳開來，協會的「非政府」隱蔽成績顯然不如預期。另外，據目前接觸到的檔案可悉，多任代表皆被推選為華美協進社的副代表職，並以此獲得不少與國民黨政府人士及黨政要人交往的機會，其實際效益如何亦有待考察。

在「共謀的局外人」定位方面，《自由中國》的案例則透露該會界線的彈性。雷震等人雖已於「祝壽專號」惹惱黨政高層，並遭遇當局強烈反彈，但亞洲基金會內部仍因該期言論獲致的驚人銷量而頗感滿意。會長卜蘭姆甚至將此期的暢銷指向臺灣民眾「『依法治國』的要求與日俱增」，並評估該刊對於法律與民主理念的深化有發展可能云云。¹⁴然而，由於《自由中國》隨後導致亞洲基金會與當局關係一度鬧僵，該會因而在此後好一段時間避免在臺灣展開其他可能因言論惹禍的購贈計畫。此事之後，亞洲基金會亦對其行動方針是否需作出調整做過討論，得出的結論是：「在亞洲與政府或準政府組織合作往往更加可行。」同時，亦感嘆亞洲的志願組織往往枯有民主外在卻不理解民主真義。¹⁵

¹³ 徐祥弼訪問，〈姚嘉文先生訪問記錄〉，2022，未刊稿。

¹⁴ “Comment on Quarterly Report,”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Feb. 15, 1957. Letter from Robert Blum to Earl Swisher, May 17, 1957.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¹⁵ Letter from Patricia Flanagan to Edgar N. Pike, Oct. 15, 1963.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Vol.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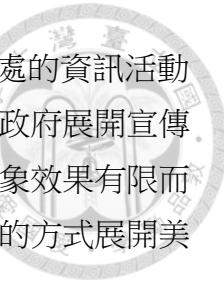
（二）冷戰中受援方與美國的共謀結構

敗退來臺的國民黨政府，經濟尚未自戰爭中復原且將國內資源高度集中軍事發展，無論政府或民間單位皆高度仰賴美援挹注下的發展。這也導致臺灣社會能與挾大量資金與軍火的美國協商的籌碼相當有限，受援國與組織在援款的談判桌上往往趨於弱勢。為了更有效地推動美國在亞洲的冷戰目標，並且避免刺激當地敏感的殖民情緒或陷入干預內政的風險，美國政府及亞洲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資金與權力運作必須與更為隱蔽的方式運作，此亦提供了受援國政府一定程度的協商空間。例如國民黨政府經多次施壓並以恐威及「中美關係」要脅，終於促使亞洲基金會放棄對《自由中國》的支持。

受援國並不只是被動回應美國的冷戰行動，更多時候反而是美國政府高度仰賴受援國政府的默許、協助，或附和其冷戰意圖；雙方來往並非僅是自主、依賴傳統二元論述所能涵蓋。1950 年代，因忌憚中共擴張，美國必須在東亞培植另一股中國勢力與之對抗，而與敗退來臺急切於重建「象徵秩序」的國民黨政府一拍即合，積極挪用其「自由中國」敘事與僑務工作，作為美國對東亞華人行動的灘頭堡。因此，由於美國在華人工作及僑教計畫中，高度需要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象徵符號，因此在後續執行上亦相當程度上選擇放任國民黨政府滿足其僑務需要，而將其自身冷戰目標置後。例如長期默許國民黨政府利用僑教授款補充對北越難民的接收與安置工作，¹⁶以及大量用於非美方目標對象的港生。再者，雷震的案例中亦說明，50 年代後期以來，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冷戰布局的重要性雖然下降，不過由於區域風險因 1958 年的金馬危機驟升，而導致美國必須再次依賴國民黨政府達成其亞洲政策。換言之，美國並非如過往預期般主導冷戰發展，而是經常受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牽制，影響其對受援國的介入或者讓步。過去雖普遍認為是美援協助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站穩腳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1950 年代美國亦高度仰賴國民黨政府支持其總體冷戰布局，以確保亞洲的區域安全。

再者，過去論及戰後臺灣史，對於美國的角色往往止步於其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並協助其政權鞏固與發展。本研究發現，事實上，美國並非僅側面支應國民黨政府的政權安定，同時更因地緣政治之故而積極將臺灣塑造成「自由中國」。透過重塑「中華民國」的國際聲望，使臺灣成為非共中國人的集結點。實際行動主要透

¹⁶ 美國大使館直至 1958 年才因整體政策的轉變而介入此事，以免影響因東南亞難民問題影響與當地國家間的關係。David L. Osborn,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Program in Taiwan,” Taipei to Department, Sept. 3, 1958. 893.43/9-358, Confidential File, 1955–1959, Reel 12.



過支持並發展非共華人勢力的教育工作與文化事業，並搭配以美新處的資訊活動進行。為了更有效地推展「自由中國」目標，美國一度嘗試與國民黨政府展開宣傳合作，最後則因評估國民黨政府的海外宣傳技巧過於粗糙，對目標對象效果有限而作罷；¹⁷轉而採取臺灣為僑教中心、香港為非共華文出版品流通中心的方式展開美國在亞洲的華人工作；港臺兩地則作相互支援。

（三）重探冷戰中的反共與民主

美國在冷戰中的反共與民主構想，本應為互補的作用，藉由推動民主、自由理念而強化反共功效。然而，在第三世界新興國家之中，民主卻往往淪為口號或變形為反共的附庸。在《自由中國》的案例，即說明美國、自由中國社同仁與國民黨政府三方對於民主理念的認知落差。不過，同時也可發現亞洲基金會對該刊的期待，亦隨政治環境的轉變而由最初的反共導向，逐漸關注該刊中有關自由、民主理念的倡議。換言之，該會在亞洲的行動除了促成反共的當前首要目標，同時亦積極運作民主在各國社會的發酵。

1950、60 年代，該會在臺灣為民主所搭建的「心靈基礎建設」主要是透過法治理念的深化，該會強調：「根本而言，民主是建立在法治上的。」¹⁸該會早在 1953 年便邀請華盛頓大學法律系陶爾西教授前來臺大、東吳大學教授憲法，同時亦撥款購置各類法律書籍供給大專院校；又如該會於 1970 年代大量資助臺灣的法律扶助發展，更明確地透過強化民眾對自身法律權益的認識，進而擴大關心臺灣社會並爭取民主。另外，誠如前文指出，該會在 1960 年代高度關心台灣的學術研究與社會科學領域發展，核心目的亦係出自對於現代化民主社會的期許，嘗試藉由提供研究者智識刺激、激發其好奇心並解放思想，擴大其對所處社會的關心與參與，進而促成民主的發生。不過，由於冷戰的反共需求及美國官方政策的限制，直到 1980 年代卡特總統（James Jimmy Carter, 1924 – ）轉向開展人權外交、促進威權國家的民主以前，亞洲基金會對於民主的投資顯得較為幽微且零散，多半包裝以慈善、協助

¹⁷ 美新處認國民黨往往「過度夸夸其談」(extremely bombastic tone)，大使蘭欽亦指出國民黨的節慶宣示過於長篇大論且「文學性」而難以服人。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46/2 (Formosa and Nationalist China)." Feb. 17, 1955. FOIA, CIA-RDP80R01731R003000010001-1. 「美國藍欽大使請見外交部葉部長談話紀錄」(1954 年 4 月 9 日)，〈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

¹⁸ “An Inquiry into the Position of Taiwan to Determine the Basis for a CFA Program,” F. Chang to Amoss, May 17, 1954.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AFR.

社會發展名義，潛移默化地偷渡民主思想。換言之，1950 年代以來的這些「心靈基礎建設」，或可視為提供自由與民主理念成長的培養皿。

亞洲基金會所制定的計畫最終發展並不總是如其預期般運作，該會 1950、60 年代對法治精神深化所投注的心血顯然並未發揮太大作用。反而是原先預定以反共導向的《自由中國》後期言論的激進化，促成臺灣民眾對於民主的想望，提供日後威權鬆動的契機。這顯然是亞洲基金會從未預想到的結果。



引用書目

一、中文史料

(一) 報紙期刊

《中央日報》1953 年至 1956 年，台灣新聞智慧網，漢珍數位圖書。

《聯合報》1952 年至 1959 年，台灣新聞智慧網，漢珍數位圖書。

《公論報》1951 年至 1958 年，臺灣研究資源，得鴻資訊。

《自立晚報》1953 年，臺灣研究資源，得鴻資訊。

《自由中國》，自由中國資料庫，得鴻資訊。

《中國學生周報》1954 年至 1956 年，「香港文學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張道藩，〈論當前文藝創作三個問題〉，《文藝創作》創刊週年紀念特刊（1952，臺北），頁 1–12。

張道藩，〈論當前自由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文藝創作》第 22 期（1953，臺北），頁 1–7。

〈重視僑教與建設臺大—慶祝校慶—〉，《華僑青年》第 2 卷第 5 期（1959，臺北），頁 4–6。

〈各校僑生代表歡迎梅瑞強博士〉，《僑生》第 2 卷第 2 期（1960，臺北），頁 6。

〈我們的話〉，《世界新聞》創刊號（1952，臺北），頁 1。

本社，〈大陸雜誌二十二年〉，《大陸雜誌》第 44 卷第 6 期（1972，臺北），頁 28–31。

王梓良，〈大陸雜誌三十年〉，《大陸雜誌》第 61 卷第 1 期（1980，臺北），頁 39–42。

馬徹，〈大陸雜誌〉，《現代學苑》第 2 卷第 1 期（1965，臺北），頁 41–42。

韓繼旺，〈僑生在政大〉，《政大僑生》（1957，臺北），頁 12–13。

(二) 外交部檔案

〈鼓勵僑生回國升學〉，《外交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5.2/0001。

〈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 〈華美協進社等（一）〉，《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102。
- 〈華美協進社等（二）〉，《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103。
- 〈金山亞洲協會支助自由中國半月刊〉，《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76。
- 〈香港友聯社動態及相關資料〉，《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87。
- 〈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2701-0056。
- 〈東南亞華僑教育計畫〉，《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9908-005。
- 〈國內外僑教與僑生〉，《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50209-0078。
- 〈僑生回國升學（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1。
- 〈僑生回國升學（三）〉，《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3。
- 〈僑生回國升學（五）〉，《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49910-0065。
- 〈各國駐華外交領事人員銜名錄〉，《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00400-0087。
- 〈洽購美國書刊資料及外交官銜名錄等〉，《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50213-0002。
- 〈各國駐華官員身分證（十）〉，《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00400-0112。
- 〈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30800-0036。
- 〈福特基金委員會亞；亞洲基金協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451.1/40。
- 〈周海通記錄對匪鬥爭〉，《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4/818.11/0005。
- 〈周海通宣傳資料〉，《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6/818.12/0027。
- 〈周海通記錄對匪鬥爭〉，《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6/818.11/0010。
- 〈海外對匪鬥爭指導委員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7/816.9/7。
- 〈海外對匪鬥爭指導委員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7/816.9/0008。

（三）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 〈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0。
- 〈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
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1。



〈1958 年度美援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總卷〉，《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42。

〈1961 年度華僑教育計畫（僑教計畫）—教育部新僑生入學輔導經費〉，《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6-10-004-187。

（四）僑務委員會與行政院檔案，檔案管理局藏

〈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00000000A/0042/7-7/1

〈一般經常性案件〉，《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2/002199/51/0003/017。

〈一般經常性案件〉，《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19000000B/048/005299/51/0005。

〈僑校僑民報告表〉，《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50/002105/51/0008/005。

〈經費補助〉，《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4/002107/52/0001。

〈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47/005002/51/0001。

〈法規命令之訂、修、廢〉，《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9/005002/51/0001。

〈僑教活動、報告〉，《僑務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9000000B/0046/002110/51/0001/013。

（五）《立法院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

第 13 會期第 10 期、第 14 會期第 3 期、第 20 會期第 1 期

（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國史館藏

〈鄭南渭（鄭保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10000-2637。

〈章雅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20000-4704。



(七) 中國國民黨檔案，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室藏

- 〈40年總裁批簽〉(1951年10月30日)，檔號：總裁批簽 40-0402。
- 〈41年總裁批簽〉(1951年10月30日)，檔號：總裁批簽 40-0163。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六次會議紀錄〉(1952年12月2日)。
- 〈中改會第66次工作會議紀錄〉(1952年2月26日)，《第六屆中央改造委員會工作會議》，檔號：會 6.43/66。
- 〈中改會41年度7月份工作報告〉(1952年7月31日)，《第六屆中央改造委員會一般檔案》，檔號：會 6.41/308.3。
- 《認識敵人》(1951)，收錄「吳稚暉檔案」，檔號：稚 00499、稚 13002。

(八) 《雷震、傅正檔》，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 〈自由中國社籌備程序〉，館藏號：052-01-08-009。
- 〈王紀五致雷震〉(1951年2月7日)，館藏號：052-01-11-21-014。
- 〈王紀五致雷震〉(1952年8月21日)，館藏號：052-01-11-21-028。
- 〈雷震致王紀五〉(1951年11月2日)，館藏號：052-01-11-19-069。
- 〈雷震致王紀五〉(1952年1月2日)，館藏號：052-01-11-19-072。
- 〈杭立武致雷震〉(1952年3月27日)，館藏號：052-01-11-23-02
- 〈董時進致雷震〉(1952年8月5日)，館藏號：052-01-11-28-072。
- 〈王紀五致雷震〉(1952年8月21日)，館藏號：052-01-11-21-028。
- 〈劉毓棠致雷震〉(1952年8月26日)，館藏號：052-01-11-19-089。
- 〈雷震致王紀五〉(1952年11月8日)，館藏號：052-01-11-19-096。
- 〈雷震致王紀五〉(1953年3月19日)，館藏號：052-01-11-20-009。
- 〈雷震致思琦〉(1953年4月7日)，館藏號：052-01-11-10-013。
- 〈雷震致#增瑞〉(1953年6月27日)，館藏號：052-01-11-10-017。
- 〈雷震致王紀五〉(1954年6月15日)，館藏號：052-01-11-20-032。
- 〈雷震致王紀五〉(1955年3月29日)，館藏號：052-01-11-20-062。
- 〈雷震致王紀五〉(1955年7月29日)，館藏號：052-01-11-20-068。
- 〈印尼華僑致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1956年10月16日)，館藏號：052-01-11-10-056。
- 〈新加坡華僑中學致 James A. Elliot (USIS)〉(1956年10月21日)，館藏號：052-01-11-10-058。



〈Chou Hsiang-Kuang 致 USIS〉(1956 年 10 月 24 日), 館藏號: 052-01-11-10-059。

〈Robert J. Clarke 致 Chang Sang Chiag〉(1956 年 10 月 30 日), 館藏號: 052-01-11-10-060。

〈楊少珍致 USIS〉(1956 年 12 月 29 日), 館藏號: 052-01-11-10-062。

〈雷震致 Robert Blum〉(1959 年 5 月 31 日), 餐藏號: 052-01-11-12-101。

〈Richard J. Miller 致雷震〉(1959 年 8 月 20 日), 餐藏號: 052-01-11-12-012。

〈雷震致 Richard J. Miller〉(1959 年 8 月 24 日), 餐藏號: 052-01-11-12-102。

〈Edgar N. Pike 致雷震〉(1960 年 6 月 29 日), 餐藏號: 052-01-11-12-014。

〈Swisher 致雷震函〉, 餐藏號: 052-01-11-20-068。

〈Dang Vinh Sanh 等致 The Service of Informations of the U. S. A.〉, 餐藏號: 052-01-11-11-047。

〈Josiah W. Bennett (USIS) 致雷震〉, 餐藏號: 052-01-08-009。

(九)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其他人物專檔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大陸雜誌社〉,《朱家驛》,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餐藏號: 301-01-16-016。

〈Edgar N. Pike 致錢思亮〉(1961 年 12 月 27 日),《錢思亮》,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 餐藏號: 303-01-18-02-254。

〈教育部開會通知單 Notice of Meeting〉,《教育計劃方案》, 李國鼎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李國鼎資料庫, 餐藏號: a00174018。

「孟治致胡適函」(1959 年 6 月 10 日),〈與孟姓的來往書信〉,《南港檔》, 胡適紀念館藏, 餐藏號: HS-NK05-041-007。

「吳思琦致胡適函」(1952 年 1 月 26 日),〈與其他吳姓的來往書信〉,《美國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 HS-US01-091-007。

(十)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臺灣大學檔案館藏

「國立臺灣大學聘函」(1951 年 10 月 11 日), 檔號: 0040/1600400/002/0001/013。

「David N. Rowe 致錢思亮函」(1968 年 3 月 14 日), 檔號: 0057/2601300/001/0006/003。



「為亞洲基金會協助本校設立社會學系及農經研究所一案函請查照辦理由」，
錢思亮致法、農學院函（1960年10月19日），檔號：
0049/2400502/014/0001/006。

「為亞洲協會中華民國分會贈送貴校書籍請查照惠復由（1962年4月18日），
檔號：0051/2500100/001/0008/045。」

（十一）時人日記、口述、回憶錄、年譜等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9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卡爾•L•藍欽，《藍欽使華回憶錄》。臺北：徵信新聞社，1964。

鄭彥棻，《僑務問題的新認識》。臺北：海外出版社，1955。

鄭彥棻，《往事憶述》。臺北：傳記文學，1978。

高信，《中華民國之華僑與僑務》。臺北：正中書局，1989。

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八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國史館、中國文化大學，1988。

張其昀原著，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主編，《質樸堅毅：張其昀日記（1949–1950, 195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 第二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新亞遺鐸》。臺北：聯經，1998。

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1。

雷震，《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

雷震，傅正主編，《雷震密藏書信選》。臺北，桂冠，1990。

萬麗鵠編著，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傅正著，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馬之驥，《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晚報，1993。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臺北市：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 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
新北：國史館，2003。
- 黃杰著，廖文碩等編輯校訂，《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 1–3》。臺北：國史館，
2022。
-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二）〉。臺北：聯經，2000。
-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臺北：天下文化，2005。
-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臺北：九歌，2008。
- 黃錦樹、張錦忠、李宗舜主編，《我們留臺那些年》。馬來西亞：有人，2014。
- 賴觀福，〈回首歷史往事〉。吉隆坡：氏著，2016。
- 白垚，〈縷雲前書（上）〉。八打靈再也，雪蘭莪：有人出版，2016。
- 吳安琪，〈篳路藍縷：留臺人口述歷史回憶錄（1950–1985）〉。八打靈再也，
雪蘭莪：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20。
- 葉曙，〈我與學生：病理卅三年之三十二〉，《傳記文學》第 15 卷第 6 期（1969，
臺北），頁 74–78。
- 賴玉嬪整理，〈我們在成功的路上見面—訪周哲水〉，《大馬青年創刊號》（1983，
台北），頁 24–26。
-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傳記文學》第 87 卷第 3 期（2005，臺
北），頁 105–125。
-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一五）〉，《傳記文學》第 108 卷第 1 期（2016，
臺北），頁 136–141
- 阮毅成遺作，〈中央工作日記（一二三）〉，《傳記文學》第 109 卷第 3 期（2016，
臺北），頁 137–144。
- 盛世才原著，〈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17 卷 2 期（1970，臺北），頁 93–
95。
- 沈劍虹，〈國際宣傳處——一個很特殊的機構〉，《傳記文學》42 卷 2 期（1983，
臺北），頁 76–78。
- 李壬癸，〈八十自述（上）〉，《傳記文學》第 109 卷第 4 期（2016，臺北），頁
24–41。
- 徐榮崇訪問，〈羅世宗〉（2013 年 10 月 17 日），收錄徐榮崇、湯熙勇等人主持，
《102 年僑務口述歷史專案報告》，2013，頁 363–408。
- 單德興訪談，〈李有成訪談錄（二）〉，《中山人文學報》46 期（2019，高雄），
頁 113–144。



(十二) 已公刊史料

- 中國經濟資料社編，《上海工商人物誌》。上海：氏著，1948。
-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臺北市統計要覽》。臺北：氏著，1954。
- 教育部教育資料研究室輯，《程部長天放五年來言論選集》。臺北：氏著，1954。
- 辛之魯，《美軍生活》。臺北：自由中國社，1955。
- 翁之鏞，《美援運用分析之研究報告初稿》。臺北：中央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1955。
- 國立臺灣大學印行，《四十五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氏著，1956。
- 海外出版社，《僑務一年》。臺北：氏著，1957。
- 國立教育資料館，《美援有關教育計畫實施報告（1953–1957）》。臺北：氏著，1957。
-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七年來的中美教育合作》。臺北：氏著，1959。
- 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編印委員會編，《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三藩市：氏著，1960。
- 教育部編印，《教育概況（中華民國三十九年至五十年）》。臺北：氏著，1961。
- 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編印，《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工作報告》。臺北：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1963。
-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編印，《僑生教育計劃運用美援成果檢討》。臺北：氏著，1966。
- 國史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第29冊》。臺北縣：國史館，2006。
- 僑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處編印，《僑生回國升學概況》。臺北：氏著，1972。
-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捌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 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編，《雷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

(十一) 其他史料

- 〈偵監自由亞洲協會蔡增瑞等活動〉，《臺灣省警務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63–00212。
- 〈偵查袁倫仁言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10000A/0044/05711/179/0001/002。



- 〈美亞洲基金會利用美援支助香港友聯社反我活動〉，《總統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49/3110604/0262。
- 〈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三)〉，《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09。
- 〈各學術文化機關團體會社登記及請領補助案等(六)〉，《教育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9-030501-0012。
- 〈王紀五先生事略〉，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9380001A。
-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臺灣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
-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1953年1月15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會議紀錄彙編〉，《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05-010。
- 「蔣中正與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團長蔡斯等關於支援外島游擊部隊之權責移轉問題等談話紀錄」（1954年2月12日），〈軍事—蔣中正與美方將領談話紀錄（二）〉，《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2-00089-004。
- 「第一一五次中常會指示：聽取鄭彥棻報告海外黨務工作之檢討」（1959年1月28日），〈石叟叢書續編一副總裁中常會指示彙編〉，《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09-00003-034。
- 「僑生教育中美小組顧問葛萊克撰在臺僑生教育報告書」，〈石叟叢書—各方建議（包括報告）（下冊）〉，《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08-00019-039。
- 〈政務—我國官員出訪及各國官員來華訪問情形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1-00022-001。
- 「唐縱陶希聖陳建中等簽陳誠國民大會前夕海內外政治情況分析與建議」（1960年2月17日），〈石叟叢書資料彙編（四）〉，《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110-00005-008。
- 「副總統嚴家淦於畢業僑生活動中心開幕典禮致詞呈核稿及僑生教育有關資料」，〈任副總統時：致詞稿（三）〉，《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6-010706-00003-006。

〈臺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資料移交過程與清冊〉(2019年3月26日),陳翠蓮教授提供。

徐祥弼訪問,〈姚嘉文先生訪問記錄〉,2022,未刊稿。



二、外文檔案

(一) The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Taiwan Files, Box No. P-53, P-54.

(二) 台灣亞洲基金會檔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Vol. 178, Vol. 207, Vol. 250, Vol. 251

(三)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FRUS, 1950, Vol. 6.

FRUS, 1951, Vol. 6, Part 1; Vol. 7, Part 2.

FRUS, 1952–1954, Vol. 6, Part 1; Vol. 7, Part 2; Vol. 14, Part 1; Vol. 15, Part 1.

FRUS, 1955–1957, Vol. 1, Vol. 2, Vol. 3

(四)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cord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DTPILLAR, Vol. 1, Vol. 2, Vol.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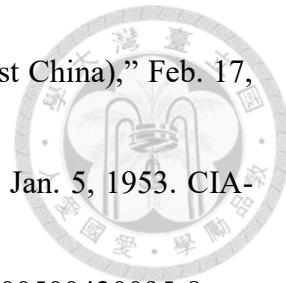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eports to the President,” Jun. 30, 1953. 5076de59993247d4d82b59ab.

PSB,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 5, 1953.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D-44 Formosa)” USAF to OCB, Nov. 6, 1953. CIA-RDP80-01065A000300080007-0.

“Annex to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on PSB D-44,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Jan. 19, 1954. CIA-RDP80-01065A000300080006-1.

“PSB D-44, Coordinated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the Far East,” 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Officer, OCB, Feb. 8, 1954. CIA-RDP80-01065A000100070001-9.



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46/2 (Formosa and Nationalist China),” Feb. 17, 1955. CIA-RDP80R01731R003000010001-1.

“PSB D-23,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Jan. 5, 1953.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The Overseas Chinese,” Mar. 15, 1954, CIA-RDP80-00809A000500420095-8.

Letter from Allen W. Dulles to Richard M. Nixon, Apr. 8, 1954. FOIA, DOC_000048116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Organization Charts, 1947–75, 2016, 引自「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CIA-Organization-Charts/CIA-Chart-1950.jpg>, 檢索日期：2023年4月10日。

(五)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Microfilm]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50–1954, Reel 2.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0–1954, Reel 9, Reel 47, Reel 39.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55–1959, Part. I, Reel 5.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l Affairs, Part II, 1955–1959, Reel 12, Reel 13.

China, 1960–January 1963, Internal Affairs, Reel 1, Reel 23.

(六) 其他美國政府檔案

Memo of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 Jan. 23, 1959 [DDE’s Papers as President, NSC Series, Box 11, Special Meeting of NSC 1/22/59],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research/online-documents/declassified-documents-fiscal-year-2010>, accessed Mar. 21, 2023.

“NSC Report on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Mar. 27, 195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s://www.proquest.com/dnsa/advanced?accountid=14229>, accessed May 16, 2023.

PSB, “Draft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Report No. D-44: Intensified Use of Formosa Facilities fo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Nov. 19, 1953. U.S.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671464/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2>, accessed May 16, 2023.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 11, 1957.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15935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OCB,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 Study," Dec. 1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52401/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OCB,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an Asian University," Aug. 18, 1955.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5240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Comments on PSB D-44, June 8, 1953. 'Intensified Use of Formosa Facilities fo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Josiah W. Bennett to the Ambassador, Jun. 8, 1953.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672799/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OCB,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46/2 (Formosa and Nationalist China)," Jul. 1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48666/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USIA, "Overseas Chinese: U.S.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Oct. 6,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32993/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Meeting with the Vice President," Jan. 8, 1954.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332408/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Depart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an Instrument of U.S. Policy," Jul.13, 1956. USDDO, <link.gale.com/apps/doc/CK2349332334/USDD?u=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Departm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U.S. Policy," Sept. 6, 1956. USDDO,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005672/USDD?u=%20twnsc183&sid=bookmark-USDD&pg=1>, accessed May 16, 2023.



(七) 其他外文史料

Robert Blum, "The Work of The Asia Found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29, No. 1, 1956, pp. 46, 56.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A message to all Asia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page number. 引自「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messagetoallasia00comm>, 檢索日期：2023年5月15日。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A new approach to the vital need for freedom in Asia. (San Francisco: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Inc., 1951), no page number. 引自「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newapproachtovit00comm>, 檢索日期：2023年5月15日。

Memo of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 Jan. 23, 1959 [DDE's Papers as President, NSC Series, Box 11, Special Meeting of NSC 1/22/59] 引自「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Museum, and Boyhood Home」網站,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research/online-documents/declassified-documents-fiscal-year-2010>, 檢索日期：2023年3月21日。

Charles Stuart Kennedy, "Interview with Albert L. Seligmann," Jan. 27, 2000,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adst.org/OH%20TOCs/Seligmann-Albert-L.pdf>, accessed Sep. 23, 2023.

Charles Stuart Kennedy, "Interview with Charles T. Cross," Nov. 19, 1997,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adst.org/OH%20TOCs/Cross,%20Charles%20T.toc.pdf>, accessed Sep. 23, 2023.

Jack O'Brie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M. McCarthy." Dec. 28, 1988,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https://memory.loc.gov/service/mss/mfdip/2004/2004mcc04/2004mcc04.pdf>, accessed Aug. 25, 2023.

鐘逸明，"Interview With Lee Sing Tiong(李成忠)," Jun. 22 & 29, 202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ld War: On-the-ground Experiences In Asia, <https://rcw-asia.com/browsarchives/interview-with-lee-sing-tiong>, accessed Jan. 5, 2024.

鐘逸明，"Interview With Francis Cham(湛承憲)," Jul. 14 & 30, 202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ld War: On-the-ground Experiences In Asia, <https://rcw-asia.com/browsarchives/archives/interview-with-francis-cham>, accessed Jan. 5, 2024.

John K. Fairbank and Joyce C. Lebra, "Earl Swisher 1902-197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3, 1976, p.461.

三、期刊論文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第31卷第1期(2001，臺北)，頁79–127。

趙綺娜，〈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臺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1，臺北)，頁97–163。

王梅香，〈麥加錫與美新處在臺灣的文化冷戰(1958–1962)〉，收錄游勝冠主編，《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臺北：里仁，2016)，頁101–148。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20，臺北)，頁123–158。

王梅香，〈香港友聯與馬華文化生產：以《蕉風》與《學生周報》為例(1955–1969)〉，收錄張錦忠、黃錦樹、李樹枝編，《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22)，頁9–34。

王梅香，〈冷戰時期跨國非共策略與美國文化宣傳：論泰國的亞洲基金會1954–1963〉，《歐美研究》第52卷第4期(2022，臺北)，頁567–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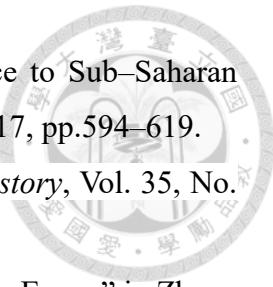
- 王梅香，〈打造冷戰兒童：香港友聯《兒童樂園》與自由亞洲協會的文化宣傳（1951–1954）〉，《中國現代文學》第43期（2023，臺北），頁71–94。
- 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期（2016，臺北），頁1–40。
- 陳翠蓮，〈冷戰與去殖民：美國政府對戰後初期臺灣獨立運動的試探與評估（1947–1950）〉，《臺灣史研究》（2019，臺北），頁91–138。
- 陳翠蓮，〈地方選舉省籍關係與反對黨：美國政府對1950、1960年代台灣選舉的看法〉，收錄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林映汝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71–102。
- 許維賢，〈亞洲基金會在新馬的文化冷戰：以友聯出版社和《學生周報》為例〉，《中外文學》52卷2期（2023，臺北），頁65–113。
- 蔡明諺，〈製作豐年：美國在臺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收錄游勝冠主編，《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臺北：里仁，2016），頁1–38。
-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臺北），頁211–242。
- 柯裕棻，〈合宜的笑聲：美國家庭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在臺灣〉，《文化研究》33期（2021，臺北），頁285–323。
- 楊翠華，〈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第29卷第2期（1999，臺北），頁41–103。
- 楊翠華，〈美援技術協助：戰後台灣工業化開端的一個側面〉，收錄陳永發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6），頁261–292。
- 黃庭康，〈反思臺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五零年代為例〉，收錄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頁83–116。
- 藍適齊著，川島真監訳，〈米援、台灣のジャーナリズム教育、そして中国系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ネットワーク援〉，收錄森口（土屋）由香、川島真、小林聰明編，《文化冷戰と知の展開：アメリカの戦略・東アジアの論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2），頁325–359。
- 吳翎君，〈冷戰初期洛克菲勒基金會對臺灣的援助〉，收錄貴志俊彥等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頁109–131。
- 三澤真美惠著，蓋曉星譯，〈美國新聞總署和臺灣「自由」電影陣營的形成〉，貴志俊彥等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頁85–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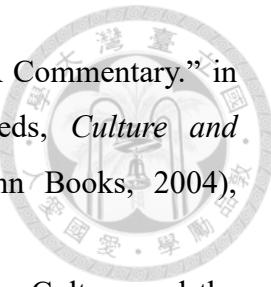
- 傅葆石著，秦雅萌、劉玲燕譯，〈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73 期（2019，香港），頁 47–62。
- 傅葆石著，秦雅萌、劉玲燕譯，〈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74 期（2019，香港）頁 67–82。
- 任育德，〈1950 年代臺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跨域視角的分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83 期（2021，香港），頁 95–111。
- 任育德，〈當革命民主遇上選舉：1950 年代國民黨與臺灣地方選舉〉，收錄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林映汝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
- 蘇瑞鏘，〈從雷震案看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收錄薛化元編，《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臺灣史論叢戰後政治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 177–212。
- 金進，〈冷戰 1950、1960 年代新馬文學：以《大學論壇》（新）和《蕉風》（馬）兩大期刊為討論對象〉，《台灣東南亞學刊》10 卷 2 期（2015，臺北），頁 41–79。
- 黃金麟，〈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台灣社會學》第 34 期（2017，臺北），頁 123–167。
- 范燕秋，〈臺灣的美援醫療、防癩政策變動與患者人權問題，1945 至 1960 年代〉，《臺灣史研究》（2009，臺北），頁 115–160。
- 周琇環，〈美國的經援與軍援（1945–1965）〉，收錄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頁 285–322。
- 鄧峰、趙繼珂，〈美國學術界對美國新聞署的研究綜述〉，《冷戰國際史研究》第 9 卷第 15 期（2013，上海），頁 223–250。
- 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2015，北京），頁 91–102。
- 張楊，〈雙重文化冷戰：亞洲基金會援助亞洲大學項目探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93 期（2022，香港），頁 105–119。
- 吳國坤，〈冷戰中的文化傳承——張國興與亞洲影業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193 期（2022，香港），頁 142–159。
- 許卓，〈冷戰初期美國在菲律賓心理宣傳活動探究——從亞洲基金會的“民主種子”項目為例〉，《國際政治研究》202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16–133。



- 戴超武，〈“新冷戰史”與當代美國外交史學思潮〉，《美國研究》(1999，北京)，頁 38–51。
- 牛可，〈超越外交史：從外交史批判運動到新冷戰史的興起〉，《冷戰國際史研究》(2014，上海)，頁 1–37。
- 市原麻衣子，〈アジア財団を通じた日米特殊関係の形成？－日本の現代中國研究に対する CIA のソフトパワー行使－〉，《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260 号 (2015，名古屋)，頁 299–318。
- 利亮時，〈1950 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第 17 期 (2006，臺中)，頁 533–552。
- 陳曼華，〈新潮之湧：美國新聞處美國藝術展覽與臺灣現代藝術 (1950–1960 年代)〉，《臺灣美術》109 期 (2017，臺中)，頁 27–48。
- 薛月順，〈臺灣「草蝦王國」的形成 (1968–1988)——政府與民間扮演的角色〉，《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 (臺北，2010)，頁 139–176。
- 薛月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臺灣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國史館館刊》第 36 期 (臺北，2013)，頁 99–139。
- 李盈慧，〈1949 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暨大學報》第 1 卷第 1 期 (1997，南投)，頁 165–193。
- 呂芳上，〈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發展〉，收錄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 (1945–1960s)》(臺北：國史館，2015)，頁 253–285。
- 蕭高彥，〈五〇年代臺灣自由觀念的系譜：張佛泉、《自由中國》與新儒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 卷 3 期 (2014，臺北)，頁 387–425。
- 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 1950 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收錄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臺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頁 207–262。
- 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民國 39–47 年）的僑務工作〉，《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31 期 (2007，南投)，頁 181–208。
- 紹軒磊，〈「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 (2009，臺北)，頁 71–90。
- 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第 70 期 (2022，臺北)，頁 167–244。
-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42, 2013, pp. 327–343.



- Frank Gerits, "Hungry Minds: Eisenhower's Cultural Assistance to Sub-Saharan Africa, 1953–1961." *Diplomatic History*, Vol. 41, No. 3, 2017, pp.594–619.
- Gordon Johnst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Vol. 35, No. 3, 2010, pp. 290–307.
- Immanuel Wallerstein, "What Cold War in Asia?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oston: Brill, 2010.
- Kenny K. K. NG, "Soft-boiled, anti-communist romance: The Story Paper and Liu Yichang's A Singapore Story." in Jeremy E. Taylor, Lanjun Xu eds, *Chineseness and the Cold War Contested Cultures and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and Hong Ko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94–109.
- Mai Isoyama, "The Asia Foundation's Cold War Influence on Tadao Yanaihara'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Japa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31, 2020, pp.201–221.
- 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3, 2000, pp.739–769.
-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2, 1999, pp. 501–524.
- Meredith Oyen,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oston: Brill, 2010), pp. 59–93.
- Noriko Kamachi,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Debate of Japanese China Specialists over American Research Fun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4, 1975, pp.981–994.
- Peter Kindsvatter, "Report on the Temple University Conference – Exploring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 Vol.26, No.4, 1996, pp.12–19.
- Scott Lucas, "Campaigns of Truth: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American Ideology, 1951–195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2, 1996, pp.279–302.



Scott Lucas, “‘Total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A Commentary.” in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and Frank Schumacher ed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pp.206–214.

Scott Lucas, “Beyond Freedom, Beyond Control: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in the Cold War.” in Hans Krabbendam and Giles Scott-Smith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40–56.

Shuang Shen, “Empire of Inform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s Network and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7, pp. 589–610.

Ting-Hong Wong, College Admiss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Cas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e 1950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6, pp. 331–357.

Wen-Qing Ngoei, “The Domino Logic of the Darkest Moment: The Fall of Singapore, the Atlantic Echo Chamber, and ‘Chinese Penetration’ in U.S. Cold War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21, no. 3, 2014, pp. 215–245.

四、近人專著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1985。

王世榕，《第三部門：美國亞洲協會與台灣》。高雄：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1997。

官有垣，《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臺灣社會發展》。臺北，智勝文化，2004。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2。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新北：稻香出版社，201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臺北：衛城，2017。



-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臺北：春山，2023。
- 若林正文著，洪郁如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16。
- 若林正文著，何義麟等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新北：
大家出版，2020
-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1988》。臺北：
聯經，2015。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臺
北：遠足文化，2017。
-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遠足文化，
2021。
- 唐耐心著、新新聞編譯小組譯，《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 至
1992》。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1995。
- 張楊，《文化冷戰：美國的青年領袖項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
稻鄉出版社，1996）。
- 薛化元，《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臺北：遠流，2020。
- 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2020。
- 文安立著，牛可等譯，《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
北京：世界圖書，2014。
- 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1953–1968）》。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
- 王賡武，《天下華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 翟韜，《文化冷戰與認同塑造：美國對東南亞華人華僑宣傳研究（1949–1965）》。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
- 翁台生，《西方公司的故事：CIA 在臺活動秘辛》。臺北：聯經，1991。
- 蕭新煌、江明修、官有垣編，《基金會在臺灣：結構與類型》。臺北：巨流，2006。
-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臺北：商務，2010。
- 夏誠華，《民國以來的僑務與僑教研究（1912–2004）》。新竹：玄奘大學海外華
人研究中心，2005。



Michael A. Szonyi 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Michael E. Latham 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Jürgen Osterhammel and Jan C. Jansen 著，傅熙理譯，《帝國主義的末日：去殖民的風潮吹過亞洲與非洲，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版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9。

John Lewis Gaddis 著，時殷弘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Cosmopolitanism: Period Style in 1950s Korean Cine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Cho Tong-jae, Park Tae-jin, Edward Reed, *A Partner for Change Six Decades of The Asia Foundation in Korea*. Seoul: The Asia Foundation, 2017.

David F. Schmitz,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65-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ugene B. Ford, *Cold War Monks: Buddhism and America's Secre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Gregg A. Brazinsky,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Hugh Wilford,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Calling the Tune?* London: Frank Cass, 2003.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 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 Luc Dongen, Stéphanie Roulin, Giles Scott-Smith eds, *Transnational Anti-Communism and the Cold War: Agents,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Jennifer M. Miller, *Cold War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 Masuda Hajimu, *Cold War Crucible: The Korean Conflict and the Postwar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eghan Elizabeth Kallman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eds, *The Third Sect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NGOs, and Nonprofi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 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eter Romijn, Giles Scott-Smith and Joes Segal eds, *Divided Dreamworl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East and W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 Rhodri Jeffreys-Jones,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8.
- Shawn J. Parry-Giles, *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5*. Westport: Praeger, 2002.
- Stephen G. Craft, *American Justice in Taiwan: The 1957 Riot and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6.
- 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 Susan Buck-Morss,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 Tony Smith, *Why Wilson Matters: The Origin of America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Crisis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五、學位論文

- 文馨瑩，〈美援與臺灣的依賴發展〉。臺北：臺灣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1989。
-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5。
-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15。
- 陳月萍，〈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 范雅梅，〈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鐘瀚樞，〈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美援教育計畫〉。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 陳慧嬌，〈偶然身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分認同〉。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張齊顯，〈戰後美國對華經濟之援助：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之研究（1948–195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



李仕寧，〈李度與中國海關（1943–195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

曾信豪，〈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遠東難民計畫的國際合作（1954–19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23。

賴韋廷，〈中華民國對外文化冷戰：以外交部對美宣傳為中心，1949–198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3。

六、網路資源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1951–1996,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090158>, accessed Mar. 14, 2023.

David Nelson Row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https://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kt3p3034kd/entire_text/, accessed Apr. 13, 2023.

F. Earl Swisher Paper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University of Libraries, <https://archives.colorado.edu/repositories/2/resources/336>, accessed Jun. 28, 2022.

Lyman Hoover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https://archives.yale.edu/repositories/4/resources/309>, accessed Nov. 13, 2023.

Alan Valentin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Libraries,

<https://rbSCP.lib.rochester.edu/1784>, accessed Mar. 14, 2023.

Charles Burress, "James L. Stewart—longtime liaison to Asia." SFGATE, Jan. 29, 2006, <https://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James-L-Stewart-longtime-liaison-to-Asia-2523343.php>, accessed Apr. 13, 2023.

"Lester Knox Little, 89 Dies; Headed the Chinese Customs." New York Times, Oct. 31, 1981, <https://www.nytimes.com/1981/10/31/obituaries/lester-knox-little89-dies-headed-the-chinese-customs.html>, accessed Mar. 15, 2023.

"Edgar Pike, AID Official in Mideast," Aug. 31, 1980.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reurl.cc/x9R0j1>, accessed Jul. 6, 2022.

About the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about/>, accessed Mar. 15, 2023.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 accessed Mar. 15, 2023.



「Office of the Historian」網站，網址：<https://history.state.gov/>。檢索日期：2023年3月10日。

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RG 306),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foreign-policy/related-records/rg-306>,
accessed Nov. 16, 2021.

「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
<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k=dgmain>，檢索日期：2023年7月15日

「學生問題研究所資料」，東京大學學術資產等アーカイブズポータル，
<https://da.dl.itc.u-tokyo.ac.jp/portal/assets/94efba10-e24a-47a0-a3ae-11f91dbcc67b>，檢索日期：2023年6月25日。

「張福運」，近代春秋 TIS 人物索引，<https://reurl.cc/x7WKjL>，檢索日期：2023年5月15日。

「董時進」，近代春秋 TIS 人物索引，<https://reurl.cc/p6NNy8>，檢索日期：2023年8月8日。

謝雄立，〈中國之友史麟書〉，《馬祖日報》，1957年10月27日，網址：
<https://data.matsu-news.gov.tw/>，檢索日期：2023年7月9日。



附錄

附錄一、亞洲基金會成立之初的遠東政策（1951）¹

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列寧與史太林之迭次宣言已表現蘇聯理論家之斷論，認定『亞洲之轉變即為世界之轉變』。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亞洲民族主義之復興乃成為蘇聯破壞攻擊之目標。一般人民對於改善個人福利與生活及國家獨立之固有願望，已有若干部份被佛口蛇心之馬克斯共產意識所迷惑。因缺乏傳播眞理之媒介，此等人民未能認識凡歸服於共產黨統治下之人民或國家，無一獲享受自由或生活改善之效果。在西方人士心目中，今日之中國已足證明一個民族已在共產黨鞭撻下完全淪為奴隸。在亞洲鐵幕後因被杜撰新聞及受檢查所矇蔽，若非以一正確之機構為之申述，而將其真相傳播，則對此種事實無由認識。本協會之使命，不獨為使亞洲人民認識被蘇聯帝國併吞之惡果，而且號召彼等參加反共運動，以期自由與改善生活之目標得以實現。

美國之特許菲律賓獨立，贊助印尼獨立，以及以經濟援助及第四點計劃施諸台灣與東南亞等地，均足為美國對促進亞洲國家獨立與民族繁榮極表關懷之明証。英國之給予印度及緬甸以自治領地位，亦可證明西方各國已接受亞洲各國應有獨立與自治之權利，此與蘇聯對待中國之所為完全相反。法國對越南聯邦而抗拒蘇聯所指揮之胡志明叛亂，可使越南國民政府有逐漸發展併入法國政府體制之希望，而其對外之防衛，則受法國軍事之保護。英國正擴大馬來亞政府之代議制，並謀減少及消除馬來亞之種族糾紛，同時，保護其人民，以免受共產叛徒之侵入；以人民對民主政制所產生之能力必可使代議政府有獲改進之希望。

南韓國軍在聯合國總司令領導下，保衛其民族主義，足以表明其反抗共產黨侵略所付之代價與犧牲。如蘇聯之野心不息，則其他亞洲國家亦將面臨同樣之事實。日本人民之改造，重新加入自由國家之集團，以及彼等對促進民主自由之關切，均為民主生活方式所可能影响之有力例証。關於此點，亞洲人民仍須加以說服。

¹ 全文收於《自由亞洲協會計畫書》(San Francisco: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 1951)，收錄〈自由亞洲委員會〉，《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90901-0061 。

中國人民及其旅居海外之同胞對增強及擴大民主政制基礎之熱望，經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佈之憲法中有所規定，並已在相當範圍之內，實施於台灣。民主政制之實行，包括現任政權繼任人之選舉，亦已規定於該憲法中。俟該憲法完全發生效力之時，中國人民可得保証以獲見為國家謀利益之自由政府。因此維護台灣島上之自由以及擊敗中國大陸上之共產主義，亦為自由亞洲協會之目標。

在美國方面，有許多熱心人士與團體只須有聯繫路線之機構，便可為自由亞洲作有力之表示；在亞洲方面，亦有許多熱心人士與團體，只須有一種表示合作願望之媒介，便可為自由制度之維護。吾人希望此種利害與共之關係，將使若干全國協會成立於亞洲各大都市之中心地點。本協會將與各熱心人士及團體通訊，以便向亞洲送發出版物。此種全國協會將由各國之熱心公益人士組織之，以代本協會分發刊物，並對有關各該地共產黨之侵畧作新聞與意見之交換橋樑。

本協會亦將設法在當地以普遍之文字編印社論。凡有關降服於共產主義者，將以其後果在當地之顯淺報章發表，並繪圖描述之，使此種描寫散佈於百姓家，以揭露共產黨如何破壞家庭制度及其習俗；如何擄劫工人及農民，以擴充共軍；如何強迫勞役以及如何在秘密控訴暴徒公審制度下，使人類之尊嚴，人格與自由喪失殆盡！

本協會之效能，端賴在亞洲各國當地人民之密切合作以及各該地有能幹之作家熱心參加本協會所主持之出版工作；並將請准各地政府特許編輯人員得享完全之言論自由。本協會正與全美自由歐洲協會所處之地位相同，吾人之計劃能否成功，視乎一般社會人士之反應如何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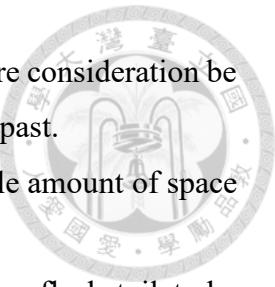
美國政府在國際行為上之最高原則不作積極性之情報及教育計劃，以影响他國人與團體之政治行為。維護個人自由及國家獨立，必須自由人士以其個人資格，無分種族國界，熱烈參加，共同合作，因此，各自由國家之人民，務須聯合起來，為個人之自由及國家之獨立，全面參加此種國際運動，以補充及贊助各該政府之努力，始可戰勝赤色法西斯主義之陰謀侵畧。

會長谷禮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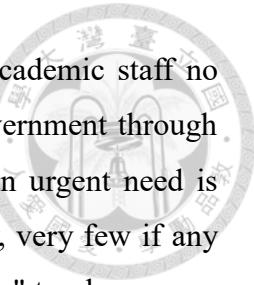
附錄二、葛萊克「臺灣僑生教育報告」25 點建議（1953）²

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careful study be made immediately of the need for professionally trained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and in Southeast Asia.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study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made of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past two or three years of the colleges in Taiwan and in a few selected institutions in other portions of Southeast Asia. The fact that a college graduate is on a government payroll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he is satisfactorily employed. If he is just there killing time on a "stand by" basis his employmen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satisfactory.
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enrolment of local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s of Taiwan be stabilized at levels not in excess of those at present until an accurate measure of local needs be determined.
3. It is recognized that large numbers of capable young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are clamoring for admission to the college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screen out large numbers of young people who could benefit from additional trai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a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the work in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t is probable that surplus plant space already exists in the normal schools.
4.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Free China is operating on an austerity program and must make full use of all her facil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48 hours per week be considered minimal for the use of academic plants and no more academic buildings be built until the utilization of academic plant space is much greater than it is at present.
5.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connection with additional teaching loads, salary adjustments be made which wi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increase made in the teaching load. This is to compensate them for income less because of their relinquishment of other part-time jobs they now have.
6. It is recommended that overseas students be not admitted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in Taiwan until there is suitable residential housing to accommodate them.

² Hugh C. Gregg, 「Report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aiwan」(1955 年 3 月), 收錄〈中美雙方會商東南亞僑教問題案〉,《行政院》, 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 AA00000000A/0042/7-7/1。



7.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hen dormitories are built in the future more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the problem of clothes storage than has been given in the past.
8. It is recommended when new dormitories are built that a reasonable amount of space be provided for social activities.
9.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all new dormitories built in the future, flush toilets be included in the specifications.
10.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hower bathrooms equipped to provide both hot and cold water be included in the specifications for all new dormitories
1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each new dormitory washrooms be included in the plans and be made a part of the dormitory itself.
1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hen new dormitories are built they be made to serve overseas and local students,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space used by local students will be compensated for by assigning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space in existing dormitories to overseas students.
13.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in overseas secondary Chinese schools special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the housing needs in Taiwan Teachers College to facilitate such a program.
14.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study be made of each of the libraries by a trained college librarian looking toward the logical and 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the library plants in each of the colleges.
15.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ies be made of book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ies and that additions be made so as to bring them more nearly in harmony with current standards.
16.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f United States funds are to be used for the purchase of library books, it should be with the distinct understanding that such books will be so housed that they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ully and freely for student use. Frequently, but not always this may be accomplished by housing them in the general library.
17.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rental text book library in each institution serving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at rental rates be set at levels within reach of students of limited means.
18. It is recommended that before any new dining halls are buil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a two-shift" system for the food service and that whatever money can be had for dining hall purposes be used for improving means of fly and other insect controls.



19. It is recommended that because of the adequacy of the present academic staff no faculty homes be built with money supplied by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rough the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or other agencies unless an urgent need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Such instances should be very rare and very, very few if any exceptions should be made until the loads for the so called "fulltime" teachers come much nearer measuring up to Western standards.
20. It is recommended that U.S. aid be given to the Government of Free China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struction in the colleges participating in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to overseas students.
2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ssistance be given to Free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ynamic student personnel programs on the campuses of the college provid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overseas students.
2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ssistance be offered Free China on a study of curriculums.
23.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f the time should come when more academic buildings are required, they be added to existing plants rather than being set up as separate institutions for overseas students.
24.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a change in the school calendar so as to reduce the long mid-year holiday.
25.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nsideration be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of Free China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ovinci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xisting colleges be reorganized into a Provincial University with the units on scattered campuses so that degrees granted for educational work done in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in the name of Taiwan Provincial University. This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satisfying the prestige desired by most overseas, as well as by many local students.



附錄三、亞洲基金會臺灣辦事處 1961 年工作一覽³

亞洲協會駐中華民國代表辦事處設立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工作目標包括下列各項：

- (一) 協助學者達到他們的目標——建設性的思想，表現，研究及教學。
- (二) 鼓勵社會、經濟及教育問題之研究以求改進實際問題。
- (三) 協助研究環境之改善，以吸引優秀中國學人
- (四) 協助科學及技術之發展，以加強中國在技術及學術上之成就。
- (五) 促進中華民國和其他國家間學術上之聯繫。
- (六) 協助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以配合現代生活之工作

下列為一代表性之名單，例舉過去一年中與本會合作之機構：

1. 教育部

- 於十所示範小學內資助流動科學實驗器材之設計及試用，以加強低年級的科學教學。
- 資助中小學生全國科學展覽會。
- 資助以中小學生為對象的科學問答廣播節目。
- 供給科學書籍以備中小學科學教科書重訂時之參考。
- 旅費資助一官員前赴澳洲考察在墨爾鉢及雪梨的中等教育。
- 旅費資助一官員前赴歐洲研究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的情況。
- 旅費資助一位數學專家前赴德國參加國際會議。

2. 中央研究院

- 資助南港學人新村的建築。
- 購置微粒攝影器材一套。
- 繼續資助現代歷史資料之出版，該項資料係由中國外交部移交中央研究院者。
- 資助物理學外籍客座教授一位為期三年。

³ 中華民國分會編印，《亞洲協會簡介》(臺北：氏著，1961)，頁 4–10。收於〈福特基金委員會亞；亞洲基金協會〉，《外交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451.1/40。



- 撥款購置特種學術書籍。
 - 旅費資助語言學家一位前往美國進修。
3.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 資助設立國家研究獎金為期三年，本會資助包括在科學方面的研究獎金名額十五名。
4. 僑務委員會
- 繼續協助僑生教育。
5. 國立台灣大學
- 協助在法學院設立社會學系，並在農學院成立農村社會經濟研究所。
 - 資助化學及歷史兩系的研究工作。
 - 專科書籍以備農學院教學研究之用。
 - 旅費資助近代史教授一位前赴日本韓國從事研究近代史資料。
 - 旅費資助教授兩位前赴日本參加第三屆日本放射同位元素會議。
 - 旅費資助農化教授一位參加美國暑期科學教師講習會（放射生物學）。
 - 資助近代史教授一位從事有關中共歷史之研究工作。
6. 省立師範大學
- 繼續支持英語教學中心：聘請美籍英語教師於該中心執教，供應英語教學設備及書籍，並資助中國教師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
 - 購買樂器贈與該校音樂系。
 - 旅費資助教授一位赴日考察中等教育及日光能研究設施。
 - 旅費資助教授三位參加美國暑期科學教師講習會。
 - 旅費支持中國英語教授兩位考察日本英語教學設施。
7. 東海大學
- 購置圖書館設備。
 - 旅費支持教授一位應聘赴日本大坂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
 - 購置有關遠東近代史的書籍。
 - 旅費支持中國哲學教授一位赴日考察該國漢學研究實況。
 - 旅費資助教授一位赴沖繩島研究該地歷史與地理。
 - 旅費支持體育助教一位前往美國俄勒崗大學進修。



8. 東吳大學
 - 資助關於臺灣少年犯罪問題研究工作。
 - 資助法學院刊印中英文教科書籍。
9. 中央圖書館
 - 資助該館編撰發行中華民國出版圖書英文選目（包括民國四十八年至四十九年）。
 - 資助編撰出版中華民國學術機構錄。
10. 國立歷史博物館
 - 資助舉辦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西畫巡迴展覽遍及高雄、臺南、臺中及花蓮等地。
 - 旅費資助高級行政人員一位考察歐洲博物院。
11. 基督教青年會
 - 資助福隆海濱青年訓練夏令營
 - 旅費資助體育導師一位至美國春田大學進修
 - 旅費資助幹事一位參加國際青年會總會舉辦之進修會，並考察香港日本二地青年會工作情況
12. 台灣省國民就業輔導中心
 - 資助該中心從事研究本省學徒就業情形，並捐贈就業輔導書籍。
13. 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
 - 資助出版中文臺灣地誌第二集。
14. 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
 - 資助出版「科學教育」月刊。
 - 資助專家一位赴日考察日本全國科學展覽會。
15. 中華科學協進會
 - 資助「科學畫報」雜誌在臺復刊。
16. 大陸雜誌出版社
 - 繼續支持「大陸雜誌」——該刊物以發揚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為宗旨。



17. 亞洲婦女協會聯盟

- 該組織於一九六〇年在臺北舉行之年會曾得本會部份資助。

18. 新聞學

- 以獎學金及旅費協助三個新聞事業機構之新聞記者分別前赴哈佛，史丹福及哥倫比亞三大學進修。

19. 其他

- 支持華盛頓大學舉辦一九六〇年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本會以旅費資助中國學人前赴西雅圖出席會議，並撥款協助部份中國學人在美作旅行考察
- 津貼現在國立政治大學執教的韓國訪問教授一位，並以有關美國文化的幻燈片全套供給政大一位美國訪問教授作教學之用。
- 以研究獎學金供給外交部職員一位前往美國國會實習進修一年。
- 旅費資助內政部官員一名出席香港大學主辦之東部地區公共行政會議。
- 旅費資助國際學舍行政人員一位前赴美日二國考察該二國內各國際學舍業務。
- 旅費資助臺灣博物館專家一位參加在日本舉行之第十二屆國際保護鳥類會議。
- 資助家庭計劃協會設立棄兒疾病緊急動用調轉基金。
- 資助四健會代表兩位在國際農村青年交換計劃項下前赴美國。
- 資助中聲廣播電臺舉辦廣播編劇及演劇一九六〇年暑期講習會。

20. 贈送書籍

- 在「亞洲學生贈書計劃」之下，本會在中華民國分送約四萬冊書籍及四千冊刊物至各大專學校、軍事學校，圖書館，學術機關及其他學校，下列係主要分發機構：

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省立師範大學、省立成功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中央警官學校、軍官外語學校、省立農學院、淡江文理學校、陸軍史政處、海軍官校、金門戰地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自然科學促進會、石門水庫圖書館。